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版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维普网全文收录期刊

东方论坛

EASTERN FORUM

1988年创刊 双月刊
2023年第4期
(总第182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胡金焱

委 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卞建华	蔡颖雯	陈德球	陈洪连	陈瑞华
董志勇	窦秀艳	方 雷	何云峰	侯传文
胡金焱	黄速建	姜异新	姜振昌	刘东方
刘京希	刘喜华	刘跃进	吕周聚	马斗成
孟天运	孙百才	孙继国	谭好哲	王立胜
王庆金	王绍波	王兆胜	王子今	尉利工
魏 建	吴义勤	肖建红	钟永光	周 潇

主 编：孙继国

副主编：冯济平 侯德彤

1988 年创刊

2023

东方论坛

4

双月刊

总第 182 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杂文时代的“鲁迅风”：动态竞争中的窘迫和嬗变

姜振昌 黄 岩 · 1 ·

从母体孕育内省

——海子《太阳·土地篇》论

董迎春 · 16 ·

□ 东方文化

礼图与笙诗：贵族社会的仪式与文艺生活

张树国 · 28 ·

□ 历史研究

汉代人视阈中的商业

宋艳萍 · 43 ·

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

马小菲 · 62 ·

李大钊的家国情怀及其历史影响	王令金 · 74 ·
----------------	------------

□ 经济研究

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与对策	尹振涛 汪 勇 · 85 ·
------------------	----------------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基于慈善捐赠的时空演化视角	吕承超 阎佳琪 · 96 ·
------------------------	----------------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非正式约束何以激发企业家精神	高 歌 · 111 ·
-------------------------	-------------

□ 语言学研究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论析	聂志平 · 121 ·
-------------------	-------------

话题的演变与觅材取材	姜言胜 洪仁善 · 141 ·
------------	-----------------

□ 社会治理

复合型治理：破解基层政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逻辑进路	王 义 · 149 ·
-----------------------------	-------------

THE EASTERN FORUM

The Contents of the 4th Issue for 2023

"Lu Xun Style" in the Essay Era: Embarrassment and Evolution in Dynamic Competition

..... Jiang Zhenchang Huang Yan (1)

Breeding Introspection from the Matrix - On Haizi's *The Land of The Sun* Series... Dong Yingchun (16)

Rites and *Sheng* Poems: Rituals and Literary and Artistic Life in Noble Society.....Zhang Shuguo (28)

Commerce in the Eyes of the People of the Han DynastySong Yanping (43)

Wang Chong's Experience as an Official and His View of FateMa Xiaofei (62)

Li Dazhao's Patriotism and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Wang Lingjin (74)

How Digital Finance Supports the Real Economy: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 Yin Zhentao Wang Yong (85)

The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 in China: A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Perspective Based on Charitable Donation..... Lyu Chengchao Yan Jiaqi (96)

Rol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Inspiring Entrepreneurship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Gao Ge (111)

An Analysis of Saussure's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Nie Zhiping (121)

The Evolution of Topoi in Relation to Rhetorical Invention

.....Jiang Yansheng Hong Renshan (141)

Compound Governance: The Logical Approach of Breaking the "Formalism at

the Fingertips"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Wang Yi (149)

英文翻译：岳玉庆

杂文时代的“鲁迅风”： 动态竞争中的窘迫和嬗变

姜振昌¹ 黄岩²

1. 青岛大学 鲁迅研究中心, 山东 青岛 266071; 2.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 国民党执政当局的压制, 使 1930 年代“鲁迅风”杂文愈挫愈奋, 并带来杂文“委婉含蓄”的艺术嬗变。作家间的论争和“敌”对作家的竞创作品, 也给予动态竞争中的“鲁迅风”杂文以有效的正反面动能, 共同玉成其艺术价值的大厦。

关键词: “鲁迅风”杂文; 隐匿曲折; 含泪的微笑; 论争与竞创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3) 04-0001-15

以“鲁迅风”杂文为标志, 中国文学的 1930 年代被称之为是“杂文的时代”, 作家队伍壮大, 优秀作品林立, 艺术内涵丰富, 以至于茅盾先生说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既不同于世界各国文学史、也不同于中国历代文学史的特点”^①。但 1930 年代却并不是一个通常繁荣文艺所需要的社会稳定和“王纲解纽”的时代。它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另一种情形: “关于艺术, 大家知道, 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 因而也不是与那好像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基础相适应的。”^②从艺术发展史来看, 这种“某些繁荣时代”指的应是两个社会发展的交替时期。1930 年代的中国就属于这样的时期, 其内忧外患的加剧和政治统治的腐败所导致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激变, 充满着对艺术的需求和激励的动能因素。

然而, 1930 年代的“鲁迅风”杂文繁荣又同历史上新旧交替的大变动时代的文艺现象如欧洲文艺复兴、中国春秋战国之交的散文兴盛等不尽相同。由于国民党执政当局在实行军事统治的同时实行了残酷的政治文化统治, 使动乱中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处士横议、自由争鸣的有利于文艺繁荣的局面, 相反的倒是更多地为文艺设立了种种禁令^③。因此 1930 年代的杂文繁荣又有自己独到的时代特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鲁迅杂文艺术研究”(21BZW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姜振昌, 男, 山东昌邑人, 青岛大学鲁迅研究中心教授、临沂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鲁迅研究; 黄岩, 女, 山东章丘人,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②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94页。

③ 参见张静庐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倪墨炎编:《三十年代反动派压迫新文学的史料辑录》,《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色:像大石底下萌发的大树一样,在被迫压的社会夹缝中竞争屹立、生生不息。

—

1930年代的杂文受到国民党执政当局的摧残与压制,是它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生于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杂文是以广泛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其主要特色。随着1920年代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趋激化,国民党执政当局越来越暴露出其反动和腐败的面目,使国家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民族忧患意识驱使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作家决然更加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文艺家跳出狭隘的个人的小圈子、超越泛泛地文化批评的窠臼去说“社会的话”。正如周扬当时所说:“中国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有民族良知的作家都不能对于政治采取超然态度。”^①这样,“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的杂文,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体目标,服务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时政斗争,去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②,就是势所必然的了。杂文时代意识的这种变化,从1920年代中期“语丝派”的创作中就已见到端倪,到1930年代又演变为大多数“鲁迅风”杂文作者的自觉行为,以至于鲁迅把它总结为“对于时局的愤言”。鲁迅在1930年代结集出版的杂文集计有《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和三本《且介亭杂文》等八部,作品虽然对三教九流、古今中外、市井琐闻等人生万象无不关涉,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便是对腐败的执政当局投降媚外、专制独裁、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等反动统治进行抨击的作品。例如,鲁迅在《自由谈》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逃”的合理化》就辛辣地嘲讽了国民党执政当局于大敌当前之际,为掩饰其自动放弃山海关等长城要隘、反操纵一些人责骂学生的爱国活动是“贪生怕死”的卑劣。接着,鲁迅又在《自由谈》连续发表了《观斗》《航空救国三愿》《战略关系》《迎头经》《中国人的生命圈》《不负责任的坦克车》等一系列同样锋芒所向的作品。鲁迅仍有意识地在针砭“国民性”中的“陋劣”,但他已不再笼统地使用“国民性”的概念,也不是单单从文化传统中挖掘造成这些“陋劣”的根源,而是十分注意把国民性的改造同针砭时弊结合起来。例如,《新秋杂识(二)》确实对上海的善男信女热衷于开孟兰胜会、从天狗嘴里救月亮等迷信活动忧心如焚,但愚顽的根源却在于,国土相继沦陷,灾民不计其数,“不但救不胜救,即使想要救罢,一开口,说不定自己就危险”^③,所以最稳妥的是救鬼魂,救月亮。反动政治统治正是制造并利用这些愚昧现象的罪魁。鲁迅还在《沙》中指出:中国人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④。茅盾也不例外,他于1933年上半年在《自由谈》发表的29篇作品中,除了两篇是欢迎肖伯纳来华的、两篇是讽刺曾今可的“解放词”的,其余的如《谈蝙蝠》《“自杀”与“被杀”》等均是“抨时政、砭锢弊”的力作。鲁迅和茅盾是《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也是“鲁迅风”杂文的中坚和引领者,仅黎烈文接编《自由谈》的初期(1933年12月至1934年5月)半年之内发表的六百余篇作品中,这类作品就占了一半还多。它们以形形色色的现实“病象”为依据

① 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29页。

②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77页。

③ 鲁迅:《新秋杂识(二)》,《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0—281页。

④ 鲁迅:《沙》,《鲁迅全集》第4卷,第549页。

展开论辨：如“读经和复古救国论”（曹聚仁《读经请愿记》、祝秀侠《“文化城”有感》、克《回到古代去》、致立《谈皇帝》、风子《拍卖文明》）、“诈伪民主”（徐懋庸《女主人与小犬》、欧阳山《何必多问》）、“航空救国”（鲁迅《航空救国三愿》、张天翼《航空救国之一端》、阳秋《航空救国》、楼适夷《航空救国》、招勉之《学乖》）、“丧权媚外”（郁达夫《谈健忘》、彭家煌《虾和鳝及其他》、古飞《西崽哲学》、鲁迅《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围剿苏区杀戮人民”（干《伸冤》、鲁迅《〈杀错了人〉异议》）、“钳制和伪饰舆论”（风子《官刑及其他》、止水《预言》、子展《正面文章反看法》、鲁迅《推背图》《言论自由的界限》）、“搜刮民脂民膏”（鲁迅《现代史》、达伍《从正经到幽默》）、“视爱国学生如乱麻”（鲁迅《逃的辩护》、曹聚仁《杀错了人》）、“安内攘外”（杜重远《最可怕的是什么？》、鲁迅《文章与题目》）等，尖锐抨击的几乎都是国民党执政当局的腐朽没落和黑暗政治统治。难怪有御用文人大声疾呼：“《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像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①这段话虽暗藏杀机，但它的确道出了《自由谈》在杂色并陈的表象之下，具有明确的“左翼文学”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性的事实。这在《生活》《新语林》《中华日报·动向》《芒种》《太白》等刊物那里，表现得也都很明显。

当然不能简单地把1930年代杂文统归纳为时事的风雨表和政治的“鼓动的工具”，它们也仍然在广阔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中保持着独立而深刻的文化反思意识，也包含着对人生哲学的悟道、怡情的潜移默化的审美功能，其创作题旨是多向性的。然而从主导方面说，要求作“感应的神经”、与时政活动保持同步，确已成为“鲁迅风”杂文最倾心的精神家园。作家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执著而又特别不留情面地针砭现实时政中违背世情抑或丑陋、污浊的精神缺憾，构成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杂文的最精彩、最有生气的部分。其勇敢真诚的艺术追求中，仿佛喻示着中华民族全部的忧虑不安、人心向背、情感智慧。如果说，文学确有“经过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誉，那么，“鲁迅风”杂文就该属于范例。这与执政当局的政情和禁令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当执政者同历史上一切没落阶级一样病入膏肓而又讳疾忌医、穷途末路而又不愿也不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必然会大动干戈、扼杀一切正义之声，尤其要扼杀杂文这种“论时事不留面子”^②的时代的“林中响箭”。

人类社会进入文明史以来，执政当局和黑暗政治的压制所造成的几乎都是文学艺术的衰败，而1930年代的杂文何以能是一个例外呢？这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由种种复杂因素构成的特殊原因。关键是壮大的精英体的杂文作家队伍^③能“排角成城以御强敌”^④。像中国历史上许多“特立独行”之士

① 水手：《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社会新闻》第2卷第21期，1933年3月3日。

② 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页。

③ 计有鲁迅、茅盾、郭沫若、瞿秋白、冯雪峰、聂绀弩、徐诗荃、唐弢、徐懋庸、郁达夫、廖沫沙、曹聚仁、胡风、周木斋、阿英、陈子展、夏衍、何家槐、夏丏尊、夏征农、邹韬奋、魏猛克、彭康、冯乃超、欧阳山、胡衣凡、郑伯奇、陶行知、郑振铎、胡愈之、柯灵、李初梨、张天翼、巴金、陈望道、叶圣陶、彭家煌、欧阳凡海、杨幸之、谢六逸、李辉英、柳倩、穆木天、宋之的、杜重远、潘汉年、祝秀侠、李平心、张友渔、张香山、王任叔、姚蓬子、芦焚、楼适夷、吴景崧、马国亮、孔另境、任白戈、覃晓晴（静子）、周而复、司马文森、周建人、靳以、王孟宾、周立波、林林等。他们共同构成了“鲁迅风”的创作大潮。此外出版过杂文集的作者还有：周作人、林语堂、老舍、吴稚晖、废名、俞平伯、韩侍桁、林徽音、岂凡（章克标）、章太炎、梁实秋、沈从文、胡适、林希、钱歌川、李儵、梅雨（梅益）、周楞伽、何容、老向、姚倩、徐訏、陶亢德、苏汶、胡秋原、丰子恺、施蛰存、范玮、李迺梅、黄震遐、章乃器、黄天庐、王捷三、舒新城、柳湜、杨邨人、常乃惠、沈益士、杨晋豪、杨藻章、郑重、乌一蝶、翁漫栖、金满成、洪为法、郑逸梅、倪文穆、陈光珪、王世颖、李唯建等。

④ 鲁迅：《春末闲谈》，《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5页。

一样,他们压力越大,反抗越烈。鲁迅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①,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鲁迅风”作者的共同意志。鲁迅、郭沫若、邹韬奋、彭家煌、郁达夫、潘汉年、瞿秋白、冯雪峰、杜重远等都是在被国民党执政当局通缉、追捕的险恶情况下健笔不辍的。以至于执政当局真真地举起带血的屠刀:因一篇《闲话皇帝》杂文,编者杜重远身陷囹圄,作者艾寒松被通缉;曹聚仁因一篇漫论“汉奸”的《生背痛的人》,遭汪精卫严办;《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因《自由谈》而被暗杀……。但对于国民党执政当局来说,这仍然收效甚微。“血泪文章战士心”,如果说杂文创作中有高层次的、永久性的品格的话,这是首先的和重要的。

同样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国运民瘼和政治危机,“鲁迅风”杂文的针砭多又强调团队意识和协同精神。例如,鲁迅曾说当时的思想自由“不过是一句反话”^②,其《言论自由的界限》《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等,都深刻揭示了执政当局钳制言论“自由”的恶劣,“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③。鲁迅擎旗前引,其他作家也群起而攻之,仅《自由谈》一家刊物,在同一主题下就出现了郁达夫的《政权与民权》,达伍(廖沫沙)的《从外国回来的悲哀》,静子(覃晓晴)的《疯狂了的世界》,大圣的《再谈秀才的厄运》,马国亮的《不准哭》等。同样,前面举出的《自由谈》上群体进行的类型主题创作,也都是群体协作的产物。如果我们再系统地检阅当时的主要杂文刊物,就可发现,这种做法还经常出现于刊物与刊物之间。例如,当陈子展和陈望道分别在《自由谈》发表《文言——白话——大众语》和《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针砭封建遗老们提出的“文言复兴”^④的口号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建设“大众语”的主张时,立即在《太白》《芒种》《新生(周刊)》《社会月报》等刊物那里得到反响。他们纷纷以显要位置刊发杂文作品,不仅赞同和深化着“大众语”的理论命题,而且给喧嚣一时的文化复古势力以有力一击。当《自由谈》火力全开对种种有名无实的“救国”谬论、特别是“航空救国”歪理展开抨击时,《涛声》也发表蒲公英的《谈谈重庆的航空救国》,《论语》发表凯的《航空筑路与变法兴学》,王诵之的《航空捐款处上当》等,还在的“月旦精华”栏的头条位置重新刊登鲁迅的《航空救国三愿》,表现出与《自由谈》同一的命题——中国不是没有飞机,只是不用于抗战,“航空救国”实则成为执政当局搜刮民脂民膏的假托和口实。当然,协同创作并非对主题简单地重复、扩大,更多的是相互补充、深化。例如,1933年初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平津告急,执政当局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却热衷于将北平大批古物装箱南运。鲁迅在《“逃”的合理化》和稍后的《崇实》中,已经对此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但鲁迅还嫌不够,认为这个题目“还大可做文章”,劝茅盾“不妨也写一篇”^⑤。于是,茅盾就在《自由谈》上发表了《欢迎古物》。鲁迅从“不准大学生逃难”而古物却能迁运两种事例的鲜明对比中揭示出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而古物却“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⑥。茅盾则抓住执政当局的洋奴心理展开透析,“不见洋大人撰述的许多讲到中华古国的书么?他们嘲笑猪一样的中华老百姓,却赞赏世界无比的中华古物呢!”为了不使“洋大人所叹”,当局便决不会“为了不值钱的老

① 鲁迅:《书信·330625 鲁迅致山本初枝信》,《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24页。

② 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页。

③ 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全集》第5卷,第116页。

④ 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南京《时代公论》周刊第110号,1934年5月。

⑤ 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⑥ 鲁迅:《崇实》,《鲁迅全集》第5卷,第12页。

百姓而失了值钱的古物”^①。鲁迅和茅盾揭示的都鞭辟入里,但角度不同,结论也各异,合起来看,问题的实质就更清楚了。至于鲁迅助力青年作者的事例如帮助曹聚仁谈“杀人”^②、支持唐弢谈“堕民”^③、协助廖沫沙论“推”^④、给瞿秋白改稿并与他一起联名写作^⑤等,更是不胜枚举。这就使杂文积累起了赢得受众并冲破禁锢的共同能量。

一

然而,以文人的笔去对付残暴的专制者的手枪决非易事,殉道的、大无畏的精神固然重要,而以“智”取胜的艺术策略也不可或缺,不然的话,似许褚般蛮劲十足地赤膊上阵,会带来无谓的创伤和牺牲,这是“鲁迅风”杂文所不取的。因而,与犀利质直的五四杂文相比,1930年代“鲁迅风”杂文因“保护色”的需要产生了浓化“委婉含蓄”的艺术嬗变。克罗齐在谈到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时说:“审美的作品的历史现出一些进步的周期,但每周期都有它的特殊问题,而且每周期只能对于那问题说,是进步的。许多人都按照一个大致相同的方式,在同一题材上用功夫没有能给它一个恰当形式,但是总在逼近一个恰当形式,那据说就是进步。等到一个人出来找到了那个恰当形式,那周期据说就已完成而进步也就终止了。”^⑥这里所谓周期中的艺术进步,无非就是艺术形式在时代的襁褓中逼近内在需要的演变,是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激化和统一构成艺术进步周期运动的主要动因和结果。这能说明“鲁迅风”杂文在五卅后周期运动中的变化。它为适应周期运动的规律“找到了那个恰当的形式”:

一是文风更趋“隐匿和曲折”。鲁迅1933年5月4日在给黎烈文的信中说:“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⑦当然,鲁迅的这种追求并非始于1930年代,早在1920年代的《语丝》时期他就意识到杂文应该“造语须曲折”,反对“锋铓太露”^⑧。所不同的是,《语丝》时期对“曲笔”的初步追求是为增加杂文的机锋与“诗美”而采取的一种修辞手段,而1930年代却主要是抗争的“智取”需要所引起的艺术形式的深层变革。

所谓“隐匿和曲折”,就是“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刘勰《文心雕龙·隐秀》)。正因如此,鲁迅杂文在当局的严密检查和御用文人们的两眼紧盯中能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准风月谈》所收的64篇作品,除《归厚》一篇外,全部是在要求“少发牢骚”之后的《自由谈》上刊出的,而“被删去的地方倒很少”^⑨。《伪自由书》所收1934年的作品中,被删削的也仅三篇。对此,鲁迅解释说:倘不是写成这样貌似“不痛不痒,痛煞痒煞”^⑩的文章,读者是决计看不到的。鲁迅在给瞿秋白修改《大观园的人才》时伸

① 茅盾:《欢迎古物》,《申报·自由谈》,1933年2月9日。

② 曹聚仁1933年4月10日在《自由谈》发表《杀错了人》,鲁迅即于4月12日发表《〈杀错了人〉异议》。

③ 唐弢1933年6月29日在《自由谈》发表《谈“堕民”》,鲁迅即于7月6日发表《我谈“堕民”》。

④ 廖沫沙1933年7月24日在《自由谈》发表《第三种人的“推”》,鲁迅即于7月27日发表《“推”的余谈》。

⑤ 鲁迅与瞿秋白1933年在上海联名发表杂文14篇,后均收入鲁迅的《伪自由书》。

⑥ [意]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48页。

⑦ 鲁迅:《书信·330504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

⑧ 鲁迅:《两地书·三二》,《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7页。

⑨ 鲁迅:《花边文学·序言》,《鲁迅全集》第5卷,第418页。

⑩ 鲁迅:《书信·330801致胡今虚》,《鲁迅全集》第12卷,第206页。

冤》等十多篇杂文时,舍疼割去的大都是过于直露的言辞和意思。很多作家也都心领神会鲁迅这般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艺术追求。徐懋庸自觉把“泼辣”尖锐的锋芒“‘隐藏’得非常含糊”(徐懋庸语);阿英则一改一贯的以气骋辞、咄咄逼人,努力作着“朦胧”“晦涩”的美学追求(《夜航小引》);连茅盾也力避着早期杂文的“硬棒棒”说理,推崇“妙语谈玄”;而唐弢、徐诗荃、聂绀弩、廖沫沙、柯灵等一批后起之秀则从一开始就将鲁迅的“婉转”笔法自觉当作效仿的楷模。这些作家作品“隐匿和曲折”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概其要者则是:或者以“阳秋”笔法借古喻今,暗中契合历史进程中古今相似的处所,对现实痛下针砭,如陈子展的《蓬庐絮语》、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或者将话搭话、随说漫说却“草蛇灰线”,于不经意中传达出作者的喜怒哀乐和价值判断,如唐弢的《土地和灶君》、鲁迅的《观斗》;或者托物言志、以此例彼,通过评述草木虫鱼、风花雪月等自然界的物相而寄寓政治性的倾向,表达作者对时风时政的否定情绪和针砭态度,如鲁迅的《谈蝙蝠》、唐弢的《两种虫类》;或者模糊其辞,真格的意向偏不说破,通篇的语境和议锋几乎都是没有确定性的谜团,同时又隐约地透出真实确定的端倪,在欲说还休、故弄破绽中引导读者探询谜底,如鲁迅的《现代史》、徐懋庸的《不知其味》;或者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说假话,在拿腔拿调的“佯谬”和反向的情感倾向中让人更感到“虚假信息”的虚假性,如鲁迅的《“非所计也”》、达伍的《从正经到幽默》;或者迂回包抄,犹如打仗之十面埋伏,并伏兵要道,使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断其归路,如瞿秋白的《大观园的人才》、鲁迅的《航空救国三愿》;或者声东击西,攻其不备,在“绕弯子”中凸显其着眼点,以巧妙一击致“敌”于死命,如杨霁云的《鸦片救国》、鲁迅的《文章与题目》;或者“设类取譬”,以“类型相”刻画为议论“媒介”生发开去,既为说理获取由头和机锋,又使理论“虚”起来,得到理念的“经营空白”、靠类比和启发制胜的艺术效果,如徐懋庸的《蛇与 SPHINX》、鲁迅的《二丑艺术》;或者以绕指柔的百炼钢纠缠软化顽症顽结,顽症不化,绕则不止,如闲斋的《泥沙杂拾》、鲁迅的《七论“文人相轻”》,等等。这就是1930年代作家赋予杂文艺术的“隐匿和曲折”,形式活泼,工艺多样,它确实能有效地钻过“文网”尽其批判职责,而又恰恰与恩格斯所说的“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①的美学原则相契合,它以其深刻的寓意、暗示等给人们留下审美感受和思考的广袤空间。

二是在“幽默+讽刺”中作“含泪的微笑”。中国现代杂文幽默的发轫仍然可以追溯到《语丝》时期,但其深化和成熟同样也是在1930年代。将对时政的针砭以幽默出之,往往会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赛珍珠说过“幽默与俏皮”能使作家在抨击执政要人确有危险的时期“免遭所忌”。“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如果不是将讽谏与戏谑调侃交揉一体,是不能实现“谲辞饰说,抑止昏暴”(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的。即便是后来发展到“为笑笑而笑笑”的林语堂,他提倡幽默的初衷也是这样,用他在《林语堂自传》中的话说,就是为了冲破当时的文化封锁,既要“暗示我们的思想”,又“不致身受牢狱之灾”。同时,幽默还能使作家在受压抑的情况下将胸中的“闷气”借笑的幌子哈哈地吐出来,“倘若二六时中,都意识着这悲惨,我们便到底不能生活了。于是我们就寻出了一条活路,而以笑了之。这心中一点的余裕,变愤为笑,化泪为笑……倘无幽默,这世间便是只好愤死的不合理的悲惨的

^① [德]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0页。

世界”^①。因此,鲁迅充分肯定了五四以来一些散文小品的“幽默和雍容”,并推崇用幽默“撕断绅士们的假面”的肖伯纳、赞赏“含泪的微笑”的果戈理,等等。在国民党文化高压政策面前,杂文作家们又迅速找到了幽默。鲁迅、瞿秋白、廖沫沙、郁达夫、徐懋庸、叶圣陶、丰子恺、柯灵、陈子展及陶亢德、老向、老舍、何容等,都有一些作品含着浓郁的幽默意味。

显然,由于现实的黑暗残酷和斗争的需要,使得幽默不能以纯轻松愉快的形式出现,“免不了改变样子”^②,作品常常是在苦与喜、清与涩、热与冷、温和与激烈、平淡与奇警、酸楚与辛辣等对立相悖的情感和意向间觅取谐合,为笑的艺术涂上一层深沉、严肃的色彩,亦即融合着浓浓的讽刺意蕴的“含泪的微笑”,收到亦庄亦谐的艺术效果。这类作品很多,其中鲁迅1933年在《论语》第13期发表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堪称范例。作品的题目就造成了引人入胜的谐趣。接着,由“缠足”论者的两大派说起,层层深入地“推论”下去。缠足——中庸与不中庸——胃病,看起来是多么风马牛不相及,但作者却把它们放在一起,那么认真地、那么煞有介事地考证着。两者的不协调造成了极大的妙趣,加之充满机智隽永的幽默语言,真使人忍俊不禁。但是,作品字里行间又“笑里藏刀”,例如,“现代评论派”曾诽谤鲁迅为“学匪”,鲁迅索性把它引入题目并摆出一副与“正统”的考古学派不同的姿态,给论敌以顺手一击。作品曾不厌其烦地考证中国的缠足,结论是“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实在是“过火”。鲁迅说:“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要所谓“除恶务尽”,杀掉还不算,还要“食肉寝皮”;但对外敌却非常谦恭非常大度地“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③。原来,文章的“杀机”就蕴藏在这里。这不正是对国民党执政当局草菅人命、安内攘外本质的揭示吗?更令人泪笑的是,孔夫子靠一车两马周游列国却不幸消化不良得胃病,与蒋介石的靠“一机两翼”四处拉拢诸侯、围剿苏区并疯狂敛财但又吃不消化不掉“病入膏肓”,何其神似。鲁迅的“笑”中体现出的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有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基础……于无足轻重的东西之中见出最高度的深刻意义”^④的真正的幽默,也是带讽刺的幽默。老舍在《自由谈》发表的《空城记》《励友人书》《打倒近视》、臧克家的《年前年后的忌讳》、元固的《“送去看”与“拿来看”》、徐懋庸的《女主人与小犬》等也都在风趣中透露了严肃的主题,使人作会心的微笑和冷静的沉思。这就是鲜明地打着抗争印记的1930年代幽默,环境的恶劣使它在“持平于欢乐和悲哀之间”^⑤闪烁着艺术辩证法的光芒。这是一代作家所特有的机智、受压抑的情感、深沉的思想与性格的艺术折射。用“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八个字,可以集中概括其特点。这同“隐匿和曲折”融为一体,使杂文的“艺术化”加浓、加深。国家不兴诗家兴,“蚌病生珠”的规律在1930年代得到了“鲁迅风”的充分验证。

① [日] 鹤见佑辅:《说幽默》,鲁迅译,《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84页。

② 鲁迅:《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鲁迅全集》第5卷,第43页。

③ 鲁迅:《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第506页。

④ [德] 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74页。

⑤ [美] 斯诺:《鲁迅——白话大师》,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三

1930年代对杂文来说,的确是多事之秋。不同作家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以论争和竞相创作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十分热烈。以论争而言,规模较大的如“鲁迅风”作家同“新月派”和“民族主义文艺”的论争、同“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以及“大众语问题”之争、“京派与海派”之争,等等,莫不寻常可见。这里值得引起关注的是有两次论争涉及杂文自身,这影响并引导了杂文发展的路向,使杂文在重要理论问题上由茫然转为明朗、盲目走向自觉。

一次是关涉杂文取材与格调问题的“说苍蝇”与“谈宇宙”之争。1934年4月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声称:小品文(杂文)的创作应当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①,并同时刊登了以写草木虫鱼的“闲适”杂文而著称的“京兆布衣”周作人的放大照片和五秩自寿诗。林语堂和周作人等人自1920年代末以来在杂文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崇尚性灵、追求闲适的倾向,早就有目共睹并受到了文学界的批评。但他们非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②,《人间世》同期刊发的刘半农的《双凤凰砖斋小品文》、徐訏的《论烟》等,也大都是取材“苍蝇之微”的闲适之作。这就不能不进一步引起“鲁迅风”杂文作者的反感。这期《人间世》遂成为论争的导火索。最早撰文发难的是埜容(廖沫沙)。他在《人间何世?》一文中严厉指责了《人间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的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取材的“只见苍蝇,不见宇宙”;二是格调的“玩物丧志,轻描淡写”,把“俏皮埋煞了正经,肉麻当作有趣”,这是“西方文学有闲的自由的个人主义,和东方文学的筋疲骨软、毫无气力的骚人名士主义”的合一。埜容还进而严肃地指出了《论语》和《人间世》二者之间的联系:“前者的‘一笑’,后者的‘苍蝇’实在是二而一者也。这种东西,倘说它不是吗啡红丸,但也并不是什么清心补脑之物罢。”^③这说中了林语堂的精神实质,遂使林语堂恼羞成怒,马上在《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中反驳,“埜容君是看中‘宇宙’,鄙视‘苍蝇’,我却鄙夷宇宙,好谈苍蝇。若问苍蝇有何可谈,请阅《人间世》第1期《金圣叹极微篇》”^④。徐懋庸的文章所阐释的金圣叹的意思也极平常,概括起来就是“世界中间之一切所有,其故无不一起于极微”,学为作文,当注意观察。对于极小的事情,倘加仔细深刻的观察,必有丰富的意义,否则,若“以粗心处之,则无如何,因遂废然以搁笔耳”^⑤。这遂成为林语堂继续争辩的抓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金圣叹强调“以闲心谛视”,这正是林语堂所特别看中的,也是埜容所极力反对的。然而林语堂对此却置若罔闻,又发表《周作人诗读法》《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和三篇《方巾气研究》,除了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饶舌和声称自己不怕受“鄙夷”、遭“白眼”外,又批评埜容的文章充满“方巾气”“道学气”,“甚足代表新道学之见解思想”。这样的反驳已明显底气不足了。林语堂从1920年代末“语丝派”分化的时候起,就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倾向与社会的政治意识之间的距离,为安全起见,他干脆修身养性,独善其身,寄情于与时政不相干的“苍蝇之微”的闲适意趣中。人各有志,

① 林语堂:《发刊词》,《人间世》1934年第1期。

② 林语堂:《我的话·序》,《行素集》,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第1页。

③ 埜容(廖沫沙):《人间何世?》,《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14日。

④ 林语堂:《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16日。其中《金圣叹极微篇》原题为《金圣叹的极微论》,徐懋庸作,载《人间世》1934年第1期。

⑤ 徐懋庸:《金圣叹的极微论》,《人间世》1934年第1期。

这按说也无可厚非,但林语堂却非得要造成一种大声势,甚至非得将自己的主张,张扬成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排他理论,这就大谬不当了,使得楚容的批评越发显得及时和中肯。连徐懋庸的无意间为林语堂敲边鼓也被批得灰头灰脑。

此外,还有不少人参加了这场论争,仅《自由谈》发表的文章就有:胡风的《过去的幽灵》、由的《谈小品文和幽默》、古董的《论文坛上的摩登风气》、曹聚仁的《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吴容的《论天真》、崇巽(鲁迅)的《小品文的生机》、痰迷的《“请教先生‘两’首诗”并序》等。5月9日张梓生接编《自由谈》后,决心结束这场论争,但又发表了鲁迅的《一思而行》和茅盾的《不关宇宙或苍蝇》。另外,《人言周刊》《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太白》等报刊也都同时刊发文章参与了论争。这些文章除林语堂、徐懋庸各自作为一方为自己辩护外,大都对“玩物丧志,轻描淡写”“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的小品文(杂文)理论和创作倾向予以了科学的辨析,其中茅盾和鲁迅的最具建设性。茅盾认为,小品文应当“自由发展,让它依着环境的需要而演变为各种格调”,“《人间世》不顾时代的变幻一味追踪公安竟陵派‘性灵’、‘闲适’,不免是‘自做枷来自戴了’”,“时代给小品文挣扎出一种最合宜的格调。谈宇宙或谈苍蝇,都可以;但假使以‘自我闲适’的眼光去谈苍蝇不为时代所需要,那么,同样去谈宇宙,也未见其可”^①。一言以蔽之,“问题应不在宇宙或苍蝇之分”,而在“闲适”的不合时宜。茅盾不是一般地排斥写“苍蝇”,也不盲目地强调写“宇宙”,而是把论争的焦点升华到题材与时代的关系、时代意识和历史意识必然对文学创作发生制约作用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令人首肯。同时,茅盾强调不应对写“苍蝇之微”简单化地一概否定。鲁迅也强调了“闲适”的不可取,指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②。有中肯的分析和批评,更有热切的期待。

另一次是如何认识杂文的“社会价值”与“文艺价值”的争论。挑起论争的是林希隽,他在1934年9月《现代》第5卷第5期发表的《杂文与杂文家》和《社会月报》9月号发表《文章商品化》,都认为杂文的“蓬勃”是“畸形的发展”,“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社会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剧并日而语”。断言杂文对社会“丝毫无需要之处”,写杂文“是一种恶劣的倾向……浪费的生产”。并指责杂文作者是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去获取“较多的报酬”,并无人“用苦工认真创作”。林希隽对杂文必欲封杀而后快。这种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空穴来风。1930年代,面对空前繁荣的杂文,一些崇尚栖居“象牙之塔”的作家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甚或失望和厌烦。他们推崇的是“唯艺术而艺术”,是鸿篇巨制的永垂青史。因而当《春光》创刊号发表郑伯奇的《伟大作品的要求》提出“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一部伟大作品”^③的质问时,立即引起了激烈讨论。当时除《春光》外,《文学》《自由谈》《文学论坛》《现代》等大型刊物也纷纷刊发有关文章。林希隽的文章即在这场讨论中出现的。他指责现在的作家、尤其是有能力的作家为什么不把“随时随地都有着可作成杂文以外的更有意义的诸文学制作之丰富的题材”“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那种零碎片断的杂文?”“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美国为什么能够有辛克莱,杰克

① 茅盾:《不关宇宙或苍蝇》,《申报·自由谈》1934年10月17日。

② 鲁迅:《小品文的生机》,《鲁迅全集》第5卷,第464页。

③ 郑伯奇:《伟大作品的要求》,《春光》1934年第1期。

伦敦等世界盛誉的伟大的作家?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①没有理由怀疑林希雋期盼“伟大作品”的真诚,然而他却不去冷静地分析“伟大作品不产生”的主客观原因,而是极为粗暴地将对文艺现状的不满迁怒于杂文的繁荣,于是便极力地贬斥杂文的社会价值,想以此唤起杂文家的悔过和转产。

林希雋的言论理所当然地引起“鲁迅风”杂文作者的反响。其中聂绀弩全面分析了林希雋对杂文的社会价值的肆意抹煞,中肯地说,“有这样的事么?杂文‘丝毫无需要之处,却又能‘不胫而走’;走了,又‘不足怪’。这道理恐怕只有林先生自己才懂得,‘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杂文的‘不胫而走’,我也说‘正是不足怪的事’。历史转动了前进的车轮,使大众迫切地需要理解。正同需要物质的供应一样,他们也需要精神的粮食。‘拿粮食来!’他们喊。可不一定限定作家只写小说戏曲或某种特定的体裁。不过,‘在目前,这时代’,他们不期然而然地多量地选择了这种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日常事变,而又最浅显最容易消化的杂文。在这种场合,杂文绝不是什么‘丝毫无需要之处’或‘浪费的生产’”^②。鲁迅也连续发表了《商贾的批评》《做“杂文”也不易》等文,充分阐述了杂文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指出这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③。鲁迅针对林希雋特别指出:“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④这实则是义正严词地宣示:在中华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革命功利主义无疑是判断一切人一切事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也是判断文艺现象、特别是“鲁迅风”杂文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

由于理论上的原则性差异和情绪的对立,双方在论争中都未作出妥协和让步,相反倒是使矛盾越来越激化。“鲁迅风”作者连续发表的唐弢的《谈“杂文”》、先河(何家槐)的《所谓“杂文问题”》、杜宣的《关于杂文》、魏蟠的《杂文》等,都与鲁迅、聂绀弩的相呼应,越发对杂文的社会价值产生浓郁的情感和崇高的自信;而林希雋在遭到反驳后,越发写出了《寒夜随笔》和《杂文问题》,并有申去疾(《论“所谓杂文问题”》)、杜衡(《文坛的骂风》)等为之推波助澜。但他们除了旧调重弹继续否定杂文的社会价值外,意气用事的成分越来越浓,但不久便又自觉无理又无趣,在文坛销声匿迹。

与杂文的“社会价值”之争展开的同时,施蛰存怵周木斋则围绕着杂文的“文艺价值”问题展开论辩。施蛰存借对电影《伏尔泰》的评价,以一种挑剔者的姿态,影射“多是对准了时事发的话”“一定不免有许多悻悻然的气概”的“鲁迅风”杂文,说杂文虽然“有宣传作用”,“在当时的读者中,的确还有效力”,但却缺少永久性的“文艺价值”,“如果传给后人看起来,读者所处的环境既不相同,文字的感应力一定也会得两样了。那时伏尔泰的文章的好处一定没有人能感受到,而其坏处却必然会在异代的读者面前格外分明的”^⑤。这虽不同林希雋般对杂文作全盘否定,但也为否定杂文提供了另

① 林希雋:《杂文和杂文家》,《现代》第5卷第5期,1934年9月1日。

② 耳耶(聂绀弩):《谈杂文》,《太白》第1卷第2期,1934年10月5日。

③ 鲁迅:《做“杂文”也不易》,《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6页。

④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页。

⑤ 施蛰存:《伏尔泰》,《文饭小品》1935年第3期。

一种口实。杂文的文艺价值是无可否认的,不然的话,它决然不会得到受众的广泛喜爱,单是受压制中的艺术探索,就已显示出不凡的艺术价值。只要能对此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阐释,施蛰存的发难就会不攻自败。遗憾的是,当时很少有人能对杂文的文艺价值作冷静的思考和阐发。周木斋针对施蛰存而答辩的《杂文的文艺价值》,只是一味地以杂文的“以时事为命脉”而自豪,进而含糊其辞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倘使杂文因充满时代气息而缺少文艺价值,那还是老老实实不要这样的文艺价值,而这倒是杂文的真正文艺价值”^①。这种心态是坦然的,也很可贵。因为一个落后的苦难民族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无疑要比它所面临的文学问题重要得多。因此,对于用杂文悲壮地参与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人的觉醒解放的一代作家来说,任何人不应对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社会历史价值视而不见而只取艺术表现的形式,不应忽略杂文中所包含的非文学的(或者说是超文学的)意义而加以指责,更不应借“文艺性”纠葛而欲将其逐出文坛。但周木斋所代表的单一的价值取向,显然也面临着拥有了社会历史而丢掉了文学价值的危险,某一个时代的文学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终究是别的门类所无法替代的,“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②。显然,周木斋对施蛰存的反驳是无力的。施蛰存从周木斋的答辩中看出了偏颇,更加理直气壮起来。在稍后发表的《“杂文的文艺价值”》中进一步指出:“如果要把这些文章当作文艺作品看,则它们在其本身的社会价值之外,当然必须具有另外一种文艺价值。至于这种文艺价值,当然要从这些文章的修辞,逻辑,甚至作者的态度等一切文学上的标准上去评量的”,“决不是每一篇杂文都有文艺价值的——纵然它有何大的社会价值”^③。周木斋又发表《如此这般》,只是笼统地指责施蛰存“落入了一般反对杂文的窠臼”,对他的质疑没能正面作答。直接的论争就此结束。

平心而论,施蛰存的诘难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因为他提出的确实是一个长期存在而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杂文作家都未能认真对待、深入思索的重大原则问题。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作家尽管暂且不去与之理论,但却从中受到了刺激和启发,意识到了旧的认知的偏颇。当时的文坛随之出现了一种倾向性的变化——有意识地、较广泛地开展了对杂文艺术特质的理论探讨。鲁迅在为徐懋庸《打杂集》写的“序”中,将杂文同一向被人们视为文学正宗的唐诗进行比较,强调指出了杂文“生动,泼刺,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的特质。“移情”作用正是艺术审美的核心所在,所以鲁迅断言,“能移人情,对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搅乱你们的文苑”,“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④。显然,鲁迅已经不再只是一味追求杂文对思想社会有用,不是单单看重杂文的历史感与时政效果,同时也倾心追求符合艺术规律与永恒意义的艺术境界。这是鲁迅新的杂文观和对杂文认识的重要深化。几乎与此同时和稍后,从艺术上研究杂文的理论文章开始竞相出现^⑤。不少作者认为,杂文是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是对“对中国文坛的一种有力贡献”,甚至说它在

① 周木斋:《杂文的文艺价值》,《太白》第2卷第4期,1935年5月5日。

② 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84页。

③ 施蛰存:《“杂文的文艺价值”》,《文饭小品》1935年第5期。

④ 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91—292页。

⑤ 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徐懋庸的《鲁迅的杂文》(《打杂续集》)、李长之的《鲁迅之杂感文》(《鲁迅批判》)、周作人和郁达夫分别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两集散文撰写的《导言》、余十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他笔名真多、杂感文最好》、陈望道编理论特辑《小品文与漫画》、钱公侠和施英的《小品文·小引》等。

中国现代散文中成就“最丰富最伟大”^①。李长之则重点从结构、逻辑、风格、修辞以及情感态度等文学构成的素质上剖析鲁迅杂文,进而充分肯定了它的崇高文学价值。徐懋庸融汇了诸多杂文家的切身感受和体验,概括出了“理论的形象化”^②的艺术特点。最耐人寻味的是署名“老阿”的因被骂还带有负面情绪的《鲁迅先生“骂人的艺术”》,说鲁迅杂文体现出的“艺术修养以臻于登峰造极”,远非用心研究《骂人的艺术》的梁实秋先生“所能及也”^③。其中的不少作者(例如李长之)关注的问题,恰恰正是施蛰存在对杂文的诘难中涉及到的。这实则也是关于杂文文艺价值的论争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场关于杂文的“社会价值”与“文艺价值”的争论,其意义和产生的影响巨大又深远,它澄清了“五四”以来最有代表性否定杂文的思潮,强化了社会对杂文社会价值的认知自不待言;“鲁迅风”杂文作者也在对话中实现了认识的升华,特别唤起了对杂文艺术特质的关切。试想如果长期拘囿于单一的价值取向,无视也不自觉追求其文学价值^④,使杂文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永远处于矛盾和失衡状态,杂文也即难以名正言顺地获得长足的发展。这次论争体现了社会心理对杂文艺术的需求,推动了杂文理论批评对审美的重视、对杂文理论的重大突破和拾遗补缺。文学界后来能深刻理解杂文的艺术价值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来对待,也正是这次论争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四

与“鲁迅风”杂文并行产生的还有一种奇特的现象:有些作家一方面敌视杂文,看上去与杂文不共戴天,另一方面自己却也在努力创作,产生了大量鲁迅所说的“‘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实也正是‘杂文’”^⑤的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梁实秋,他虽然没有聚众参与论战,但早在1929年就连续发表《论批评的态度》和“‘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⑥,均对“有人”(鲁迅)的“无穷尽的杂感”十分反感,说这些“幽默而讽刺”的杂文是“粗糙叫嚣”的文字,“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但梁实秋创作的杂文似乎也是“无穷尽”的,早期的以1927年出版的《骂人的艺术》为代表,后来1934年出版的《偏见集》影响也大,收集了作者当时谈论文学与人性问题的大量文字。再后来更是越写越多,1963年结集为《秋室杂文》,另有一部分收在1949年出版的《雅舍小品》中。在梁实秋的全部著作中,最受人推崇的,大概也只能是杂文了。

以团体的一致性既反对杂文又热心杂文创作的是《现代》派作家,施蛰存、林希隼、苏汶(杜衡)、韩侍桁、胡秋原、杨邨人等都志同道合地扮演过反杂文的重要角色,他们或者攻击杂文创作只是“放

① 郁达夫:《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5页。

② 徐懋庸:《鲁迅的杂文》,《鲁迅研究》,上海:上海书店,1937年。

③ 老阿:《鲁迅先生“骂人的艺术”》,《东方快报》1936年8月1日。

④ 1932年12月鲁迅说自己“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只有《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五种,“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鲁迅自选集·自序》),其时鲁迅已有七部杂文集问世。瞿秋白在1933年4月《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杂感这种文体……还不能够代替创作。”胡风1935年2月在《关于速写及其他》(《文学》第4卷第2号)中说:“‘杂文’和‘速写’,都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它们不能代替创作,然而却负上了创作所不能够完成的任务。”

⑤ 鲁迅:《做“杂文”也不易》,《鲁迅全集》第8卷,第376—377页。

⑥ 这两篇文章收入梁实秋:《偏见集》,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

冷箭”(杨邨人),或者说杂文充当了“法西斯蒂的文学”的“最丑陋的警犬”(胡秋原),其言辞之恶毒几乎无以复加。然而《现代》杂志上就几乎每一期上都有特定的杂文栏目,诸如“杂碎”“随笔”“感想”“漫谈”“评坛”“现代论坛”“文艺独白”等。此外,《文饭小品》《文艺月刊》《自由谈》等也都是他们经常发表作品的刊物。结集出版的杂文集中,施蛰存的《灯下集》和韩侍桁的《小文章》都颇具特色,产生过不小影响。

这种言行的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便构成了一种极为独特又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它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文人心理和复杂动机。

一种情况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反对杂文是假,反对“鲁迅风”杂文家的政治倾向是真,这以梁实秋为代表。梁实秋在1920年代末留美归国时,由于受白璧德人文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树立了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自由色彩的社会观和人性文学观。他认为当时妨碍中国“‘思想自由’的除了滥用威权侵犯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执政当局,就是狂热的文化人和宣传家,他们用谩骂的文字攻击异己,用诬蔑的手段陷害异己,夸大宣传自己的主张”^①。这里的所谓“狂热的宣传家”和“谩骂的文字”,梁实秋专指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作家和作品。梁实秋面对反动的专制体制,公开对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作出热情呼唤,显然合乎民情民意。但他把鲁迅等左翼作家看作是和反动专制政府一样的妨碍思想自由的因素,就是十分荒谬的了。梁实秋还顽固地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推崇到极致,以此来排斥人在全部社会关系中必然会带有的阶级性,因而导致了鲁迅与他的公开论战。梁实秋确实是在与鲁迅的论战中露出窘相并声名狼藉的。这就必然会激起他对鲁迅以《“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为代表的这部分论战杂文的仇视。但在平心静气的情况下,梁实秋却始终给予鲁迅的杂文艺术以很高的评价。早在1927年6月5日他就在《时事新报·书报春秋》署名“徐丹甫”发表关于《华盖集续编》的书评,最先把鲁迅杂文作为文艺对象来研究,从“灵活巧妙”地引用文言和“喜欢说反语”两个方面论述了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特点,并认为其讽刺的美妙,“在中国新文学里是很不多见的”。即便是在与鲁迅论战后出版的《偏见集·现代文学论》中,梁实秋仍然作出了鲁迅先生的杂文“用于讽刺是很深刻有力的”,具有和小说一样的“简洁流利”的文笔,“他的六七本杂感是他的最大的收获”。它出自梁实秋之口是难能可贵的,不仅体现了作家的真知灼见,而且说明他有服膺真理的诚心和勇气。可以断言,梁实秋对杂文本身从来都是只有喜爱,他所反对的只是鲁迅某些杂文的思想倾向,“做为真理的辩论看,我并不心服”^②。这就不难理解像他一样的部分作家如陈代(林微音)、邵洵美、章克标、王平陵、鸣春等为什么一面反对杂文却一面又大量写作杂文了。

《现代》派作家则属另一种情形。他们尽管也不满于“鲁迅风”杂文的思想倾向,其攻击言辞甚至包含着“和生存不能两立”的“死之说教”^③,但矛头也多半指向杂文文体本身,特别是他们因期盼“伟大作品”对杂文投以的鄙视态度,表明他们与杂文是势不两立的。既然这样却又也来写杂文,乍看颇为怪异,细究又不足为怪。由于杂文的轻便快捷又可以直抒胸臆的议论性特点,十分适于论战,因而他们要与“鲁迅风”作家对垒,找不到比杂文更有利的武器,于是便不得不“窃取光荣的杂文形

① 梁实秋:《思想自由》,《新月》第2卷第11号,1930年1月10日。

② 梁实秋:《鲁迅与我》,《中央周刊》第4卷第16期,1941年11月27日。

③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

式来做反对杂文的杂文”^①。这不是他们选择了杂文,而是杂文选择了他们,用马克斯·韦伯关于“理性行为,情感行为,传统行为”的划分看,这完全是情感行为,“我们自己对于像忧虑、愤怒、野心、嫉妒……和各种各样的欲望的情感反映越是敏感……则我们就越易于移情于它们。即使这种情感被发现其紧张的程度完全不是观察者本人可以企及的,他也仍然能够对其意义获得相当程度的情感理解,并且可以合理地解释它们对行动过程的影响”^②。这样《现代》派的杂文与梁实秋的就明显不同:梁实秋的多系在文艺的“独立性”中出现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是创作激情与谙熟的艺术形式相对应的自觉行为,是主动的、富于理性的;《现代》派的则主要是因不吐不快的冲动而在论战中产生的是“释愤抒情”的内在要求与艺术形式的不自觉遇合,是情感压倒理性的尴尬抉择。关于杂文问题之争自不待言,其他的诸如《庄子》与《文选》之争、自称“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苏汶和杨邨人同左联作家的论争等,也都不自觉地选择了杂文的形式。

这样,他们与“鲁迅风”杂文作家的争辩和斗法,就不单是原有两极的僵硬排斥,更多的是胶着中的联系,以至于相反相成。因为双方都有意无意地从对立面身上摄取养分来匡正和丰富了自己。最明显的是《现代》派对杂文的“以时事为命脉”的接受。本来,《现代》派作家是因崇尚“文艺自由”和“为艺术而艺术”而反感和攻击“鲁迅风”杂文的。但随着论争的展开,施蛰存不得不站出来肯定杂文在当时的读者中的“宣传作用”,甚至说“鲁迅先生的杂感文写得的确好”^③。几乎与此同时和稍后,当具有很强“文艺性”的周作人式的“闲适”杂文一度充溢文坛时,他们也变得不满起来。杨邨人说:“现在小品文之趋势之一落千丈,已经大有重上象牙之塔钻入牛角尖的危机,小品文作家也大有山林隐士烟茶自娱的神气,这对于文化运动已经是漠不相关的堕落现象了。”^④可见,他们已不再一味地“为艺术而艺术”,不再与杂文的关涉时政势不两立。如果不是正面接受“鲁迅风”的影响并经过了创作实践的体验,是很难获得这样的认识的。而且,他们一开始创作就对杂文艺术这样熟谙,较好地避免了草创时期杂文的那种粗疏状态,不能不是对“鲁迅风”杂文的兼收并蓄。反过来,“鲁迅风”作家对杂文艺术理论的重视和自觉,也不能不与论争中受到的刺激和启发有关;甚至鲁迅在百般受到阻挠中的继续给《自由谈》写稿,多半原因是专为“和攻击者赌气”;越是有人反对杂文的“社会价值”,便越是有“鲁迅风”作者如聂绀弩、周木斋等不顾一切地去爱惜它,强化它,……这实际上都是从有意与对手相拗的角度接受了其影响,也都属于相反相成。1930年代的杂文现象就是这样错综复杂,正所谓“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王安石《洪范传》)。

由反杂文作家制造的矛盾和株连引起的不同杂文现象之间的矛盾,虽然并不像前两种冲突那样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杂文的兴衰和发展方向、实质,但却能给巨大影响于杂文所形成的艺术风貌。假若没有这些矛盾纠葛和冲突,杂文肯定要比现状平和得多、沉寂得多,作品难以被赋予这样强烈的论辩色彩,难以形成这种百家争鸣、如火如荼的局面;假若不是对立的双方都有意无意地各自接受对方的影响,杂文的演进和深化也会缓慢得多。其中最不应被忽视的是,由于这些作家的创作追求和

① 聂绀弩:《谈杂文》,《太白》第1卷第2期,1934年10月5日。

②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页。

③ 施蛰存:《杂文的文艺价值》,《文饭小品》1936年第5期。

④ 杨邨人:《小品文与大品文》,《现代》第5卷第1期,1934年5月1日。

艺术个性不同,矛盾纠葛中的创作角逐驱使杂文作品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风貌,黄钟在鸣,瓦釜也在唱。例如施蛰存,由于他恪守着“要把这些文章当作文艺作品看”的信念,使他始终注意运用委婉的笔致强化着杂文的艺术感染力,无论是大量关涉论争的文字,还是少量小杂感如《谈奖券》《雨的滋味》《书籍禁止与左倾运动》等关于社会事相的思辨,一经他点化便妙趣横生。再如梁实秋,虽然当他去解剖重大的社会思想问题、阐释历史规律时显得有些纤巧局促,气势不足,但当他表现和传达思想感情的微波细流、针砭民族文化精神的种种弊端时,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具有大家风度。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所谓“骂人的艺术”中。梁实秋说骂人最忌浮躁和浅露,“善骂人者必须态度镇静,行若无事”,“骂人必须先明虚实掩映之法,须要烘托旁衬,旁敲侧击”,“你骂他一句要使他不甚觉得是骂,等到想过一遍才慢慢觉悟这句话不是好话,让他笑着的面孔由白而红,由红而紫,由紫而灰,这才是骂人的上乘”^①,即骂人最讲究“微妙含蓄”。其杂文集《骂人的艺术》和《偏见集》都堪称典范。这与鲁迅的“骂人艺术”各美其美但又神韵一致。其他作家也各有特色:著有《散文七辑》的林徽音,一直是1930年代活跃的杂文作者,其作品以桀骜不驯的“野气”为基调,有时精雕细镂,讲究析理,有时信马由缰,咄咄逼人,独具刚柔相济的风格;韩侍桁的《小文章》乍看貌似拙笨、敦厚,骨子里却深藏着幽默与机警;而林希隼则以快言快语和痛快淋漓的格调急切地传达出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尽管常常表现出浅陋和偏激。……这些多元创造的满地金沙,不仅与“鲁迅风”一道共同铸就了杂文艺术的大厦,而且连同国民党执政当局的压制和“价值”论辩一道,给予竞争中的“鲁迅风”杂文以十足的有效的正反面动能,它们“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②,1930年代“鲁迅风”杂文的繁荣和嬗变,即由此推动完成。

责任编辑:冯济平

"Lu Xun Style" in the Essay Era: Embarrassment and Evolution in Dynamic Competition

Jiang Zhenchang¹ Huang Yan²

1. Lu Xun Research Center,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2. Qingdao Hengxi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The suppression by the Kuomintang ruling authorities made the "Lu Xun style" essays in the 1930s more and more vigorous, and brought about the artistic evolution of "euphemism and implication" of those essays. The debate among writers and the works composed by the "rival" writers also endowed the "Lu Xun style" essays with effective positive and negative kinetic energy in the course of dynamic competition, and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edifice of their artistic value.

Key words: "Lu Xun style" essay; hidden twists and turns; tearful smile; debate and competitive creation

① 梁实秋:《骂人的艺术》,《骂人的艺术》,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

② [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从母体孕育内省

——海子《太阳·土地篇》论

董迎春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太阳·土地篇》是海子晚期“太阳七部书”中最为秩序、整体的一部“大诗”。海子笔下的“太阳”与“土地”产生了某种宇宙感应的思想联结,形成一种异质、互文的文本效果。海子以探天地宇宙、感身心超验的心灵触角与原型意识,不断进行跨文化、跨文体的沟通与对话,最终创造出海德格尔所体认的“天地神人”的思想融留与生命感召。

关键词: 土地;母体;书写;互文;沟通;对话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3)04-0016-12

诗歌的写作常常在瞬间完成,依凭直觉、灵感,诗的运思则变成诗的思维和通感。它形成了不同于理性思维,也不同于绝对精神实体的宗教思维,它是一种悟性与直观,“悟性认识因果关系就比在抽象中思维所得的要更完整、更深入、更详尽;唯有悟性能够通过直观既直接又完全地认识一个杠杆,一组滑车,一个齿轮,一个拱顶的安稳等,有些什么样作用”^①。这就决定了诗歌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理解与展示,诗的特点是播散性、差异性,对诗的解读与理解,既是诗的意义也是诗的体裁悖论。因而,对诗的翻译、鉴赏等,则是一件极为艰难的工作,它需要时代和环境等背景因素的“知人论世”,但诗也如“迷宫”拒读者千里之外,成为艺术殿堂中最为精英的部分。对诗的理解,除了需要基本的文学素养和生活经验表现出来的智力结构,也极需属于个体本身的直觉和悟性所形成的超验之心与审美态度。诗必须经过“接受”而完成,只有经由参与性的阅读与想象,才能实现诗的最终完成。诗这个巨大的精神光晕,就是从可能抵达,以诗性、超验的体验之心去理解诗歌,为“诗”的有用性、理解性找到一种文体、文本存在的合法依据。

以诗心会通和理解诗意,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诗歌解读方式。而海子晚期的“太阳七部书”的确需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朦胧诗以来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问题研究”(11BZW09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董迎春,男,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西方文论、当代诗歌研究。

^①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5页。

要这种审美化、哲理性的诗性解读,以期理解极具宏大精神气场与文化抱负的“大诗”^①。

一、土地:秩序的生长

在犬儒之风盛行的年代,海子已经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化“能指”,他的精英情结与文化抱负激励着许多后来者的精神认同与担当意识。海子通过隐喻与超验的象征主义写作,为人类找寻失落的文化原型与积淀意识,找寻陌生的熟悉心灵。“神秘与奇特、秘密或怪异相关。尤其是它涉及心灵中熟悉的东西陌生化的感觉,或者别的心灵中陌生的东西熟悉化的感觉。”^②极具史诗意识与文化担当的“大诗”,正是对衰微的人类心灵的重新认知与价值重构。在无序混乱的世界中,《太阳·土地篇》试图为这个漂泊的“灵魂”找到文化出路。海子写道:“在这一首诗(《土地》)里,我要说的是,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的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代替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大地本身恢宏的生命力只能用欲望来代替和指称,可见我们已经丧失了多少东西。”^③

《太阳·土地篇》写了十二个月份的思考。此部“大诗”结构较为完整,在海子诗篇中属于思考比较成熟深入的一部。它在“太阳七部书”系列中着重于“土地”意象展开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反思,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推助了海子“大诗”的又一次行动与可能。“他死之前将他的全部长诗列在一起,总的取名为《太阳》,‘太阳’在他的体系中,一方面意味着自我拯救,意味着他所呼唤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光明与黑暗既互相对抗又互相转化的总的象征,它暗示这种拯救是徒劳的。”^④这种“拯救”必须要在人类的心灵中找到文化原型与精神结构,以此构建民族史诗与人类大诗的思想图景。此部“大诗”如其他几部晚期“太阳”系列“大诗”一样,充斥着大量的“身体”意象,身体的在场,让神话的隐喻和超验与象征主义写作走向了身心感应,形成一种个体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交汇而成的精神史诗。

“土地”意味着母体、孕育、诞生和情结,相对于“太阳”这个文化意象在海子“大诗”的作用,“土地”更代表了一种东方生命的本体回归,海子将“土地”长卷统一于太阳这个大生命、大宇宙的文化呼吸与生命召唤之中,繁殖成幻象、偶然、精神事件、弥塞亚。“太阳七部书”中充满的冲突、矛盾、撕裂、对立,成就了海子“大诗”话语的丰富性和可勘探性,形成了结构、语言的内在张力与强烈的不谐性、异质性。“可以将这种费解与迷人的并列称为一种不和谐音(Dissonanz)。因为它制造的是一种追求不

① “大诗”,一般指印度古代文学中的长篇叙事诗,比如伽梨陀婆的《罗古世系》和婆罗维的《野人和阿周那》等几部较早的作品,以及后来的一些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它们内容多取材于史诗传说,词藻和描写颇为讲究,在梵文文学中影响很大。“大诗”,既体现为诗歌对世界观照的精神高度,也指偏重于叙事性质的长篇叙事诗。海子在《动作〈太阳·断头篇〉代后记》写道:“诗有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还有一些诗意状态。”(见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888页。)我们统一称海子的“长诗”写作为“大诗”,一是区别于传统或同期的长诗写作,它渗透更多的文化与思想意蕴。二是海子自称“大诗”是一种创造性的、更具世界眼光的写作,其理念代表着一种诗歌精神,渗透着诗人的历史担当与文化理想。

② [美]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③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889页。

④ 金肽频主编:《海子诗纪念文集(评论集)》,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安而非宁静的张力。不和谐音的张力是整个现代艺术的目标之一。”^①海子在《太阳·土地篇》的序中写道:“用土地死去了/用欲望能代替他吗?”^②“土地”是根源、母体、孕育、诞生、希望、收成……是肉身与欲望的存在之体与安身之命,同时也是形而上学的文化体验与终极之思,“埋葬尸体的天空/光明陌生而有奇迹”^③，“大诗”是海子“他”的自我生命写照,亦是一次深刻而独立的精神探险。海子根据季节变化,在自然与内心的彼此感应中探寻一条隐秘的精神之途,既有虚无、缥缈的心灵幻象,也有神秘、有力的文化撞击与灵魂裂变,“心灵感应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它关系到你的思想可能不是你的,无论你认为这些思想多么隐秘。文学中流行心灵感应”^④。一次次苦苦感应与追寻的过程,便是一次次实在且果决的心灵事件,通过身体的在场和语言的导引,在自我的灵魂深处勘探、确认生命的印迹、奇迹,以及大诗化、艺术化的审美幻境。

海子走向“大诗”途中最为艰辛与困境重重的是哲思,他遭遇心灵的审美幻境,承担着身体的入魔与因狂热而生成的幻象化呓语,其中一部分转换为极具诗艺价值的积极建构,另一部分却在撕裂与挣扎的丰富痛苦中化为无效幻景。他扎根“土地”的时代写作与文化抱负,也感到其复杂与矛盾,“以前精神便是上帝,接着变成了人,现在他变成了群众”^⑤,他必然勇敢地面对这个“群众”为先的时代语境,也含有内心对“死亡”痛苦的逼真体验。他时常把“大诗”比作“少女”,用“大地”隐喻诗人自我,他必须成为自我,又同时分裂自我,“我就是死亡和永生的少女”^⑥,他遭遇着“情欲老人,死亡老人”^⑦,自我不得不作着某种撕裂与抗争,他希冀的是“诗中伴侣”,在一片幻象涅槃与无序挣扎中,“我”这位诗中的“青年王子”,在“黄昏和夜晚”中找到灵魂亲切的陪伴与认同,“总有人从黄昏趋向于火焰,或曰:落日脚下到火焰顶端是他们的道路和旅程,是文艺复兴和歌德一生,他们这些巨匠和人类孤单的个体意识之手,经典之手,在茫茫黑夜来临之前,已经预兆般提前感受到夜晚的黑暗和空虚,于是逃循于火焰,逃向火焰,飞向火焰的中心(经验与个体成就的外壳火焰)以期自保。这也是人类抵抗死亡的本能之一”^⑧。现实肉身的无奈感与文化层面巨大的精神价值,对“死亡”导向攀登式的思想思索与宿命式的心灵质询,迎难向上的心理动力,这种无序、混沌的身体幻象,压缩与激荡着无助的内心挣扎与文化裂变,“自从人类摆脱了集体回忆的创作(如印度史诗、旧约、荷马史诗)之后,就一直由自由的个体为诗的王位而进行血的角逐。可惜的是,这场角逐并不仅仅以才华为尺度。命运它加手其中。正如悲剧言中,最优秀最高贵最有才华的王子往往最先身亡。我所敬佩的王子行列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雪莱、叶赛宁、荷尔德林、坡、马洛、韩波、克兰、狄兰……席勒甚至普希金”^⑨。海子再次将“自我”添为“经典之手”与“人类之子”,他在天才的痛苦中看到生命征伐的丰富和高贵的文

① [德] 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②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55页。

③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95页。

④ [美] 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第38页。

⑤ [德] 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尹溟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⑥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60页。

⑦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58页。

⑧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905页。

⑨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896页。

化价值与情感确认。“从荷尔德林我懂得,必须克服诗歌的世纪病——对于表象和修辞的热爱,必须克服诗歌中对于修辞的追求,对于视觉和官能感觉的刺激,对于细节的琐碎的描绘——这样一些疾病的爱好。”^①“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②他的写作不仅是一种思想抱负,也有效地掌握心灵的诗艺,他在“文化”这把“烈火”中看到人类的愿景与可能。

《太阳·土地篇》第二章“神秘的合唱队”的序中写道“沉郁与宿命。一出古悲剧残剩的断片”^③,海子以生命与诗的献祭而克服与消解了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和对立。这种“献祭”不过是诗人与现世的一种决裂而走向了更丰赡高远的生命俯瞰与神性注视。

在“大诗”中前行半步,都倍感艰难,窘迫与痛苦无所不在。“我愿意魔鬼围绕着我,因为我是勇敢的。勇敢驱赶了鬼魅而自制许多魔鬼——勇敢需要笑。”^④海子通过与“魔鬼”的对话来消解生命的对立、紧张关系。“身体的活动不是别的,只是客体化了的,亦即进入了直观的意志活动。”^⑤这些外部的自然现象也无不汇聚成诗情与感应,这种“意志活动”成为一种诗艺路径与精神象征。“诗歌不是视觉。甚至不是语言。她是精神的安静而神秘的中心。她不在修辞中做窝。她只是一个安静的本质,不需要那些俗人来扰乱她。她是单纯的,有自己的领土和王座。她是安静的,有她自己的呼吸。”^⑥“土地”作为“母体”,象征着阴性和吸引,对其“土地”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丰富了海子“太阳七部书”的精神实体与哲理观照。

他写道:“岩石 不准求食和繁殖 / 只准死亡 只准死亡的焚烧 岩石! 回答我! // 岩石吼叫 岩石歌唱 // 歌唱然后死亡”,“岩石! 回答我!”^⑦“岩石”是“土地”另一强度反应,正是它构筑宇宙与土地,它虽然坚硬又冰冷,但是,此时却充当另一情感对象,完成了心灵对话与精神诉说,“岩石”的坚硬性、歌唱性,吻合了这种母体文化的包容与繁殖特征,实现了海子的精神求解与灵魂相伴。“大诗”话语中的个人风格,显然源于海子受难式的献祭,也源于他对文化内核的清醒认知,以及天才式的直觉与超验的悲悯情怀,这些综合的元素完成了诗之“歌唱”与“歌唱性”。海子的“大诗”一方面是反思与沉思性的现代之维,另一方面也是“母体”的文化认同与审美之维,是一种“内歌唱”的审美情怀与文化担当。

“土地”是自然“诸神”威武林立的心灵居所,亦是诗人为自我对话而预设的思想对象。“站在最高山上的人,笑看着戏台上生命里一切真假悲剧。”^⑧“诸神”是海子诗写途中深情诉求的引领者和同道人,他们在意识深处推动诗人走向超验的神奇诗语与神性的苦难体验,并获得深邃的文化能量。

海子写道:“现代主义精神(世纪精神)的合唱队中圣徒有两类:一类用抽象理智、用智性对自我的流放,来建造理智的沙漠之城,这些深渊或小国寡民之极的土地测量员(卡夫卡、梭罗、乔伊斯);这些抽象和脆弱的语言或视觉的桥的建筑师(维特根斯坦、塞尚);这些近视的数据科学家或临床大

①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917页。

②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916页。

③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61页。

④ [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尹溟译,第34页。

⑤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第151页。

⑥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917页。

⑦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600页。

⑧ [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尹溟译,第34页。

夫(达尔文、卡尔·弗洛伊德),他们合在一起,对‘抽象之道’和‘深层阴影’的向往,对大同和深渊的摸索,象征‘主体与壮丽人格建筑’的完全贫乏,应该承认,我们是一个贫乏的时代——主体贫乏的时代。他们逆天而行,是一群奇特的众神,他们活在我们的近旁,困惑着我们。另一类深渊圣徒和一些早夭的浪漫主义王子一起,他们符合‘大地的支配’这些人像是我们的血肉兄弟,甚至就是我的血。”^①

海子“太阳七部书”这一系列的每个长卷情感与主题均有所区分。“土地”长卷,相对于海子早期(1984—1985年)的三部大诗与晚期(1986—1989年)的《太阳·断头篇》,“土地”长卷更为关注宇宙内部,关注大地作为万物的母体性及母语文化中的“土地”情绪与情感依赖对海子“大诗”的意义,它们指向了远方的理想诉求,既是此岸诗意的探索,也是彼岸的攀登之途与苦苦追寻。“远方就是你一无所有的家乡”^②,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终其一生的行走不过是对生命乌托邦不断追寻的过程,是雷电、幻影,肉身也意味着短暂与偶然,正如瞬间,是呈现与融留,也是速朽和过渡。“土地”提供了收留的居所,使生命旅程留下美好印迹。作为诗人,对形而上学的命运的质询与反思,使得海子更接近了生命内核与思想启示,内部包容着黑暗与深渊,也折射出广袤与无限,“你为什么惊怕呢?——人与树是一样的。他越想向光明的高处生长,他的根便越深深地伸入土里,黑暗的深处去,——伸入恶里去”^③。永远无法超越与抵达生命的内部与秘密,对“黑暗”的不断“质询”与“反思”,使海子走向了受难激情与悲悯智慧,完成了对焦虑过渡肉身之维的克服与消解,“远方就是你一无所有的家乡”,这种最初与最终的返乡冲动(“土地”情结)与超验之心建筑了“大诗”的话语均衡与写作纯粹。

二、大诗:走出“土地”

“太阳七部书”关于“太阳”主题的精神长卷成为海子大诗追寻的情感依据与哲理认同,也是身体与内心的秘密对话、诗与生命的同一本体与灵魂福祉,在独立而恍惚的幻象、幻想、幻境中,识别人类的自我与大我。

他写道:“我总是拖着具体的 黑暗的内脏飞行 / 我总是拖着晦涩的 无法表白无以言说的元素飞行 / 直到这些伟大的材料成为诗歌 / 直到这些诗歌成为我的光荣或罪行”,“我那暴力的循环的诗 秘密的诗 阴暗的元素 / 我体内的巨兽 我的锁链 / 土地对于我是一种束缚 / 也是阴郁的狂喜 秘密的暴力和暴行”^④,“我的诗 追随敦煌 大地的艺术……我的诗,有原始的黑夜生长其中”^⑤。“诗歌”变成“土地”的智力元素,同时兼作缪斯之神,导引着海子在“太阳”仰望的方向,专注于焚烧的性灵与哲理,直至这幅生命的思想图景越来越清晰可见。

在《太阳·土地篇》中,“诗歌”与“盲人”“巨人”“岩石”“众神”一般同样极具神性。它既是命运的推助者,也是信仰的追问者。“诗歌”,不再只是一种体裁与文体,也不是独立差异的自由文本,

①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892页。

②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609页。

③ [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尹溟译,第36页。

④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629页。

⑤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630页。

成了极具灵性与神性的精神攀登者和引领者,它也成为推助身体在场体验的话语媒介,构成自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与路径,召唤思想的形式与存在本体。“大诗”的抵达无疑是这种精神抱负与哲思语境相互推动、生理欲望与文化动力相互平衡的结果。“诗歌”成为身体献祭的文化居所,也是诗人自我净化与暗示的形式诱因,所有的关于“命运”与“信仰”追求的生死是在“诗歌”中完成的。作为生命哲学与诗性话语的“诗歌”,完成了极具存在本论意义的自我塑造与思想践行,除了“诗歌”的美好之外,海子也认识到,“诗歌罪恶深重 / 构成内心财富”^①,唯有对“诗歌”进行心灵省思与哲理思辨,才有生命的突围与心灵跨越的文化可能,“诗歌”之罪,也意味着对诗歌写作误区的规避,同时直指同时代写作表现出的精神缺失,在诗人看来,这无疑与生命的“大诗”相背离。“从夏娃到亚当的转变和挣扎——在我们祖国的当代尤其应值得重视——是从心情和感性到意志,从抒发情感到力量的显示,无尽混沌中人类和神浑厚质朴、气魄巨大的姿势、飞腾和舞蹈。亚当: 之一,荷马的行动力和质朴未凿、他的黎明; 之二,但丁的深刻与光辉; 之三,莎士比亚的丰厚的人性和力量; 之四,歌德,他的从不间断的人生学习和努力造型; 之五,米开朗琪罗的上帝般的创造力和巨人——奴隶的体力; 之六,埃斯库罗斯的人类对命运的巨大挣扎和努力——当然,这仅仅是一些典型。”^②

当然,“诗歌”应该是多元丰富的,离散差异的,它像块茎,在诗之田园四处疯长,以此来形容海子的“大诗”,形象地展示出他的疯狂与矛盾的联结,丰富多彩、斑驳陆离,他以献祭、殉道的撕裂话语与情怀践行他的大诗理念与神性写作,成就大诗写作的大呼吸、大生命,“创造亚当是人本的——具体的,造型的,是一种劳作,是一次性诗歌行动。创造夏娃是神本的、母本的、抽象的、元素的和多种可能性同时存在的——这是一种疯狂与疲倦至极的泥土呻吟和抒情。是文明末端必然的流放和耻辱,是一种受难。集体受难导致宗教。神。从亚当到夏娃也就是从众神向一神的进程”^③。海子追求这种“劳作”“诗歌行动”,以及“一种疯狂与疲倦至极的泥土呻吟和抒情”^④,他深刻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受难”,更深刻地认识到“集体受难导致宗教”^⑤,“从众神向一神的进程”^⑥,他以“全能叙事”的上帝语调,导引人类的希望图景与神性话语,由此,可以看出海子的超验之心与象征感应的写作,带来了诸多的心灵感应与话语启示。

海子追求与体认的“死亡”,是一种极具存在价值的哲学范式,他的这种死亡话语,不是肉身遭遇精神创伤的生理危机,而是采取了一种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而成的审美态度,他执着于理想与矛盾并行的诗歌事业,奔走在人类命运与未来景观的大绳索上,对自己的生死命运仿佛早有了清晰深刻的洞悉,并以悲剧意蕴的神话思维超越现实与肉身的“自我”,以“大诗”建构他的普遍性的伦理追求。海子写道:“坟墓中站起身裹尸布的马匹和猪 / 拉着一辆车 / 在鼓点如火之夜 / 扑向乡间刑场 / 车上站立着盲目的巨人 / 车上囚禁着盲目的巨人 / 在厨娘酣然入睡之时 / 在女巫用橡实喂养众人酣然入睡之时 / 马匹和猪告诉我 / ‘我的名字上了敌人的第一份名单’”^⑦。这份“名单”预示着海子

①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64页。

②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895页。

③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895页。

④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895页。

⑤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895页。

⑥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895页。

⑦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63页。

式的献祭告别与文化决裂,他站在时间与幻象的“战车”上,悲悯地追问人心、人性的前景与未来,这位“盲目的巨人”在奔赴“死亡”的途中,一步步沉思个体与文化的终极价值和超验之心所能抵达的象征与可能。“死亡比诞生/更为简单/我们人类一共三个人/我们彼此杀害/在最后的地上/倒着四具尸首/使诸神面面相觑/他是谁/为什么来到人的村庄/他是谁”^①，“死亡”是“谁”？“死亡”，既是一个他者，也是一种立场，更是海子理解“虚无”、洞悉“绝望”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生命手段与思想路径，“死亡”是世俗肉身的完结，它导向海子“大诗”有关“死亡”的存在之思与可能之诗。尽管这种“死亡”极度混乱、无序，幻象死亡更接近了诗语的魔幻与超验，也毗邻哲学范式的终极行走。人类的情感本身肯定自由，过程本是诗意且令人眷恋，但是“大诗”话语追求的行走却是另一思想旅途。从某种意义上讲，诗人除了凡俗意义上“志业”认同之外，更是人类心灵的精神喻指与象征，侧重于对充满否定情感与价值的内部勘探，以及黑暗心灵的秘密质询与沉思，“生存是人类随身携带的无用的行李 无法展开的行李 /——行李片刻消散于现象之中”^②，正是这“无用的行李”却蕴藏了绵延亘古的秘密与人类归宿，“一片寂静/代代延续”^③，在孤独、沉寂的虚无体验与形而上学的追问中（否定性情感与价值），海子探寻现实肉身的本体回归与价值认同，把身体的在场体验融注于精神“现象”的解读，通过“大诗”写作的话语实践与终极行动，汇聚了人类心灵的秘密矛盾的沉思与道说。

“土地”既是诗人自我，同时也是他者（人民），海子的“土地”成为这两者亲近与对话的思想场所。“诗歌”成为情感纽带，维系着诗人的担当与热爱情怀。而“土地”的经验融注了西方现代哲学与世界视野，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母体”的文化裂变与心灵质询。

在《太阳·土地篇》中，“歌队长”唱道，“我的人民坐在水边 看着大海死去天才死去/我的人民身边只剩下玉米和柴刀”，“我用我的全身寻找一条河 尤其是陌生的河/我用全身寻找那一个灵魂”^④。海子歌唱的既有不朽的“诗人”，也有他的“人民”，“大地”成为两者之间联结的命运居所，两者在这里获得了交融、沟通。他以“王”的身份在诗中与“人民”对话，“存在/水上我的人民/泪珠盈盈或丰收满筐//我的人民/这割下众多头颅的果园理应让她繁荣！/新鲜 锐利 痛楚 我的人民”^⑤。通过歌唱与对话来抒发他在诗歌道路上坚定的艺术观念、思想决心与文化情怀。他要突破封闭的“土地”观念，在坚实的“土地”中践行“大诗”理念。这个诗途，既是思途，也是灵性感应之途，更是认知与哲理路径。“林乃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外。这些路叫做林中路。每人各奔前程，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林业工和护林人识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在林中路上。”^⑥对“天才”的幻象确认，是对海子“大诗”的价值认同与坚定信念。“天才”在历史事件与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真正的文化动力，推动着海子对人类的理想担当与行动实践，特别在追求理想家园的精神书写中，这类伟大、璀璨的心灵往往会推动文化与历史的真正转型。“海子”作为象征符号的文化价值与思想意义就在于

①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66页。

②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69页。

③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69页。

④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72页。

⑤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68页。

⑥ [德]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题言。

重续了屈原、李白等先哲的精神情怀与精英传统,将先知智力与个体超验感知同一于“心”与“行动”,创造出辽阔、宏大的生命诗篇和原型意识。“人类没有罪过只有痛苦/太阳火光照见大地两岸的门窗/痛苦疲倦的泥土中有天才飞去”^①,但是“天才”,海子肯定也会遭遇“愤怒”“疲倦”,遭遇现实压力与被忽视,自然少不了痛楚与失败,唯有“故乡”“大地”能够融留这些“忧伤”与献祭的“身体”,化作“土地”的一种品质与灵魂,“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②,以此实现新生与复活。

“土地”既是孕育大诗故土,也是心灵苏醒的家园。海德格尔讲,人在大地上诗意栖居。土地,不仅是孕育、繁衍生气的居所,也是最终的人类归宿,大诗的现代之维与生命之思均由此生成,一种与生存相关的初心与终极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与可能。

海子写道:“芳香而死亡的泥土/对称于原始的水/在落日殷红如血的河流上/是丰收或腐败的景色”^③,“泥土”是二元的,既指向“芳香”,也指向“死亡”,其思辨丰赡的内心包容了这种对立和紧张,作为一种文化意象与情感符号,诗人以否定性的情感与价值建构实现了对“泥土”的文化穿越与哲理观照。“泥土”最终孕育着希望,是灵魂诞生的土壤与归宿。“泥土”是歌唱,也是希望之火、丰收之火,“火”是道说,亦是默默燃烧,而那源于“内心的黑暗”的召唤变成一种文化省思与哲理观照,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作出回应,诗人的沉默变成执着与向往,在隆重、寂寥的夜色中栖居于“大地”。土地,是大地的母体,大地,是土地的哲学。“作品不是对那些时时现存手边的个别存在者的再现,恰恰相反,它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④“大地”是母体的文化象征,是生命的真实召唤与归宿;“大地”,是掷地有力的绝响与知己,是生命道说的勇气与希冀,“大地 你为何唱歌和怀孕”^⑤,“大地”,成为诗人与世界关系的思想纽带;“大地”的歌唱是诗人的内心歌唱,是心灵溢散出的赞颂与喜悦之情,她孕育着果实与品质,诗人诞生于“万物”,但又冲决万物,成为独立的歌者、思者。“你为何因万物和谐而痛哭/叫内心的黑暗抓住了火种”^⑥,这种痛苦的心灵质询变成了对“土地”的感应与致敬,而黑暗“内心”则打通了另一秘密通道,他在强烈的“不和谐”中保护着对内部心灵的秘密探索与热情,借“大地”完成了生命内部某种关系的转换,打通了对生命勘探的另一路径,塑造着深刻/独立、深沉/清醒的心灵勘探与神秘召唤。

除了肉身与凡俗的行走,还有梦想与理想的行走,海子诗中经常出现的“马”的意象完成了这多重行走,直逼现代之思、幻想之诗。“小诗”《以梦为马》因此成为海子最具代表的抒情诗经典。在《太阳·土地篇》中,海子同样写到这种最具想象与诗性的飞翔之“马”。

“马”是“大地”的腾飞与流动的展示,“土地”养万物种与自然。海子以梦为“马”,为诗入梦,“马”成为形式与途径,支配着诗人驰骋与幻想,奔走于“土地”与愿景,最终完成形而上学之诗与诗的哲学,在一片空境、幻象中抵达生命的可能,而这“可能”正是“马”的隐喻与一生,也是“向死而生”的生命道说与途中的哲学洞悉与诗意呈现。“……从泪水中生长出来的马,和别的马一样/死亡之马啊,

①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96页。

②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96页。

③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77页。

④ [德]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第22页。

⑤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61页。

⑥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70页。

永生之马,马低垂着耳朵/像是用嘴在喊在喊着我——那传遍天堂的名字”^①。“马”是海子诗中代表性意象之一,它意味着驰骋,意味着天马行空,同时也是宿命与献祭,它是想象力的飞翔,也是灵魂的诗性探险,“竖起耳朵 听见了/秋天的腐败和丰收/月亮的内心站着一匹忧伤的马”^②,这匹“忧伤的马”“站在内心”,仰望纯粹的天空,在飞翔想象完成内心赞美与歌唱。以梦为马的“诗人”是灵性载体与精神圣徒,亦是生活诗意的播撒者与道说者。“马”是精神加速器,也是思想运思的情感媒介,其奔驰、想象的精神世界把海子导向对高度、难度的体验之诗、哲学之诗与神性之诗的探索与实践。

三、土地:异质的大地

“土地”代表母体文化,与东方性灵和情怀紧密联系,她自觉游离于东方文化和农业文明,极具世界视野与现代省思,即农业文明见长的性灵文化遭遇现代之维的文明忧思,体现出“金属”对于农业文明的重要意义。同样,“金属”被现代技术与城市文明所取代,成为物质符号的标志,海子导向的必然是土地遭遇多种文明所产生的文化省思与痛苦纠结,这个“土地”极具矜持与纠结、守旧与新生相交缠的异质特征。

《太阳·土地篇》让海子不断走向精神殉道与文化复活的信仰探索,最终走向“人类”的大我行动与自我圣化。晚期(1986—1989年)“太阳七部书”很难像早期(1984—1985年)那么清晰地看出某种文化与文明的精神架构,而是处于一种撕裂与痛苦挣扎的混沌之诗与异质体验当中。当然这种幻象、幻想的写作一方面克服了凡俗精神现象的还原与复活行动,一方面又不得不遭遇肉身之思的痛苦质询与身体创痛。用一个弱小之躯抵抗一个时代心灵与世界文化的衰弱的写作,这个悲剧已经埋下,我们一方面认识了天才式的燃烧与宿命,也看到人类自我的渺小与局限。

《太阳·土地篇》“第六歌咏”献诗是“种豆南山——给梭罗和陶渊明”,海子向这两位人类伟大的心灵学习,参悟与体验着孤独、虚无,以简朴、恬静思维去应验生命的自在与精神的富有,“我忘记了 只有他 追随贫穷的师傅学习了一生/灯中囚禁的奴隶 孤独星辰上孤独的手/在你的宫殿镌刻我模糊的诗歌,想起这些/石头的财富言语的财富使我至今辛酸”^③。显然,这两个中外不同时期的诗人对土地、宇宙都有近似的体验与认知,他们的超验之心与心灵感应无形中影响了海子对宇宙的深度体验与生命领会。“白色帝子”“安睡的水”“月亮”“敦煌”“村庄”“秋天果园”,这一类文化意象更趋近东方诗人对自然与生命体悟及背后所寄托的文化情怀,它们是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的旨趣与意境,也代表了东方美学与审美态度。当然,对于《太阳·土地篇》而言,最终追求的是“民族与人类”交汇的“大诗”,因而,在《太阳·土地篇》中,从母体文化孕育的大地之诗,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思维,呈现出文化的思辨与现代性的醒觉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海子最终抵达的仍然是“人类”这个大我,带着悲剧情结、冲突色彩的献祭与精神复活,走向存在之思、哲理之诗。当然,这些都深深扎根于母语文化传统,也深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

①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576页。

②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607页。

③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631页。

海子沉浸于“土地”的写作与心灵召唤。他这些具有“元诗”意义的写作倾向,是关于诗歌的诗歌,他以“诗歌”这个精神实体与性灵母体隐喻着生命的行走与诗意的可能,他的诗歌事业象征着人的精神归宿与心灵拷问。海子以诗歌作为诗人志业,以生命本体展开艺术的召唤,不断践行文化的抱负与追求,通过审美态度与哲理观照来展开对人类命运的沉思与突围。

“诗歌”与“土地”的关联在《太阳·土地篇》中得以确证,诗歌成为精神的纽带与作为孕育食物、养料的“土地”有着某种精神的关联,后者提供食粮,前者诞生精神,它们共同支撑起诗人海子强大而有抱负的艺术信念与生命信仰。“上帝乃是表示理念和理想领域的名称。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尘世的世界是红尘苦海,不同于彼岸世界的永恒极乐的天国。如果我们把感性世界称为宽泛意义上的物理世界(康德还是这样做的),那么,超感性世界就是形而上学的世界了。”^①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像“豹子”“上帝”“羔羊”“太阳”“天使”“天梯”“众神”“酷律”这一类文化意象无处不在,这也是海子接受现代之维和西方文化浸染后的异质追求与世界眼光,它们隐喻着西方基督教文化建构的理性世界与伦理诉求。“一盏真理的灯/照亮四季循环中古老的悔恨”^②,“真理”与“悔恨”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契合、感应关系,是一种以忏悔、罪感为特征的文化体系,其中渗透着西方理性至上的原则,而这个“至上”由“上帝”统领。“我们作为形式的文明是建立在这些砍伐生命者的语言之上的——从老子、孔子和苏格拉底开始。从那时开始,原始的海退去大地裸露——我们从生命之海的底部一跃——其实是险入失明状态。原生的生命涌动蜕化为文明形式和文明类型。我们开始抱住外壳。拼命的镌刻诗歌——而内心明亮外壳盲目的荷马只好抱琴远去。荷马——你何日能归?!”^③海子结合所处的母体传统文化情结,在吸取自身营养的同时,也不断吸收他者文化的精神营养,形成一种“异质”文化形态的精神食粮,从而走向诗人所追求的“诗与真理、民族与人类”融合的“大诗”。“真理有如一种植物,在岩石石堆中发芽,然而仍是向着阳光生长,钻隙迂回地,伛偻、苍白、委屈,——然而还是向着阳光生长。”^④在海子看来,“从母走向父:亚当的创造,不仅回荡滚动着大地的花香,欲情和感情,作为挣脱母体(实体和材料)的一种劳作,极富有战斗、挣扎和艰苦色彩——雕像的未完成倾向。希腊悲剧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两个典型的创造亚当的过程。带有鲜明的三点精神:主体明朗、奴隶色彩(命运)和挣扎的悲剧性姿态。而且在希腊悲剧和意大利复兴各有巨匠辈出”^⑤。海子这种清晰的世界眼光,对人类文明板块的深刻审视,渐渐融合在他自觉的文化冲动与受难的激情之中,以此建构他的“大诗”话语与行动。融入人类的伟大心灵,走向更为庄严的先知与圣徒的自我圣化过程,于海子个体的凡俗肉身来说则意味着一场生命危机。

“土地”孕育着诞生与生殖欲望。“土地”是饥饿的装饰,也是收获的粮仓;“土地”是我们必然面

① [德]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第231页。

②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626页。

③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890页。

④ [德]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第200页。

⑤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895页。

对但也常常忽略的身体和文化居所。诗人善于捕捉土地上蔓延、播撒的各种心灵讯息与生命符号,培育和酿造生命之诗、艺术之诗、精神之诗、灵魂之诗。而这个过程,正是身心汇聚、内外兼容的神秘感应与胸襟契合的文化象征。

“土地”最终诞生的是“王”,这种东方性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成就了海子立体综合素养与智力结构兼备的大诗话语,也将诗人本身塑造为一种极具世界眼光与文化情怀的抒情之王和诗歌之王。有着诗人这一身份的海子,思考着自我与世界的秘密感应,身体的在场与精神的通感,实现了诗与生命文化抱负与双重理想。诗的审美化与哲理化的融合抵达了诗的本体价值与终极思维对时代的文化启示,它们穿越现实的焦虑与心灵的挤压,在诗意家园完成一个诗人的神圣使命。这个“土地”就是海子,这个“王”也是海子的喻指与象征,它们共同反映出诗人不同于时代的文化抱负与精神企及。

这位“诗歌之王”以身体体验苦难,撕裂含混、暧昧的语义,不断表现出“王者”的引领风范。“作为身在其中的证人。王者以黑夜为本。”^①显然,对海子诗歌的把握,除了精确的语义分析之外,更需要对他所营造出来的时代语境与文化气场加以感受与体验,通过联想、想象来建构他所表达的思想意蕴。“词不只是钥匙,它也可以是桎梏。”^②从语言的理据性角度很难对此语段展开诗意分析,甚至会将其误解为是违背语言规律的诗行。这种“反读”的方式恰恰有助于梳理诗人晚期并未完成的“大诗”。论者的增补与读解,丰富了“以诗解诗”的理论价值与阐释可能。我们阅读海子诸如此类的混沌、晦涩诗句,也的确感受到其创造诗语的神奇与神性,他让语言在混沌、暧昧中获得语言与思想的汇合与并行。以诗解诗,也是以一颗诗者的心灵抵达同样诗性的心灵,抵达可能的海子,增补极具文化价值与精神意蕴的海子诗学,不断完成对海子诗学把握的直觉与可能。这种“把握”尽管暧昧与飘忽,但论者的别出心裁与深情感应,补充了学界对海子诗学认识的价值与意义。尸体是太阳,太阳是尸体,尸体是王,王是太阳,这种自我幻化、圣化的过程,导致了视听的极度幻觉化,“一具太阳中的尸体 横陈/大地 犹如盲诗人的盲目”,那诸多“太阳”,却成就了海子这个“王”,成就一个盲诗人,没有双眼,但却洞悉世界秘密,穿越比深渊更深渊的思想地带。这“太阳”是献祭的“尸体”,这“尸体”是具有思想重量与献祭激情的诸多“太阳”的身体之一,“大地”是它的最终栖居之所,这一切都在“盲诗人”这里找到了关联,完成了《太阳·土地篇》的文化书写与谱系建构。

以诗解诗,造成了对海子“大诗”的解读不是手术刀式的、话语中心主义的,而是多元文化与沉思的,这种对诗性与意义的“游牧式”解读,自然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子语言与思想并行、诗与生命双重生长的多义性、可能性。语言诗体意识的诗写,创造出差异而神性的文本意境,“言语”是对海子诗学最有力的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讲,差异性、创造性的“言语”是诗人天赋与现代性的体验与实践的精神成果。诗人终其一生追求各种话语的朦胧之美,追求对直觉与“灵感”的捕捉,以“闪现之龙”(想象力)建构他的大诗话语。整个诗写过程是一种沉寂美的展现与文化涅槃,形成了雄浑、崇高的混沌美学与文化诗境——“芳香的巨大老虎 照亮整个海滩”^③。同时,“言语”也意味着某种局限与受制,也象征着生命的局限与虚无,这正是海子诗学的关键所在,用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命绝唱和话语行动创造了中国气派,并与世界对话,完成了汉语诗歌的文化抱负与哲学品质。

①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912页。

②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页。

③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627页。

《太阳·土地篇》第十章在“迷途不返的人……酒”的标题下引用了叶赛宁的诗“迷途不返的人哪，你们在哪里？/我们的光芒能否照亮你的路？”“酒 人类的皇后 雨的母亲 四季的情人/我在观星的夜晚在村落布满泪珠/猎鹿人的酒分布于草原之湖”^①。“酒”催生着酒神艺术，叶赛宁是“大地”的守护者（其经典诗句：“人在大地上终其一生”），“回返的道路水波粼粼/有一次大地泪水蒙蒙”^②，“大地”在海子的诗中再一次散播温情脉脉的眼神：“泪水蒙蒙”，“绳索或鲜艳的鳞 将我遮盖/我的海洋升起着这些花朵/抛向太阳的我们的尸体的花朵 大地！”^③，诗中的撕裂与酸楚在“土地”的神性对话中暂时得以和解，“土地”是诗意栖居的大地，是“大诗”的心灵居所，是诗人灵肉交融与身心感应、升华的大地之诗、灵魂之诗，其中隐匿着理性与现实世界的另一通道。“大地痛苦的诗！/大地痛苦尖叫向天空飞去/夜晚焚烧土地与河流 梦境辉煌”^④，大地是浪漫之诗、母体之诗，亦是哲学之诗、复活之诗。

《太阳·土地篇》是海子晚期“太阳七部书”中最为秩序、整体的一部“大诗”。“太阳”与“土地”产生了某种宇宙感应的思想联结，形成一种异质互文的文本效果。诗人以探天地宇宙、感身心超验的心灵触角与原型意识，不断进行跨文化、跨文体的沟通与对话，其神韵就像鲁迅的《野草》对“意象”的创造一样^⑤，最终创造出海德格尔所体认的“天地神人”的思想融留与生命感召。这也许正是海子的“大诗”写作所探索与实践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冯济平

Breeding Introspection from the Matrix – On Haizi's *The Land of The Sun Series*

Dong Yingch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Land of The Sun* series is the most orderly and comprehensive "long poem" among the "Seven Books of the Sun" in the late years of Haizi. The "sun" and "land" under his pen produce some ideological connection of cosmic induction, forming a heterogeneous and intertextual effect. While exploring heaven and earth in the universe, the transcendental spiritual tentacles and archetypal consciousness, he constantly carries out cross-cultural and cross-styl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and finally creates the thought fusion and life inspiration similar to what Heidegger recognized from "heaven, earth, god and man".

Key words: land; matrix; writing; intertextuality; communication; dialogue

①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 617 页。

②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 616 页。

③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 613 页。

④ 海子：《海子诗全编》，西川编，第 601 页。

⑤ 姜振昌：《“以诗为文”与鲁迅〈野草〉文体的艺术特征》，《鲁迅研究月刊》2021 年第 4 期。

礼图与笙诗：贵族社会的仪式与文艺生活

张树国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战国宴乐水陆攻战纹壶中的几个图像,画面生动活泼,是对贵族时代礼仪制度与战争生活的凝缩,与《诗经》相关主题及先秦礼典具有互相印证的可靠性,实际上是包括采桑图、大射礼图、大飨礼图的先秦礼图。采桑图表现了《诗经》时代的高禘崇拜、男女幽会秘仪,大射礼图与《诗经》射礼诗篇相应,大飨礼图与《诗经》宴飨诗篇相应,对解决雅诗中的笙诗问题有一定帮助。这些图像对《诗经》时代的宗教、伦理仪式生活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印证。

关键词: 战国宴乐水陆攻战纹壶;大飨图;会射图;采桑图;礼图

中图分类号: K892.9; I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3) 04-0028-15

古代左图右书,书所不能言,图以彰其形;图所不能画,书以尽其意,图书相须为用,相得益彰。礼图的绘制在古代中国已形成了传统。据《隋书·经籍志》,最早的礼图出于东汉末年,郑玄、阮湛曾著《三礼图》9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夏侯伏朗《三礼图》12卷,张镒《三礼图》9卷;《崇文总目》著录梁正《三礼图》9卷;《四库全书·经部》著录宋杨复《仪礼图》17卷、《仪礼旁通图》1卷,宋聂崇义《三礼图》,明王应电《周礼图说》,明刘绩的《三礼图》等。这些礼图主要是典礼仪式中的名物图或行礼时的位置图,图像呆板而平面化;至于仪式场景和人物礼仪行为,就难以再现了。《仪礼》如冠、婚、丧、祭、乡、射、朝、聘诸礼仪生活中,其升降揖让富有画面感,但现存礼图作品因为去古已远,往往不能尽意。《中国青铜器全集》著录战国早期“宴乐狩猎攻战纹壶”(详见图1、2),礼图画面生动传神,无疑是当时社会的生动记录,无论从礼学史、艺术史还是从文学角度来看,都弥足珍贵。

图1中的宴乐纹青铜壶今藏于故宫博物院,高40.7厘米,宽24.6厘米。据介绍,全器主体纹饰分三道:第一道表现射礼和嫔妃采桑;第二道一侧为飨食礼,上为宫室宴飨,下为击磬伐鼓鸣钟场面,另一侧表现弋射和捕鱼情景;第三道表现水陆攻战场面,一侧为攻战战场,城下战士多架云梯攻城,守城战士站在城上抗击,另一侧为水战战场,两战船上层正处于激战状态,下层有划桨手摇船奋进。这表明从春秋后期发展起来的人物画像,至此已相当成熟,战国时期贵族生活与时代特点已能概括地表现出来。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简帛书写与上古文学经典关系研究”(22BZW0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树国,男,辽宁阜新人,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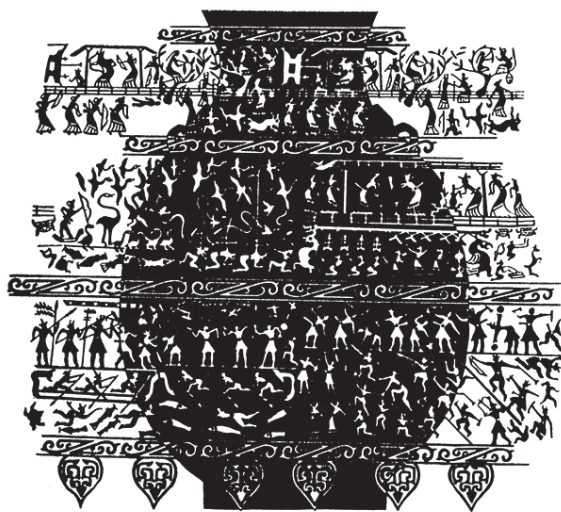
图1 战国早期镶嵌宴乐纹壶^①图2 战国早期镶嵌宴乐纹壶纹饰拓本^②

图2为《商周青铜器纹饰》中收录的战国宴乐水陆攻战纹壶的拓本白描图。这幅装饰纹样将春秋战国之际贵族阶级的社会生活镂刻在铜壶表面上,形象生动,内容丰富。马承源先生将其分为6个主题单元,并作如下解释:

1. 燕饮画像,表现有台基或有基础的堂中,宾主享饮酬酢、仆佣奉酒,有列鼎陈设。堂前或堂左有鼓钟、击磬、击鼓、奏瑟、歌舞等场面。

2. 会射画像,表现与会的贵族们在弯弓拉矢、射向布侯的情景,燕饮与会射画像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与《仪礼·乡射礼》的描述有其相似之处。

3. 采桑画像,表现人数不同的妇女在桑树上采桑叶,下有人相接。图中采桑者的服装为贵族妇女。《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齐戒,亲东向躬桑。”此画当即“躬桑”之类。

4. 弋射画像,表现为数目不同的人张弓向天以矰矢射鸟,画像中矰矢上皆系有线。射鸟为弋,是田猎的一种。

5. 狩猎画像,表现狩猎者手持弓箭或矛向着成群的牛、羊、鹿、犀等大小走兽捕猎的情况。古代狩猎与练兵有关,饰狩猎画像为崇尚武勇之意。

6. 攻战图像,包括对阵、徒兵搏斗、攻城、水军画像。这一水陆攻战图向我们生动地提供了东周时代战争的形式及其战斗情景。^③

①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7册《东周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版》第146页、《图版说明》第48页。

②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图版第100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51页。

③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详见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叙》第29—30页;又见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9页。

战国宴乐水陆攻战纹壶中的几幅画面代表了不同的主题,是由古代艺匠们在繁复的生活画面中精选出来的,是贵族社会礼仪制度和战争生活的浓缩,与《诗经》及先秦礼典具有互相印证的可靠性。笔者认为这几幅图画实际上是战国礼图,与《诗经》时代的社会生活存在密切联系,《礼记·仲尼燕居》:“不能诗,于礼繆;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①诗、乐、礼和谐统一在仪式生活中。虽然《诗经》时代已经逐渐远去,但作为社会生活的礼仪交往活动,作为一种深层的传统,仍是《诗经》时代的延续;同时这些礼图对《诗经》研究在具体而微的层面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暗示。

一、“采桑图”为“高禘求子图”

“采桑图”可以说是“战国宴乐水陆攻战铜壶”上非常生动的图画,表现的是“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及“蚕月条桑,取彼斧戕,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豳风·七月》)的情景。葛兰言(Marcel Granet)《中国文明》论中国农业社会中的日常劳动生活,以为在桃树、杏树、梨树、栗树、李子树、桑树中,最有用的是桑树;他们小心翼翼地为桑树剪枝,“过多蔓生的枝条要用斧子砍掉,小树则只是摘取它们的树叶”,桑叶装在用柳条或芦苇编制的筐里,用来喂蚕:

春天来了,天气渐暖,金翅雀唱着歌儿。姑娘背着柳条筐,沿着小路慢慢走着,去采集新鲜的桑叶^②。(It is springtime, the days grow warm / the goldfinch is singing / girls with their baskets / walk along the little paths / to gather the young leaves of the mulberry.^③)

这种诗意的语言源自《诗经·豳风·七月》,采桑、养蚕、缫丝、纺织、染色到最后做成丝绸服装,这些劳动完全由妇女承担,类似于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李惠林(Hui-lin Li)《中国驯化的植物:基于生态地理学的考虑》一文认为,桑树与漆树在中国北部植物群中占有独特地位,桑叶用来孵化蚕,中国黄土高原地区的养蚕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600—前2300年^④。蚕与丝绸在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及,在《诗经》中提到20余次。桑树种植及丝绸业由北方迁到长江流域似乎是在战国时期^⑤。商代甲骨文就有祭祀蚕神的记载,称为“蚕示(祗)”,如武丁时期卜辞:“牢,五牢,蚕示三牢,八月。”“贞:元示五牛,蚕示三牛。”^⑥上古时代,采桑养蚕为女子专任之事,有相应的神话传说,“蚕示(祗)”可能是女性神。《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

① 郑玄注:《宋本礼记》下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影印本,第150页。

② [法]马赛·葛兰言(Marcel Granet):《中国文明》(La Civilisation Chinoise),杨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

③ Marcel Granet, *Chinese Civilization*, Kathleen E. Innes and Mabel R. Brailsford Trans, New York: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43:145.

④ Hui-lin Li, "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China: Ecogeograp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OI:10.1525/9780520310797-006, 1983:21-64.

⑤ David N. Keightley,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36-37.

⑥ 郭沫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55页。

郭璞云：“言噉桑而吐丝，盖蚕类也。”^①晋代张华记载：“呕丝之野，有女子方跪，据树而呕丝。北海外也。”^②“欧”“呕”谐声相通，“呕丝”即吐丝，将蚕当成了女子，蚕吐丝比喻为女子呕丝，引人兴味。《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记宣山有“帝女之桑”，可能也包含着相应神话。《荀子·蚕赋》状蚕之样貌“身女好而头马首”，将蚕之形态与养蚕妇女的形象相结合。法国学者桀溺(Jean-Pièrre Dièny)分析汉乐府《陌上桑》，认为“桑园的春祀最早可能具有特殊意义”，《诗经》中诸如《七月》《隰桑》《十亩之间》《桑中》等多首诗表明，在桑园和爱情这两个主题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桀溺注意到《白虎通》“天子亲耕以供宗庙之祭，后之亲桑以供祭服”，以为桑园是男女惯常的幽会之地，男女青年节庆时就在那里约会和举行婚庆；同时也是神灵高禖的祭坛，人们来此是为了求神得子^③。桑园既是古代妇女的劳动空间，同时也是一个礼仪空间，这一说法在图2中有印证。

需要注意的是，图2中女子除采桑之外，有的带着弓并有射猎的动作。马承源据《礼记·月令》认为，这是后妃们“躬桑”的画像。需补充的是，此图与古代的“高禖”求子以及男女幽会之原始秘仪有一定联系。《礼记·月令》记“仲春之月”：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及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月令》及画中的“弓鞬”是一指示性的男性象征，意为向“高禖”求男子。陈梦家引蔡邕《月令章句》“妃妾接于寝，皆曰御”提出：“‘礼天子所御’者，祀高禖时天子与妃相交，其交或为媚神之意，故他人礼之，授以弓矢，祝其得男也。”^④《礼记·射义》：“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⑤“玄鸟至”即燕子归来之时，正是民间嫁娶的时令，故“媒氏之官以为候”。郑玄注：“高辛氏之世，玄鸟遗卵，娥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变媒言禖，神之也。”^⑥“娥简”即有娥氏之女简狄，郑玄认为商朝始祖母简狄吞燕卵而生商之祖先，因此为媒官尊为高禖，又称为“皋禖”。南宋罗泌《路史·余论二》“皋禖古祀女娲”条认为：“皋稷之神，女娲是飨，末世已失其源，谓为娥简之所托者，疏矣。”又云：

此蔡邕所以谓禖神高辛以前之所旧有，不由于高辛也。束皙云：“皋禖者，人之先也。”卢植乃云：“玄鸟至时，阴阳中而万物生，于是以三牲请于高禖之神，因其明显故谓之高，因其求子故谓之禖，而古有媒氏之官，因以为之神。”斯得之矣。^⑦

① 郭璞注：《宋本山海经》，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79页。

② 张华著，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二《异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页。

③ [法]桀溺(Jean-Pièrre Dièny)：《牧女与蚕娘——论一个中国文学的题材》，张本、黄晓敏译，详见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54—206页。

④ 陈梦家：《高禖郊社祖庙通考》，《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62页。

⑤ 郑玄注：《宋本礼记》卷二十，第3册第405页。

⑥ 郑玄注：《宋本礼记》卷五，第1册第287页。

⑦ 罗泌：《路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第173页。

据闻一多研究,夏、商、周三代皆以先妣为高禘:夏人以先妣涂山氏为高禘,殷人以简狄为高禘,周人以姜嫄为高禘,《鲁颂·閟宫》为歌颂姜嫄的诗,閟宫即禘宫^①。在黄帝与其妻雷(嫫)祖神话传说中,采桑与高禘神话结合得尤其紧密。《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黄帝世系,云“黄帝妻雷祖,生昌意”^②,昌意生韩流,韩流生帝颛顼。《世本》:“黄帝有熊氏,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累祖,产青阳及昌意。”宋衷曰:“玄器、青阳,即少昊也。”^③《大戴礼记·帝系篇》:“黄帝居轩辕之邱,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嫫祖氏,产青阳及昌意。”^④“雷”“累”“嫫”谐声相通。《路史·后纪五》记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嫫祖,生昌意、玄器、龙苗”,又云:“(黄)帝之南游,西陵氏殁于道,式祀于行,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⑤由此看来,桑林是求子之所,同时也是祭祀生殖女神的圣所。

春秋战国时代的宋国一直保存着桑林之舞。《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杜预注谓“桑林,殷天子之乐名”,孔颖达则谓“桑林”取材于商汤求雨、祷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之事,“遂以桑林名其乐也”。当表演开始之后,“舞师题以旌夏”,杜预谓:“旌夏,大旌也。题,识也,以大旌表识其行列。”孔颖达《正义》曰:“舞初入之时,舞师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题识其舞人之首。”^⑥即舞人化妆而入,有可能戴着假面,竟然将晋侯吓得退入后房。从孔颖达的解释可见,桑林之舞与求雨有关。《庄子·养生主》记庖丁解牛,其运刀“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莫不中音。庄周为宋国人,可能欣赏过桑林之舞。《墨子·明鬼下》:“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孙诒让注引王念孙之说:“《法苑珠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大事也’,据此则‘祖’是泽名,故又以云梦比之。”^⑦这些地点都是古代祭祀高禘神以求子的圣地。《汉书·地理志下》:“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⑧采桑与男女情色关系至为密切,在桑林之舞中洋溢着原欲的放纵,具有原始生殖崇拜的内涵。这可以从《诗经》中的采桑诗篇中得到证明,如《秦风·车邻》:“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此外诸如《魏风·十亩之间》《魏风·汾沮洳》中的采桑女之歌,透露春日的喜悦和男女约会的愉快。最具典型意义的是《邶风·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诗中的桑中、上宫以及淇水之上,都是男女欢会的场所。日本学者目加田诚注《邶风·桑中》“期我乎桑中”云:“卫地桑中与燕之祖、齐之社稷、宗(笔者按: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一样,毫无疑问是高

①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神话与诗》,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第118页。

② 郭璞注:《宋本山海经》,第246页。

③ 王谟辑:《世本八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④ 戴德辑,孔广森补注:《大戴礼记补注》卷六十三,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本卷叶8B面。

⑤ 罗泌:《路史》,第89页上栏。

⑥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227页。

⑦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29页。

⑧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5页。

禘祭祀的场所。高禘是在仲春之日,祭祀国之始祖母以求子嗣之地,届时男女集聚一起举行性的祭礼。”^①对此,台湾学者高莉芬曾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上古时期的高禘社稷仪典,至春秋战国之际,已逐渐淡化了宗教神秘的色彩。在溱洧、桑中富含象征的文化空间中,展演着会合男女的春会议典”;“这个春会的庆典仪式,蕴涵上古生殖崇拜与巫觋文化的绵延和传承。”^②陈梦家认为,上古时代高禘、郊社、祖庙为一,高禘为祖妣发祥地,故祀高禘就是祭祀最古之宗庙,而宗庙与郊社也是“同源分化者”^③。桑林之舞实际上成了表演生殖崇拜及求子巫术的原始秘仪,是崇尚庄重严肃的古代社会生活的一种生动点缀。

二、会射图即大射礼图

图1、2中有几处描写射箭的图像。可以说,射礼是礼仪宴会中的重要项目,故礼书中有大射、乡射等名目。在西周金文中有“射庐”,这是古代宫廷内用于天子行大射礼和练习射术的场所。西周懿王时期的《匡卣》铭文云:

惟四月初吉甲午,懿王才射庐,乍(作)象舞,匡甫象乐二。王曰:休。匡拜手稽首,对扬天子不(丕)显休,用作(作)文考日丁宝彝,其子子孙孙永宝用。^④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收录《匡卣》铭文拓本,并作释文,以为铭文中的“懿王”即恭王之子,“象乐”之“乐”字有漫漶之处,应隶定为“𪛗”:

象舞者,《礼记·内则》云:“成童舞象,学射御。”象𪛗,《吕氏·仲夏纪·古乐篇》:“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韦注云:“三象,周公所作乐名。”𪛗即乐之繁文,犹文王、武王乃先王,而文、武字或从王作玨、珽也。言“甫象𪛗二”者,盖三象本有三章,此抚其二章也。在射庐“作象舞”,与《礼记·内则》言相应,而作象舞须抚象乐,则为古礼之所缺佚者矣。^⑤

郭沫若释“甫”为“抚”,“甫”“抚”鱼部谐声相通。宋人陈旸释《周颂·维清》诗序“《维清》,奏象舞也”,认为:

《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统》《仲尼燕居》皆言“下而管象”,《春秋传》亦曰“象箭”“南”,

① [日] 目加田诚:《中国诗选》第1册《周诗—汉诗》,日本:东京社会思想社,昭和46年(1971年),第18—19页。

② 高莉芬:《春会的仪典象征:邂逅采桑女的文学原型分析》,《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

③ 陈梦家:《高禘郊社祖庙通考》,《陈梦家学术论文集》,第154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拓片05423A,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398页。

⑤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上册《图录》第68页、下册《考释》第83页。

盖文王之乐,歌《维清》于堂上,奏钟鼓、舞象于堂下,其所形容者,熙邦国之典而已。^①

“射庐”一词,屡见于出土文献。《师汤父鼎》:“唯十又二月,初吉丙午,王在周新宫,在射庐。”《十五年赵曹鼎》:“唯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恭王才周新宫,王射于射庐。”^② 传世文献中亦称射宫。《礼记·射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大雅·行苇》描写贵族与其族人宴会、比射的场面云:“敦弓既坚,四鍬既钩,舍矢既均,序宾以贤。敦弓既句,既挟四鍬。四鍬如树,序宾以不辱。”郑笺:“鍬音候,又音侯,矢名。”孔疏云“矢而谓之鍬者”,《释器》云“金鍬剪羽谓之鍬”,孙炎曰“金鍬断羽,使前重也”,《方言》云“关西曰箭,江淮谓之鍬”^③。《宾之初筵》首章言举酬、饮酒、射箭:“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对大射礼的描述,与《仪礼》中《乡射礼》《大射礼》一致。在射礼进行过程中,以射乐为节制。《仪礼·大射仪》:“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乐正命大师曰:‘奏《狸首》,间若一。’大师不兴,许诺,乐正反位,奏《狸首》,以射。”《狸首》,郑玄认为是逸诗《曾孙》:

狸之言不来也。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后世失之,谓之《曾孙》。《射义》所载《诗》曰:“曾孙侯氏”是也。《曾孙》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④

《狸首》有歌词,同时也是弦乐。《大戴礼记·投壶篇》:“命弦者曰:‘请奏《狸首》,间若一。’太师曰诺。”^⑤

“射侯”之得名,《礼记·射义》云:“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⑥ 陈槃先生则认为源于古代巫术:“以射制服诸侯之谓也。本自先有诸侯,以其不侯,从而射之,因是始有射侯,故古祭射侯之辞曰:唯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⑦ 实际上类似于“偶像伤人术”或“厌胜之术”。但用在典礼仪式上的射侯制度,其古义已经大变。《燕礼》疏引《郑目录》云:“诸侯无事,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礼。”《射义》云:“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⑧

关于“射鱼”,古书记载很多:《易·井》九二“井谷射鲋”,西周金文《静簋》“王令静司射学宫”,又云“射于大池”。陈梦家云:

①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编:《陈旸〈乐书〉》卷七十《诗训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第2册第255—256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拓片02780、02784,第1447、1451页。

③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151页。

④ 郑玄注,孔颖达疏:《仪礼注疏》卷十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52页。

⑤ 戴德编,孔广森注:《大戴礼记补注》卷二十五,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本卷第13页。

⑥ 郑玄注:《宋本礼记》卷二十《射义》第四十六,下册第404页。

⑦ 陈槃:《“侯”与“射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

⑧ 郑玄注:《宋本礼记》卷二十,下册第397页。

古有射鱼之法,而大池即辟雍,所以渔于大池、射于大池和王乘于舟为大豊(礼)而射于辟雍,应是同类之事。^①

《礼记·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荐鮓于寝庙。”《淮南子·时则训》:“季冬,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鱼。”“射鱼”主要用于祭祀,同时借“射鱼”活动来选拔俊士。《礼记·射义》:

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②

“泽”即“泽宫”。《礼记·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泽。”注云:“泽宫也”。《孔子家语·郊问》即云:“王立于泽宫。”陈槃先生认为“名副其实之水边宫殿”^③。图1、2刻有众人携弓佩剑、排列整齐、等待乘舟射鱼的情景。《周礼·司裘》“王大射”郑注云:

大射者,为祭祀射。王将有郊庙之事,以射择诸侯及群臣与邦国所有之士可以与祭者。射者,可以观德行,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

射礼进行之中以乐为节。《礼记·射义》:“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蘋》为节,士以《采芣》为节。”^④除《狸首》外,《驺虞》《采蘋》《采芣》均见于《诗经·召南》,为合乐之诗。《墨子·三辩篇》载:“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其诗曰:“彼茁者葭,一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一发五豝。于嗟乎,驺虞。”诗义与比射之情景颇相吻合。在燕饮之中比试射艺,一方面以助酒兴,制造游戏气氛;另一方面,在敬恭祀事之中亦有提倡尚武精神之义。

三、燕射礼图与笙诗

燕射礼图可以说是上古贵族钟鸣鼎食生活的生动写照,对先秦礼制系统是一写实性的图示。题材上表现的是燕飨礼仪,可称为“燕射礼图”或“大飨礼图”。上古时代礼乐之用以和为贵,清儒邵懿辰认为冠婚丧祭场合不用乐,“独射、乡、食、享以正交接之时,乃用钟鼓、干戚以和安乐也”^⑤。图2左上方为“飨礼图”,表现的是《礼记·乐记》中所谓“献酬醕酢”之礼或称“献宾之礼”;主体部分即“乐舞图”,是“大飨”之礼中最为隆重的部分。

关于“大飨礼”,在《礼记·仲尼燕居》记孔子论其“有四焉”:

①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页。

② 郑玄注:《宋本礼记》卷二十,下册第404页。

③ 陈槃:《〈春秋〉“公矢鱼于棠”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1987年。

④ 郑玄注:《宋本礼记》卷二十《射义》第四十六,下册第397页。

⑤ 邵懿辰:《礼经通论》,详见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卷一六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6351页下栏。

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籥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还中矩,和鸾中《采齐》,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

注谓“大飨有四”云:“大飨谓飨诸侯来朝者也。四者,谓金再作,升歌《清庙》、下管《象》也。”注“夏籥序兴”云:“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乐。”^①注误。从画面上来看,伴随着钟、鼓、笙、管之音,表演着象征“用兵击刺”的“干舞”,是“大飨”仪式写实性的图解。“管《象》”实即用籥管吹奏“象乐”,“象乐”为配合“象武”或“象舞”之音乐。关于“象武”的性质,《周颂·维清》毛序曰:“奏《象舞》也。”郑笺:“《象舞》象用兵击刺之舞,武王制焉。”“舞”“武”古通,蔡邕《独断》“象舞”作“象武”,《礼记·仲尼燕居》亦作《象武》^②。“夏”即雅,为金奏之曲,《礼记·燕礼记》曰:“以乐纳宾,则宾及庭,奏《肆夏》。”《周礼·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而“籥”为笙奏,为匏竹之类。“夏籥”之“夏”通雅,夏乐即雅乐,为编钟乐;“籥”即瓠笙,为吹奏乐。“夏籥序兴”即编钟、笙奏迭相演奏之意。《礼记·乐记》:

圣人作为鞀、鼓、柷、敔、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③

“献宾之礼”是整个“大飨”之礼中一个重要环节,在《仪礼·乡饮酒礼》中有细致的介绍。杨宽认为,大飨礼主要表现为主、宾之间的献、酢、醕、酬活动,称为“一献之礼”;在宾客迎入后,先由主人取酒爵到宾席前进献,叫做“献”;次由宾取酒爵到主人席前还敬,叫做“酢”;再由主人把酒注觥,先自饮,劝宾随着饮,叫做“酬”^④。“醕”为“小饮”(《玉篇·酉部》)之意,《仪礼·士虞礼》“酌酒醕尸”可证。所“飨”之“醴”为甜酒。《说文》:“醴,酒一宿熟也。”《小雅·吉日》:“以御宾客,且以酌醴。”“醴”用在仪式上,以立而不饮为特点,即《左传·昭公五年》“设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饮”。《小雅·瓠叶》描写的正是“献宾之礼”:

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① 郑玄注:《宋本礼记》卷十五,下册第148—149页。

② 张树国:《乐舞与仪式——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③ 郑玄注:《宋本礼记》卷十一,中册第307—308页。

④ 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42页。

这首诗中的“尝”“献”“酢”“酬”，正是主宾之间的“一献”之礼。在图2中，坐宾之前摆放着两“豆”及一牲鼎，《瓠叶》诗中作为起兴的瓠叶与炮炙的兔首则是筵豆中的食物。《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郑伯享赵孟，“子皮戒赵孟，礼终，赵孟赋《瓠叶》……乃用一献，赵孟为客”。刘师培《礼经旧说·乡饮酒礼卷四》认为，“乡饮酒礼”是大飨礼、燕礼的根源。对《汉书·儒林传·刘昆传》“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刘师培注云：“盖汉人经文诗说有以《诗·小雅·瓠叶》篇为人民射礼者，故（刘）昆采其制。”“飨礼均以立成，其彻俎而后，则行燕礼。”^①西周春秋时流行于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作为招待贵宾的隆重礼节。飨礼中，乐舞表演与献宾之礼是同时进行的，请看图3：



图3 公元前5世纪中叶佚名青铜壶上的仪式表演图

图3是今藏于法国巴黎 Musée Guimet 博物馆的一件佚名青铜壶壶身画面的复原图。据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描述，壶身刻画的是典礼表演场面：牺牲被供奉在高台上的宗庙里，乐奏场面在建筑物之前的庭院中，除了一套编钟和编磬外，还有一架建鼓和楹鼓^②。《小雅·彤弓》也是主宾飨礼上所奏乐歌：

彤弓召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

彤弓召兮，受言载之。我有嘉宾，中心喜之。钟鼓既设，一朝右之。

彤弓召兮，受言櫜之。我有嘉宾，中心好之。钟鼓既设，一朝酬之。

周代乐舞一般分为“雅乐”及“燕乐”。“雅乐”是当时周天子及各国诸侯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等大典所用的乐舞，乐器如编钟、石磬、建鼓以及其他吹奏乐和弹拨乐等，同时伴有“六舞”。“燕乐”，一为燕飨之乐。《周礼·春官·钟师》：“凡祭祀飨食，奏燕乐。”郑玄注：“以钟鼓奏之。”贾公彦疏：“飨食，谓与诸侯行飨食之礼于庙，故与祭祀同乐，故连言之。知以钟鼓奏之者，以其钟师奏九夏，用钟鼓，故知此燕乐亦用钟鼓奏之，可知也。”二为房中乐。《周礼·春官·磬师》：“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磬，凡祭祀奏缦乐。”郑玄注：“燕乐，房中之乐。”贾公彦疏：“燕乐，房中之乐者，此即《关

① 刘师培著，钱玄同整理：《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2页下栏、第74页上栏。

②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Suspended Music: Chime-bells in the Culture of Bronze Age Chin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30.

睢》二南也。谓之房中者,房中谓妇入后妃,以风喻君子之诗,故谓房中之乐。”^①图3表现的,应是“燕礼”第一义“燕飨之乐”。

在《诗经》时代,诗、乐与仪式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下面依据先秦礼书的记载补充一些“大飨礼图”没有表现的内容。对这一时代仪式生活的考证,可以解决一些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

首先,图3对《诗经》中典礼仪乐章的演奏情况是最好的图示。《尚书·益稷》云: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祝敌,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②

“夔典乐”是对宴飨仪式场景的描述,是依据春秋战国时代仪式乐奏情况,发思古之幽情。从时代来看,不可能是尧、舜时代的作品,因为尧舜时代是陶器、瓦器时代,并未出现编钟。凌廷堪于“凡乐皆四节,初谓之升歌,次谓之笙奏,三谓之间歌,四谓之合乐”条下引李光地语云:

据《仪礼》,作乐凡四节:升歌,一也;笙入,二也;间歌,三也;合乐,四也。盖堂上之乐,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乐,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堂,匏竹在下,即笙管之谓也。上下迭作则谓之间,上下并作则谓之合。准此以求,则“搏拊,琴瑟以咏”,升歌之乐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敌”,下管之乐也;“笙庸以间”,间歌之乐也;“箫韶九成”,合作之乐也。^③

阮元释《虞书》“笙庸以间”云:

《大司乐》疏引郑注云:“东方乐谓之笙。笙,生也。东方长生之方,故名乐为笙也。西方之乐谓之庸。庸,功也。西方物成熟有成功。亦谓之颂,亦颂其成也。”郑君此说,古义也。按:东、西阶并有钟磬,在东者名笙,在西者名庸,所吹之笙则在两阶之间。^④

阮元的解释意在调和古人之说,但不合理。陈旸解释《益稷》“笙镛以间,鸟兽跄跄”云:

大笙谓之巢,以众管在匏,有巢之象也。小者谓之和,以大者唱则小者和也。大钟谓之镛,以能考大功也,小者谓之搏,以其薄而小也。盖笙之为器,以匏为之,包竹摠而植,以象物之生,其音则象鸟矣。镛之为器以金为之,能宫能商,始隆而终杀,其声则象兽矣。^⑤

①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28页上栏。

②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02页下栏。

③ 凌廷堪:《礼经释例》卷十三,详见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第6507页。

④ 阮元:《天子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间歌合乐表说》,《擘经室一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2页。

⑤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陈旸〈乐书〉》卷七十九《尚书训义》,第2册第321页。

参考图 2.3 燕射礼图刻绘“笙庸以间”的场面,可知“笙”即匏竹,为吹奏乐;“庸”即镛,为编钟;“笙庸以间”即匏竹之类的吹奏乐和编钟、编磬之类的打击乐在音乐演奏中“间奏”。《小雅·鼓钟》“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描述的也是这种“间奏”的场面,“雅”指钟磬乐,“南”指匏竹之类的吹奏乐。

其次,据图 2.3 可知,《小雅》中的“笙诗”实际上是“标题音乐”,燕射礼图实际上是对“乡饮酒礼”“燕礼”“乡射礼”“大飨礼”等仪式生活的图示。凌廷堪叙述“乡饮酒礼”的仪式过程云:

“一人举觶,毕,工入,升自西阶,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此升歌也,谓瑟与人声歌于堂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此笙奏也,谓笙入奏于堂下也。又云“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此间歌也,谓堂上之歌与堂下之笙间作也。又云“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采蘋》”,此合乐也,谓堂上、堂下众声俱作也。凡四节。^①

《仪礼》中《燕礼》《乡射礼》在“四节”基础上有所改动。仪式生活中《由庚》《崇丘》《由仪》《南陔》《白华》《华黍》六首皆为笙曲,分别隶属于《小雅·鹿鸣之什》与《南有嘉鱼之什》。古人认为此六首“笙奏”原来有诗词,后来散亡。《毛诗序》云:

《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洁白也。《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有其义而亡其辞。……《由庚》,万物得由其道也。《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义而亡其辞。^②

观其在典礼仪式中的应用,恐怕这六首“笙曲”本来就没有歌词。如有歌词的话,岂不与升歌、间歌没区别了吗?郑注此六诗为“其义未闻”(见《乡饮酒礼》下注),孔疏“未可以意言之也”,《毛诗》的解释恐怕属于望文生义。陈旸《乐书·乐图论》论“间歌”云:

然工歌则“琴瑟以咏”而已,笙不与焉。笙入则众笙而已,间歌不与焉。间歌则歌吹间作,未至于合乐也。合乐则工歌、笙入、间歌并作,而乐于是备矣。^③

图 2.3 表现的正是“笙镛以间”的场面,中间呈跪姿吹匏竹者正是笙奏图景。

再次,《诗经》的编排可能受到典礼仪式的影响。据《左传·襄公四年》,鲁国穆叔到晋国行聘问之礼,“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晋国派行人询问是何缘故,穆叔回答说: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鹿鸣》,君

① 凌廷堪:《礼经释例》,详见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第 6507 页。

②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九、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892 页下栏、897—898 页。

③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陈旸〈乐书〉》卷一五四,第 3 册第 568—569 页。

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谿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①

“肆夏之三”又见《国语·鲁语》,指肆夏、樊遏、渠,为金奏之曲;“文王之三”指《文王》《大明》《緜》,“《鹿鸣》之三”即《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可见这三种乐章为当时仪式中所常用。在《毛诗》中,“笙诗”《南陔》《白华》《华黍》排在《鱼丽》之下,“笙诗”《由庚》《崇丘》《由仪》紧接《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史记·孔子世家》所谓诗之“四始”,即“《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都是典礼仪式上的乐章。由此看来,《毛诗》编排很明显受到了典礼仪式的影响。

四、结 语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既对贵族社会的仪式生活有清晰的解说,同时强调礼乐对君子道德修养的意义。《礼记·孔子闲居》一文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相互参照,可知其源出于战国,记载孔子与子夏论述“五至”“三无”“五起”等概念,注重“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孔子注重诗、乐、礼与人的内在修养的结合,正如《论语·阳货》篇所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作为君子不应拘束于礼乐之器以及仪式表演,而应该理解礼乐文化的真精神,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无体之礼”“无声之乐”相对,以乐悬即编钟乐为代表、结合管箫吹奏乐的乐器组合为“有体”之礼、有声之乐。郭店简《性自命出》论性、命与诗乐相通之理,发挥乐教之作用,简24—26云:“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叹,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斂。”^②《赉》《武》为《诗经·周颂》之“大武乐章”即“武乐六成”之二,与韶、夏均为雅乐的重要组成。《性自命出》简27—28记载:

郑卫之乐,则非其声而从之也。凡古乐龙心,益乐龙指,皆教其人者也。《赉》《武》乐取,韶夏乐情。

裘锡圭认为,《赉》《武》是歌颂周武王灭商定天下的歌词,故言“乐取”^③。刘钊释“益乐龙指”为“淫乐弄指”,“益乐”指淫乐;“益”为“溢”字古文,“溢”有过度、非分、泛滥、奢侈意,与“淫”的过度、无节制之意正同;“龙”疑读为“弄”,为撩拨、挑逗之意^④。“龙”“弄”均来纽东部,“龙”为“弄”之假借字。郑卫之乐属于桑间濮上之音,以琴瑟弹拨乐为主,故称为“烦手淫声”。古代乐器如琴、瑟、箏之类弹拨乐多称为“弄”,如《汉书·司马相如传上》:“(相如)乃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心说而好之。”

①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92页。

② 荆州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57页。

③ 荆州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63、180、183页。

④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司马相如弄琴夜挑卓文君事人所共知。又如王维《秋夜曲》“银筝夜久殷勤弄”可证。但“古乐龙心”之“龙”则非“弄”意，当释为“恭”。“恭”古楚文字或从“共”，或从“龙（龍）”，楚文字作：

 郭店《尊德义》34：“恭（龠）则民不怨”^①

 上博一《缙衣》2：“静恭（龠）尔立（位），好是正直”^②

“龙”（龍）、“恭”（龠）谐声相通，因此“古乐龙心”当读为“古乐恭心”，意谓《赉》《武》之类古乐使内心恭敬而庄重。

魏源云：“诗有为乐作而不为乐作之分，且同入乐而有正歌、散歌之别。”又云：

古圣人因礼作乐、因乐作诗之始也，欲为房中之乐则必为房中之诗，而《关雎》《鹊巢》等篇作焉；欲吹豳箏则必为农事之诗，而豳风、豳雅、豳颂作焉；欲为燕享祭祀之乐，则必为燕享祭祀之诗，而正雅及诸颂作焉。三篇连奏，一诗一终，条理井然，不可增易，此外则诸诗各以类附。^③

魏源是遵循着礼—乐—诗这一顺序，典礼仪式在前，乐与诗在后，这是就三者的统一体而言的。可以说，魏源的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典礼仪式乐章之外的这些诗篇，魏源称为“散歌”者，如二《南》之《殷其雷》《汝坟》《行露》《甘棠》，《豳》之《破斧》《伐柯》，《颂》之《访落》《闵予小子》《小毖》《敬之》，等等，其原初状态是“徒诗”，经采诗观风以后，被之管弦，以收观风俗、知得失之政治伦理功效，同时也适当地应用于典礼仪式中。魏源认为：“一用之于宾祭无算乐。再用于矇瞍常乐，三用于国子弦歌。”在典礼仪式上所谓“正歌”演奏完之后，“乃继之以无算爵，乱之以无算乐”。“无算”意思是说随兴之所之，尽欢而止^④。“矇瞍常乐”，指用于“食举”以及讽谏的“工师之歌”。“国子弦歌”，即乐正教国子“春诵夏弦”之诗。清儒邵懿辰认为：“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故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可以说，古代贵族以诗、乐作为基本的教育内容，其本身就是适合学礼的需要，诗、乐、礼在仪式中是统一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战国宴乐水陆攻战纹壶”上的图画实际上是先秦礼图，是对先秦社会的宗教、伦理及社会风俗的反映。据研究，战国青铜器装饰纹样在传统的动物纹、植物纹、自然景物纹、几何纹之外，表现人类社会生活纹样的题材为前代所无法比拟。其中图画狩猎纹、水陆攻战、宴乐射猎纹、采桑纹、礼仪活动纹等约40余件，说明战国青铜装饰艺术已达到很高水平。这些图像生动传神，

① 荆州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57页。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③ 魏源：《诗古微》“夫子正乐论”条，详见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卷一七二，第6426页下栏。

④ 参见魏源：《诗古微》“夫子正乐论”条，详见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卷一七二，第6426页下栏。

⑤ 邵懿辰：《礼记通论》“论乐本无经”条，详见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卷一六八，第6351页下栏。

在仪式活动中传递着生活的意义和情趣,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笔者重点讨论上图中采桑画像、燕飧画像、会射画像,这些图像反映了先秦贵族社会礼仪交往与艺术生活,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记录,相较于后世礼书中诸多平面性的礼图来说,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及审美价值。至于弋射、狩猎及水陆攻战画像的意义自然明了,笔者就不作讨论了。

责任编辑:潘文竹

Rites and *Sheng* Poems: Rituals and Literary and Artistic Life in Noble Society

Zhang Shuguo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Several banquet images, vivid and lively with water and land battling patterns from a Warring States pot, are a reflection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and war life in the noble era. They are reliable corroboration of related themes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pre-Qin rites. In fact, they are pre-Qin ritual images depicting mulberry gathering, grand shooting ceremony and grand dining ceremony. The mulberry gathering shows the Gao Mei worship and secret rites of tryst between lovers in *The Book of Songs*. The grand shooting ceremony corresponds to the shooting ceremony poems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grand dining ceremony to its dining ceremony poems,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study of *sheng* poems in the *ya* part of *The Book of Songs*. These images provide enlightening confirmation of religious and ethical ritual life in the time of *The Book of Songs*.

Key words: banquet images with water and land battling pattern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ot; grand feast image; shooting image; mulberry gathering image; ritual image

汉代人视阈中的商业

宋艳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在汉代人的视域中,商贾为从事于贱业者。在重农抑商政策之下,商业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和控制,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现实,又令汉代人不得不重视商业。在“利”的驱动下,汉代商业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发展态势。汉代画像中大量的市集图,充分反映了汉代商业的繁荣,是汉代商品经济繁盛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汉代;商业;贱业;汉代画像

中图分类号: K234; F0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4-0043-19

商业,起源甚早。司马迁将工商业兴起的时间,设定为高辛氏之前,即为五帝时期。而班固将商业兴起的时间向前推进到神农之世,即三皇时期。其实,从原始社会开始,为了生存,人们用所余之物,向别人换取自己所需之物,这一交易过程,就是商业行为。随着需求的扩大,为了方便交易,人们制造了货币。随后有人专门充当交易的中间环节,从中赚取差价,这就是商人。商业活动从分散逐渐集中在固定地点,就形成了市场。国家为了规范市场管理,于是建造了市肆,统一规划,并派官员进行管理,维持市场秩序,负责向商户收取租税。《白虎通义》曰:“商贾,何谓也?商之为言商也。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贾。”^①可知,流动的商人称为“商”,固定在市场中的商人称为“贾”。行商坐贾,成为商人的两种类型。

从上古开始,人们就有了对职业进行分工的意识。“四民”即是对职业划分的一种方式。所谓“四民”,即将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种类型。通过学习获取仕进者,称为士;从事于农作物生产者,称为农;从事于加工制造行业者,称为工,或百工;从事于流通交易者,称为商。四民要各安其职,严守本分。《清华简·为政之道》中,规定社会各等级以及四民皆要“上下各有其修”,具体表现为“君𠂔(守)器,卿夫=(大夫)𠂔(守)正(政),士𠂔(守)教,攻(工)𠂔(守)巧(巧),贾(贾)𠂔(守)贾(贾)聚(货),戎(农)𠂔(守)𠂔(稼)𠂔(穡),此之曰攸(修)。”^②君、卿大夫、士、工、贾、农,构成了社会的有机整体,皆要守住自己的本分,不可逾越。如此,国家才能稳定,社会才能发展。其中农、工、商行业

基金项目:本文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汉代画像与观念世界”(G36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艳萍,女,山东泗水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汉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① 陈立撰:《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46页。

^②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37页。

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依存,不可或缺。司马迁曾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①这里的虞为虞官,管理山林川泽。物产经虞官而输出,工将物产加工为成品,商将成品带入流通领域,完成了从商品生产到流通的全过程。农为众人提供食粮。农、虞、工、商,互相依存,共同构成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汉代商业的发展状况

从先秦开始,四民身份已有高低之分。秦代征兵,贾人是最先征发的对象,然后是有市籍者,再后是大父母、父母曾经有市籍者,可知商人及其后代,是士卒的主要来源。整个汉代,在重农抑商的社会大背景下,商、百工、医、巫等,皆被视为从事于贱业者。汉代人的固有观念为:“行贾,丈夫贱行也。”^②商人的地位很低,被剥夺了很多权力。汉高祖时明确规定:“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纈罽,操兵,乘骑马。”^③商贾被剥夺穿华服、操兵器、乘骑马的权力,国家还对他们征收繁重税租。汉惠帝、高后时,对商贾之律有所放松。汉文帝时,商业的快速发展已无法忽视,“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縠。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④汉文帝不得不采取抑制措施,规定“贾人、赘壻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⑤,商人在政治上被剥夺了仕进权。汉景帝对文帝政策有所修正,打破“有市籍不得宦”的禁令,规定“訾算四得宦”^⑥,从而为商贾进入仕途打开了一扇窗。汉景帝还明确规定官吏不得从事商业贸易,避免与商贾争利。这些措施皆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实行算缗、告缗制度。规定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目,并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一百二十钱),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此为“算缗”。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其赀产。有敢于告发者,政府赏其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为“告缗”。算缗、告缗制度,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却使商人受到沉重打击,中家以上大多破产。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采取均输、平准政策,官府垄断商品流通,商贾又一次遭受打击。从汉元帝开始,刘汉王朝呈衰落趋势。“重本抑末”被儒者反复强调。博士贡禹认为,国势渐衰的原因,是因“民弃本逐末”,他主张罢除钱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税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于农,复古道便。”^⑦贡禹的主张虽然有益于恢复农业生产,但复古的主张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王莽统治时,对商业采取包容态度。他擢升富商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以王孙卿为京司市师(即刘汉王朝的东市令),客观上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当时百姓私下交易时仍使用刘汉王朝的五铢钱,王莽大怒,下令禁止使用五铢钱。

①《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950页。

②《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981页。

③《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5页。

④《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32页。

⑤《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列传》,第3077页。

⑥《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52页。

⑦《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列传》,第3076页。

王莽五次改革币制,造成货币混乱,对当时的商品经济打击甚大。王莽还效法井田制,将天下田改为“王田”;奴婢改称“私属”,皆不得买卖。王莽的经济改革,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①的结果,终以失败告终。东汉王朝建立后,重新使用五铢钱,商品市场的混乱才告结束。东汉初期,历战争洗礼,经济衰退,重农抑商政策再次被强调。桓谭在上疏中提到:“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②桓谭认为要重本抑末,关键是禁锢商贾,不得为官吏。尽管东汉时期始终坚持重本抑末政策,但无法抑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汉代,尽管商人地位很低,但还是有很多从事于商业活动者。著名的富商,蜀地有卓氏、程郑、成都罗裒;宛有孔氏;鲁有丙氏;齐有刀间、临淄姓伟;周师史、雒阳张长叔、薛子仲;宣曲任氏;塞斥桥桃;关中毋盐氏、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其余郡国富商不可胜数。富人皆有自己的致富之道。以冶铁致富者为蜀卓氏、程郑、宛孔氏、鲁丙氏;以盐井致富者为成都罗裒;以赍賁子钱致富者为毋盐氏;以田农致富者为秦杨;以贩脂致富者为翁伯;以卖酱致富者为张氏;以洒削致富者为质氏;以胃脯致富者为浊氏;以马医致富者为张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从深层次剖析了商业之所以兴盛的原因,那便是:利。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③。正是利益所趋,才使得天下之人熙熙而来,攘攘而去。司马迁对商业活动并不排斥,认为商业才是最容易致富的行业。司马迁认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④各行业按照贫富程度排序为:农—工—商,看来农最贫困,其次是工,而商最容易致富。司马迁认为富才是仁义道德的基础,礼是在富的根基上产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为很多商人立传,其中包括陶朱公、子赣、白圭、猗顿、巴寡妇清、蜀卓氏等。司马迁对先秦以来的商业进行了认真反思,不仅感叹道:“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⑤司马迁这一观点显然与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相左,他代表了一部分有识之士的观点:重农亦重商。班固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认为食和货是生民之本。食为农业,货为商业,将商业和农业的地位相等,这与汉代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政策相异。班固在《汉书》中列有《货殖传》,很多内容来源于《史记·货殖列传》,如为陶朱公、子赣、白圭、巴寡妇清等立传,此外又加入了一些其他富商。班固对严守职业道德的商业行为加以褒扬,并对商业不轨之举进行了批判:“至于蜀卓,宛孔,齐之刀间,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犹复齿列,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⑥班固的批判分两种情况:一是私人操控铜铁鱼盐的行为;二是掘冢搏掩行为。第一种情况其实就是盐铁私营,这是盐铁会议的中心议题。盐铁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利润极大,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私人争利,会给国家带来很大损失。班固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对私人争利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不轨奢僭”的恶行。

①《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第4112页。

②《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冯衍列传》,第958页。

③《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952页。

④《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972页。

⑤《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982页。

⑥《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第3694页。

第二种情况中,“掘冢”就是盗墓;“搏掩”,为抢劫,抑或赌博,以取人财物,总之都是不法行为。班固认为这些行为皆属于伤化败俗之举,为大乱之道,必须加以摒弃。

秦代就已经针对商业行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如《睡虎地秦简》中的《金布律》和《关市律》。金和布皆为货币,《金布律》,即关于货币管理的法律法规。《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规定:官府是钱的管理者,出入钱,皆要加盖丞和令的印章。以千钱为单位加以统计,一千钱为一畚,加盖丞、令印章。不满千钱的,亦要封上并加盖封印。钱无论好坏,都可以作为货币进行流通,如果因为钱不好而拒绝使用,就会触犯法律。十一钱与一布等价,一布的标准为长八尺,宽二尺五寸。布质量不好,或者长宽不足尺寸者,不能作为流通货币使用。市场上流通的钱称为行钱,不能选择性使用行钱、布,有敢择行钱、布者,如果列伍长不报告,及官吏不严谨地遵循金布法律,皆有罪,受到相应惩罚。市场中所售商品,都要估算价格。价值不足一钱的小物,不用估算。市场中的商铺统一规划,整齐划一地排成行列。按照所售物品类型,划分出很多区域。每个贾人按照自家所售商品类型,寻找适合自己的商铺。贾人称为“贾市居列者”,有专门的户籍,称为市籍。《睡虎地秦简》中的《关市律》,内容不多,只规定从事手工业和为官府出售产品,收钱时必须立即把钱投进钱龕里,并让买者见证投钱的过程,不从令者就要处于赀一甲的惩罚。《睡虎地秦简·关市律》其他条文应该亡佚了,不然不会内容这么少。

汉承秦制,汉代商业管理方面的法律应该与秦代相差不大。汉初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金布律》和《口市律》。依据《睡虎地秦简·关市律》之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口市律》”应该为“《关市律》”。从简文可以获知,汉代对市场管理非常严格。如果在市场中以不正当手段获取钱财者,要受到相应处罚。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关市律》规定:

诸詐(诈)给人以有取,及有贩卖贸买而詐(诈)给人,皆坐臧(赃)与盗同法,罪耐以下有(又)惡(迁)之。^①

如果以欺诈手段获取钱财,或者在贩卖贸买中存在欺诈行为,皆要坐赃与盗同法,处以耐罪之下的还要迁徙。看来汉代对市场的管理非常严苛。这种严苛在客观上保障了市场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良性发展。汉代的市贸行为有一定规则,违反规则就要受到惩罚。同时鼓励知情者揭发、抓捕。市场官吏负责向商贩收租,各商贩要如实汇报资产,并自觉缴纳租金。若隐匿资产,不自觉依法交租,则所隐匿资产视同偷盗的赃款,其贩卖之物及贩卖所得之钱皆要被县官没收,并取消其于市场上贩卖的资格。列长、伍人如果不告发,就要被罚金各一斤。嗇夫、吏主者如果不能捕得,就要被罚金各二两。这一点在《汉书·何武传》中亦有记载。汉宣帝时,何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中人皆敬惮其家。何武的弟弟何显家有市籍,但却不按时交纳租税。市嗇夫求商不畏强权,逮捕并折辱了何显家人。按照《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关市律》,作为市嗇夫的求商,逮捕折辱何显家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秦汉时期,中央设立官员,对经济领域加以管理。秦代治粟内史专门“掌谷货”^②,其下有两丞。汉景帝时将治粟内史改名为大农令,汉武帝时又更名为大司农,统领全国谷货和财货。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此外,中央还设有内史。内史本为周官,掌管京师

①《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②《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31页。

治安。秦代沿袭。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分置左、右内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更名右内史为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又都水、铁官两长丞;左内史更名为左冯翊,属官有廩牺令丞尉。此外,左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四市四长丞皆隶属于左冯翊。可知长安诸市皆在左右内史的管辖之下。市的直接长官为市令或市长,其下为市丞。此外还设有市啬夫、市吏、市掾、市楼令等,根据市场的规模和类型分设不同官职。^①除了以上官吏,还有“伍人”和“列长”。每五家商户选出一位代表,称为“伍人”。每列商铺有一人专门负责,称为“列长”。伍人、列长虽然算不上官吏,但也是市场管理者的一部分。他们负责监督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商业活动,维持正常商业秩序。如果发生违法行为,伍人、列长负有连带责任。

林甘泉将秦汉时期的市场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国都之市,咸阳、长安、洛阳都存在这种超级市场;再一种是诸侯国和郡县的市场;最后一种是乡聚的市。^②刘承祿在《秦汉工商行政管理考察》中指出,秦汉时期的市场种类很多,有专物专市型的酒市、柳市、马市、奴婢之市、盐铁市;有价格稳定性的直市;有时间性型的日市、夜市;有特殊部门型的军市、胡市、狱市、槐市(太学市)等等。^③这些研究都非常有价值。西汉长安城中设有专门的市场,以供人们从事商业活动。在《中国考古学·秦汉卷》西汉未央宫复原图中,可以看到市场所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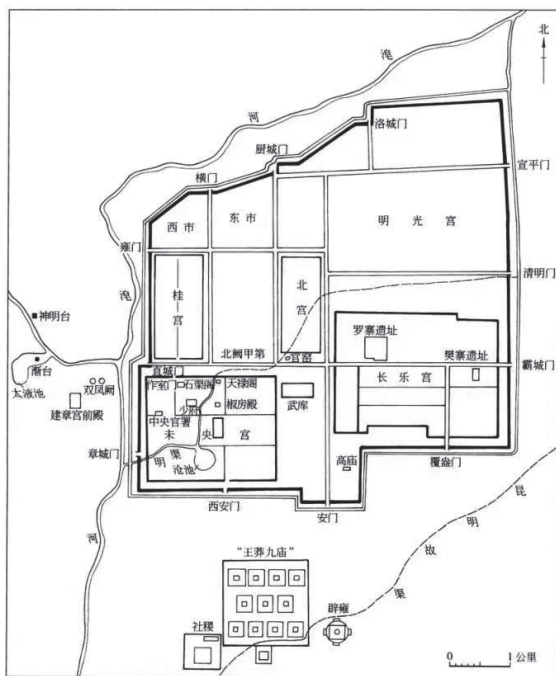


图1 西汉未央宫复原图^④

从上图看,未央宫的北部为桂宫、北阙甲第、北宫,北阙甲第的正北方为东市,桂宫的正北部为西市。东市、西市位于整个长安城的西北部,是长安城最重要的官办市场。汉高祖六年(前201),“立大

① 关于汉代市官,前人已做过大量研究。如李学勤:《银雀山简〈市法〉讲疏》,《秦汉简牍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乃华:《论汉代的市》,《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刘承祿:《秦汉工商行政管理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② 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上、下册),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525页。

③ 刘承祿:《秦汉工商行政管理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④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77页。

市”,“大市”应为东市。西市立于汉惠帝六年(前189)夏六月。东市西市在未央宫以北,形成“面朝后市”的格局。除了东市西市,长安城还有其他市。何兹全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提到:“汉代长安有九市。……《长安九市》条说:‘《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市楼皆重屋。’九市之说大概是可信的,班固《西都赋》也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也说:‘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①可知长安城一共有九个市,其中东市和西市最为重要,这或许就是复原图上只有这两市的原因所在。

东汉建都于洛阳,在《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东汉洛阳城复原图中,可以看到市场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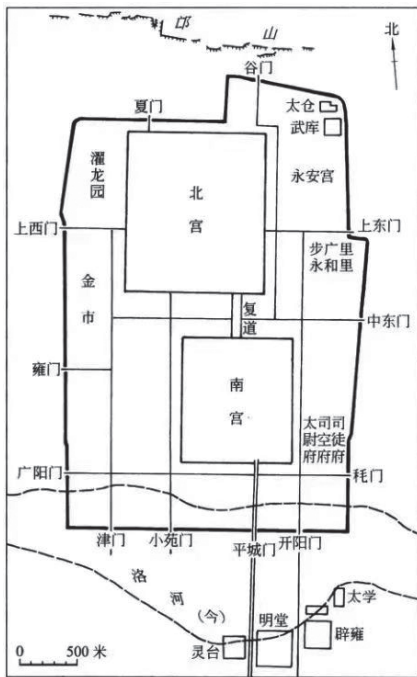


图2 东汉洛阳城复原图^②

复原图中,洛阳城只有金市,处于京城西部。西晋陆机的《洛阳记》中曰:“洛阳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观之西城中;马市在大城之东;洛阳县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阳县也。”^③可知洛阳城中一共有三个市,金市规模最大,在宫城西部,也被称为大市;马市在城的东部;洛阳县市在城南。陆机虽是西晋人,但此时距东汉未远,西晋的洛阳城和东汉的洛阳城应该变动不大。洛阳城复原图中只有金市,而没有马市和南市。不过在《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提到:“洛阳三市中金市以外的马市和南市,分别设于城东和城南,市场之所在,也应是居民聚集的区域。”^④可见洛阳城确有三市,只是在该书的东汉洛阳城复原图中没有标记出来。令人疑惑的是,《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记载:“湖阳公主奴杀人西市”^⑤,因此事由洛阳令董宣处置,所以这里的西市应该是洛阳城的,而不是长安城的。可见洛阳城中有西市。西市或为金市,因金市在宫城西部,且西方的五行属金,故而将金市与

①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9页。

②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234页。

③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十六《闲居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5页。

④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236页。

⑤ 《后汉书》卷二十六《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907页。

西市互称。

除了长安、洛阳等国都所设之市,汉代还有不少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成都、洛阳、邯郸、临菑、宛并为汉代的五都会,是最为繁荣的商业中心。此外,燕、陶、睢阳、吴、寿春、番禺等地,都是商业发达的重要城市。这些商业中心遍布全国,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被称为“通邑大都”。这些“通邑大都”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商业网络。东汉王符有言:“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①可知汉代商业城市的繁多。

军市为军中所设之市,从战国时即已设立,且实行收租制。所收租赋,收归国库,抑或充当军饷。也有将领自行决定用途的情况,如战国时赵国将领李牧,将军市所收之租用以飨士和赏赐;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太守,将军市租皆给予士卒。这应该只是个别情况,大多数的军市租赋,应该上交国库。

胡市是设在边境的市,以与少数民族互通商品。汉代时,在北方,与匈奴通市;在西北,与羌通市;在南方,与南粤通市。随着胡市的扩展,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开通,汉朝与西域及西南诸国的商业贸易空前繁盛。疏勒国,处于西去大月氏、大宛、康居的交通要道之上。疏勒城设有市列,为汉廷与西域商业贸易的重要枢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皆善贾市,喜好汉朝的兵器及黄金。自乌孙以西至安息,因靠近匈奴,经常被匈奴骚扰,但皆贪恋汉朝的财物,想方设法与汉廷通商。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朝汉,西域诸国皆尊附汉廷,以便更好地与汉进行商品贸易。西域诸国的物产,亦随着胡市的开通,大量进入中原。大宛多苜蓿、葡萄酒,这是与汉朝交易的重要商品。特别是汗血宝马,最受汉廷喜爱。罽宾,有目宿、杂草奇木、檀、櫟、梓、竹、漆等特产,还种五谷、葡萄等水果。有金银铜锡做成的器具;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玕、珊瑚、虎魄、璧流离等珍禽异兽及宝物,皆是罽宾国的特色商品。汉武帝时与罽宾互通关市。汉元帝时,因路途遥远、汉使常被袭杀等原因,与罽宾暂停互通。汉成帝时,因贪图汉廷的赏赐及贾市,罽宾遣使来朝,此后互市不绝如缕。汉武帝时期,自开通西南夷后,汉朝的商品亦传到西南诸国。汉王朝的缯帛,通过巴蜀楚道及牂柯江到达夜郎;蜀地独出的枸酱,通过牂柯江,卖到南粤和夜郎;蜀布、邛竹杖也通过蜀地商人,贩卖到身毒、大夏等国。东汉和帝时,大将军窦宪大败匈奴,重新开通西域。西域的珍宝,如宛马、金银、香罽等,随着胡市的开通而进入汉廷。胡市,确为融通汉朝与西域、西南诸国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市的交易时间,有从随意性到规范化的变化过程。部落时期,商品交易具有随意性,不规范性。到了周代,开始有了规范的市场及交易时间。市为一日三合:大市,以百姓为主;朝市,以商贾为主;夕市,以小商小贩为主。到了汉代,商品经济更为繁荣,所以增为一日四合。

初次交易,需要择取良日。据《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记载:

·市良日,戊寅、戊辰、戊申戌,利初市,吉。^②

戊寅、戊辰、戊申、戊戌,皆为开市的良日,利于初次交易。开市择日的目的,为趋吉避害。

市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场所,还是刑斩罪犯之地,“弃市”之名因之而起。汉景帝时,晁错即被斩于东市。汉武帝时丞相刘屈氂被告发使用巫祝,被腰斩于东市。汉昭帝时,方士成方遂冒充卫太子,被识破后腰斩于东市。汉平帝时,名儒吴章被王莽腰斩,磔尸东市门。王莽违背秋后问斩的制度,于春

①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注:《潜夫论笺校正》卷三,《佚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0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释文注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94页。

夏斩人于都市,令百姓震惧,只能道路以目。从以上可知,市的一个重要功能为行刑及曝尸之所。之所以如此,是因市中人最多,能更好地起到警戒世人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弃市”亦为羞辱刑。

皇帝有时还会带头破坏市场秩序。汉哀帝宠信驸马都尉董贤,赏赐无度,甚至“发取市物,百贾震动”^①。汉哀帝之举,无疑对市场秩序产生了极坏影响。偷盗,是与市具在的社会现象。《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有很多惩治盗贼的法律条目。在法律严明时,盗贼会有所收敛,但在国家治理不力时,市中就会盗贼横行。汉宣帝时,京兆尹多不称职,长安市中偷盗者众多,为首者称为偷盗酋长,简称偷长。张敞任京兆尹后,召集诸位偷盗酋长,委任他们为吏,并采纳偷长的计策,将众小偷悉数抓获,依法处罚。自此之后,“枹鼓稀鸣,市无偷盗”^②。

总之,汉代尽管重农抑商政策一直未变,国家也不时采取打击商业的举措,但商业繁盛势不可挡。汉代已形成了规范的市场管理法则,有益于商品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汉代市场中所售商品种类

汉代市场中所售商品,种类多样,数目繁多。第一是酒。从远古时期开始,人们就懂得了酿酒技术,酒从此进入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青铜器中爵、鼎等盛酒器的大量出土,说明商代饮酒的盛行。周代时饮酒更为普遍,并纳入礼制范畴。除了祭祀用酒,“乡饮酒礼”中,饮酒为礼仪的重要环节。“乡饮酒礼”是周代流行的宴饮礼俗,由乡大夫作为主人设宴,招待乡学中的贤能之士和德高望重者。据《礼记·射义》记载:“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③饮酒与礼仪结合在一起。酒不仅在礼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亦是人们日常饮用之物。从先秦时期开始,因酒的需求量大,所以成为商品,在市中出售。《墨子》中记载道,鲁国有兄弟五人,父死,长子不葬,四子对长子曰:“子与我葬,当为子沽酒”^④。鲁国五兄弟,应该属于普通百姓,可知先秦时期,酒已成为上自天子,下至百姓皆饮用之物,自然成为市场中的重要商品。到了汉代,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更为重要,“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⑤酒成为汉代必不可少的日常饮品。刘邦在作泗水亭长时,经常在王媪、武负所开小酒馆处赊欠酒钱。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曾在临邛买酒舍,卓文君当垆卖酒。可见酒为汉代重要商品之一。

汉代对酒的制造和管理,处于不断调整之中。汉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夏,规定“民得酤酒”^⑥,允许百姓私人卖酒。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为增加国家收入,实行榷酒酤政策,官府控制酒的生产 and 流通,独占酒利,不许私人自由酿酤。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的盐铁会议上,榷酒酤遭到贤良文学反对,遂被取消,改征酒税。王莽时又重新控制酿酒权,令官府自行酿酒并出售。东汉再行税酒政策,但酒政处于不断调整过程中。汉和帝永元十六年(104),令兖、豫、徐、冀四州“禁沽酒”^⑦。汉顺帝

①《汉书》卷八十六《何武王嘉师丹传》,第3496页。

②《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第3221页。

③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六十《射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38页。

④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卷十二《公孟》,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08页。

⑤《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第1182页。

⑥《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50页。

⑦《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192页。

汉安二年(143),“禁沽酒”^①。汉桓帝永兴二年(154),“禁郡国不得卖酒”^②。无论政策如何调整,酒作为商品,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大型商业城市,“酤一岁千釀”,意为一年要卖掉一千瓮酒,可见酒的交易量非常之大。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酒在市场交易中一直占据大宗。

第二,粮食。人不可一日无食,所以粮食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物。除了农民自给自足外,其他不从事于农业生产者,皆需要粮食以兹生存,所以粮食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汉代时,关于粮食管理政策,国家处于不断调整之中。汉武帝时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汉宣帝时,接受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③的建议,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稳定粮食价格。到汉元帝时,因天下大水,饥殍遍野,在诸儒的建议下,元帝罢盐铁官、北假田官和常平仓。王莽统治时,因经济改革失败,致使“谷贾翔贵”^④,百姓饿死者十有七八,“盗贼群起”成为必然之势。刘秀在两汉之际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但在他未发迹时,曾在宛卖谷。可知粮食作为人们饮食的必需品,为市场的重要商品之一。

第三,盐、铁。盐、铁一直是重大的民生问题。汉代盐铁政策几经变化。汉武帝时为增加国家收入,将盐铁生产及销售权收归政府。盐铁官营的弊端,是官方工匠所作器具,质量不好,价格昂贵,民无从选择,官府有时还强令百姓购买。汉昭帝时,关于盐铁问题展开激烈论辩。以桑弘羊为首的大夫集团,赞同盐铁官营;而贤良文学则持反对意见。盐铁会议后,国家政策有所调整,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汉元帝时,罢盐铁官,此后因用度不足,又复盐铁官。尽管国家政策多次调整,但盐、铁在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所以一直是市场中的重要商品。因地理位置不同,盐的种类亦不同。“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⑤山东、山西、岭南、沙北,皆为汉代重要的产盐基地。除了这些地方,四川亦为产盐的重要地区。四川汉代画像砖中有采盐画面:



图3 制盐画像砖 东汉^⑥

①《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273页。

②《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300页。

③《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41页。

④《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45页。

⑤《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967页。

⑥《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画像上部描绘了大山场景,重峦叠嶂,鸟兽遍野。画像下部刻画了完整的制盐场景:左下侧为取盐场景:有一口盐井,几个工人正在汲取盐水。中间位置为运盐场景:山间栈道上,两人正肩背盛满盐水的器具,向煮盐之处运输。右下侧的山包下,是煮盐场景:一个长长的灶台,上面安放着一口大锅,里面盛满盐水。一个工人正坐在灶台前向灶内添柴,灶内燃烧着熊熊大火。锅中盐水被高温蒸煮,水分蒸发,只剩下盐时,成品就会做成。这幅盐井图,没有看到管理盐井的官吏,反映的应该是私营制盐业。下面这幅画像与此相似:



图4 四川邛崃“盐井”画像砖 东汉^①

这幅画像中取盐、运盐、煮盐画面皆与上幅画像基本相同,两者属于同一母题的画像。四川画像中盐井图的出现,充分反映了四川制盐业的发达。从画像看,四川地区以井盐为主。

第四,兵器。王莽天凤四年(14),琅邪女子吕母之子被官吏冤杀,于是她散尽家财,以酤酒买兵弩,起兵反叛。王莽地皇三年(22),刘秀与宛人李通谋划共举大事,于是至市中购买兵弩,为起事做准备。可见兵器为汉代市场中的商品之一。

第五,肉食。樊哙在跟随刘邦举事之前,曾在市场屠狗售卖;原涉曾遣奴至市买肉;王莽时,流民入关,饿殍遍野。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买,却贱取于民,民甚患之。王业还持市中所卖梁饭肉羹,哄骗王莽说此为百姓家常所食,王莽居然相信此言。可知肉食为汉代市场中的重要商品。

第六,药品。据《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方士费长房曾为市掾,从市楼中瞭望,见到市中有老翁卖药;另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隐士韩康常采药于名山,卖于长安市中,三十余年口不二价。以此看,药品为汉代市场中的商品之一。

第七,书籍。西汉末期的槐市上,太学生们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互交易;东汉时,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②可见洛阳市中,有专门售书的店铺。从王充“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看,书铺中所售书籍涵盖诸子百家,品类丰富;汉桓帝时的刘梁,虽为宗室子孙,但少年时为孤儿,家中贫困,只能到市中卖书,以此养活自己。看来书籍确实是汉代市场中的商品之一。

第八,丧葬用品。西汉末期,原涉的门客家贫,母亲去世无力安葬,原涉让诸宾客去市中购买了

^①《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第82页。

^②《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29页。

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一应俱全,送给丧家;东汉时,博士郭凤自知死期将至,提前让其弟子去市中购买棺材敛具。可知丧葬用品,为汉代市场中的商品之一。

第九,占卜。汉成帝朝丞相张禹在幼儿时,经常随家人去集市。他喜欢观看卜相者卜卦,看得久了,竟能通晓蓍布卦意。占卜虽然不是商品,但人们在求卜问卦时需要付费,亦属交易范畴,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十,奴婢。《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有“人良日”。简文为:

人良日,乙丑、乙酉、乙巳、己丑、己酉、己巳、辛丑、辛酉、辛巳、癸酉、癸巳。·其忌,丁巳、丁未、戊戌、戊辰、戊子,不利出入人。男子龙庚寅,女子龙丁。^①

这应该是买卖奴隶的吉日和忌日。吉日为乙丑、乙酉、乙巳、己丑、己酉、己巳、辛丑、辛酉、辛巳、癸酉、癸巳;忌日为丁巳、丁未、戊戌、戊辰、戊子。“不利出入人”,意为不利于奴隶买卖。《睡虎地秦简》“人良日”反映了秦代奴婢买卖的盛行。王莽曾道:“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②,可见秦代人口买卖现象确实非常盛行。不仅奴婢,普通百姓家的妻、子亦在被贩卖之列。西汉时期,奴婢买卖现象依然严重。霍去病曾为其父中孺购买田宅、奴婢。西汉后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③,因此,奴婢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以致出现“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④王莽针对这一现象,改奴婢为“私属”,规定不许买卖,但后期迫于形势,又不得不取消这一禁令。东汉时奴隶买卖依然盛行,王孙贵族之家,奴婢动则千人。只要有奴婢存在,买卖就不可避免。

第十一,牲畜。《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有关于牲畜的良日:

马良日,乙丑、乙酉、乙巳、乙亥、己丑、己酉、己亥、己巳、辛丑酉、辛巳、辛亥、癸丑、癸酉、癸巳、庚辰。·其忌,丙子、丙午、丙寅、丁巳、丁未、戊寅、戊戌、戊子、庚寅、辛卯。

牛良日,庚辰、庚申、庚午、辛酉、壬戌、壬申、壬午、癸酉、甲辰、甲申、甲寅。·其忌,己丑、己未、己巳、己卯、戊寅、戊戌、戊子、己巳。·戊午不可杀牛。

羊良日,乙丑、乙酉、乙巳、己酉、己丑、己巳、辛酉、辛丑、辛巳、庚辰、庚寅。其忌,壬戌、癸亥、癸酉。春三月庚辰可以筑(築)羊卷(圈),即入之,羊必千。

猪良日,庚申、庚辰、壬辰、壬申、甲申、甲辰、己丑、己酉、己巳。·其忌乙亥、乙巳、乙未、丁巳、丁未。

犬良日,癸酉、癸未、甲申、甲辰、甲午、庚辰、庚午、辛酉、壬辰。·其忌,己丑、己巳、己未、己卯、乙巳、戊子、戊寅、戊戌。·有妻子,毋以己巳、壬寅杀犬,有殃(殃)。

鸡良日,甲辰、乙巳、丙午、戊辰、丙辰,可以出入鸡。鸡忌日,辛未、庚寅、辛巳,勿以出入鸡。^⑤

简文中包含六种牲畜:马、牛、羊、猪、犬、鸡。所谓的良日和忌日,与买卖及宰杀牲畜相关。良日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释文注释》,第194页。

②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第4110页。

③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第336页。

④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第1179页。

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释文注释》,第194页。

适合买卖及宰杀牲畜,而忌日则要避免。《岳麓书院秦简》中亦有关于马、牛、羊等牲畜买卖的简文:

1415·金布律曰:黔首卖马牛勿献(献)廷,县官其买殴(也),与和市若室,勿敢强L。买及卖马牛、奴婢它乡、它县,吏

1428 为(?)取传书及致以归及(?)免(?),弗为书,官嗇夫吏主者,赀各二甲,丞、令、令史弗得,赀各一甲。其有事关外,以私马

1300 牛羊行而欲行卖之及取传卖它县,县皆为传,而欲徙卖它县者,发其传为质。黔首卖奴婢(婢)、

1301 马牛及买者,各出廿二钱以质市亭。皇帝其买奴婢(婢)、马,以县官马牛羊贸黔首马牛羊及买,以为义

1351 者,以平贾(价)买之,辄予其主钱。而令虚质、毋出钱、过旬不质,赀吏主者一甲,而以不质律论L。黔首自

0990 告,吏弗为质,除。黔首其为大隲取义,亦先以平贾(价)直之L。质奴婢、马、牛者,各质其乡,乡远都市,欲徙

1226 老为占者皆悉(迁)之。舍室为里人盗卖马、牛、人、典、老见其盗及虽弗见或告盗,为占质,黥为

J42 城旦,弗见及莫告盗,赎耐,其伍、同居及一典,弗坐L。卖奴婢(婢)、马、牛者,皆以帛书质,不从令者,

1263 赀一甲L。卖半马半牛者,毋质诸乡。^①

这是一组关于马牛羊等牲畜及奴婢买卖的简文,是《金布律》中的法律规定,违法者要受到严惩。其中提到皇帝买卖奴婢、马的情况,可见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皆参与到买卖奴婢、牲畜之中。汉简中亦有购买马、牛等牲畜的简文,如《居延汉简》:

𠄎诣官封符 为社内买马 六三·三四(乙伍柒版)^②

买马牛持刀剑 一七一·九(乙壹贰叁版)^③

《张家山汉简》中亦有简文,规定了买马的权限等问题。传统文献中亦多买马的记载,如汉武帝时卫青派人到河东买马。可见汉代马、牛等牲畜的交易量很大。政府还专设马市、牛市,以方便对马、牛等牲畜进行交易。

第十二,布帛。布帛分为丝织品和布类。缙布属于丝织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关市律》中有关于缙布买卖的法律条文。规定销售缙布,必须达到一定幅度,小于二尺二寸,就不能销售,且要被没收。汉代一尺相当于现在的0.23米,二尺二寸相当于现在的半米。小于半米,布幅就太小了,不能进行买卖。对于贩卖不足布幅缙布的行为,如有抓捕或者告发者,则将缙布赠送于他。《居延汉简》中有购买白素的简文:

𠄎买白素一丈直二百五十 凡九百七十九

①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244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第116页。

二一四·二六(乙壹伍陆版)^①

白素为白色的生绢,属于丝织品的一种。除了丝织品,其他布类亦为重要商品。如絺绤、縠、纁缘、朱纁、罽、縠布、縠、荃葵等,都属于布类,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关市律》中皆有记载。其他汉简中亦有买卖布类的简文,如《居延汉简》:

第卅四卒吕护买布复袍一领直 四百又从郭卒李忠买阜布

四九·一〇(甲三四八)^②

第卅四卒吕护购买了两种商品,一种为布复袍,一种为阜布,皆与布类相关。《敦煌汉简》中亦有买卖布类的简文:

□戾郭成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		
所卖布疎	始乐尹虎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	索卿以
	万贯范融买□一丈二尺直四石二斗	

(一四六四A)^③

简文中是卖布情况统计表,包括买布人籍贯姓名、买布数量及价格等。从以上简文可知,布帛确实是汉代重要商品之一。布帛的质量在销售中直接影响价格,劣质品禁止上市。《礼记》中曰:“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④汉文帝时亦规定“巧伪之物不鬻于市”^⑤。可见汉代对布帛、器物等商品有严格规定,不合规格就不能在市中售卖。

除了以上这些商品,汉代市场中还有各类食品、调料、农具、工艺品等。在“通邑大都”里,商品种类相当丰富,交易数量也非常惊人。这些商品按照类别可分为:食品类:谷棗千鍾、醢醬千瓠、漿千甌、鹽豉千荅、鮓鯨千斤、鰕千石、鮑千鈎、棗栗三千、佗果菜千鍾;饮品类:酤一岁千釀;皮革类:牛羊毳皮;燃料类:薪稿千车;交通工具类:船长千丈、轺车百乘、牛车千两;器具类: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鈎、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牲畜类:马蹄躐千、牛千足、羊毳千双;布帛类:帛絮细布千鈎、文采千匹;皮裘类:牛羊毳千皮、皮革千石、狐貉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床上用品类:榻布千石、旃席千具;竹木类:木千章、竹竿万个;材料类:筋角丹沙千斤、漆千斗;奴隶类:僮手千指;此外还有子贷金钱千贯。子贷者利润颇高,贪者抽取三分之一利息,廉者取五分之一,子贷之家资产堪比千乘之家。从商品种类及交易量可以看出,汉代商品贸易确实非常繁盛。

在汉代,各地皆有独特的物产。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夫山西饶材、竹、穀、纁、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⑥这些物产深受人们喜爱,很多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这些也是市场流通的重要内容。各地涌现了以特产致富者,如“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第143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第34页。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5页。

④ 《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上》,第2600页。

⑤ 《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上》,第2599页。

⑥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950页。

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①各地特产进入商品交易市场。依靠这些特产,当地一些人发家致富,竟然与千户侯产相比肩。

从上文可知,汉代商品确实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汉代人交易的热情空前高涨,商品经济的繁盛毋庸置疑。

三、汉代画像中的商业

汉代画像中,有一些反映商业的图像,为我们了解汉代商业提供了最直观的史料。

在四川汉画像砖中,有完整的集市画面,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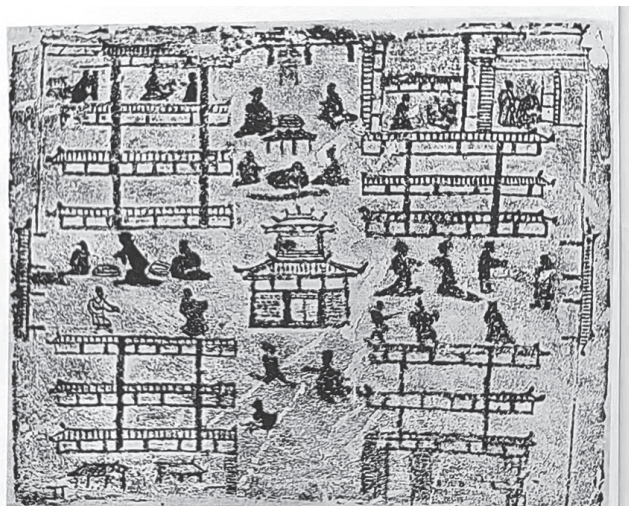


图5 四川成都市郊“市井”图^②

画像呈正方形,中间位置有一座两层楼房。《三辅黄图》引《庙记》曰:“市楼皆重屋”^③,可知画像中心的两层楼房,为市楼。市楼一般建于市场正中,是管理市场的办公场所,其作用为“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④。市楼的上层,悬一鼓。其用途有三:一为开、闭市时敲击以提示众人;二为市吏有事情需要宣布时敲击以召集众人;三为有紧急状况时敲击以警示众人,如发生火灾、追捕盗贼等等。以市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各有一条笔直的大道,把市场分割成四部分。每一部分有几列商肆,排列非常整齐。东西南北各有市门,其中北门有“北市门”、西门有“西市门”的榜题,东门和南门虽无榜题,但亦可知为东市门和南市门。市肆设施完备,商铺鳞次,秩序井然,看来是经过统一规划。整幅画像呈现出一个“井”字,这可能是市场被称为“市井”的原因所在。关于“市井”的由来,汉代人有不同观点。据《风俗通义》记载,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去市中售卖之前,先将物品在井上濯洗,所以称为市井;一种认为与井田制有关,“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⑤总之,所谓的“市

①《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970页。

②《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97页。

③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释》卷二《长安九市》,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93页。

④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释》卷二《长安九市》,第95页。

⑤《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第2476页。

井”，与井有一定关联。这幅画像中并未看到井，或许汉代的市井，并非真有井，只是习惯性沿用了先秦“市井”的称号而已。在这幅画像中，除了列肆，还有一些行商，在道路中间空地摆摊行售。市场内熙熙攘攘，井然有序。

四川汉代画像砖上，还有一些描绘市场的画面。如以下三图：



图6 市井画像砖一^①

这幅画像描绘了市场的一个侧面。画像最左侧有一道半开的门，旁边的榜题为“中市门”。市场中有一些商铺，挨着中市门的商铺所卖似乎为粮食，一大一小两个盆状粮具放在柜台上，一店员正站在柜台前招揽生意。此外还有一些行商，从商品形状看，似为鱼、肉等，交易双方正在讨价还价，甚为热闹。画像右侧有一两层小楼，榜题为“市楼”。依据这一榜题，可以印证图五正中的两层楼确为“市楼”。这幅画像中“市楼”的厅堂上，一戴冠官员跽坐于席上，手持一简状物，正与左边一官吏交谈。左边官吏亦戴冠，跽坐，地位似比右边官员低。从服饰上看，市楼中的两人与外面市场里的人显然不同，两者应为市场管理者，即市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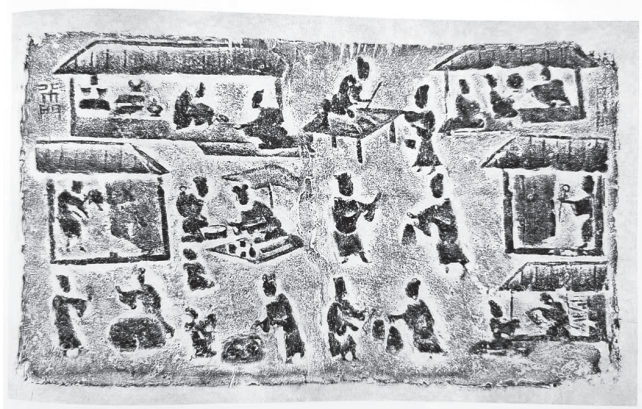


图7 市井画像砖二^②

这幅画像也是四川的汉代画像砖。左边中间位置有一道门，上面的榜题为“北市门”。画面右边中部亦有一道门，上面的榜题为“南市门”。画像中刻画了一些商铺，最左边上面的商铺为酒肆，南市门上下分别有一商铺，商家和顾客正在交易。市场中间还有一些行商，买卖双方正在讨价还价，一幅熙熙攘攘的繁荣景象。

①《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第98页。

②《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第98页。

图8 市井画像砖三^①

这个画像砖亦出土于四川。画像左右侧分别有一道门,为市场的南北门或东西门。画像左上方有一商铺,店内有五层摞在一起的器具,所售商品或为食品,抑或为布匹。画像中间为市楼,一人手持筒牍状物,正欲走上楼梯。这幅图虽然没有上面几幅图内容丰富,但也体现了汉代市场的基本面貌。

汉代市场中商品繁多,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日用类生活用品占据市场交易的主流。酒、盐、纺织品、食品等,在市场中最为常见。汉代画像反映了这一情形:



图9 四川汉代画像砖

这幅画像描绘的是市场的一隅。画面左侧有一门,应为市门。市门右侧有两家商铺,右边似为食品店,货架上摆放着一些圆形食品。左边商铺所售商品为长条形,店外一买家跽坐于地,正与店内老板商谈。市门左侧有一圆柱形烤箱状物,上面放着几个圆形饼状物。圆柱形器具旁边有一个长几,上面放两个圆形饼状物。从形状看,或为烧饼。画面右边,有两个行商就地摆摊,从商品形状上看,似为鱼、鸡及麻团状食品。这幅画像惟妙惟肖,把买卖双方的肢体语言描绘得非常生动。市场井然有序,物品多样。从画像中可以体会到汉代商品经济的繁盛。四川邛崃亦出土了集市画像砖:

图10 四川邛崃市出土画像砖^②

①《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第99页。

② 高文主编:《中国巴蜀新发现汉代画像砖》,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6页。

这幅画像描绘的也是市场一隅。画面右边有一道门,应为市门。画面左上部有一家酒肆,买卖双方正在洽谈业务。画面右下边有一摊位,摆放一张长方形桌子,桌上放着两条鱼。画面左下边也有一摊位,亦摆放一张长方形桌子。桌上放着的商品,有鸡鸭等肉类。四川德阳亦出土了集市画像砖:



图 11 四川德阳市柏隆镇出土画像砖^①

画像中有三家店铺,各自正在交易。左下边的店铺似为酒肆,左上边的店铺似为粮店,右上边店铺所售商品似为刀具。店铺中间有三个行商在摆摊卖货,所售商品为粮食、鱼等食品。

在汉代画像中,有一些专门描绘酒肆的画面,集中体现于四川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如以下四幅画像:



图 12 四川汉画像砖酒肆画像砖 东汉^②

画像中有一家酒肆,一店员站在柜台里面,正与店外一买家洽谈。买家身后有一车夫,推着一辆独轮车,上面放一方形器皿,应为盛酒之用。酒肆旁边有一大人、一小孩,正在追逐嬉戏,使得画面呈现出悠然自得,轻松愉快的生活气息。以下三幅画像,与图 12 内容相似:



图 13 羊尊酒肆画像砖 东汉^③

① 高文主编:《中国巴蜀新发现汉代画像砖》,第 7 页。

②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第 96 页。

③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第 9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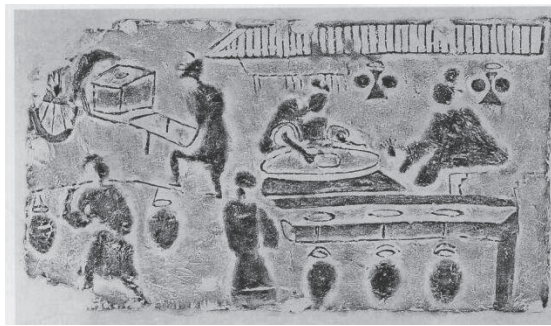
图 14 四川画像砖 东汉^①图 15 四川画像砖^②

图 13、14、15,皆为四川画像砖。三幅图中皆刻画了酒肆、交易双方、推独轮车者。三幅画像与图 12 属于同一母题,只是画像构成要素稍有区别而已。

江苏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亦有酒肆图像:

图 16 江苏徐州市铜山县利国乡发现画像^③

画像中刻画了一面阔三间三层楼宇。楼内底层为酿酒和酌酒的场景,楼上四间,每间榻上各坐两人,似乎正在品尝美酒。从四川及江苏画像可以看出,酒确实是市场中最为重要的商品。酒肆图是汉代人最喜欢刻画的母题之一,体现了汉代人对于酒的独特情愫。

①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第 95 页。

② 高文主编:《中国巴蜀新发现汉代画像砖》,第 95 页。

③ 《中国画像石全集》4《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 年,《图版》第 20 页。

四川汉代画像砖,市场及酒肆画面很多,反映了四川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天府之国,土地肥沃,农业的发达使人们富足,亦带动了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的繁荣。秦代的巴寡妇清,就生活在四川地区。其先祖开创了朱砂矿,在丈夫死后,她一直独立支撑家族产业,资产丰饶,得到秦始皇的垂青和赞许,以上宾之礼待之,并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秦始皇这一举措,无疑对四川地区的商品经济起到了鼓励和示范作用,这或许是四川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原因之一。

在汉代人的视阈中,商既是贱业,但又是富业,“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①,正反映了汉代人对商业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尽管统治者一直秉承“重农抑商”政策,但商业的发展无可阻挡。“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②,正是汉代商品经济繁盛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侯德彤

Commerce in the Eyes of the People of the Han Dynasty

Song Yanping

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eyes of the people of the Han dynasty, commerce was considered a humble occupation. Under the policy of valuing agriculture and belittling commerce, commerce had been suppressed and controlled to varying degrees, but the fact that "though the law now cheapens commerce, merchants are already rich; though farmers are respected, they are already poor" forced the Han court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commerce. Driven by profit, commerce during the Han dynasty could be vividly described by the saying "the bustle and hustle of the world was all for profit". The large number of paintings of marketplaces from the Han dynasty fully illustrate the prosperity of commerce during that time, a true reflection of its flourishing commodity economy.

Key words: Han dynasty; commerce; humble occupation; paintings from the Han dynasty

①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33页。

②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注:《潜夫论笺校正》卷三《侈侈》,第120页。

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

马小菲

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 东汉学者王充在扬州会稽郡一带历任县掾功曹、都尉府掾功曹、郡五官掾、州从事等职务, 位居地方属吏的上层, 但王充一心希望经察举进入中央朝廷, 实现由地方属吏到朝廷命官的迁跃。东汉初, 影响察举的内外因素, 包括经学水平、道德品行、行政才能, 以及家庭出身、长吏好恶、乡里口碑等, 王充在这些方面优势并不明显, 是以升任朝官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仕宦经历推动了王充“命论”等思想的形成, 深刻影响了王充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 王充;《论衡》; 东汉; 仕宦

中图分类号: K235; B23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3) 04-0062-12

东汉会稽郡学者王充(公元27—约97年)以其著作《论衡》知名, 但现存关于王充生平的史料不多。范曄《后汉书》王充本传记载非常简略,^① 魏晋时期会稽山阴人谢承与陈郡阳夏人袁山松的《后汉书》中亦各有王充传记, 内容与范曄《后汉书》大致相同。由于材料不足, 目前关于王充的研究, 对王充生平问题讨论较少。^② 其实, 王充的《论衡》中有不少与自身经历相关的论述, 这些论述不仅提供了王充生平的一手材料, 且折射出王充经历与其思想的关系, 可以补充史料之阙如, 丰富对王充的认识。其中, 王充的仕宦经历在《论衡》中记载尤多, 笔者拟结合《论衡》文本及相关史料, 对王充仕宦经历及其对王充思想的影响进行考察, 以求教于方家。

一、王充历任职务考

根据范曄、谢承、袁山松《后汉书》的记载, 王充在进入官僚体系之前, 先赴京师洛阳游学。^③ 王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论衡》与东汉士人的知识世界研究”(22CZS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马小菲, 女, 山东济南人,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 主要从事秦汉思想文化、社会史研究。

① 参见《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 第1629-1630页。

② 大多学者只是在讨论王充作品、思想时将王充生平作简要介绍。专门就王充生平问题进行论述的, 主要有徐复观《王充论考》和周桂钿《王充评传》。徐氏在文中主要对王充生平提出质疑, 认为范曄《后汉书·王充传》所载“乡里称孝”“受业太学师事班彪”以及“谢夷吾推荐”三事均属不实; 周氏则对徐氏的论点一一反驳, 证明《后汉书·王充传》和《论衡·自纪篇》所载王充生平基本可信。见徐复观:《王充论考》, 收于氏著:《两汉思想史》(二),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年, 第516-525页; 周桂钿:《王充评传》,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年, 第1-21页。此外, 黄晖、蒋祖怡、徐敏、钟肇鹏各自撰有《王充年谱》, 关注王充生平事迹的时间线索, 其中钟《谱》独立成书, 载事尤详。

③ 游学洛阳这段经历王充自己未曾提及, 颇引起了一些学者如徐复观的怀疑。笔者认为, 王充赴洛是有可能的。会稽地处帝国边缘, 东汉初尚不具备理想的学术环境, 当时游学风气盛行, 而洛阳作为东汉京师, 是全国的文化、学术中心, 集中了名儒大家, 自然是各地士人的向往之地。因此, 王充在完成基础学业后, 赴洛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 实在情理之中。此外, 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虽然没有提及在洛阳的经历, 但《论衡》其他篇章如《率性篇》《谈天篇》《别通篇》的零星记录, 可以作为王充曾在洛阳生活的证据。

充何时结束在洛阳的游学,史料无载。袁山松《后汉书》王充本传载“充幼聪明,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①考虑到王充青年时经历光武帝、明帝二帝,光武帝于中元元年初建礼制建筑“三雍”,尚未及进行礼制实践,故此处的“天子”,当指新登基的明帝。据范曄《后汉书》载,明帝于永平二年(公元59年)三月临辟雍,行大射礼;同年十月,临辟雍,行养老礼。若王充“观天子临辟雍”,说明在永平二年时他依然在洛阳,这一年的王充已经三十二岁。此外,在《论衡·状留篇》中,王充也曾自称“计学问之日,固已尽年之半矣”,可见他的求学生涯确是比较漫长的。^②因此,王充大概在中年时才结束游学,返乡入仕。^③

如同当时不少士人一样,王充入仕是从本籍所在郡(会稽郡)的辖县县吏起步,^④他曾自述:“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论衡·自纪篇》)关于“入州为从事”,他还补充过一些细节:“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诣杨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罢州家居。”(《论衡·自纪篇》)范曄《后汉书》本传对王充从政经历的描述是“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⑤所言与王充自述基本相符。可见,在元和三年(公元86年)之前,王充主要担任郡县属吏,掾功曹是他在县廷和都尉府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在郡府的最高职务则是“列掾五官功曹行事”,但在郡吏任上,王充因与太守理念不合而离职。元和三年,王充重新被辟除为州从事,又于两年后的章和二年(公元88年)主动离职。这是王充仕宦生涯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王充的历任职务,以及相应的秩次、职责、地位。

王充的第一任职务为县掾功曹。《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县属吏秩次:“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⑥县掾功曹便属于百石以下的少吏。两汉郡、县

① 袁山松:《后汉书》卷第三《王充传》,收于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66页。

② 东汉后期顺帝、灵帝、献帝时,不少太学生甚至超过六十岁,如顺帝阳嘉二年,“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灵帝熹平五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史”(《后汉书·孝灵帝纪》);献帝初平四年,“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后汉书·孝献帝纪》)《论衡》引文出自黄晖校释:《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23页。本文所有《论衡》引文皆出自此书,下文皆随文附注。

③ 根据《后汉书·王充传》的记载,王充学成后返回家乡,先“屏居教授”过一段时间。兴办私学在东汉时期非常普遍,张鹤泉指出,当时人兴办私学除了受重视经学的风气影响外,更有一些人希望藉此造成社会影响,作为仕途之敲门砖(见氏著:《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后汉书·儒林传》对出外游学之后归乡讲授并进而入仕之人也多有记载,比如会稽籍官员顾奉之师程曾、会稽学者赵晔之师杜抚等人,都是游学太学后还乡讲授,进而被任以官职。因此,客观来说王充归乡教授一事是可以成立的,且很可能是为此后进入仕途作准备。不过,这段经历可能比较短暂,社会影响也不大,是以王充自己从未提及。

④ 周桂钿曾就王充任职地点提出“陈留”“颍川”两种猜测,见周桂钿:《王充评传》,第8页、第16页。此说不确。根据史料,西汉中期以来,郡县长官回避本籍,但其自行任免的属吏皆从当地人中挑选,前人所言已详,不赘。因此王充在被州刺史辟除之前,一直任职于家乡会稽郡及下属县,与同时代很多会稽士人相同。

⑤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29—1630页。

⑥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42页。

二级行政部门皆设诸曹作为办事机构,各曹主要负责人称掾、史,《后汉书·百官志一》本注引《汉书音义》言“正曰掾,副曰属”,^①掾功曹即为功曹掾,是功曹的主要负责人。

从职责看,无论在郡在县,功曹都主管同级属吏的任用、推荐、赏罚。《后汉书·百官志五》“(郡)皆置诸曹掾史”条下本注:“功曹史,主选署功劳。”^②王充亦曾自述道:“常言人长,希言人短。专荐未达,解已进者过。及所不善,亦弗誉;有过不解,亦弗复陷。能释人之大过,亦悲夫人之细非。”(《论衡·自纪篇》)应当就是陈述自己在功曹任上的职责所在。本职工作之外,功曹还可在特殊情况下代长吏行事,职总内外,统领各曹。因此,功曹实为郡县各级政府中地位最高的属吏,史书多称之为“右职”,或“豪吏”“纲纪”,王充在《论衡·遭虎篇》中称“功曹众吏之率”,“功曹之官,相国是也”,亦为其证。

王充的第二任职务是都尉府掾功曹。都尉府掾功曹为都尉府属吏,汉代大郡都尉与郡守同为两千石,都尉府属吏种类及相应的秩次与郡府属吏类同。《汉旧仪》云“郡国百石,两千石调”,^③即郡国属吏皆由郡国守相自行辟除,秩次为百石。由此,都尉府掾功曹秩次亦当为百石。从职责与地位看,都尉府掾功曹与县掾功曹、郡掾功曹一样,主管同级属吏的任用、推荐、赏罚工作,地位颇高。

王充的第三任职务是郡“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关于“列掾五官功曹行事”,黄晖解释道:“‘列掾五官’,犹言列为五官掾也。‘功曹行事’,盖即署功曹事。”^④即王充在郡府实任五官掾,署功曹事。从秩次看,郡五官掾作为郡府属吏,秩次为百石。

从职责看,五官掾无具体所掌,《后汉书·百官志五》“(郡)皆置诸曹掾史”下本注言:“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⑤安作璋指出,署者署理也,凡官出缺或离任,以他官暂理其职务,谓之署理,有别于正式任命者。^⑥也就是说,当功曹或其他曹缺任,五官掾可主其事,这便是王充任五官掾而得以“功曹行事”的原因。另外,东汉时五官掾常主祭祠,从而列于诸吏之首,^⑦如东汉延熹六年的南阳郡桐柏淮源庙碑文,列举该郡参与春秋祭祀之官属,便以五官掾为首。^⑧王充亦有关于祭祀的论述。在《谢短篇》中,王充批评文吏“自谓知官事,晓簿书”却不能通晓其意,曾举出一连串“官事”质问文吏,其中就有不少祭祀相关内容,如“社稷,先农,灵星,何祠?岁终逐疫,何驱?使立桃象人于门户,何旨?挂芦索于户上,画虎于门闾,何放?除墙壁书画厌火丈夫,何见?”而在《乱龙篇》《解除篇》《祀义篇》《祭意篇》等篇中,王充也详细论述过对雩祭、社稷、灵星、岁终逐疫的看法。由其论述可见,不少祭祀活动在当时是官府事宜的一部分,王充对它们颇为了解,或许与他曾任五官掾有关。

①《后汉书》志第二十四《百官一》,第3559页。

②《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第3621页。

③卫宏:《汉旧仪二卷补遗二卷》,收于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2页。

④黄晖:《论衡校释》,第1379页。

⑤《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第3621页。

⑥参见安作璋、熊德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03—104页。

⑦参见安作璋、熊德基:《秦汉官制史稿》,第104页。

⑧《桐柏淮源庙碑》:“春侍祠官属五官掾章陵刘诩、功曹史安众刘璿、主簿蔡阳乐茂、户曹史宛任巽、秋五官掾新□梁懿、功曹史酈周谦、主簿安众邓巖、主记史宛赵旻、户曹史宛谢综。”收于洪适:《隶释·隶续》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页。

从地位看,严耕望指出,汉碑中称郡吏之升迁多曰历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①因此五官掾在郡府中的地位仅次于功曹,也属于郡之右职。

王充的第四任职务是州从事。州从事为刺史属吏,又称“从事史”,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四》《后汉书·百官志五》,“从事史”包括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等,秩皆百石,司隶与外十二州从事史员职略同。王充“入州为从事”时,先“诣杨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其职当为部郡国从事。《后汉书·百官志四》“(司隶)从事史”下本注云:“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②可见王充任此职时,主要应负责文书与察举工作。其后王充“入为治中”,任治中从事。治中从事在司隶称功曹从事,二者除名称不同外无太大差别,关于功曹从事的职责,《后汉书·百官志四》本注言“主州选署及众事”,^③因此治中从事亦当在州中主管选举、总理众事,相当于郡县的功曹,为州属吏地位最高者。严耕望指出,仕州者多由主簿、部郡从事而治中、别驾,^④王充的经历大致也遵循这一轨迹。

章太炎曾指出“一郡之吏,无虑千人”,^⑤据尹湾汉墓所出《集簿》(YM6D1正)记载,成帝元延时东海郡有“吏员二千二百三人”,^⑥据《后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汉官》,河南尹有员吏九百二十七人,^⑦则东汉初中原大郡员吏达千人大致可信。两汉会稽郡地处边地,不及中原发达,员吏数量稍少,但根据《后汉书·陆续传》,东汉初会稽郡掾史也已达到五百人以上。^⑧由此,王充最终做到郡五官掾,后又任州从事,已经属于地方属吏的上层,近乎“千里挑一”。邓红称之为地方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土皇帝”,^⑨其言虽过,却也表明了王充在地方实已具有一定的地位。

二、王充未能升任朝官之原因

王充并不满足于仅仅担任地方属吏。廖伯源曾指出,汉代仕进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仕为属吏,如地方之州、郡、县属吏以及中央之公卿府属吏;其二是仕为朝廷命官,即中央、地方各官署之长吏以及其他由朝廷任命之官员。^⑩属吏与朝官大致以二百石为界,二百石像一道鸿沟、关卡,跨越过

① 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第117页。

② 《后汉书》志第二十七《百官四》,第3614页。

③ 《后汉书》志第二十七《百官四》,第3614页。

④ 参见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09页。

⑤ 章太炎:《检论》卷七《通法》,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朱维铮点校:《章太炎全集》(《尴书》初刻本、《尴书》重订本、《检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6页。

⑥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7页。

⑦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第3622页。

⑧ 《后汉书·陆续传》言“续与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见《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第2682页。

⑨ 邓红:《王充新八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⑩ 参见廖伯源:《汉代仕进制度新考》,载《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去,便可青云直上。^①严耕望曾形容官吏跃过此关之后的发展:“处散则补三署诸郎,任职则除尚书侍郎、诸卿令佐。既习律令威仪中都故事,则出补令长,敷政百里。三年考绩,或直迁刺史、守、相。或再入京师,处闲散则为大夫、议郎,讽议左右;秉机枢,则任尚书、诸校、中郎将等职。然后出补守相,宰制千里。守相高第,擢任九卿,亦有超至三公者。”^②汉代多有由地方属吏跃迁至公卿者,如王充同郡的包咸、钟离意、郑弘、谢夷吾等人,皆自地方属吏升至二千石以上,实现了层级的迁跃。王充所向往的,也是越过二百石之关,成为秩次、地位更高的朝官。

从《论衡》可以看出,王充对于高位厚禄充满渴望。《刺孟篇》云:“夫富贵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于爵禄也,有所辞,有所不辞。岂以己不贪富贵之故,而以距逆宜当受之赐乎?”《定贤篇》云:“富贵,人情所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乐,去之而隐,生不遭遇,志气不得也。”《别通篇》中,他羡慕董仲舒、唐子高、谷子云、丁伯玉等人“建美善于圣王之庭”,《效力篇》《须颂篇》中,他更是一再表达自己对于进入中央朝廷的向往:

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将援引荐举,亦将弃遗于衡门之下,固安得升陟圣主之庭,论说政事之务乎?(《效力篇》)

智能满胸之人,宜在王阙,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然后自动,不能自进,进之又不能自安,须人能动,待人能安。(《效力篇》)

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须颂篇》)

从王充对待家乡会稽的态度上,也可看出他对升任朝官的执着。身为会稽人,王充对于会稽似乎并无太多好感。他不仅曾对与会稽相关的大禹、伍子胥信仰予以奚落和攻击,更指出南方的环境使得楚、越之人中更容易产生谗夫小人。对于自己会稽人的身份,王充也不甚满意,曾经不无埋怨地提到“《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远非徒门庭也”(《论衡·须颂篇》),这是说自己离中央朝廷太远了;他还曾说到,“珍物产于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论衡·超奇篇》),这是说边远之地依然存在人才,可见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和看法是,中原各郡相对边郡而言,人才更为集中。由此,会稽人的身份对于王充而言,更像是一种阻碍和负累。王充对于会稽的态度,在地域意识颇为浓厚的东汉,是比较反常的,或许只能解释为他一心希望离开会稽、走向政治中心,因此才会在《论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家乡及家乡事物的反感。

然而终其仕宦生涯,王充都没能离开会稽一带,进入他所向往的朝堂。是什么阻碍了王充的晋升呢?这里,我们先要分析一下地方属吏想要跨越“二百石之关”可行的途径。由文献可见,最主要的途径当属察举,尤其是州郡岁举孝廉、茂才,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 50% 以上的会稽籍朝官,都是举孝廉为郎而进身的。^③其次是皇帝征召,多与上书自荐、私人举荐相结合。另外,廖伯源

① 日本学者纸屋正和称此鸿沟为“二百石之关”:“众所周知,汉代在百石以下小吏和二百石以上官吏之间,横有一道非经察举不能逾越的森严关卡。”见氏著:《前汉时期县长吏任用形态的变迁》,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12页。

② 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33页。

③ 笔者根据各家《后汉书》及《会稽郡故书杂集》,统计东汉光武、明、章、和时期会稽籍朝廷命官共15人,包括陆闳、包咸、钟离意、谢夷吾、盛吉、郑弘、沈丰、许武、董昆、顾奉、公孙松、许荆、包福、陆稠、陆逢,其中包咸、钟离意、谢夷吾、郑弘、许武、董昆、顾奉、公孙松迁为朝廷命官的途径为举孝廉。

根据新出土尹湾汉墓《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提出属吏亦可通过积累功劳、考课绩优直接“以功迁”为秩次较低的朝官，^①不过该简主要反映了西汉成帝时情况，这一途径在王充的时代是否仍然适用，尚不确定。^②

从《论衡》来看，王充最在意的即为察举，或曰“乡举里选”。《程材篇》中，他将儒生与文吏两类群体进行比较，称儒生往往“陋于选举，佚于朝廷”；^③《定贤篇》中，他指出得到推举不代表此人一定贤能，“或德高而举之少，或才下而荐之多”；而《效力篇》《状留篇》二篇中，他反复强调贤儒鸿才“不能自举”，又半是埋怨半是请求地希望郡守（“将”）举荐，这些应当都是基于王充的亲身经历。可见，王充当经历过不少选举的场合，并对这一进身途径寄予厚望，因而才会对自己频频落选产生强烈的情绪。

由上所述，王充仕途不顺，很大程度是陷落在察举这一环节。关于东汉时察举的标准，光武帝诏书曾提到“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史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④以上四科，可以总结为德行、学识（包括经学和文法）、能力，这些都是针对个人内在素质而言的。与此同时，个人素质之外的长吏爱憎、家世出身、乡里口碑亦对选举有较大影响。^⑤我们可以从这内外两方面来考察王充未被察举的症结所在。

先看内部的德行、学识、能力方面。首先，王充具备良好德行。范曄《后汉书》形容王充“少孤，乡里称孝”；^⑥王充形容自己“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论衡·自纪篇》），“在乡里，慕蘧伯玉之节；在朝廷，贪史子鱼之行”（《论衡·自纪篇》）；《论衡》的《率性篇》《非韩篇》《程材篇》《状留篇》等篇章，亦展示出王充注重修身守节、为人清重、不趋炎附势的高尚情操。不过，王充的这些道德品质并没有为他积累足够的名气。一方面，王充为官经历中没有合适的契机展现其品德，《论衡·定贤篇》中，他指出父兄缺乏慈爱、上级昏庸悖逆，个人的孝悌、忠义才能充分彰显，即个人的美好品质往往需要外在环境的恶劣来彰显，而如果不存在恶劣的外在环境，则衬托不出个人品德之高尚，这里的例子很可能来自王充的真实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在东汉，由于察举、征辟必采名誉，人们为了彰显自身道德品质，往往采取非常行为，如清人赵翼所言，“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⑦《后汉书·独行列传》便集中记载了当时偏行一介而成名立方者，而王充本身“不好微名于世”

① 参见廖伯源：《汉代仕进制度新考》，第35页。

② 阎步克指出，西汉时功劳就是官吏选拔升迁的重要条件，但对秀才察举科目也开始强调功劳，主要是始于东汉初年。见氏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03页。如此一来，东汉举孝廉本就以“功劳”为标准之一，似乎不当另有属吏直接“以功迁”为朝官一途。

③ “朝廷”即郡府，见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77页。

④ 《后汉书》志第二十四《百官一·太尉》，“掾史属”下刘昭注引应劭《汉官仪》，第3559页。

⑤ 关于东汉世家豪族影响选举，前人之述备矣。关于私人爱憎，安作璋曾指出，选用人才的大权掌握在皇帝及高官等少数人手中，往往出现任人唯亲、唯财、唯势及个人好恶的情况。见氏著：《秦汉官制史稿》，第357页。关于乡里评论，日本学者东晋次曾经专门分析“乡论”对于掾吏任用和选举孝廉的重要影响。见氏著：《后汉的选举与地方社会》，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第589—593页。

⑥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29页。

⑦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五《东汉尚名节》，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2—104页。

(《论衡·自纪篇》),“不肯自彰”(《论衡·自纪篇》),不愿为出名而刻意表现,如此自然也就难以获得名声。王充在《定贤篇》中提出,“大贤寡可名之节,小贤多可称之行”,考虑到《定贤篇》全篇都在论证像王充一样的士人才是真正的“贤人”,这里的“大贤”应当包括王充在内,可见在当时的评价体系下,王充虽有“节”但并不“可名”,缺乏具备传播力、影响力的道德事迹,要想凭借品德得到荐举,并无太大优势。

就学识而言,王充自幼聪颖,且曾游学京师、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可以说才华出众。但需要注意的是,王充的学术取向重博通不重专精。《后汉书·王充传》描述王充“博览而不守章句”“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①从《论衡》中王充所讨论的话题,也可看出他不仅博通五经,且兼及诸子,思想与知识非常丰富庞杂。王充自己也一直以儒生中的“通人”自诩,对于专经之儒很是鄙薄,讽刺他们为“陆沉者”“盲瞽者”“目盲、耳聋、鼻痈者”(《论衡·谢短篇》《论衡·别通篇》)。博学多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是评价士人的重要指标,然而,东汉前中期对于儒生的期待,依然以“专经”“明章句”为主流,如和帝时,徐防上书建议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顺帝时,左雄议改察举之制,提出“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的考试机制,其奏皆获准。如此一来,王充虽具有相较专经之儒更为完备系统的知识体系,却不符合当时所看重的学识标准,因而很难脱颖而出。

就行政能力而言,身为儒生的王充,能够立足礼义,对地方长吏进行道德规谏。王充在建初孟年曾就禁奢侈、禁酒之事两次上奏郡守:“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糜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论衡·对作篇》)这两次进言被特别记载于《论衡》中,应当属于王充较为得意的为政举措。^②相较道德规谏,王充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略逊一筹。根据《论衡·自纪篇》的记载,有人曾经直接批评过王充“材未练于事,力未尽于职”,王充对此指控并未予以否认;在《论衡·程材篇》中,王充称儒生“所能不能任剧”,儒生是王充所认可的身份,故王充本身可能也存在实务能力不足的问题。然而,东汉初年政治形态存在“吏化”倾向,^③特别看重官吏的实务能力,“功劳”作为实务能力的直接体现,^④成为官吏进身的关键凭借。对于不擅长实务的王充而言,建功立业并非易事。他曾在《论衡》中多次指出不能仅凭功劳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有才智、有能力,如《答佞篇》云“功之不可以效贤,犹名之不可实也……无效,未可为佞也”,《定贤篇》更是花大篇幅讨论“功赏不可以效贤”。这些论述极像是王充为自己的辩护,说明王充的功劳很可能并不突出,在“乡举里选,必累功劳”^⑤的选拔机制下,这同样影响了其晋升。

①《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29—1630页。

②然而,王充的进言没有被纳用而施行,为他赢得名声和功绩,反而可能导致了他的离职,《后汉书·王充传》说他“仕郡为功曹”时,“以数谏争不合去”,大概便是指上述建初孟年之事。沈钦韩《后汉书疏证》在范《书》王充本传“以数谏争不合去”下,援引了《论衡·对作篇》关于《备乏》《禁酒》文句,可见沈钦韩亦认为范《书》所载王充在郡吏任上“以数谏争不合去”,当与建初孟年王充上奏郡守之事有关。见沈钦韩:《后汉书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

③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366页。

④《程材篇》言:“文吏理烦,身役于职,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属吏之功,如廖伯源所言,盖指辅助长吏治理一方,忠于职守,政绩显著,考课时名列前茅。见氏著:《汉代仕进制度新考》,第21页、第32页。

⑤《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第三》,第133页。

从外部的家世出身、长吏爱憎、乡里口碑来看,王充也不占优势。首先,王充自述出身于“细族孤门”,他曾回忆他人对自己家族的评价:“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吾子何祖?其先不载。”(《论衡·自纪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东汉初的会稽郡与南阳、汝南、陈留等中原大郡相比,世族化程度尚浅,选举尚未被豪族世家把控,如与王充同时的郑弘、陆续皆出身世家大族,但郑弘的初始职务是乡啬夫,陆续的初始职务是郡户曹史,皆非郡县右职,说明守令在召署时,并未过多考虑他们的家族背景。^①因此“细族孤门”的家庭出身对王充进身可能影响并不太大。但长吏好恶与乡里名声,很可能确实阻碍了王充的升迁。并且,王充本身的性格问题可能加剧了这种阻碍。

王充曾叙述自己儿时的经历,“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论衡·自纪篇》),儿时便显露的不合群的性格,加之以超凡的才华和游学太学的经历,使王充为人清高。面对长吏,他遵循礼仪,很少自我表现,也不曾刻意讨好迎合。《自纪篇》中,他描述自己“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辩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不言”,“众会乎坐,不问不言;赐见君将,不及不对”,“不好微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展现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形象;此外,他在《程材篇》中形容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损崇,以称媚取进”,《状留篇》云贤儒“纯特方正,无员锐之操”,“遵礼蹈绳,修身守节,在下不汲汲”,其实也都是王充自身的写照。王充如此行事,若非遇到慧眼识珠的伯乐,很难被发现,进而被提拔。

至于乡里口碑名声,本就是当时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而由王充所述,会稽郡守对属吏的察举,又往往征求其他属吏的意见,因此才会有《论衡·定贤篇》所谓“以朝庭选举皆归善”,“著见而人所知者举多,幽隐人所不识者荐少”,“或德高而举之少,或才下而荐之多”等情况。王充与同僚的关系并不和睦,作为儒生,面对以文吏为主的同僚,王充充满优越感,看不惯他们无才无德却一味钻营的做法,根本不愿与之来往,他曾经自述“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所友位虽微卑,年虽幼稚,行苟离俗,必与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汜结俗材”(《论衡·自纪篇》),这种态度定会引起“俗材”们的愤恨,从而不遗余力地毁谤中伤王充。《自纪篇》中,王充提到自己的经历,“俗材因其微过,蜚条陷之”,“良材奇文,无罪见陷”;《累害篇》中,他总结君子在乡里、朝廷常遭遇“三累三害”;《定贤篇》中,他感慨“广交多徒,求索众心者,人爱而称之;清直不容乡党,志洁不交非徒,失众心者,人憎而毁之”;而在《非韩篇》《答佞篇》《言毒篇》等篇中,他极其详尽地描绘了奸人、佞人、小人的行径,若非自己亲身经历过他人的构陷,很难将这些行径描述得如此清晰具体。众口铄金,王充“陋于选举,佚于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此可见,王充虽德才兼备,但在当时的官吏选拔标准之下,其内在素质难以有效彰显,加之个人性格与官场不合,难以获得举主和同僚的主观认可,仕途不顺是可以预料的。

值得一提的是,对察举之路失望后,王充也尝试过其他途径。章帝即位后,年近六旬的王充曾经撰写过一系列歌颂文章,希望以此直接获得章帝的征召。根据范晔、谢承《后汉书》,章帝时同郡谢夷吾亦曾上书推荐王充,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

^① 邢义田曾统计东汉家世背景可考的265位孝廉,其中会稽郡有孝廉16位,大部分来自无仕宦背景的家族,见氏著:《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载《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18—319页。

也”。^①如果记载属实,那么这两件事,应当是有关联的。^②根据范晔《后汉书》,章帝听从了谢夷吾的推荐,特别下诏以公车征召王充,^③然而,王充却因病未能成行,^④失去了最后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成为朝官的机会。王充的仕途,也由此伴着未尽的遗憾画上了句号。

三、仕宦经历对王充“命论”的影响

对高位厚禄充满渴望,对中央朝廷充满向往,将仕宦成功视为人生价值的终极所在,而自己却始终在地方属吏任上徘徊,这样的反差,势必对王充的心理、情感、思想造成巨大冲击。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王充关于“命”的理论的形成。

在《论衡》开篇《逢遇篇》至《奇怪篇》的十五篇中,王充描绘了这样的图景:人生中一切际遇皆由前定的命决定。“命”由天自然而然地施气于人而形成,是一个源于偶然,具有必然性,又最终通过“偶然”实现的复杂结构。人的命包括死生寿夭的寿命和富贵贫贱的禄命;人命之外,国家亦有命。对于个人而言,不同命的影响程度是“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命义篇》)与命相关的概念还包括“时”以及代表偶然事件的“遭”“遇”“幸”“偶”,命、时、遭遇幸偶,共同构成了实现人生抱负的三重屏障。对于命,人们既无法控制又无法改变,只能通过一些异象、征兆来预测。

王充的命论结构多样、内容庞杂,并非凭空而来。儒家和世俗关于命的看法,是王充命论最主要的两个理论来源。王充对于儒家命运观念的吸收,主要体现在对孔孟等儒家人物相关言论的引用或化用,对于世俗命论的吸收则在于对星命、骨相、占卜、祥瑞等与命相关的信仰的采用。不过,王充对于二者的吸收皆存在一定偏差。

就儒家而言,儒家虽信命,但没有否定个人努力尤其是道德修为对于人生际遇的作用。傅斯年曾指出,儒家关于命的思想之核心,在于调和“命正论”与“命定论”的“俟命论”,^⑤以为上天之意大体福善而祸淫,只是有时会有偏差,出现祸福之报与善恶不符的情况,人们只需做好自己力所能及之事,不断完善道德,等待上天的最终安排。可见,在儒家看来,人生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仍把握在人自己手中。然而,王充在吸收儒家命论时,只选择那些肯定“命”的力量的言论,而抛开了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的部分。比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本是子夏引孔子之言以安慰司马牛之语,其意在于说明,生物学意义上的兄弟,是命中注定而无法改变的;但人可以通过修行道德,使四海之人皆爱敬之如兄弟。同样,《论语·宪问》《孟子·梁惠王下》载孔子、孟子面对小人的谗害,虽将道之行废、遇与不遇归于天命,但亦表现出对于自身道德的绝对自信。然而,王充在引述上述言

① 谢承:《后汉书》卷三《王充传》,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第76页。

② 参见孙如琦:《王充溢美章帝原因辨析》,《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③ 关于章帝是否真的征召王充的讨论,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第519—525页;周桂钿:《王充评传》,第107—112页。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时虞翻曾形容王充为“征士”,即征召不就之士。虞翻与王充为同郡,相隔时间不远,应当听到过乡里流传的王充事迹,所言大概率是可信的。

④ 孙如琦指出,王充最终未能成行,更多和章帝去世或者谢夷吾被贬有关。见孙如琦:《王充溢美章帝原因辨析》,《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⑤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2—103页。

论时,只取儒家士人承认命的部分,以论证“有命审也”,却省略了他们对于人事尤其是道德修行的关注。不仅如此,他在《论衡》首篇《逢遇篇》的开头就指出:“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也就是说,王充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操守对于他能否取得仕宦成功影响不大。在接下来的数篇文章中,这一立场始终不变,并且由仕途进一步扩大到人生其他领域。王充完全斩断了个人道德修养与吉凶祸福的因果关系,否定了人凭借砥砺自身道德获得好运的可能,从而也就消解了儒家命论的核心关怀。

就世俗而言,汉代关于命的信仰除了王充所赞许的星命、骨相、占卜、祥瑞之外,亦包括时日信仰,后者在人们生活中尤为普遍。时人相信,年月日时有其内在的吉凶规律,在不同的时日进行不同的活动会影响人的祸福。考古发现已证实,秦汉时期存在大量《日书》,指导人们选择恰当时日安排衣食住行各项事务以趋吉避凶,这说明《日书》使用者的心态亦非完全的命定论。如蒲慕州所言,因为一切吉凶之事都与时日相互对应,且这种对应关系可以为人所知,一个人靠着遵循《日书》的指示选对时日,就有获得理想人生的可能。^①甚至可以说,时日信仰恰恰是建立在个人对于命运的自主性之上的,因为若人力完全无法改变命运,也就没有择日的必要了。王充对于世俗命论借鉴得不如儒家多,但根据王充对不同信仰的选择性吸收,我们也可看出他的倾向。王充赞同的星命、骨相、吉验、卜筮等信仰,充当着命运的传声筒,人只能通过它们被动了解、接受命运,无法进行干预;而对于肯定人的自主权的时日信仰,王充基本持忽视或否定的态度,说明他对于以技术手段改变命运的做法从根本上不予采纳,从而也消解了世俗命论的根本支柱。

综上,儒家和世俗虽信命,但相信通过道德修行或恰当的技术操作,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主导自己的命运,从而为人在命运中的自主性保留了空间。然而,王充的命论只吸收了儒家和世俗言命存在的部分,并将之无限放大,而完全抽离了儒家和世俗对人的能动性、自主性的肯定。他指出:“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论衡·偶会篇》)命运的主宰就是命运本身,而非外物。他的命论,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命定论。儒家和世俗对命的认识,只是为他言命提供了素材与思路上的支持,而“命定”的核心理念应当主要源于王充本人的经历与感受。^②

《论衡》中关于“命”的十几篇文章,以《逢遇篇》《累害篇》《命禄篇》开头,这三篇文章全都基于王充的仕宦经历。比如,文章中出现了不少当时人对于有才德者不被重用的质疑,《逢遇篇》:“世俗之议曰:‘贤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观鉴治内,调能定说,审词(伺)际会。能进有补贍主,何不遇之有?’”《命禄篇》:“世俗见人节行高,则曰:‘贤哲如此,何不贵?’见人谋虑深,则曰:‘辩慧如此,何不富?’”“有才无位”正符合王充本人的遭遇。对于时人的质疑,王充皆以“命”的理论来解释,可见其“命论”首先针对的就是自己的经历,关于“命”的系列文章即围绕自身的仕途不顺而展开。如龚鹏程所言,王充所言性命问题,主要是关系到一个人在官僚体系内部是否显达的禄命

① 蒲慕州:《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世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4分,第636页。

② 关于这一点,前人学者已有简要论述,见[韩]金钟美(Kim Jong-Mie):《天、人和王充文学思想:以王充文学思想同天人关系思想的联系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44页;徐复观:《王充论考》,第526—528页;龚鹏程:《世俗化的儒家:王充》,载《汉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04页。

问题。^①王充自诩道德、才华过人,比诸多在高位者更为卓异,却沉沦下僚,始终未受赏识而飞黄腾达。面对这种情况,他难以跳脱出时代,批判当时依靠个人主观推荐的察举制度之不合理,而只能像同时代贾谊、司马迁、东方朔、扬雄等士人一样,将不遇归之于命。这应当是王充形成命定论的根本原因。

在王充看来,长吏好恶、同僚关系等外部环境,对仕途影响最大:“凡人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祸,累害之也。”(《论衡·累害篇》)这当然是合理的。但他认为,遇到怎样的长吏、怎样的同僚,都是“命”“时”决定的,个人无法控制,也无法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处境,这就走上了命定论的道路。

王充知道功劳对于晋升尤为关键,而他认为功劳的取得同样由命、时决定,与个人素质无关。《定贤篇》中,他指出“阴阳和、百姓安者,时也。时和,不肖遭其安;不和,虽圣逢其危”。《治期篇》中,他指出“居位治民,为政布教,教行与止,民治与乱,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洁,居位职废;或智浅操洿,治民而立”。《答佞篇》中,他指出“若夫阴阳调和,风雨时适,五谷丰熟,盗贼衰息,人举廉让,家行道德之功,命禄贵美,术数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治理有成效、社会安宁、百姓乐业,都是由于命好,且赶上了好时机,功劳的建立在于运气,不在个人。这同样是命定论的思路。

王充将一切影响仕途的因素皆归于“命”,而完全排除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命的力量太过强大且无法左右,因此人的成败实是自己无法控制的,如此一来,事业未成也就不再令人耿耿于怀。王充曾明确以信命的姿态对待仕宦进退,流露出豁达洒脱的心境:“时适当退,君用谗口;时适当起,贤人荐己。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辅善;且失位也,小人毁奇。……故孔子称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仓,诚知时命当自然也。”(《论衡·偶会篇》)而在《自纪篇》中,他亦将得失归之于命,表现出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超然与淡泊:“孔子称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于人。昔人见之,故归之于命,委之于时,浩然恬忽,无所怨尤。福至不谓己所得,祸到不谓己所为。”可见,命的理论使王充在面对仕途不顺的现实时,能够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除了自我安慰,命论还能帮助王充回击他人对自己道德才知的质疑。前文提到,当时不少人认为,人的道德才知与事业成就应当呈正向关系,才高德丰,一定会取得高官厚禄;反过来,仕途不顺则说明自身才德不足,即所谓“身完全者谓之洁,被毁谤者谓之辱,官升进者谓之善,位废退者谓之恶。”(《论衡·累害篇》)王充提出命的理论,将个人显达与否完全归于命的力量,排除了才德对于仕途的影响;而既然贵贱穷达与才德无关,自然也不能凭借贵贱穷达来判断才德高下。由此,王充以命的理论实现了对自身才华与道德的辩护。

综上所述,王充的命论与其仕宦经历密切相关。命论以王充个人遭遇为出发点,以“命由前定”为思想核心,融合了时、遭遇幸偶等概念,形成一整套复杂理论。命的理论建立起来之后,王充转而以之为武器批判其他虚假无验的观念、说法、现象,尤其是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理论和鬼神信仰。王充曾总结道:“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论衡·偶会篇》)。他相信,命是吉凶祸福的主宰,同时命也是一种自然之道、适偶之数,因此,吉凶祸福的发生是自然而然的,并非由“他气旁物厌胜感动”引起。“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也就是气之间的感动和物之

^① 龚鹏程:《世俗化的儒家:王充》,载《汉代思潮》,第204页。

间的压胜,分别对应天人感应理论和鬼神信仰。由此可见,命论对王充的其他思想亦有重要影响,是王充思想体系中的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①而这一关键的理论,正是仕宦经历在王充思想上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徐复观曾指出,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常决定于四大因素:本人的气质、学问的传承与功夫的深浅、时代的背景、生平的遭遇。王充个人的遭遇,“对于他表现在《论衡》中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今思想家中,实少见其比”。^②这启示我们在未来的王充研究中,需要继续坚持“知人论世”的传统方法,不断挖掘《论衡》中王充生平相关内容,从而加深对王充思想的认识,还原王充作为一名富于才华而沉沦下僚的地方士人的本来面貌。

责任编辑:侯德彤

Wang Chong's Experience as an Official and His View of Fate

Ma Xiaofei

School of History,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Wang Chong, a scholar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served as an official in Kuaiji, Yangzhou from the county up to the prefecture. Though he had become a high local official, his real ambition was to enter the central court through the recommendatory system. In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whether a man would get recommended or not depended on suc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s knowledge of Confucian classics, morality and administrative talent as well as family origin, higher officials' taste and the reputation in the township. Wang Chong's strengths did not fit these criteria, so his desire to be promot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was never satisfied. The experience as an official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his theory of fate, which profoundly influenced his ideological system.

Keywords: Wang Chong; *Lun Heng*; Eastern Han; official experience

^① 邓红曾指出,“命”为王充思想的本体和依据,见氏著:《王充新八论》,第60—111页。

^② 徐复观:《王充论考》,第513页。

李大钊的家国情怀及其历史影响

王 令 金

青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李大钊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被定位于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李大钊就基于民族危亡发表文章和演说,抒发了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他执著这种家国情怀,为在中国创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奔走呼号。其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为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确立,提供了现实素材,奠定了历史基础,并且对于后来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制度的制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李大钊; 家国情怀; 初心使命; 历史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3) 04-0074-11

李大钊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被定位于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①。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李大钊基于民族危亡的残酷现实发表文章和演说,抒发了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他执著这种家国情怀,为创建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奔走呼号。在他及同人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庄严地宣示了党的初心使命。鉴于此,可以说,李大钊的家国情怀为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并且对于后来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制度的制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李大钊家国情怀的现实基础

李大钊家国情怀最明显的底色就是忧国忧民、救国救民。这一底色的形成根源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其时,国家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在封建社会平台上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在此当中,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饱尝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诸如军事杀戮、经济掠夺、政治控制、文化奴役等等。李大钊自从来到人间,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悲惨社会。

李大钊于 1889 年诞生于直隶(今河北省)乐亭大黑坨村,其家乡地处渤海湾畔,亦属京畿重地,临近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在这些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对李大钊产生了深刻影响。年幼的李大钊命运多舛,正如后来他本人所言:“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

作者简介: 王令金,男,山东平度人,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① 参见《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李大钊全集〉出版说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①李大钊是一个遗腹子,生来就未见到父亲,一岁多又失去了母亲,既未能感受到父母的关爱,也未接受到兄弟姊妹的提携。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使得李大钊既受人同情,又容易同情别人^②。总之,特殊的家庭背景和苦难的社会环境滋养了李大钊“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思想情愫。

幼年时期的李大钊家境还算殷实,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祖父李如珍是个勤俭治家的人,曾经闯关东经商,在长春万宝山一带开杂货铺,赚了些钱,回到家乡买房置地。同时,他给村民办好事,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成为村中比较有地位的人。李大钊出生时,李如珍已年过花甲,李大钊的启蒙教育是由李如珍承担的。6岁时,李大钊开始进入本村谷家创办的私塾读书,塾师单子鳌为李大钊取学名“耆年”,表字“寿昌”(后来,李大钊发表文章时,署名“守常”)。9岁时,李大钊转入本村张家专馆(实际上亦为私塾)读书,先生赵辉斗是李大钊先父李仁荣的老师。赵辉斗和李如珍私交甚好,曾经在东北合伙经商,自然对李大钊很器重。11岁时,祖父又给李大钊换了一位老师黄宝林,此人学问高深,曾在北京最高学府国子监读过书。相继请教名师,给了李大钊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祖父一心想把孙子培养成人,以光宗耀祖。1899年,祖父给只有10岁的李大钊找了同村一位比李大钊大5岁的女子完婚,名叫赵纫兰,其父赵文隆系前述赵辉斗的同辈远亲,其祖母是李大钊的姑祖母。可见,这是一门亲上加亲的娃娃亲。之后,李大钊与赵纫兰共同生活了28年,生育9个孩子,除4个夭折外,其他5个^③均由赵纫兰一手拉扯大。赵纫兰为李大钊的事业和生活奉献了一生。李大钊在回顾自己求学经历时写道:“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業”。^④

1902年,13岁的李大钊参加童试,没有考中。1905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县试过关了,府试也比较顺利。未料,没等考试流程全部结束,清政府即在“新政”推进中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此后,李大钊和部分参加考试的生员一起转到永平府中学堂学习。此间,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学风有所改观。总起来看,增加西学内容,由此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相继进入青少年的学习视野,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同时影响着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政法学堂,学习政治法律,兼修英语和日语。李大钊在这里学习了6年之久。此间,他给自己改名为“钊”。1913年夏天,李大钊完成了北洋政法学堂学业,获得毕业资格。随后,他得到进步党人孙洪伊和汤化龙的经济支持,决定去日本留学。秋冬之际,李大钊开始出发前往日本。此间,他依据扬雄《方言·第七》中“钊,远也”,“燕之北郊曰钊”之意,正式改名为“李大钊”,以表示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同时表明他的籍贯乐亭地处古代燕国北部,以示不忘家乡父老。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正式进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在此期间,李大钊接

①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7页。

② 这一点在他后来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例如,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俄文系旁听生曹靖华因为交不起学费面临辍学。李大钊得知后立即给会计科写信,让他们从自己的薪水中扣钱替曹靖华交学费。参见王海明:《解读李大钊》,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115页。

③ 即长子李葆华,1909年生;长女李星华,1911年生;次女李炎华,1919年生;次子李光华,1922年生;三子李欣华,1926年生。在其子女取名中均有“中华”的“华”字,表明对“中华”的挚爱。

④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五卷,第297页。

受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安部矶雄研究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安部矶雄给李大钊上过选修课,讲授“都市问题”,其思想给李大钊以深刻的启迪。李大钊经常到安部矶雄的住所请教问题,追求马克思主义。这是李大钊世界观发生重大转变的开端。其间,李大钊还研读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著作《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等,通过研读这些著作,奠定了李大钊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这种学习环境和内容的变化促使李大钊发生世界观的转变,即由原来用儒家唯心主义审视世界转变为用马克思主义审视世界。反观中国国内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文化衰败的现实,萌生了革命的念头。1915年,李大钊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反袁斗争。1916年1月,为了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李大钊专门从日本横滨回到上海,在上海停留了近半个月,后又返回日本。因为此段时间李大钊没有去课堂听课,早稻田大学将其除名。就这样,李大钊在未完成学业(即肄业)情况下,结束了留学生涯。同年5月,李大钊被迫回国,正式踏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征程。此时,李大钊27岁。

从李大钊接受启蒙教育起,到结束留学生涯至,在这二十多年间,中国国内发生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例如,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897—1898年的西方列强阴谋瓜分中国狂潮,1899—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1905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俄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5—1916年的反袁护国战争,等等。这些重大事件,是家仇国难的交织,是刀光剑影的拼杀,是腥风血雨的洗涤,是万般劫难的变幻!在这种战连祸结的特殊社会环境里,但凡有情感、有理智、有仁爱之心的中国人,都不会甘于沉沦,更不会引颈就戮,定会为求生存而奔走呼号!

回国后,李大钊积极参与报刊创办,试图从思想宣传入手,引领青年人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从而打破旧中国的残破景象。他先是出任《晨钟报》主编,不久,辞去了这项工作。1917年1月,李大钊被聘任为《甲寅》日刊编辑。他积极投身于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吹响了启蒙青年的号角。他在《甲寅》《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許多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文章,激发国人的革命热情。1917年12月,李大钊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此间,在工作中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化名流有广泛的交往。同时,由于他研究宣传新思潮马克思主义的缘故,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发愤图强,救国救民。诸如,毛泽东、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张申府等^①。就这样,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内形成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气候。1922年12月,李大钊辞去了北京大学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一年有余。

综上所述,李大钊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特殊的年代。从家庭层面看,李大钊从小缺少父慈母爱,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渴求仁爱的种子,正是这颗仁爱种子的萌发,奠定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感基础,进而生成了同情弱者的怜悯之心和匡扶正义的侠气虎胆。尤其是,李大钊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教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根深蒂固。他深深懂得,只有思想端正了,才能修身养性;只有完善自我修养,才能理顺家庭生活;只有安排好家庭,国家才能安定繁荣;只有国家安定繁荣,天下才能得以平定。这是儒家学人尊崇的信条,也是儒家学人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进而达到平定天下的最高理想和实践路径。从国度层面看,李大钊在接受启蒙教育和

^①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8、290页。

东奔西走求学时,中国已遭受西方资本主义的严重侵略,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广大人民群众遭受苦难。为求生存,已有无数仁人志士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甚至贡献了宝贵生命。时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历史洪流冲决了封闭已久的种种藩篱,诸多读书人纷纷迈出国门,寻求生机,救国救民。其时,由于鸦片战争以降西方科技文化不断传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日趋衰落,至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已明确地提出“废科举”“倡西学”的英明主张,虽然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得到付诸实施,但已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随后不久,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正式宣布停止科举考试制度,这在客观上堵死了读书人读书赶考、升官发财以至光宗耀祖的通天大道。不甘沉沦的读书人,为求生存,另寻他途——遗弃传统诗书礼仪,选择西方科技文化,并将目光转向东洋日本。此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跻身列强行列;同时,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日文化有着许多同构因素,为前去留学的中国学生学习提供了方便或捷径。尤其是对于贫穷的中国学生而言,更是经济可行。正是这种历史氛围的影响,李大钊放眼国家前途和民族希望,踏上了东渡日本留学的征程,进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实现自己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二、李大钊家国情怀的丰富内涵

尚在求学当中的李大钊,已是拖家带口的顶梁柱。国家破败、民不聊生的严酷现实,使他深深陷入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沉思之中。

1912年6月,尚在天津北洋政法学堂读书的李大钊,面对“党争则日激日厉,省界亦愈划愈严”,“南北几兴兵戎,生民险遭涂炭”,“环顾神州,危机万伏”^①的社会环境,撰写了《隐忧篇》一文^②,初步抒发了他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他指出了令人堪忧的六大问题,即“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③他认为,边疆不宁,面临瓜分;招募士兵,军粮难保;财源枯竭,外债高筑;连年旱灾,衣食无着;百业凋敝,工农皆苦;人才匮乏,国家难兴。在此基础上,进而点明了社会的三大顽疾,即“党私”“省私”“匪氛”。他指出:“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已至于此,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则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省自为治,畛域日深,循是以往,数年或数十年后,势至各省俨同异国,痛痒不关,即军事财政之协助,系乎国家兴亡者,将亦有所计较而不为矣”,“战后之兵,野蛮浮动,在伍时既大肆劫掠,退伍后仍将流为盗寇,则今日之兵,即他日之匪”,“怅望前途,不寒而栗,黯黯中原,将沦为盗贼世界,吾民尚有噍类耶!”^④在此,李大钊将辛亥革命失败后灾难深重的社会状况活脱脱地描述出来,从而表达了对社会的忧虑。

国难丛生,引发忧虑;愚昧落后,着实悲哀。1913年4月1日,李大钊发表了《大哀篇》一文^⑤,进一步阐发了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假共和局面下人民群众的悲哀状况,写道:

①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② 此文署名李钊,公开发表于1913年6月1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1年第3期。

③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第1页。

④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第1—3页。

⑤ 此文署名李钊,载1913年4月1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

“今日之所谓共和者又何如也? 吾殉国成仁杀身救民之先烈,所以舍生命以赴之者,亦曰:‘是固为斯民易共和幸福也。’吾民感先烈之义,诚铭骨镌心,志兹硕德,亦欣欣以祝之曰:‘是固为吾民易共和幸福也。’而骄横豪暴之流,乃拾先烈之血灵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 吾先烈死矣! 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①由此可见,正义者喊正义,而那些“骄横豪暴之流”也打着“正义”的旗号欺骗民众。接着,他深刻揭露了政党纷争、鱼肉百姓的黑暗现实。写道:“试观此辈华衣美食,日摇曳于街衢,酒地花天,以资其结纳挥霍者,果谁之脂膏耶? 此辈蝇营狗苟,坐拥千金,以供其贿买选票者,又果谁之骨髓耶? 归而犹给吾蠢百姓曰:‘吾为尔作代表也,吾为尔解痛苦也。’然此辈肥而吾民瘠矣。抑吾闻之,各党之支分部,因选举耗用者,动辄数万金,此其所需,要皆仰给于其党魁俊之踞要津享大名者。”^②另外,他还深刻揭露了武人争雄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指出:“共和后,又有所谓建国之勋者矣。其今日一榜,明日一榜,得勋位、嘉禾、上将、中将者,要以武人为多,而尤以都督为横,以其坐拥重兵,有恃无恐,上可以抗中央,下可以胁人民。其抗中央也,则曰‘吾拥民权也。’其胁人民也,则曰‘吾尊重国法也。’究之,国法当遵,而彼可以不遵,民权当护,而彼可以不护。不过假手于国法以抑民权,托辞于民权以抗国法,国法民权,胥为所利用以便厥私。中央视之无奈何也,人民视之无奈何也。则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其力复散在各省,故民之受其患也较轻。今者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其力更集中于一省,则民之受其患也重矣,则所谓民权、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③正是上述种种社会弊端,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他写道:“试观吾国,版图若兹其阔,民庶若兹其繁,江河贯于南北,沃野千里,天府之区也。苟有善治者,不待十年,丰庶之象,可坐而睹,而锋镝扰攘之余,为之国家者,不有以解其倒悬,乃坐视困苦飘零而不救,以致农夫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④针对如此恶劣的社会现实,他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指出:“夫今之为政者,匪不纲其政纲以示斯民,若社会政策也,保护制度也,是又徒炫耀其名以贾吾民之欢心已耳。钻营运动争权攘利之不暇,奚暇计及民生哉? 然则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福也,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此少数豪暴狡狴者外,得其所者,有几人哉? 吾惟哀吾民而已矣!”^⑤

面对如此社会环境,李大钊倾心关注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1917年2月10日,李大钊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一文,表达了对人力车夫的深切痛情,并力陈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指出:生活在北京的人,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挣得几十枚铜钱,供养一家老少的生活。北京沙尘

①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第7页。

②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第8页。

③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第8—9页。

④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第9页。

⑤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第9—10页。

漫天,加之车马杂踏,飞尘更为严重,致使人力车夫吸入飞尘患病而死。有鉴于此,建议人力车夫戴口罩,由警察给以劝导。另外,冬天戴手套,夏天备雨具,以加强劳动保护。^①当时,李大钊已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尚能关心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并为他们想方设法解除疾苦,实属不易。1919年3月9日,李大钊发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详细描述了唐山煤厂(即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文中写道:唐山煤矿拥有八九千工人,他们整日在煤矿里挖煤,面目漆黑,见不到阳光,吸不到新鲜空气,如同生活在地狱里。这些人像一群饿鬼,一旦出现塌方,就被活活压死。他们每天工作八小时,只能得到二角钱,生活费需要自理。在唐山,骡马的生活费一天还要五角钱,累死一匹骡马,雇主要偿付一百元左右,而累死一个工人雇主给付的抚恤金只有三四十元。可见,工人的生活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不值骡马的生命,太可怜了。唐山煤矿实行包工制,还雇佣许多童工。包工头残酷地剥削工人,致使工人更加可怜。^②1921年3月5日,李大钊在《新生活》第46期上发表了两篇短文,即《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和《黄昏时候的哭声》,进一步表达了他对平民百姓的同情之心。前文记叙了北京贫民捡拾煤渣的情景^③,后文描述了北京贫民沿街乞讨的凄惨^④。正是这种悲惨的生活情景,激发了李大钊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悲悯之情和大爱之心。

李大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将忧国忧民、救国救民家国情怀的实现,寄望于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将一般性的家国情怀提升到更高层面上去表达,进而寻求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文章对发生在1789—1793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917年10月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作了深入的比较。其中指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俄国无产阶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十九世纪的世界文明胚胎于法兰西革命,二十世纪初叶以后的世界文明萌芽于俄国十月革命。^⑤在这里,李大钊既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又高度评价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从历史发展角度看问题,后浪推前浪,一浪胜一浪。文章进而指出,法国大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的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的革命,其时代精神不同,革命性质自异,不可同日而语。基于上述论证,李大钊给发动十月革命的俄罗斯人以高度的赞扬,认为“世界中将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⑥最后,李大钊表明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态度,同时表明了对救国救民道路的倾向。他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⑦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大钊以全新的视角认识俄国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路径,不再寄希望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道路,而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年11月、12月,李大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再次表达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

①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第454—455页。

②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5—436页。

③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6页。

④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三卷,第357页。

⑤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第329页。

⑥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第332页。

⑦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第332页。

中德国战败的事实,他认为,战胜德国的力量,不是联合国的武力,而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即公理战胜强权;打败德国政府的,也不是哪一派军事力量或哪一国国家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即“庶民的胜利”^①从思想意识指导作用看问题,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他认为,有诸多因素起作用,但最终落脚在“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②因此,他坚定地相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③1919年1月1日,李大钊发表了《新纪元》一文,进一步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表示出极大的向往。他指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和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洗礼,创造了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带来了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比先前进步了几个世纪。^④他进而认为,新纪元带来了新曙光,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做出一点有益于人类的工作。^⑤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俄国十月革命后给中国投来的曙光,启迪李大钊放弃了先前追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而转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正是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李大钊完成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坚信马克思主义,为天下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奋斗!

随着对俄国十月革命认识的深入,李大钊进一步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由此他的思想注意力集中转移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来,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救国救民。1919年9月和11月,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其奥妙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客观上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推翻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阶级力量。另外,无产阶级队伍越壮大,资本越发集中,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越小,这就为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提供了便利条件。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⑥在这里,他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现实,将深奥的社会发展演变规律解释得清清楚楚。简言之,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贫困”,决定了革命运动的爆发,以至取得胜利。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还初步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⑦1920年12月,李大钊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指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⑧这一唯物史观,坚定了李大钊的人民大众立场。

①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第357、358页。

②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第363页。

③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第367页。

④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第375—376页。

⑤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二卷,第377页。

⑥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三卷,第39—40页。

⑦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三卷,第20页。

⑧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三卷,第280页。

三、李大钊家国情怀的历史影响

李大钊的家国情怀是深沉的、崇高的、伟大的,不仅影响着当时中国共产党创建和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确立,而且影响着后来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要制度的制定,并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李大钊的家国情怀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李大钊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工作或学习在北京大学的一批师生员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并很快转变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骨干力量。在其当中,陈独秀是比较突出的一例。陈独秀生于1879年,比李大钊年长10岁,而且当时在北京大学的地位高于李大钊。陈独秀能够加入到以李大钊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来,既是李大钊人格魅力的影响,也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吸引。1919年4月,陈独秀发表的《贫民的哭声》一文中,充分表明他已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他饱蘸笔墨,描述了北京贫民的悲惨生活。诸如,两天没得饭吃,向邻居借米熬粥充饥者有之;风雪灌窗,屋顶漏水者有之;丈夫拉车累得吐血毙命,今又子承父业者有之;七旬老爸拉煤到家倒地而亡,时值夏日六月无棺收尸者有之;娘儿俩没饭吃,母亲被迫卖到窑子里,蒙受打骂,不得不向巡警老爷求助者亦有之。^①再者,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也时常阅读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且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1919年7月,刚刚离开北京大学不久的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7月14日)中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②接着,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③,郑重地表明了他的人民大众立场。其中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④在这里,毛泽东还具体界定了“小联合”的范围,即“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车夫、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他们受苦不过,就想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⑤基于此,毛泽东振臂呼唤:“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⑥此时此刻,陈独秀和李大钊均供职于北京大学,而且工作上联系颇多,可谓志同道合。他们共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的良方妙药,使用这一良方妙药的首要途径就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担当发动革命、领导革命的时代重任。1920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商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3月,李大钊率先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⑦,为建立共产党组织奠定了基础条件。值此,共产国际代表维经

①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384页。

② 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1),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5页。

③ 分别载于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第二号、7月28日《湘江评论》第三号、8月4日《湘江评论》第四号。

④ 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1),第145、149页。

⑤ 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1),第151—152页。

⑥ 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1),第157页。

⑦ 当时写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正式公开宣布“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由邓中夏等19人列名发起。参见萧超然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92页。

斯基一行来华(时在1920年4月),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建立共产党组织。维经斯基先在北京与李大钊取得联系,召开座谈会,交流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后来在李大钊介绍下维经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具体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以《新青年》编辑部为基地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亲自担任书记。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不久,成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担任书记。在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下,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外相继建立了6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了大量的建党准备工作,为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组织基础,为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做好了前期准备。在上述历史条件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李大钊的家国情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文本基础。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正是直接或间接地吸纳了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家国情怀的思想因子,进而形成了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具体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例如,《纲领》中规定:“(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①为了贯彻上述纲领,在《决议》中具体规定了党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策略。例如,“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该警惕,勿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手中的玩物。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中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对于手工业工会,应迅速派出党员,以便尽快进行改组工作。”^②由上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把成立工会组织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纽带。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代表着无产阶级与劳苦大众的利益,并领导这个广大群众完成改造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完成人民解放、民族振兴的宏伟基业。有鉴于此,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③以上初心使命,既是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李大钊等人忧国忧民家国情怀的具体体现,也是拯救国家于倒悬、安抚人民于苦难的历史举措。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发表了《宣言》,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形成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其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5页。

②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页。

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①近期的“奋斗的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实行男女平等,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基本权利,诸如,“无限制的选举权”、工作权、受教育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等等。^②从上述文件内容可以看出,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共“一大”和“二大”在组织上完成了建党工作,在行动上宣示了党的初心使命,这些工作无不与李大钊的家国情怀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从其谋求解决的问题看,正是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为之忧虑的国家病患与民众疾苦;从其表达的内容看,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建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从其叙事的方式看,先解决社会底层人民生活,再进行国家政权顶层设计。以上内容也是李大钊毕生探究并投身解决的问题。

李大钊的家国情怀影响着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其进行具体细致地探讨,进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举其要者,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③显然,这条“总路线和总政策”与李大钊的家国情怀高度一致。在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感召下,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克服困难,勇毅前行——经历了“打倒土豪除列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国民革命,经历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经历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抗日战争,经历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当此之际,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④新中国成立后,继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国人民终于过上了幸福生活,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也随之提升,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得以实现(或者正在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⑤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努力地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卓有成效。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⑥力求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提高全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7页。

②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7—78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6—1317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7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4页。

⑥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页。

复兴”的政治自觉和担当意识。在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地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①在中共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继续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李大钊当年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经过包括李大钊本人在内的无数中国人的努力大都得以实现,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富起来。相信,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责任编辑:侯德彤

Li Dazhao's Patriotism and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Wang Lingjin

School of Marxism,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is recogniz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as the first Marxist in China and one of the main foun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s positioned as the pioneer lea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 published articles and delivered speeches in the face of national crisis, expressing his concern about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nd his eagerness to save them. Inspired by his strong love for his country and people, he campaigned for the creation of a Marxist revolutionary party in China. His concern and love provided a starting poi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riginal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aid a historical foundation, and exert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ver the formulation of the line, principles, policies and system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fterwards.

Key words: Li Dazhao; patriotism; original mission; historical influence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3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页。

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与对策

尹振涛 汪 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 北京 100710

摘 要: 数字金融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在扩大居民消费、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创新创业,以及提高金融服务效能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有效提升了宏观经济应对外部不利冲击的韧性。但是,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数字金融在城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数据安全与治理问题突出,金融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金融风险不确定性上升,“创新—稳定”权衡难度加大等。我国应当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加强行业自律,完善个人征信体系,推广公益金融活动,助力数字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数字金融; 实体经济; 经济韧性; 数据治理

中图分类号: F49;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3) 04-0085-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体经济各个重点领域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然而,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仍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制造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和科技型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数字金融通过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大大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和增强了金融服务的触达性,具备社会普惠性、便利性和外部性特征,成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利用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理论基础,而在此基础上,数字金融在消费、投资、创新创业、金融服务和应对冲击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数字金融的发展面临一些明显的挑战,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科技伦理问题凸显,行业竞争加剧,部分消费信贷产品不良率攀升等。为此,本文建议未来应当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质效、科技伦理治理、行业自律引导、信用风险管理、消费者风险意识等方面入手,引导数字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一、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

数字金融具备显著的网络外部性,能够有效缓解金融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扩大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银行数字化转型与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研究”(21CJY06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尹振涛,男,山东青岛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金融科技与金融监管研究;汪勇,男,安徽黄山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金融科技、宏观金融与经济政策评估研究。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0页。

居民消费、优化投资结构、鼓励创新创业,以及提高金融服务效能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宏观经济应对外部不利冲击的韧性。

(一)降低服务门槛,扩大居民消费

数字金融发展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交易和提供金融服务的门槛,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了金融服务的易得性、便捷性和普及范围,扩大了居民消费^①。

首先,流动性约束是制约居民当期消费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流动性约束大的消费人群所占比例越高,消费支出就会越少;数字金融的发展将有助于降低居民个人的流动性约束,提升居民当期消费水平^②。因此,在引入信用消费制度以后,消费者就能够采取“先消费后付款”方式选择社会商品或服务项目,转变潜在消费需求为实际购买力,从而扩大社会商品与服务项目消费总量。与此同时,消费信贷还具有乘数效应。在市场运作中,居民可以利用消费信贷购置商品或服务,信贷购买的商品通过市场循环会形成一轮接一轮的购买力,最后产生的社会消费总量往往是消费信贷服务金额的数倍,由此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根据厦门大学《互联网消费信贷、流动性约束与居民消费》研究报告,开通蚂蚁“花呗”可提升18%的消费金额,表明消费信贷有助于缓解消费者流动性约束压力,对提振消费具有较大的积极作用。

其次,数字金融利用数字化手段定位和选择客户,客户覆盖被传统金融机构忽视的小镇青年、新市民等中低收入群体。因此,数字消费信贷穿透力更强,能够创造适应于各种分类市场的消费信贷产品,有效释放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群体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强中低收入家庭群体的消费购买力,从而产生规模庞大的“长尾市场”。由于“长尾市场”群体规模巨大,小额消费信贷资金也能产生巨大购买力,从而带动居民消费需求扩张。

最后,消费信贷还会影响居民消费倾向,进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中国居民过去长期存在着“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而伴随消费贷款的发展,超前消费行为理念被更多居民认同,数字消费金融发展更是强化了人们超前消费理念,逐步改变了“量入为出”的消费意识与消费文化,敢花未来的钱使现在生活水平提高,用刺激消费来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居民消费水平^③。但是,消费信贷可能导致过度消费,而前期的过度消费会对后期消费形成挤出。因此,消费信贷对总消费的刺激作用主要集中在当期,可能会挤出居民的长期消费。

(二)改善资源配置,优化投资结构

数字金融涉及到银行、居民、企业以及政府等多个参与主体。当面对不同参与主体时,数字金融则利用各种途径调整其投资方式。针对金融机构,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化分析等技术,优化贷款业务的最佳信贷行为,改善金融业务流程,提高资金获取能力与分配效率,进而优化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就居民部门而言,居民消费构成是产业投资的风向标,数字金融能够通过分析居民消费构成引导产业投资方向。例如,消费信贷需求的扩张将作用于市场需求继而促进产业投资

①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金融研究》2018年第11期。

② 张勋、杨桐、汪晨、万广华:《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0年第11期。

③ 吴雨、李晓、李杰、周利:《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

的产品升级改造,市场消费需求将倒逼企业改善生产技术和提升产品质量,并促使其进一步引进新工艺提高技术含量,通过加大产品研发和升级改造制造出更多符合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提供更优质的售后服务,从而推动企业产品品质提升和技术创新发展。可以说,数字金融通过分析居民消费构成,继而间接作用于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服务结构调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进一步带动投资和优化投资结构。

针对实体企业,一方面,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将扩充民营企业的融资路径,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尤其是作为创新创业主体的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可以扩充民营企业投资路径,为民营企业和小额贷款公司提供创投、股权、债权等投资渠道,并借助大数据技术,有效推动小微企业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业务创新,进而优化投资结构。针对地方政府部门,数字金融以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为重点,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积极推进数字化赋能和智慧化管理,不断完善和提高中小企业营商环境;同时,数字金融赋能政府部门全面推行“一网办公”,加速推进企业证照管理无纸化,鼓励指导平台型、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大数据手段赋能发展小微经济。此外,数字金融还倒逼政府部门探索适应平台经济、工业数字化、新个体、共享经济等新经济特征的管理方法。

(三) 畅通要素流动,促进创新创业

数字金融能够助力科技创新,推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良性循环,为创新创业提供动力。

其一,有效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如用户在互联网上的大量行为数据),可以面向中小微客户和长尾消费者构建数字信用评价体系,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缺陷,保证经济不发达地区也可以享受便利的金融服务,为欠发达地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更大范围地发挥普惠金融功能。

其二,更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创新的投资行为具备投资规模大、经营风险高、投资回报不稳定、投资可逆性弱的特点,这和金融机构的一般风险偏好并不匹配。不过,借助于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数字金融将赋能金融机构数字化革新,充分发挥降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关键作用,提升网络信息系统与交易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促进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搜集运用信贷记录、消费数据和交易记录等历史数据。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帮助金融机构破除“数据壁垒”和“信息烟囱”,促进创新型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高效交流,助力企业创新。

其三,通过创新商业模式继而创造更多商业机会。数字金融还具备价值发现功能,通过集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上下游数据,形成数据信息闭环和优质投资环境,有效促进数据、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向生产效率较高的科技产业流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改革创新。同时,作为一种金融基础设施,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为创新创业活动创造更多商业机会和就业岗位^①。如移动数字支付的出现,极大促进了电子商务模式的演进,推动传统线下业务活动的线上化,引致出新的商业机会。

^①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4期。

(四) 助推数字化转型,提升金融效率

数字金融借助数字化技术,不但能够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同时能够提高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成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路径。

一是提升金融服务的实效性。首先,数字金融可以有效突破传统金融产品的空间界限和数量约束,进而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覆盖范围,同时通过广泛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开展金融服务深化,创新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模式、流程和产品,完善产品模式和拓宽金融服务范围。其次,数字金融的发展为信贷市场提供了新的产品与服务模式,为同质化的信贷市场注入新鲜血液,能够有效提升信贷市场的竞争强度和产品质量,增强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提供消费信贷产品与金融服务的竞争意识,促进其革新技术手段和改善经营管理理念以提高运营效率,推动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再次,数字金融创新的大量数字化产品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造成冲击,并由此倒逼金融机构大力拓展盈利途径,开发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的产品,提高自身资产配置效率,继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①。

二是提升金融风险控制能力。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之间的期限错配风险和流动性错配风险,是其长期面临的一大重要难题。但是,随着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数字算法等技术的引入,不仅推动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迅速转变,还促进了其负债结构的多元化转型。同时,银行建立实时大数据动态风险评估框架,可以提高对自身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和流动性结构的判断能力,继而降低资产负债到期损失,增强对流动性头寸数量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数字金融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的量化风险管理短板,利用全面场景应用、大数据等技术,提升风险评估、反欺诈、金融服务合同分析、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等风险管控能力。

(五) 增强风险分担,提高经济韧性

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提高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消费信贷作为有效的消费风险分担机制,可以平滑个人流动性约束、降低收入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消费的不利冲击。随着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出现,更加健全和完善的风控体系、更低的获客成本和更广的覆盖范围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消费信贷在风险分担中的功能,降低异质性冲击对居民消费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消费信贷可以帮助很多家庭满足临时的刚性需求,在受自然灾害冲击后,有“领薪日贷款”等消费信贷服务社区的居民的房贷违约率仅为没有消费信贷服务社区居民的一半左右,同时有消费信贷服务社区的偷盗发生率也比没有消费信贷服务社区少增30%左右。因此,消费信贷有助于提升社区应对风险和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②。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消费者减少了外出就餐、旅行、娱乐等方面的支出,进而导致总体消费需求下降,社会消费环境变差,部分行业发展不景气。但疫情也加速了数字化转型进程,线上、线下消费场景加速链接,“无接触金融”服务能力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不断开拓出新的业务场景。尤其是在金融服务领域,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的互联网消费信贷有效补充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发

① 陆凤芝、王群勇:《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升》,《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② Morse A., "Payday Lenders: Heroes or Villai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102(1): 28-44.

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疫情使企业生产活动受到诸多限制,导致部分居民收入不稳定,消费能力受到抑制。而互联网消费信贷具有“无接触服务”“非接触贷款”等特征,可快速调配信息流、商品流和资金流,在缓解居民消费流动性约束、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稳消费、稳信心和稳就业的重要支持力量,很大程度上提高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能力。其次,大型平台获客渠道更加多元,服务客群更为广泛。相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白名单、体内账户体系或线下展业而言,平台通过线上生活类 APP 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丰富、便利的金融和生活服务,已成为数亿消费者所信任的数字金融服务入口。疫情期间,政府部门通过支付宝、微信、美团、云闪付、大众点评、携程等平台发放的消费券对于企业复工复产、提振消费信心、促进稳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化“加持”后的消费券具有发放速度快、市场转化率高等优点。同时,数字消费券的“杠杆效应”会通过需求侧传导到供给侧,通过叠加“乘数效应”扩大产出,刺激相关企业加大投资,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对消费回暖和经济复苏产生了更加积极的作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绍兴消费券政策的一项研究表明,数字消费券显著提高了零售商户的营业额,其中新增营业额的 75% 来自消费者自身支出,且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缓解了疫情对零售商户经营的不利冲击^①。

二、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近年来,我国数字金融得到迅猛发展,但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数字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下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较大,数据安全、算法歧视、限制竞争和数字鸿沟等问题愈发显著,行业竞争加剧同质化严重导致金融机构的成本攀升和收益率下降,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下风险隐患有所提升,并对金融监管模式提出挑战。

(一) 数字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数字鸿沟问题显现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数字金融在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目前,中国农村仍有部分地区未能实现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全地域覆盖,偏远地区的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可达性更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用户普及率为 82.9%,远远高于农村地区的 58.8%。由于数字金融发展依托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城乡之间互联网普及率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城乡之间数字金融发展的差异。以支付为例,《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 2021》显示,农户最主要的小额支付手段仍是现金,70.52% 的样本农户首选现金支付,其次为微信支付,占 23.73%。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在地区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看,2021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得分最高的上海市是得分最低的青海省的 1.4 倍(图 1)。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空间集聚性,并不能完全摆脱地理限制。东部沿海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其周边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也偏高;但是,中西部城市及其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都偏低^②。

① 汪勇、尹振涛、邢剑炜:《数字化工具对内循环堵点的疏通效应——基于消费券纾困商户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22 年第 1 期。

②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济学(季刊)》2020 年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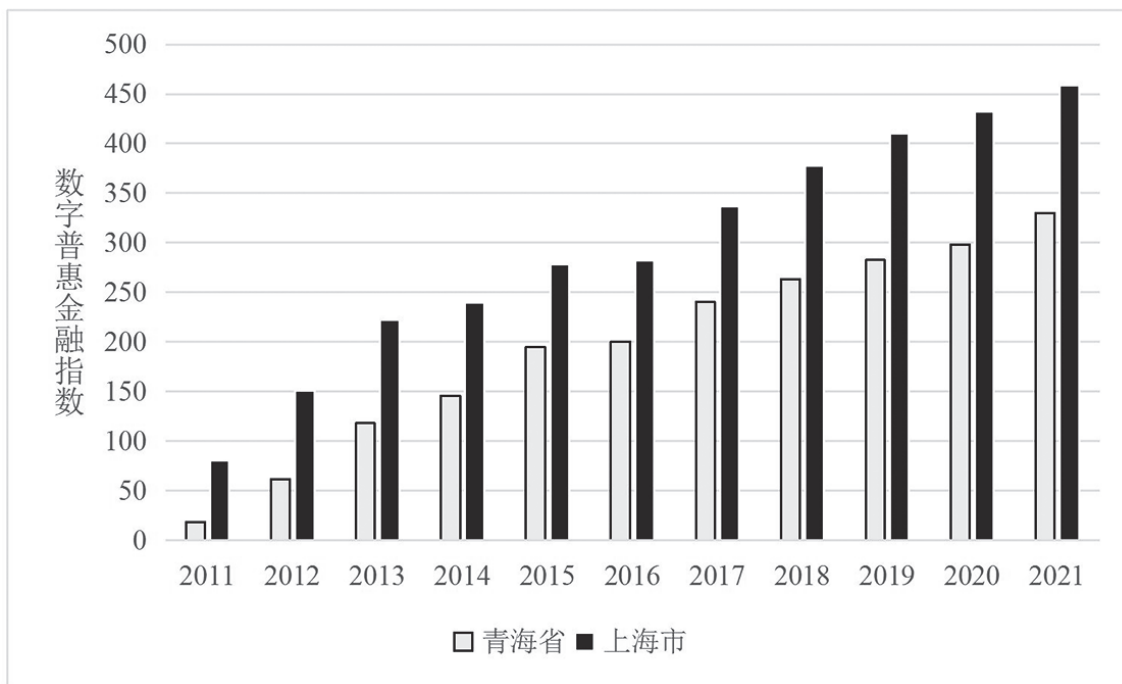


图1 2011—2021年青海省、上海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二)数据安全与治理问题突出,增加消费者权益保护难度

数字技术具有更新换代频繁、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第一,数据安全风险增大。平台企业间竞争愈发激烈,越来越重视数据要素这一核心竞争资源。部分互联网平台通过构建生态体系,以“免费”服务的方式,强制授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甚至违规违法使用用户敏感信息获益。例如,一些金融APP存在高危漏洞、隐蔽收集用户信息等安全风险,以窃取数据为主要目的攻击事件越来越频繁。第二,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现象频发。一些平台企业利用算法黑箱特性实施差别定价(如产生信贷供给歧视、诱导过度借贷等问题),与同业达成“算法共谋”形成市场垄断,并利用信息推荐技术,蓄意构建充斥高风险金融产品服务的信息茧房,阻碍消费者自主选择。第三,金融消费者保护难度加大。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在数字化场景下可能被放大,金融消费者受诈骗侵害等风险不容忽视。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电话、短信、微信朋友圈等渠道发布贷款、理财、投资等虚假信息,甚至利用非法获取的消费者金融信息编造账户冻结、涉及刑事案件等虚假情形,骗取消费者资金。同时,部分金融消费者因线下业务办理不畅,被动选择线上模式,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未能有效识别诈骗信息,导致财产安全受侵害的潜在风险增加。第四,限制竞争问题凸显。一些金融科技平台通常涉猎多个业务领域,在电商、社交、出行等其他数字经济平台兼具渠道和流量优势,用户基础庞大、业务数据丰富,又得益于数字经济的网络外部性特点,使其在短时间内便拥有了近乎垄断性的市场竞争优势。强迫“二选一”是限制竞争最为常见的现象。部分平台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利用网络效应进行不公平竞争,形成“赢家通吃”的垄断局面,甚至可能引发“大而不能倒”风险。

（三）金融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市场秩序亟需规范

数字金融行业的竞争日趋加剧,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运用,各大金融机构和其他行业的头部企业纷纷加入消费信贷领域。一是消费信贷行业竞争程度不断加剧。在消费信贷供给规模迅速扩大、需求潜力逐渐下降背景下,消费信贷市场也从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逐步转向供求平衡,甚至出现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由蓝海市场逐渐转入红海市场。市场竞争程度日益加剧,竞争不足的格局逐渐转向充分竞争,甚至过度竞争,使得消费信贷行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二是消费信贷行业的竞争方式逐步改变。这主要表现为消费信贷行业逐渐从增量客户竞争转向存量客户竞争,从不同客群、不同产品之间的差异化竞争,转向相同客群、同类产品之间同质化的价格竞争,从低水平市场规模竞争转向高水平服务质量的竞争,从产品和价格竞争逐步转向内部技术和管理能力的竞争。

消费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日益加剧,增加了企业开展消费信贷数字化业务并取得竞争优势的难度,导致各消费信贷机构的营销成本日益上升;管理难度加大导致管理成本不断上升,整个经营成本趋于上升。同时,价格竞争必然使得消费信贷产品定价不断下降,造成市场收益率趋于下降。

（四）金融风险不确定性上升,可持续性发展有待评估

数字金融的发展放大了信贷的顺周期性,并增加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在信贷领域,金融科技企业往往提供短期信贷,与长期贷款相比在经济低迷时更容易受到消费者信心不足的影响,加之由于缺乏激励机制,这些企业准确评估贷款质量和客户信用水平的动机可能没有传统金融机构那么强烈。在投资领域,金融科技企业对于相同算法的依赖会导致投资策略的相关性上升,风险难以收敛,从而放大资产的顺周期波动。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客户可以更加自由地在不同的存储账户和共同基金之间做出更有利于收益的选择,这在提高了投资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数字金融的流动性风险,金融科技企业在货币市场基金领域的业务开展使得这一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作为典型的数字金融产品,数字消费信贷的发展极大提升了金融的服务范围、业务规模及其普惠性和触达性,但由于消费信贷的本身特征,部分消费信贷企业出现较高不良率的现象。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消费信贷具备信贷额度小、门槛低、审批放款快以及较少涉及抵质押担保的特点,叠加消费信贷完全基于个人信用而没有抵押担保,贷款人违约成本较低。与此同时,互联网消费信贷客户群体是没有征信记录或信用较低、难以从传统渠道获得贷款的长尾人群,客户偿债能力较弱,更容易出现逾期还款、无法还款甚至恶意拒偿的问题。另一方面,近几年随着银行资本约束趋紧,商业银行对公业务发展受到限制,纷纷加大对零售业务布局与投入,提高个人消费信贷比例。特别是在新的风控数据、风控手段以及金融科技服务商的介入下,高回报的信用类消费贷款在个人贷款结构中占比不断提升。但是,消费贷款因具备额度低、期限短、无抵押等特点,对于贷后资产管理的要求也相对较高,而零售贷款余额规模的快速上升、用户群体逐渐下沉等原因带来了更大规模的消费贷款不良资产余额,导致消费贷款不良资产处置需求规模增加。2020年以来,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环境的影响,消费信贷企业不良贷款率逐渐上升。据研究,在疫情爆发前,金融科技贷款

的逾期率在2%—5%之间;而在疫情爆发后的5个月,金融科技贷款的逾期率超过了20%^①。

(五)“创新—稳定”权衡难度加大,需要转变监管模式

数字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速度远远滞后数字金融的发展速度。目前监管部门仍然使用针对传统金融业制定的监管策略来监管数字金融行业,没有充分考虑到数字金融的独特性,从而导致现有的金融监管制度难以很好地评估和管理风险。例如,虽然互联网银行已经成为当前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得金融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仍然适用和普通商业银行一样的监管制度。针对互联网银行的监管,目前参考城市商业银行标准,但事实上其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又与传统商业银行存在明显差异,造成在执行各项政策时容易出现不对等或不一致的情况。一方面,如果金融科技企业被要求完全遵守传统的监管法律法规,那么企业将面临巨大的合规成本压力,甚至最终放弃创新计划。另一方面,若给予其特权免除合规要求,又会使监管工作陷入“双重标准”的执法困境及创新风险无法防控的困境。

数字金融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跨界性,既包括科技与金融领域的跨界,也包括其与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方面的融合。同时,这种跨界是行业层面甚至是体系层面的跨界,比金融领域的综合化经营更加复杂。以最常见的大科技金融线上信贷为例,除使用自有资金开展业务以外,其与持牌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合作开展的助贷和联合贷款正在考验着监管的智慧和能力。为金融机构提供风控支持是助贷和联合贷款业务的主要模式。然而,在实践中部分金融机构缺乏风险控制意识,将授信决策、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完全外包给科技合作机构,将助贷机构给出的授信建议直接转化为自己对客户的最终授信决策。有的金融机构作为全部出资人并不承担信用风险,而是将全部风险通过兜底协议转嫁给科技合作机构,这极易产生道德风险。上述新问题对传统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监管的统筹协调能力、监管科技的应用能力等亟待全面提升。

三、引导数字金融更好支持实体经济的对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推动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应当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推进数字金融协调发展,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以促进科技向善,加强行业自律以引导数字金融有序发展,完善个人征信体系以增强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推广公益金融活动以提升消费者风险意识。

(一)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金融协调发展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数字金融要通过数字驱动和技术驱动缩小金融资源的区域分布差异。要加快突破明显制约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以安全多方计算、区块链、联邦学习、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科技为基础,构建安全、合规、统一的数据要素平台,推进区域数据中心集约化建设,加快大数据传输通道建设,不断提升数据传输能力。

^① Bao Z., Huang D., "Shadow Banking in a Crisis: Evidence from Fintech During COVID-19",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21, 56(7): 2320-2355.

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应持续依靠数字技术,拓宽数字金融覆盖面。中西部地区要发挥后发优势,依靠国家的政策倾斜,着力提升智能金融网点数量和规模,通过数字技术赋能金融提升金融服务覆盖率,着重提升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居民的资金可得性,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领先优势,着力提升数字金融资金配置精准度,不断创新和升级金融服务,通过数字金融产品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于不同企业、不同人群的效率,避免出现大型企业“授信过度”和中小企业“授信不足”并存的局面。此外,要深入落实数字乡村行动计划,加快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建立完善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开展征信体系、涉农大数据、农业技术服务与培训,做好“线上+线下”业务,大力支持乡村振兴。

(二) 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运用数字技术打造数字金融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可以大幅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延伸金融服务半径,拓展金融服务类别,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和受益面。因此,“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金融管理部门要引导和推动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市场化信用信息的整合和共享,打破“信息孤岛”现象;完善数字金融标准体系建设,促进行业之间、机构之间互联互通;平衡好金融创新与审慎监管,充分运用监管科技,提升数字化转型监管效能。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金融机构应基于自身业务发展用户需求,明确数字化转型方向和重点,突破约束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提升组织敏捷性和扁平化;加强数据治理,提升科技研发、网络金融等人才占比,加快核心系统建设和升级,加快数字金融产品创新和迭代,构建更加全面的技术生态、业务生态体系,为用户提供泛在、无界的综合服务。

(三) 构建数字金融伦理治理体系,促进科技向善

数字金融伦理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监管部门、从业机构、行业组织等各司其职、密切协作。首先,监管部门探索建立行业级科技伦理委员会、专业性科技伦理审查机制,以原则性指引为基础,结合新技术金融应用的风险与效益、技术应用的主观行为等建立伦理判定的软性数字金融治理规则,提升科技伦理审查结果互认水平,严肃查处科技伦理违规行为。其次,从业机构要履行好数字金融伦理管理主体责任,研究设立企业数字金融伦理委员会,强化内部科技伦理审查,做好信息公开、自觉接受外界监督,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加强伦理风险监测预警。最后,行业组织应发挥贴近行业、机制灵活的优势,通过自律公约、行动倡议、宣传教育等手段,构筑伦理自律防线。

要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创新监管工具作用,有效规范数字金融创新活动。第一,在数字金融创新试点的同时,探索开展数字金融伦理评估,为数字金融产品设计融入“科技向善”理念。第二,建立以守正向善为导向的创新测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监管科技强化创新应用检测,加强算法审计,防止算法歧视;畅通投诉建议渠道、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确保算法符合公平原则,维护消费者合理权益。第三,开展数字金融适老化、普惠性评估,缩小数字鸿沟;创新针对老年人、低收入人群和残障人士的数字金融服务模式,打造适老化、关怀式移动金融产品,提升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

(四) 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数字金融有序发展

随着更多新技术的运用,数字金融将会出现更多的产品形式,表现为具备主体多元、业态多样、

关联紧密等特征,增加了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难度。需要完善行业自律,通过该机制的建设确保各个主体形成更加规范的合规意识,使行业自律成为促进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助推器。

首先,探索数字金融领域有效市场沟通机制。确保相关需要披露的信息能够及时高质量传递给公众,完善信息数据统计功能模块的建设。针对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强不同机构、企业与政府的信息沟通。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标准规则体系,通过标准规则弥补监管制度空白,推动监管政策执行,在更大层面上实现各主体权益的保护。完善统计监测模块,通过功能更加强大的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掌握各个层面发生的最新变化,在最大程度上掌握风险底数。再次,加强行业从业人员培训,提升服务水平。完善从业人员资格评定和继续教育,通过机制构建、平台搭建等多种措施,形成完善的人才培训机制;加强从业人员和金融消费者的风险基础知识普及教育,提高将要上岗的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有效促进行业整体的运营效率。最后,加强行业共享,行业内部的各种服务商可以建立一种信息共享机制,避免陷入“信息孤岛”。例如,如果借款者在某一个消费信贷平台发生违约事件,该平台商可以马上将该名借款者的相关信息上传至共享平台。这样的信息共享机制,对不良信誉的借款者起到了一种警示作用,能够有效降低借款者因“多头借贷”而产生的信用风险。五是规范化管理数字金融的业务创新。在监管框架下鼓励数字金融业务产品和技术创新,提升消费者服务体验。例如,在合规的监管框架下,对数字信贷业务的产品创新实施较为灵活的规范化管控,对数字信贷业务的范围核准、产品报备、平台技术应用等环节允许一定灰度试运行空间,通过监管沙盒、行业引导等方式鼓励数字信贷业务产品和技术创新。

(五)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增强信用风险管理能力

在完善个人征信体系方面,一是构建多层次的社会征信体系,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为主体,市场化征信行为为辅,构建全方位征信体系;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征信并实现差异化竞争,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在竞争中不断创新,成为现有征信体系的强力补充。二是积极促进个人信用数据共享平台构建,建立征信信息共享机制。整合各领域、各行业的信用数据,通过行业规范模式和标准整合信息资源,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进行有效对接,建立全覆盖、多维度的个人信用数据库。三是积极推进“互联网+征信”,将征信数据覆盖更多的用户和应用场景,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快速、广泛、低成本采集数据,更准确地分析用户的违约风险,拓宽数字金融覆盖范围,通过跨平台的信用数据合作机制,推进数字金融的深层次发展。四是严格运用信用评分体系,避免过度授信。多数年轻消费群体具有收入不稳定、消费需求高的特性,消费信贷公司需要控制消费者信用风险,不应提供超过用户偿还能力的贷款额度,需要进一步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坚持征信信息动态更新,及时反馈消费者个人信用水平,防止过度授信。

(六)推广公益金融活动,提升消费者风险意识

在复杂的互联网消费信贷环境中,消费者要不断强化自身的风险意识,防止陷入债务陷阱。消费者安全意识是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需要全方位的宣传培养消费者安全意识。一是金融管理部门将提升数字金融素养作为新一轮国家普惠金融规划的重要内容,明确工作重点和分工安排,并将数字金融教育纳入金融消费者权益日、金融知识普及日等活动,通过体验学习、尝试应用、经验交流、互助帮扶等手段切实增强用户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二是金融机构应当完善金融营销宣传

工作制度,建立健全金融营销宣传内控机制,并将金融营销宣传管理工作纳入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加强金融营销宣传专题培训,健全金融营销宣传管理长效机制。三是认真落实全流程管控,从制度层面保障金融消保部门参与产品的设计、营销、售后等环节,补充数字信贷产品前端销售管理缺失的短板,在产品协议中详细说明借款利率的计算标准、方式、形式等,履行告知义务,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四是促进消费者学习和了解消费信贷的专业知识,及时关注并学习国家法律和政策变动情况,增强自己鉴别风险的能力。在进行消费信贷时,消费者应该对平台和产品进行充分地了解,仔细阅读产品合同,选择适合自身的信贷产品,防止个人利益受到侵害。(本文系《中国金融报告 2022: 助力经济回归潜在增长水平》中第 8 章的精编版,作者授权在本刊首发。)

责任编辑: 潘文竹

How Digital Finance Supports the Real Economy: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Yin Zhentao Wang Yong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Abstract: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e helps promote high-quality growth in the real economy. Digital finance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ing over recent years, supporting increased consumer spending, enhancing investment portfolios, encourag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trengthening the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bolstering economic stability during times of crisis. Despite these benefits, however, there remain significant challenges hindering further advancement. This includes regional imbalances and gaps in infrastructure, pressing data security concerns, competitive pressures affecting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and emerging financial risk concerns. The trade-off between innovation and stability becomes more difficult. We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mprove the technological ethics governance system, strengthen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improve the personal credit reporting system, promote public welfare financial activities, and help digital finance better suppor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finance; real economy; economic resilience; data governance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 基于慈善捐赠的时空演化视角

吕承超 阎佳琪

青岛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 选取慈善捐赠款物总额作为衡量慈善捐赠水平的指标, 依据 30 个省份 2008—2020 年相关数据, 分别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Kernel 核密度、Markov 链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慈善捐赠水平的地区差距、极化发展特点、时空发展趋势。结果发现: 从地区差距看, 整体地区差距呈持续波动趋势, 三大地区间慈善捐赠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呈现“东部最大, 西部其次, 中部最低”的格局; 从极化演变趋势看, 中国慈善捐赠水平逐步上升且存在多极化现象, 其中中部地区多极化现象最为明显, 东、西部地区其次; 从动态演进趋势看, 中国慈善捐赠发展水平状态间的流动性较高, 从三大地区看, 在邻域省份处于低水平时, 低水平省份流动性依次递增, 反之, 高水平省份均不流动。

关键词: 慈善事业发展; 慈善捐赠水平; 时空演化

中图分类号: C913.7; 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3) 04-0096-15

一、引 言

第三次分配是由厉以宁先生在 1997 年提出的, 是人们完全出于自愿的、在道德力量影响下、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①。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地区的慈善捐赠额是衡量一个地区慈善捐赠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自改革开放以来, 各地慈善捐赠事业不断发展, 慈善捐赠水平不断提升, 但是区域之间仍然存在慈善捐赠不平衡的现象。《“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出, 积极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鼓励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发展, 规范发展互联网慈善。2022 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在其工作重点任务中明确, 要培育发展现代慈善组织、慈善行业组织和枢纽型组织, 牢固树立自愿捐赠、平等互助理念, 引导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投身慈善、回报社会。目前, 学术界对于慈善捐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 对中外慈善捐赠差异的研究分析。其一, 吴杨、李亦楠等针对中美捐赠激励政策、非盈利机构布局、社会捐赠瓶颈等内容进行比较, 得出中国的捐赠主要来源于企业捐赠、美国的捐赠主要来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东省收入分配格局及其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22CJJ01) 和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团队项目“山东省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2020RWE00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吕承超, 男, 山东青岛人, 经济学博士, 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研究; 阎佳琪, 女, 山东淄博人, 青岛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研究。

^① 厉以宁:《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97 年第 6 期。

源于个人捐赠的结论,同时也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捐赠政策措施^①。其二,高静华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代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更需要以传统文化为支撑,理性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需要的慈善事业^②。

第二,对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分析。一方面,是对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因素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会计因素、政策因素。在针对会计因素的研究中,有研究发现,会计信息透明度会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可以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慈善捐赠意愿与水平。在针对政策因素的研究中,有文献提出税收政策激励能显著影响民企的慈善捐赠行为,企业可以通过捐赠税收优惠或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企业的捐赠成本,故税收政策激励是促进慈善捐赠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③;也有文献通过构建政策体系来研究慈善政策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④。另一方面,是研究企业参与慈善捐赠对自身产生的影响。在影响企业绩效方面,顾雷雷等发现,企业的捐赠行为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同影响^⑤。在影响企业融资约束方面,沈涌涛等发现,慈善捐赠决策存在同群效应,且其捐赠会提升企业品牌形象,从而缓解其融资约束^⑥。

第三,对个人及家庭慈善捐赠领域的研究。主要从影响个人及家庭捐赠的因素进行研究,包括收入因素、互联网普及因素、年龄、人口数量、所在省份、工作性质、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住房信贷、社会关系等因素^⑦。

第四,对慈善捐赠水平地区差异的度量。有学者根据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泰尔均值对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差异进行研究,得出中国慈善捐赠水平地区差异较大的结论^⑧。

-
- ① 吴杨:《中美两国基础研究社会捐赠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年第3期;李亦楠:《中美慈善捐赠结构比较研究》,《治理研究》2020年第6期。
- ② 高静华:《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文化动因》,《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1期。
- ③ Fack G., C.Landais, "Are Tax Incentives for Charitable Giving Efficient? Evidence from Franc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0,2(2):117-141; 彭飞, 范子英:《税收优惠、捐赠成本与企业捐赠》,《世界经济》2016年第7期。
- ④ 杨灿、魏娜、陈远星:《慈善政策体系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 ⑤ 顾雷雷、彭杨:《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管理评论》2022年第3期。
- ⑥ 沈涌涛、谭良锋、曾子轩等:《企业慈善捐赠中同群效应及其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 ⑦ 袁佳黎、张文宏、刘飞:《收入不平等、家庭收入与中国民众的慈善捐赠——从绝对地位到相对地位》,《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李庆海、李实:《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居民捐赠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12786户家庭的经验证据》,《改革》2023年第5期;张威、张卫国:《数字赋能慈善事业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居民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23年第1期;邓国胜、荣幸:《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家庭捐赠行为——来自CFPS的经验证据》,《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祖巧、刘渝琳:《中国家庭慈善捐赠意愿的生命周期之谜——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微观证据》,《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闫珍:《中国家庭住房财富对社会捐赠行为的影响》,《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刘武、杨晓飞、张进美:《城市居民慈善行为的群体差异——以辽宁省为例》,《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胡涂非、陈思茵:《社会资本理论下个人慈善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 ⑧ 南锐、翟羽佳:《中国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差异实证研究——度量、趋势与政策建议》,《经济经纬》2013年第5期。

综上所述,学术界在慈善捐赠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其一,就研究主体而言,过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微观主体,而从宏观层面分析慈善捐赠地区差距的文献较少。其二,就研究方法而言,针对地区差距的研究多采用基本的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泰尔指数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忽略了空间方面相邻省份对目标省份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无法十分直观准确地反映慈善捐赠水平的演变趋势,且缺少最新的慈善捐赠数据,时间跨度较短。其三,就区域视角而言,以往文献多注重研究中国与国外慈善捐赠水平的差距及影响因素,对中国国内各地区间慈善捐赠水平的差距研究略显不足。基于此,本文以中国慈善捐赠水平地区差距和演变趋势为研究对象,主要从三方面展开研究。第一,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差距进行测度,并对其差距来源进行分解。第二,运用 Kernel 核密度方法对中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地区慈善捐赠水平的极化演变趋势进行分析研究。第三,运用传统 Markov 链和空间 Markov 链,对中国慈善捐赠水平的动态演进规律进行分析,据此对中国慈善捐赠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本文采用 Dagum 提出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考察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区慈善事业捐赠款物的相对差距^①。Dagum 基尼系数的总体差距来源(G)可以分解成区域内差距贡献(G_w)、区域间净值差距贡献(G_{nb})和超变密度贡献(G_t)三部分,且满足 $G=G_w+G_{nb}+G_t$ 。总体基尼系数如式(1)所示,根据慈善捐赠款物的均值对地区进行排序得到式(2)。式(3)(4)分别表示 j 地区的基尼系数 G_{jj} 和 j 地区内差距 G_w ,地区内差距反映了同一地区内不同省份间的捐赠额不平衡。式(5)(6)分别表示 j 、 h 地区间基尼系数 G_{jh} 和 j 、 h 地区间差距 G_{nb} 的计算方法,地区间差距体现了不同地区之间捐赠额的不平衡。式(7)表示超变密度 G_t 的测算方法,其反映了由于地区间的重叠而导致的各地区间捐赠额不平衡。其中 $y_{ji}(y_{hr})$ 代表 $j(h)$ 地区内 $i(r)$ 省份的慈善捐赠水平的均值, n 为省份个数, k 为地区个数, $n_j(n_h)$ 为 $j(h)$ 地区内省份个数, $\bar{y}_j(\bar{y}_h)$ 为 $j(h)$ 地区内各省份慈善捐赠水平的均值。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子样本分布的情况进行了充分考虑,解决了样本数据间由于交叉重叠及地区差距来源带来的问题,弥补了传统基尼系数和 Theil 指数的不足。

$$G = \frac{\sum_{j=1}^k \sum_{h=1}^k \sum_{i=1}^{n_j} \sum_{r=1}^{n_h} |y_{ji} - y_{hr}|}{2n^2\bar{y}} \quad (1)$$

$$\bar{y}_h \leq \dots \leq \bar{y}_j \leq \dots \leq \bar{y}_k \quad (2)$$

$$G_{jj} = \frac{\frac{1}{2\bar{y}_j} \sum_{i=1}^{n_j} \sum_{r=1}^{n_j} |y_{ji} - y_{jr}|}{n_j^2} \quad (3)$$

① Dagum C., "A New Approach to the E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 Inequality Ratio", *Empirical Economics*, 1997,22(4):515-531.

$$G_w = \sum_{j=1}^k G_{jj} p_j s_j \quad (4)$$

$$G_{jh} = \frac{\sum_{i=1}^{n_j} \sum_{r=1}^{n_h} |y_{ji} - y_{hr}|}{n_j n_h (\bar{y}_j + \bar{y}_h)} \quad (5)$$

$$G_{nb} = \sum_{j=2}^k \sum_{h=1}^{j-1} G_{jh} (p_i s_h + p_h s_i) D_{jh} \quad (6)$$

$$G_t = \sum_{j=2}^k \sum_{h=1}^{j-1} G_{jh} (p_i s_h + p_h s_i) (1 - D_{jh}) \quad (7)$$

2. Kernel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法为对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进行估计,运用连续且平滑的密度曲线对其动态演进状态进行描述,刻画其分布状态和空间极化演进趋势,目前常用于研究空间分布的非均衡问题,属于非参数检验方法。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密度函数 $f(x)$ 如式(8)所示。核函数有多种分类,如均匀核函数、三角核函数、伽马核函数、高斯核函数等。本文运用高斯核函数来研究东、中、西三大地区捐赠额的分布情况和动态演进,其表达式如式(9)所示。其中 h 表示带宽, n 是在带宽范围内观测值数目, $K(\cdot)$ 是核函数, x_i 是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 $\bar{x}$ 为均值。根据核密度曲线得到的分布位置能反映地区捐赠额的数额大小;分布延展性可以体现慈善捐赠水平最高与最低间的差距;波峰的高度反映地区捐赠额差距的大小,波峰的数量反映慈善捐赠水平的极化程度。

$$f(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_i - \bar{x}}{h}\right] \quad (8)$$

$$K(x) = \frac{1}{\sqrt{2\pi}} e^{-\frac{x^2}{2}} \quad (9)$$

3. Markov 链

Markov 链由 Quah^① 提出,其通过构建转移矩阵,可以表明随机变量从一种状态空间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空间的概率分布,是一个随机过程 $\{X(t), t \in T\}$ 的状态空间,满足:

$$\begin{aligned} P\{X(t_n) \leq x_n | X(t_1) = x_1, X(t_2) = x_2, \dots, X(t_{n-1}) = x_{n-1}\} = P \\ \{X(t_n) \leq x_n | X(t_{n-1}) = x_{n-1}\}, x_n \in R \end{aligned} \quad (10)$$

式(10)中, $X(t_n)$ 为条件分布函数,满足 $X(t_i) = x_i$, 假设慈善捐赠水平的转移概率只与其发展水平状态 i 和 j 有关,与 n 无关,则 Markov 链可写为式(11):

$$P\{X_{n+1} = j | X_0 = i_0, X_1 = i_1, X_2 = i_2, \dots, X_{n-1} = i_{n-1}, X_n = i\} = P\{X_{n+1} = j | X_n = i\} \quad (11)$$

以上公式是对 Markov 链性质做出的解释,代表变量不同状态之间转移的概率分布。将中国慈善捐赠水平分为 N 种,则可以得到一个 $N \times N$ 维的慈善捐赠水平转移概率矩阵 P :

$$P = p_{ij} = \begin{bmatrix} p_{11} & p_{12} & \cdots & p_{1j} \\ p_{21} & p_{22} & \cdots & p_{2j} \\ \vdots & \vdots & \cdots & \vdots \\ p_{i1} & p_{i2} & \cdots & p_{ij} \end{bmatrix} \quad (12)$$

式(12)中, $p_{ij} \geq 0$, $\sum p_{ij} = 1$, $i, j \in N$, p_{ij} 表示在研究的时间范围内慈善捐赠水平的状态由第

① Quah D T., "Twin Peaks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Models of Distribution Dynamics",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6, 106(437): 1045-1055.

i 种类型转移到第 j 种类型的次数。若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计算转移概率 p , 可表示为:

$$p_{ij} = \frac{n_{ij}}{n_i} \quad (13)$$

式(13)中, n_{ij} 表示在观察期内, 慈善捐赠水平由状态 i 转移到状态 j 的次数, n_i 表示观察期内慈善捐赠水平在 i 状态的总次数, 故可以得到慈善捐赠水平的转移概率矩阵 $P = \{p_{ij}\}$ 。

(二)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6—2020 年中国内地 30 个省份(未包括西藏)的面板数据, 选取各省级慈善总会或慈善协会统计的年捐赠款物总额进行数据分析, 以慈善捐赠款物总额作为衡量慈善捐赠水平的主要指标, 围绕慈善捐赠水平进行分析, 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华慈善年鉴》, 缺失的数据运用插值法补齐。本文的地域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 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福建、海南 11 个省份, 中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9 个省份, 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0 个省份。

三、慈善捐赠水平的现状及地区差距分析

(一) 中国慈善捐赠水平现状分析

中国近年慈善捐赠呈现慈善组织数量增加、款物总额增长、以企业捐赠为主的特点。民政部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为 89.44 万个, 较 2019 年增长 3.21%, 其中社会团体 37.5 万个、社会服务机构 51.1 万个、基金会 8385 个, 分别较 2019 年增长 0.81%、4.93% 和 10.62%, 说明慈善社会组织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从慈善捐赠额来看, 《2020 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 中国现金和物资捐赠均有一定增长, 现金捐赠达 1473.97 亿元, 同比增长 41.12%; 2020 年全国物资捐赠折合 612.16 亿元, 同比增长 31.66%。从捐赠主体看, 2020 年中国企业和个人捐赠占比分别为 58.39% 和 25.13%, 说明企业是主要捐赠主体。

(二) 地区差距分析

1. 整体地区差距及演变趋势

由表 1 可知, 2008—2020 年中国慈善捐赠水平基尼系数的均值为 0.5034, 其演变趋势呈现先下降后持续波动、最后上升的趋势, 在 2020 年和 2015 年分别达到顶峰 0.7175 和低谷 0.4083。由图 1 可知, 演变趋势表现为 3 次“上升—下降”的过程。第 1 次“上升—下降”出现在 2009—2012 年, 由 0.4657 上升到 0.4751 再降到 0.4163, 平均增幅和降幅分别为 2.02% 和 12.38%, 增减幅度最小。第 2 次出现在 2012—2015 年, 基尼系数由 0.4163 上升到 0.5227 再下降到 0.4083, 平均增幅和降幅分别为 25.56% 和 21.89%, 说明慈善捐赠水平的地区差距变化幅度较大。第 3 次出现在 2015—2018 年, 地区差距由 0.4083 上升为 0.5222, 最终下降到 0.4658, 平均增长率和下降率为 27.91% 和 10.80%。2019—2020 年的整体基尼系数上升尤为显著, 由 0.4899 上升到 0.7175, 增长率为 46.46%, 增长幅度较大, 可能是由于疫情导致的地区差距出现波动。

表1 2008—2020年地区差距及分解

年度	G	地区内 差距	地区间 差距	超变 密度	地区内基尼系数			地区间基尼系数			贡献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中	东-西	中-西	地区内 差距	地区间 差距	超变 密度
2008	0.6616	0.2057	0.1173	0.3385	0.6490	0.3654	0.7314	0.5925	0.7571	0.6772	31.10	17.73	51.17
2009	0.4657	0.1522	0.0672	0.2464	0.4482	0.3852	0.4980	0.4476	0.4898	0.4741	32.68	14.43	52.89
2010	0.4751	0.1517	0.1685	0.1550	0.5397	0.3433	0.2898	0.5520	0.5322	0.3263	31.93	35.46	32.62
2011	0.4549	0.1479	0.1627	0.1443	0.5423	0.3143	0.2811	0.5071	0.5129	0.3245	32.52	35.77	31.71
2012	0.4163	0.1350	0.0677	0.2136	0.4729	0.2921	0.4238	0.4133	0.4658	0.3843	32.44	16.26	51.30
2013	0.5227	0.1680	0.1125	0.2421	0.5729	0.4105	0.4836	0.5267	0.5701	0.4952	32.15	21.53	46.33
2014	0.4556	0.1460	0.0279	0.2817	0.5156	0.4150	0.3705	0.4985	0.4836	0.4088	32.05	6.12	61.83
2015	0.4083	0.1302	0.0721	0.206	0.4479	0.3283	0.3963	0.4225	0.4374	0.3877	31.88	17.66	50.46
2016	0.4890	0.1513	0.1328	0.2048	0.5041	0.4525	0.4227	0.5347	0.4864	0.4846	30.95	27.16	41.89
2017	0.5222	0.1684	0.0842	0.2695	0.5445	0.4474	0.5037	0.5193	0.5676	0.5055	32.26	16.12	51.62
2018	0.4658	0.1446	0.1175	0.2036	0.4650	0.3871	0.4682	0.4722	0.4805	0.4883	31.05	25.23	43.72
2019	0.4899	0.1603	0.0361	0.2935	0.5231	0.3952	0.5034	0.4849	0.5260	0.4712	32.73	7.36	59.91
2020	0.7175	0.2123	0.3327	0.1725	0.4735	0.7827	0.5366	0.7781	0.5373	0.8100	29.59	46.37	24.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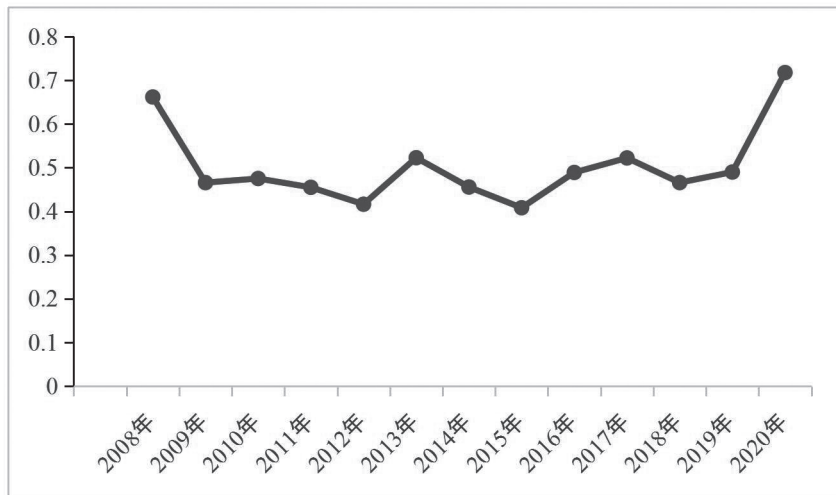


图1 2008—2020年中国慈善捐赠整体地区差距

2. 地区内差距及演变趋势

从地区内差距水平看,东、中、西部地区内基尼系数均值分别为0.5153、0.4091、0.4545,说明东部地区各省份之间慈善捐赠水平的差距最大,中部地区内部差距最小,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则处于中等水平。从演变趋势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呈现较为稳定的波动趋势,这与整体基尼系数的波动趋势基本一致(图2)。其中2008年东部地区内基尼系数最大,为0.6616;在2015年波动达到最低值,为0.4479。中部地区内基尼系数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2019—2020年上升幅度最大,由0.3952上升到0.7827,增长近2倍,这表明中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非均衡态势加剧(图2)。观察数据可知,差距增大的主要原因为2020年湖北省接受的慈善捐赠水平显著提高,这可能是由于疫情的影响。西部地区内基尼系数呈现出先下降后波动上升的演变趋势(图2)。具体来看,2008—2011年西部地区内基尼系数呈现出下降态势,从最大值0.7314降低到0.2811,且2008—2009年下降幅度最大,由0.7314下降至0.4980,降幅为31.91%,表明西部地区省内捐赠水平差距缩小。在2011—2020年

西部地区内基尼系数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上升趋势,由0.2811上升至0.5366,年均增长率为10.10%,说明西部地区捐赠额的差距又有所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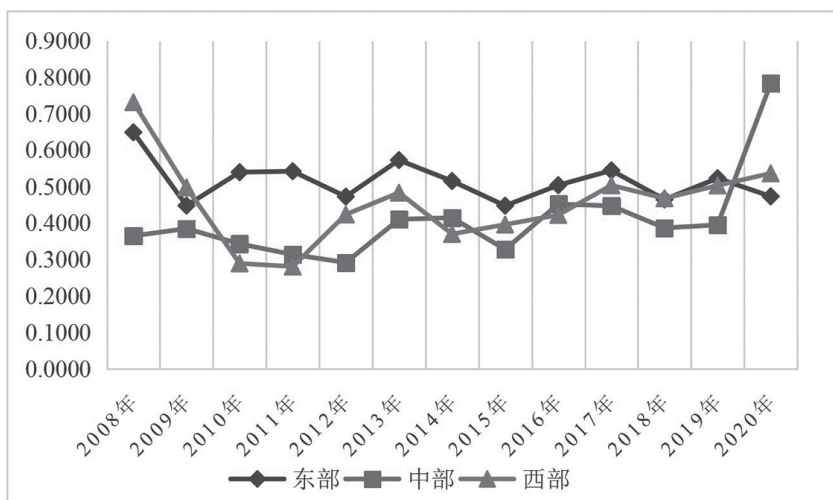


图2 2008—2020年中国慈善捐赠地区内差距

3. 地区间差距及演变趋势

从数值大小来看,三个地区之间慈善捐赠水平差距较小,2008—2020年地区间基尼系数的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东—西>东—中>中—西。具体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间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如图3所示。东部与西部间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同东部与中部地区间基尼系数基本一致,均表现为4次“下降—上升”过程,但是下降上升的时间点和趋势并不完全相同。2015—2020年东部和西部地区间基尼系数及东部和中部地区间基尼系数均呈“上升—下降—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间基尼系数在2015—2016年由0.4225上升到0.5374,升幅为27.20%;在2016—2019年呈缓慢下降趋势,由0.4846下降到0.4712,降幅为2.77%;在2019—2020年间急剧上升,由0.4849增加到0.7781,上升了约1.6倍。在同样的观测期内,东部和西部地区间基尼系数在2015—2017年间呈上升趋势,由0.4374上升到0.5676,升幅为29.77%;在2017—2018年间呈下降趋势,由0.4883下降到0.4712,降幅为3.50%;在2018—2020年又有小幅度的回升。中部和西部地区间的差距在2008—2009年,2013—2020年间与另外两曲线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在2009—2013年间变化趋势与另外两曲线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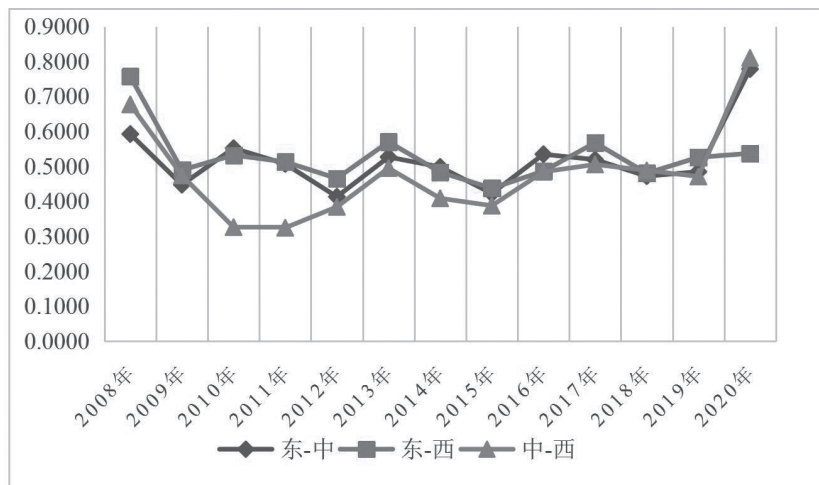


图3 2008—2020年中国慈善捐赠地区间差距

4. 差距来源及其贡献

从差距贡献率大小看,超变密度贡献率相对最大,考察期内均值为46.11%,显著高于地区内捐赠差距来源的31.79%和地区间捐赠差距来源的22.09%,是总体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地区间差距的贡献变化和超变密度贡献的变化大致对称,地区内差距贡献率变化较为平稳,变化趋势不明显。地区间差距的变化趋势为“下降—上升—波动下降—上升—波动下降—急剧上升”,超变密度来源变化与地区间差距的变化完全相反说明地区间交叉重叠现象较为明显,具体波动情况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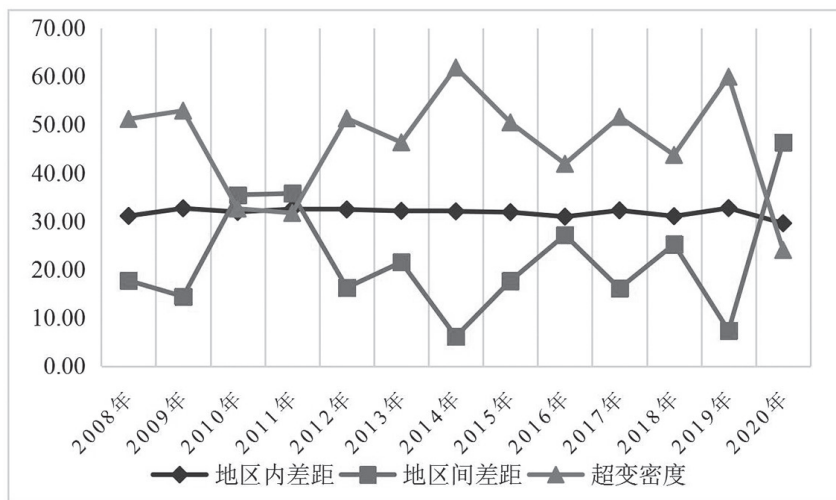


图4 2008—2020年中国慈善捐赠贡献率

四、慈善捐赠水平的空间极化演变趋势

前文对慈善捐赠水平的地区差距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研究,但是仅通过基尼系数分析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各地区慈善捐赠水平的动态演进过程,为对慈善捐赠水平的时空演进趋势进行进一步研究,本文将通过核密度估计法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慈善捐赠水平的分布特征、波峰特征、分布延展性及其极化趋势展开分析。

（一）全国各地区慈善捐赠水平的极化演变趋势

图5反映了全国各省份慈善捐赠水平的极化演变趋势。从分布特征看,主峰的分布基本不存在位移的情况,说明全国慈善捐赠水平在考察期内总体上较为平稳。从波峰特征看,波峰高度总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带宽先变宽后变窄,说明地区间慈善捐赠水平的差距先减小后增大,与基尼系数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波峰数量呈现“多峰—单峰—多峰”的演变趋势,只有2012年呈现单峰分布,说明除2012年以外,全国的慈善捐赠水平均存在多极化现象,慈善捐赠水平多极分化较为严重,但是左侧峰值明显高于右侧峰值,说明大部分省份慈善捐赠水平较低,少数省份慈善捐赠水平高。其中在2009—2012年期间,逐渐由单峰发展为双峰,侧峰存在于主峰右侧;在2012—2017年期间,在侧峰右侧出现第3个峰,说明慈善捐赠水平由两极分化发展为多极分化。从分布的延展性看,从2012年开始,右侧拖尾逐渐延长,说明有些省份的慈善捐赠水平随时间变化增长较快,而有些则增长缓慢,导致省份之间形成较大的差距。

(二) 东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的极化演变趋势

图6反映了东部地区各省份慈善捐赠水平的极化演变趋势。从其基本的分布来看,左侧的波峰基本不存在位移情况,而右侧的波峰呈现出“显著左移—显著右移—缓慢左移”的趋势,说明东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呈现出在2008—2010年间显著降低、在2010—2012年间显著增加、在2012—2020年间慈善捐赠水平缓慢降低的趋势。从波峰的特征来看,左侧波峰的高度呈现先降低后升高、后较稳定波动的趋势,中间波峰的高度变化与左侧波峰高低变化基本一致。在2009—2010年间波峰高度降低,同时带宽变大,说明东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差距逐渐变大。而2010—2012年波峰高度回升,带宽减小,说明东部地区慈善捐赠差距变小。在2010—2020年期间,波峰高度呈3次“下降—上升”交替的趋势,带宽同样呈宽窄交替的变化趋势,即地区差距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从波峰数量看,东部地区始终呈多峰分布的形态,其中左侧波峰的峰值最高,中间的波峰次之,右侧的波峰峰值最低,这说明在考察期内的东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存在多极分化现象,且大部分省份慈善捐赠水平较低,在0—5亿之间,少数省份慈善捐赠水平超过5亿;不同年份的多极分布呈现的特点也有所不同,比如2008年存在四个峰,说明东部地区各省份的慈善捐赠水平主要集中在四个峰值所在的地区。从分布的延展性看,拖尾长度先逐渐缩短、后延长,这说明在观察期内慈善捐赠水平的发展由慢变快,说明其发展成较为良好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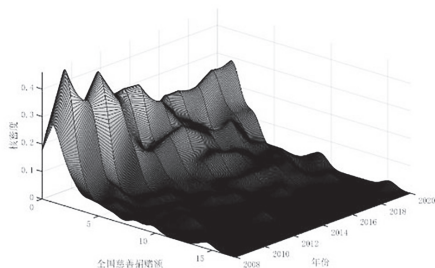


图5 全国 Kernel 核密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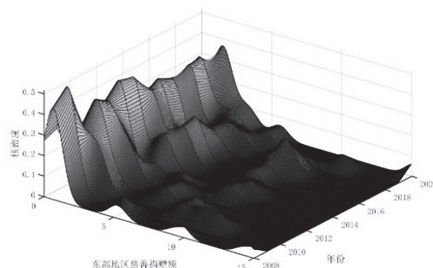


图6 东部地区 Kernel 核密度图

(三) 中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的极化演变趋势

图7反映了中部地区各省份慈善捐赠水平的极化演变趋势。从其基本的分布来看,波峰整体逐渐向右移动,说明中部地区的慈善捐赠水平在考察期内逐渐提高。从波峰的特征来看,总体上左侧的主峰高度逐渐降低,说明在考察期内,中部地区总体上慈善捐赠水平差距逐渐增大;2008—2020年间,波峰高度呈反复“下降—上升”的趋势,说明中部地区慈善捐赠差距也在上下波动,不同省份之间慈善捐赠水平变动幅度存在差距。从波峰数量看,除2010、2011年波峰数量呈单峰分布,未出现极化现象;其余年份均呈现极化现象,且极化现象日益明显。2008—2009年在主峰右侧出现一个侧峰,说明中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呈两极分布。随后,波峰数量在2010—2011年短暂变为单峰,2012—2020年发展为多峰分布,且波峰数量较多,均分布在主峰两侧,这说明中部地区不同省份之间慈善捐赠水平极化趋势较明显,大多数省份捐赠水平集中在0—5亿之间,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在0—5亿的区间内又会产生更具体的差别,从而形成多极化趋势;少数省份的捐赠水平超过5亿,形成新的波峰,故右侧波峰高度较低。从分布延展性看,右侧拖尾呈先缩短后延长的趋势,2008—2012年的右侧拖尾呈缩短趋势,说明在这段时间内慈善捐赠水平的发展减缓;2012—2020年的右侧拖尾

呈延长趋势,说明慈善捐赠水平不断发展,且发展速度加快。

(四)西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的极化演变趋势

图8反映了西部地区各省份慈善捐赠水平的极化演变趋势。从分布来看,位于左侧的主峰的移动并不明显,较为稳定,而位于主峰右侧的侧峰呈现右移的趋势,这说明在考察期内西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从波峰特征看,左侧主峰高度总体上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在2008—2011年、2015—2017年间呈下降趋势,同时带宽变宽,且侧峰变化趋势相似,说明在以上考察期内西部地区各省的慈善捐赠差距逐渐增大;2011—2015年间的主峰和侧峰高度呈上升趋势,同时带宽变窄,说明差距呈缩小趋势。从波峰数量来看,除2010年呈单峰分布外,其余年份均呈双峰或多峰分布;2011年主峰右侧出现了侧峰,2012年在最右侧出现一个波峰,说明在2011—2012年间由两极分布发展为三极分布,2012年后又迅速恢复为两极化分布,2018年再次发展成为多极分布。从分布的延展性看,右侧拖尾呈延长趋势,说明西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发展加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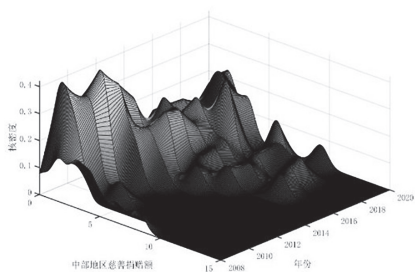


图7 中部地区 Kernel 核密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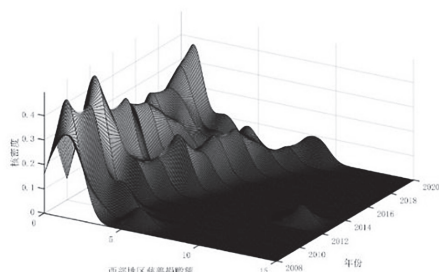


图8 西部地区 Kernel 核密度图

五、中国慈善捐赠水平发展的动态演进

为进一步分析地区间慈善捐赠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本文运用传统 Markov 链和空间 Markov 链,深入分析研究中国慈善捐赠水平的动态演进规律。本文将中国慈善捐赠水平划分为低、中低、中等、中高、高5种类型。其中低于总体水平20%的,划分为类型Ⅰ,称为低水平;位于总体水平20%—40%之间的,划分为类型Ⅱ,称为中低水平;位于总体水平40%—60%之间的,划分为类型Ⅲ,称为中等水平;位于总体水平60%—80%之间的,划分为类型Ⅳ,称为中高水平;位于总体水平80%—100%之间的,划分为类型Ⅴ,称为高水平。在测度过程中,递延时间均为1年,由此展开对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动态演进规律的研究,当省份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转换时称为向上转移,反之称为向下转移,在跨相邻类型发生变化的现象称为正向跳跃或负向跳跃。

(一)基于传统 Markov 链的动态演进

总体来看,全国慈善捐赠的 Markov 链转移矩阵对角线数值略高于非对角线数值,这说明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略高于非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由表2第2行数据可知,全国处于中低水平状态的省份占52.78%,分别有25%、8.33%、8.33%、5.56%的概率向中低、中等、中高、高水平4种类型转移。由表2第3行数据可知,中低水平省份占48.61%,有26.39%的概率向上转移为中等水平,有11.11%的概率向下转移到低水平,正向跳跃到中高和高水平的概率为13.89%。由表2第4行数据可知,

处于中等水平的省份占 44.44%,且向下转移到中低水平和向上转移到中高水平的概率相等,均为 18.06%,正向跳跃到高水平的概率为 11.11%,负向跳跃到低水平的概率为 8.33%。表 2 第 5 行数据说明,当年年末有 33.33% 的省份慈善捐赠发展仍处于中高水平,且有 33.33% 的城市向上转移,达到高水平,有 12.5% 的概率向下转移到中等水平;此外,仍有 6.94% 和 13.89% 的省份会负向跳跃到低和中低水平。由表 2 第 6 行数据可知,有 76.39% 省份的慈善捐赠仍处于高水平,有 6.94% 的概率向下转移到中高水平,有 11.11%、5.56% 的概率负向分别跳跃到中等、中低水平。总体上看,全国慈善捐赠发展水平状态之间流动性较高,其中高水平地区分布比较稳定,中高水平地区流动性最高。

表 2 2008—2020 年中国慈善捐赠水平的转移概率矩阵

		I	II	III	IV	V
全国	I	0.5278	0.2500	0.0833	0.0833	0.0556
	II	0.1111	0.4861	0.2639	0.0833	0.0556
	III	0.0833	0.1806	0.4444	0.1806	0.1111
	IV	0.0694	0.1389	0.1250	0.3333	0.3333
	V	0.0000	0.0556	0.1111	0.0694	0.7639
东部地区	I	0.4167	0.2917	0.0417	0.1250	0.1250
	II	0.1667	0.3333	0.3333	0.0833	0.0833
	III	0.0000	0.0000	0.3750	0.4583	0.1667
	IV	0.1250	0.1667	0.0417	0.3333	0.3333
	V	0.0000	0.0000	0.0556	0.1389	0.8056
中部地区	I	0.4167	0.3333	0.0833	0.0833	0.0833
	II	0.1667	0.3333	0.3333	0.0833	0.0833
	III	0.1667	0.2083	0.2917	0.1250	0.2083
	IV	0.0833	0.0417	0.1250	0.2917	0.4583
	V	0.0000	0.1667	0.0833	0.0833	0.6667
西部地区	I	0.5000	0.3333	0.0417	0.0833	0.0417
	II	0.0417	0.4167	0.2500	0.1667	0.1250
	III	0.0417	0.2500	0.3750	0.2500	0.0833
	IV	0.1250	0.1250	0.0833	0.3750	0.2917
	V	0.0000	0.0417	0.0417	0.0417	0.8750

从东、中、西 3 个地区的 Markov 链转移概率分布矩阵分别来看,西部地区各相邻省份流动性最低,中部地区流动性较高,东部则处于中等水平。以东部地区为例,当年位于低水平的省份下一年维持现状的概率为 41.67%,有 29.17% 的概率上移至中低水平,4.17% 的概率跳跃到中等水平,均有 12.5% 的概率跳跃到中高水平或高水平;当年处于中低水平的省份有 33.33% 的概率维持原状,33.33% 的概率上移至中等水平,跳跃到中高或高水平的概率均为 8.33%,有 16.67% 的概率会下移至低水平。若省份当年处于中等水平,有 37.5% 的概率能维持原状,有 45.83% 的概率上移至中高水平,上移至中高水平的概率大于维持原状的概率,说明东部地区省份慈善捐赠水平达到中等水平后,有极大概率呈上升趋势。若省份位于中高水平,则其维持原状和上移至高水平的概率均为 33.33%,下降至低、中低、中等水平的总概率约为 33.33%,说明慈善捐赠水平处于中高水平的省份在维持原状、上移、下移时的概率相同。当年位于高水平的省份维持原状的概率为 80.56%,概率较高,说明慈善捐赠高水平省份比较稳定。

从中部地区的 Markov 链转移概率分布矩阵中可以看出,对角线上的数值偏小,说明中部地区慈善捐赠发展水平的稳定性较差,较容易发生改变,且在各地区间流动性较强。其中中等水平和中高等水平的稳定性最差,在下一年保持原有状态的概率仅为 29.17%,但中高等水平省份向上转移,进一步发展成高水平地区的概率较大,为 45.83%。在中部地区,处于高水平的省份维持其原有概率的几率最大,为 66.67%,且没有省份直接负向跳跃至低水平。

从西部地区的 Markov 链转移概率分布矩阵中可以看出,其中等、中高等水平的省份维持其原有状态的概率相似,均为 37.5%; 其对角线上的数值与中部和东部相比偏大,说明西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

(二) 基于空间 Markov 链的动态演进

除时间因素外,慈善捐赠水平通常也会受到相邻地区的影响,因此把空间纳入考虑范围内,运用空间 Markov 链对慈善捐赠水平的动态演进进行研究,全国慈善捐赠水平的空间 Markov 链如表 3。

表 3 2008—2020 年中国慈善捐赠水平的空间转移概率矩阵

空间滞后类型	类型	I	II	III	IV	V
I 类型邻居	I	0.5000	0.1250	0.1250	0.2500	0.0000
	II	0.1818	0.3636	0.3182	0.0909	0.0455
	III	0.1111	0.2778	0.5000	0.1111	0.0000
	IV	0.1000	0.0000	0.0000	0.3000	0.6000
	V	0.0000	0.0000	0.0714	0.0000	0.9286
II 类型邻居	I	0.7333	0.2000	0.0000	0.0667	0.0000
	II	0.0769	0.4615	0.3846	0.0769	0.0000
	III	0.1250	0.1250	0.4375	0.1875	0.1250
	IV	0.0556	0.0556	0.2778	0.3889	0.2222
	V	0.0000	0.1000	0.0000	0.1000	0.8000
III 类型邻居	I	0.6111	0.0556	0.2222	0.1111	0.0000
	II	0.0000	0.6250	0.2500	0.1250	0.0000
	III	0.0556	0.1667	0.4444	0.1667	0.1667
	IV	0.0625	0.0625	0.0625	0.4375	0.3750
	V	0.0000	0.1667	0.2500	0.1667	0.4167
IV 类型邻居	I	0.4000	0.2667	0.0667	0.0667	0.2000
	II	0.0625	0.6250	0.1875	0.0625	0.0625
	III	0.1250	0.0000	0.5000	0.3750	0.0000
	IV	0.0000	0.3333	0.0667	0.2000	0.4000
	V	0.0000	0.0000	0.1667	0.0556	0.7778
V 类型邻居	I	0.3750	0.5625	0.0000	0.0000	0.0625
	II	0.1538	0.4615	0.1538	0.0769	0.1538
	III	0.0000	0.2500	0.3333	0.1667	0.2500
	IV	0.1538	0.2308	0.1538	0.3077	0.1538
	V	0.0000	0.0556	0.0556	0.0556	0.8333

从全国范围来看,当存在空间滞后类型时,低水平有 50%、73.33%、61.11%、40%、37.5% 的概率保持稳定,中低水平有 36.36%、46.15%、62.5%、62.5%、46.15% 的概率保持稳定,中等水平有 50%、43.75%、44.44%、50%、33.33% 的概率保持稳定,中高水平有 30%、38.89%、43.75%、20%、30.77% 的概

率保持稳定,高水平有 92.86%、80%、41.67%、77.78%、83.33% 的概率保持稳定。由此可知,除高水平外,其他各水平保持原有状态的概率均偏低,其中中高水平保持原有状态的概率最低。当空间滞后类型为中低水平邻居时,低水平省份向上转移的概率最低,说明中低水平邻居对低水平省份向上转移有一定负面影响;中低水平向上转移和跳跃到中等、中高、高水平的概率分别为 45.45%、46.15%、37.5%、31.25%、38.46;中等水平向上转移到中高、高水平的概率分别为 11.11%、31.25%、33.33%、37.5%、41.67%,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说明邻域水平越高,对中等水平省份向上转移呈正向影响;中高水平向上转移到高水平的概率为 60%、22.22%、37.5%、40%、15.38%,这说明邻域省份为低水平时中高水平向上转移的概率最大,邻域水平为高水平时中高水平向上转移的概率最小。

从东、中、西三大地区来看,三大地区慈善捐赠水平的空间转移概率矩阵对角线数值整体上均偏小,说明 5 个水平省份维持其原有水平的稳定性降低。当邻域省份慈善捐赠水平处于低水平时,东部地区处于低水平以及转移向低水平的省份均为 0;中部地区保持低水平的省份占 33.33%,省份由中低水平和中等水平向下转移到低水平的概率均为 25%;西部地区各省份保持低水平的占 50%,由中低水平转移到低水平的省份占 14.29%,中等、中高、高水平省份均无向下转移到低水平的省份。由此看出,在邻域省份处于低水平的基础上,西部地区的低水平省份更多,东部地区最少。当邻域省份慈善捐赠水平处于高水平时,东部和西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在本年位于高水平的省份,下一年也全部位于高水平:东部地区开始位于中等水平的省份有 20% 向上转移到中高水平省份,中高水平省份有 28.57% 向上转移到高水平;西部地区位于低水平的省份有 16.67% 正向跳跃到高水平,位于中低水平的省份有 28.57% 从中低水平正向跳跃到高水平。而中部地区的省份有 25% 低水平正向跳跃到高水平,20% 从中等水平跳跃到高水平,全部从中高水平转移到高水平。综上所述,邻域省份慈善捐赠水平处于低水平时,较少省份位于或转移为低水平;当邻域省份慈善捐赠水平处于高水平时,转移到高水平的省份占比较大,说明总体上慈善捐赠水平呈上升趋势。

中国慈善捐赠水平空间 Markov 转移概率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全国及三大地区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故空间因素作为影响慈善捐赠水平的重要因素,在慈善捐赠水平动态演进的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各省份慈善捐赠水平的演进受相邻省份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

表 4 中国慈善捐赠水平的空间 Markov 链转移概率相关参数

地区	Q 值	df	P 值
全国	101.7150	55	0
东部地区	66.1613	17	0
中部地区	79.7346	20	0
西部地区	75.3530	17	0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各省级慈善总会或慈善协会统计的年捐赠款物总额作为衡量慈善捐赠水平的指标,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Kernel 核密度、Markov 链三种方法对 2008—2022 年 30 个省份的慈善捐赠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分析地区间差距、空间极化演变趋势以及动态演进趋势,主要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根据 Dagum 基尼系数测得的整体地区差距可知,从总体来看,中国慈善捐赠水平差距的演变趋势呈现先下降后稳定波动,最后上升的趋势。从地区内差距及其演变趋势来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的均值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基尼系数均值最低;东部地区基尼系数呈现较为稳定的波动趋势,中部地区基尼系数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呈现出先下降后波动上升的演变趋势。从地区间差距及其演变趋势来看,2008—2020 年地区间基尼系数的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东—西 > 东—中 > 中—西,说明慈善捐赠水平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差距最大,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之间次之,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最小。从其贡献率来看,超变密度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最高,地区内差距贡献次之,地区间贡献最低。

第二,根据 Kernel 核密度方法对全国慈善捐赠水平的极化演变趋势进行了研究分析,从总体来看,全国慈善捐赠水平在考察期内较为平稳,地区间差距与基尼系数研究结果一致,慈善捐赠水平两极分化较为明显,可能导致某些省份之间形成较大差距。从各地区视角来看,东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呈“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地区差距呈稳定波动的趋势,存在多极化现象,且在观察期内慈善捐赠水平的发展由慢变快,说明其发展成较为良好的态势;中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在考察期内逐渐提高,慈善捐赠水平差距始终在上下波动,除 2010、2011 年未出现极化现象,其余年份均呈现极化现象,其慈善捐赠水平不断发展,且发展速度变快;西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其差距呈交替“上升—下降”趋势,除 2010 年未出现极化现象外,其余年份均呈多极分布,且西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发展加快。

第三,从全国慈善捐赠水平发展的动态演进趋势看,运用传统 Markov 链分析可知,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明显高于非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总体上说,全国慈善捐赠发展水平状态之间的流动性较高,高水平地区的分布比较稳定,中高水平地区的流动性最高。运用空间 Markov 链分析可知,总体上看,除高水平外,其他各水平保持原有状态的概率均偏低,且邻域省份为低水平时中高水平向上转移的概率最大,邻域水平为高水平时,中高水平向上转移的概率最小。从东、中、西三大地区来看,三大地区慈善捐赠水平的空间转移概率矩阵对角线数值整体上均偏小,说明三大地区省份维持其原有水平的稳定性降低;同时,当邻域省份慈善捐赠水平处于低水平时,较少省份位于或转移为低水平,而当邻域省份慈善捐赠水平处于高水平时,转移到高水平的省份占比较大,说明总体上慈善捐赠水平呈上升趋势。

根据以上结论,为提高各省慈善捐赠水平,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慈善教育力度。目前,各地区间慈善捐赠水平差距偏大,进行慈善教育可以引导社会公众形成正确的观念,也能为社会培养其所需要的慈善事业人才,人才的流动可以促进个省份之间慈善捐赠水平差距的减小。目前,各省份设立的慈善公益研究中心数量不均衡,慈善教育不够完善,因此,进一步加大慈善教育的力度,构建科学、高效的慈善公益研究中心及慈善捐赠机构,为慈善事业培养理论人才和专业人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全国慈善捐赠水平。

第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慈善法律体系。从全国整体和东、中、西三地区看,慈善捐赠水平不断波动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目前我国初步建立了以《慈善法》为核心一套完善的慈善法律体系,随后各省份可以继续围绕完善相关制度,在慈善事业范围确定、慈善机构认定、税收

优惠、“互联网+慈善”等方面不断进行完善,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审计监督机制,对政策的落实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督,从而有效推进慈善事业发展以及慈善水平的提高,促进慈善捐赠水平以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发展“互联网+慈善捐赠”。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互联网运用范围越来越广,慈善捐赠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逐渐增大,且可以跨省份捐赠,有利于地区间差距的缩小。故,可以以互联网为媒介开展慈善捐赠活动,大力发展“互联网+慈善捐赠”模式,从而增加慈善捐赠的广度,提高慈善捐赠水平,形成慈善宣传矩阵,引导和带领广大人民参与到慈善捐赠事业中。同时,也需要做好网络安全与监管工作,进一步完善信息反馈制度,使捐赠者能够安全捐赠。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 in China: A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Perspective Based on Charitable Donation

Lyu Chengchao Yan Jiaq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10, China

Abstract: The total quantity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is selected as an index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and relevant data are selected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20.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kernel density, and Markov chain analysis method are respectively used to study the regional disparity, polarizatio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emporal-spatial development trend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China's middle, east and west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the overall regional disparities show a continuous fluctuating trend, a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in the level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between the three regions with a pattern of "the largest in the east, the second in the west, and the lowest in the midd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end of polarization, the level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China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re is a multi-polarization phenomenon, with the central region taking the lead, followed by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dynamic evolution trend, the char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nation's liquidity is higher. Viewed from the three regions, when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s are in a low level, liquidity in low-level provinces increases in turn. On the contrary, the high-level provinces have no liquidity.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the charitable cause; charitable donation level;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非正式约束何以激发企业家精神

高歌

北京化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是生产力爆发式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企业家扮演着重要角色。重读这段历史不难发现,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作用,很大程度归因于良好的制度环境,尤其是非正式约束,不论是工业革命前夕新教伦理释放的商业精神,还是工业革命期间接近自由放任的社会环境以及绅士—企业家的声誉机制和社会网络,更不必说企业家良好的自我期许带来的社会回报,均为企业家精神的生发提供了必要条件。今天,中国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工业革命,为更好地唤醒企业家精神,有益的启示或许在于坚守诚信精神、承担社会责任和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非正式约束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作用。

关键词: 企业家精神; 非正式约束; 工业革命; 绅士—企业家

中图分类号: F091.34; K56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3) 04-0111-10

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福祉之一,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驱动因素。18世纪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造就了经济社会惊人的改变。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内涵是什么,它如何成为发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或者说企业家精神的培养环境是什么,如何创造适合企业家精神生发的条件,未来的企业家精神向何处去,等等。考虑到有关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已为数不少,本文旨在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探究企业家精神的诱发和激励机制,思考何种环境适合企业家精神的弘扬,而发现问题本质的方式莫过于追根溯源。

在漫长的经济增长历程中,为解释企业家精神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经济增长的爆发时期寻找原因一定最具说服力,而迄今为止,这一典型代表时期非工业革命莫属。在那个生产率增长“大到用百分比形容已毫无意义”的时代,奇迹产生的驱动力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当时的制度环境是否以及如何为之提供了有效的激励?研究显示,工业革命期间存在确定的企业家精神,而且是熊彼特式的企业家精神,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了经济增长,这样的成就很大程度得益于当时良好的制度环境,其中正式制度如专利、产权、金融等制度创新的意义自不待言,而非正式约束如文化、惯例、行为规范等同样不可或缺,共同构成诺思所言的制度矩阵。本文聚焦于非正式约束,探究当时的社会文化何以使欧洲人冲破中世纪神权和王权统治的双重精神枷锁,实现思想解放?企业家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如何与英国社会传统的绅士精神结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绅士—企业家”阶层?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环境,企业家群体如何进行自我突破实现自我价值,财富之外的自我期许是否带来丰厚的

作者简介: 高歌,女,河南郑州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

社会回报?无疑,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可能获得的答案都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当前正值新一轮工业革命,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方式从斯密型增长转向熊彼特型增长,驱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研究企业家精神得以激发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助力中国经济抓住窗口期实现成功追赶,可谓恰逢其时。

一、企业家精神与非正式约束的含义

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和(非正式)制度的概念都经历了各自的演进且日臻完善,为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奠定了基石。

(一)企业家精神的含义

历史上,古罗马、中古时期的中国、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均出现过为企业家的各种活动提供相对报酬的制度安排,尽管方式和目的各有不同。^①企业家一词源于16世纪的法语文献,起初带有冒险家的意思,1755年首次出现在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的法语版著作《商业性质概论》中,主要含义是强调企业家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19世纪早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 Say)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企业家的职能在于将土地、劳动、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并付诸实践。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中将理想的工业家所需的才能概括为“必须具有他自己行业中的物的透彻知识,能谨慎地判断和大胆地承担风险,同时必须是人的天生的领导者,以发挥他们内在的进取心和创造力”。^②这样的解释在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看来,只是将企业家职能看作是最广义的“管理”,并“没有把我们认为的主要之点表达出来,而这是使企业家活动与其它活动具体分开的唯一要点”,即“实现新组合”。^③1934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英译本出版,从书名可以看出,作者意欲探索经济发展的奥义,从社会运行方式层层深入,像剥洋葱一样将企业家精神从其它生产要素中抽离出来,彰显其在经济增长中无可替代的功能。同时,借用生物学术语,熊彼特提出创新像一种基因突变,产生于关键性的技术突破。自此,创新成为企业家内嵌的基因。

20世纪70年代,奥地利学派的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基于导师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学说构建起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在《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提出企业家精神表现为一种敏锐或警觉(alertness),这种敏锐使得企业家善于发现,创新来自于渐进、连续性的变化,而制度可以改变企业家的报酬结构,因此对于企业家活动的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④相比熊彼特提出了企业家会打破原有的均衡,柯兹纳则认为企业家有助于恢复均衡重建秩序。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成为研究企业家精神的代表性

① Baumol William J.,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893-921.

② [英]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50页。

③ [美]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86—87页。

④ 刘志铭:《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学术研究》2021年第7期。

经济学家。从企业家创造利润和收益结构的角度,鲍莫尔将企业家分为复制型与创新型,复制型企业家往往只能建立据他们所知已经存在的企业,而真正的创新型企业能够生产新产品和劳务,并改变原有的市场状况。其中创新型又可以分为生产性——经典案例如瓦特与博尔特的黄金组合——以及非生产性(或再分配性),如战争、寻租等,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性企业家,也是柯兹纳式企业家的再现。同时,鲍莫尔认同诺思的观点,相信制度在提升经济效率方面的核心作用,将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动的微观研究放置于历史、制度和文化背景下,认为这正是理解激励机制能够催生创新创业活动的关键。^①为更好地激发创新活动,制度尤其是非正式约束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二)非正式约束的含义

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②,包括人类设计出来的、用以型塑人们相互交往的所有约束。这里的制度包含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其中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非正式约束包括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习俗或惯例等^③,宪法章程和有关的道德伦理行为准则合为一体,构成制度稳定性的基础,两者共同组成的复杂而相互依存的网络即制度矩阵。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C. North)深入研究了制度或有效率的组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这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变量。对此,鲍莫尔和诺思均认可两种规则之间相互作用,具有双向关系,共同构成激发创新的制度环境。成功激发的要义在于形成稳定的收益结构,保证该项活动实现报酬递增和有利的相对价格变化。这里的报酬递增可以体现出更广泛的语义,而不只是经济报酬,还可以表现为社会地位提升等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后者在下文关于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精神的阐述中将得到印证。

在两种规则中,正式规则为社会和经济提供了秩序,然而,即便是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型塑选择的约束中很小一部分(尽管非常重要)。事实上,非正式约束普遍存在,行为规范和惯例界定了人们的绝大多数行为。^④企业家精神领域也是如此,作为激发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前提,非正式约束的行为准则与正式的法律规则同样重要。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相互强化,正式规则将导致一系列非正式约束的产生,非正式约束修正、补充正式规则,并将其延伸至各种具体的应用领域。^⑤非正式约束从何而来?来自于社会传递的信息,并且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这里的文化传承可以包含如社会风尚、道德伦理、习俗惯例等多重背景,人们身处其中深受影响,逐渐形成群体性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下文将通过考察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激发企业家精神的非正式约束,探寻其激发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理。诚如诺思所言,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得到启示,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① 邢源源、陶怡然、李广宇:《威廉·鲍莫尔对企业家精神研究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5期。

②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7—228页。

③ [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第4、56页。

④ [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第43—44页。

⑤ [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第112页。

二、英国工业革命前夕的企业家精神

工业革命^①是经济史上生产力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为完整探究企业家精神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将考察时间回溯至工业革命前夕(1640—1740年),而非传统的工业革命期间(1760—1830年)。那么在这段时期是否已经产生经济增长?是否出现了企业家?他们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帮助企业家成就了自己?

这段时期,当时社会的非正式约束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的演变和开化,教义越来越呈现出世俗化与商业化,教徒追逐财富成为正当行为具有合法地位,加上脱胎于庄园制成功转型的绅士—农业资本家,共同组成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力量,为后来工业革命的开启提供重要前提。这种推动作用如何产生的?是否得益于宗教改革带来的改变?是否如孟德斯鸠所说,英国“在三件重要的事情上远比世上其他民族都要来得先进,那就是信仰、商业与自由”?他们在营利领域上的优越性会不会是和孟德斯鸠所称许他们的那种虔信程度有所关联呢?^②本文将尝试从非正式约束的视角来阐述这些问题。

(一)新教伦理中的商业精神

在非正式约束中,社会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文化中,宗教信仰占据主导地位,影响当时人们基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惯例。韦伯曾经观察过宗教信仰混杂之处的职业统计,发现近代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悉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较高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进而就此提出了一个历史问题:经济上最为发展的地区为何会对宗教革命具有如此强烈的倾向?^③因此,研究当时激发企业家精神的非正式约束,新教伦理是符合逻辑的起点。

继韦伯之后,经济史学家托尼也认为,宗教改革中卡尔文教派的教义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最终影响了现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精神。当卡尔文教义中“天职”(calling)^④一词的含义演变为信众通过尽其所能地从事各种体面正当的职业以实现力所能及的成功来信奉上帝时,就相当于承认了商人和企业家的合法性,认可他们和工匠、律师一样属于上帝的选民。

对于商人而言,从事天职意味着谋取利润,为了成功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随着这一观念的普及,整个社会便开始将这种成功,特别是获得更广泛认可的工商企业经营成功,视为比中世纪乃至中世纪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合乎社会需求的目标。在这种目标下,如何使用利润就成为一个问题。如果将财富用于挥霍无疑会因过于贪婪而招致谴责,显然,正确的做法莫过于将利润重新投入生产扩大规模,使企业家能够更多地从事创新活动,进而持续增加产能,更好地履行“天职”。^⑤在这种社会心

① 囿于篇幅和主题,本文着重讨论第一次工业革命,即1760—1830年间率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

②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22页。

③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第9—11页。

④ 天职一词原意是指教徒的命运生来注定,竭尽一生也无法改变,这样的教义即使最虔诚的卡尔文教徒也难以接受,一个多世纪以后,逐渐演变成从事正当职业就可以表达对上帝的信仰。

⑤ [加] 约翰·芒罗:《托尼世纪(1540—1640年):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之源》,载[美] 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尔、威廉·鲍莫尔编著:《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姜井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第147—148页。

理的驱使下,新教徒以信仰的虔诚来从事俗世里的经营活动,使得信仰与商业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领域产生了交集,且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

在通往商业自由的漫长道路上,利润持续增加不仅带来规模经济,而且产生了资金合理使用和周转的需求,财政改革通过降低法定利率上限实现了这一功能。^①13世纪20年代,出于对教会将高利贷视为罪行的恐惧,越来越多的商人宁肯以低得多的回报购买市政府的年金。1251年,教皇规定长期公债或年金不属于贷款,可以免于高利贷律令的约束。17世纪,英国议会降低了法定利率上限,明确可永久筹措的国债能够以年金为基础。这样,财政改革在大幅降低借贷成本的同时,也解除了教义对社会价值观念的束缚,尽管这一转变直到17世纪中叶才实现。此后,借贷工具创新和金融市场改革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商业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开辟了道路。

(二) 绅士—农业资本家

农业是当时英国社会的主要产业,绅士们管理庄园附属领地已变得非常普遍,并以此获得稳定的租金。事实上,早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确实经历了大量可耕种土地转移到更有可能、更有能力且显然更愿意从事不动产管理的创业行为的人们手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均为清教徒。^②英国绅士身上已经体现出了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比如践行“新耕作法”、引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混合畜牧业等新生产方式,这种创业精神和逐利动机迥异于军事导向的传统贵族。

上述转变特别是轮作技术的大量普及使农业生产率大幅提升,不止如此,轮作技术的大规模使用需要资本,这也是绅士—农业资本家经营和管理才能的重要体现。伴随大量土地转售,资产抵押成为贵族最常使用也是最为挥霍的财富增值方式,贵族远比普通商人的债券来的安全,土地抵押成为创业资本的主要来源。^③绅士们有胆识发现并把握时机,正如萨伊所说,将土地、劳动、资本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并付诸实践,再加上使用新技术,实现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新组合。

这些曾经生活在封建庄园里的世袭贵族之所以能够顺利转型为商业企业家,也得益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宗教改革和财政改革使得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时代终于过去,取而代之的是绅士—农业资本家和富有新教徒精神的早期企业家,在1640—1740年这一重要世纪,英国确实得天独厚,拥有大量实践创新型、高效多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创业企业家。正是这一系列的创新创业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奏响了序曲。

三、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企业家精神的非正式约束

工业革命通常被视为欧洲现代经济增长的开端,也被经济史学家看作是经济史的分水岭。工业

① 财政制度作为正式经济制度,不属于本文着重分析的非正式约束,只是考虑到财政改革成功解决了困扰新教徒多年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中高利贷的合法化问题,为商业精神的释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这里对此加以阐释,作为新教伦理在经济增长中承担重要角色的补充说明。该部分内容参见 Munro John H.,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Usury, Rentes, and Negotiabilit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03(9): 505-756.

② [加] 约翰·芒罗:《托尼世纪(1540—1640年):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之源》,载[美]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尔、威廉·鲍莫尔编著:《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姜井勇译,第162页。

③ Stone Lawrence., "The Anatomy of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48, 18(1/2): 1-53.

革命时期的非正式约束如社会环境、声誉机制、社会网络等均已成为日后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有效地激发了企业家精神。

(一) 日益开化的社会环境

工业革命前夕,文化信念就已经表现出其重要性,大批受绅士精神鼓舞的农业资本家促进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事实上,在工业革命开启前的100多年里,英国制造业和服务部门的进入壁垒和排他性安排就已经被打破,或者因违反这些规则的行为而受到削弱。此外,它是一个凭借可靠信息和可置信承诺能够使彼此互不相识且利益冲突的人们进行交换的社会。^①这种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机制和交易方式是当时英国社会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有效降低了商人和企业家之间的交易成本。

在18世纪的英国,制度环境正如诺思所言,日渐成为鼓励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发展的有利因素。以财政制度为例,彼时英国的税负并不轻松,然而民众并未感到被严苛的政府管理所制约,社会经济越来越接近自由放任的状态。相较于其它国家,英国政府为勇于创新的企业家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以致于经济成功能够带来社会尊重,企业家追求财富的行为得以实现社会地位的跃迁。阶层的流动性和上升的可能性使得整个社会充满活力,结果便是促进了推动工业革命的少数经济精英的成长,而精英们的榜样又深刻影响着追随者的价值观与态度。^②这样一来,拥有企业家精神的群体将人力资源和制度环境相互补充,并将整合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当这种优势置于历史的长镜头之下,就可以印证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精神总是在特定时期成群涌现,即新组合并非在时间上均匀分布,而是一旦出现,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出现。

(二) 绅士-企业家(gentleman-entrepreneur)文化

作为一个数量可观的新兴阶层,绅士企业家的兴起背景和交易方式使得彼此之间具有共同特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足以支持创业活动,为降低交易费用起到关键作用。如果说一个社会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黏合剂^③,那么“绅士-企业家”文化正可谓当时英国社会经济保持凝聚力的黏合剂。

1. 行为准则

绅士文化可以追溯至封建时代和中世纪贵族阶层,当时的绅士更像是地主乡绅,拥有充足的闲暇,血统高贵且值得信赖。18世纪初,绅士可以经商观念日渐普及,阶层与财富之间的界限已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成为一名成功商人也意味着成为新的绅士类型。绅士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大大丰富了,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们都能够依靠自身努力跻身这一群体。当然只有财力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想像成潜在的贵族,按照绅士的行为规范要求,自觉遵循一套具有绅士风度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包括言行一致、廉洁公正以及恪尽职守。当时,具有绅士声望本身

① [美] 乔尔·莫克尔:《企业家精神和英国工业革命》,载[美] 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尔、威廉·鲍莫尔编著:《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姜井勇译,第247页。

② Mokyr Joel,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98: 26-27. <https://faculty.wcas.northwestern.edu/jmokyr/monster.PDF>.

③ [美]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第55页。

就是商人最重要的无形资产,绅士本人必须正直诚实,而且能够泛化为一种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①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如勤勉、坦诚所蕴含的文化传播能降低交易费用,并促成复杂的、生产性的交换。这种传统又会为支撑这种态度的意识形态所强化。^②由此,绅士-企业家文化与社会规范之间形成有效的正反馈机制,两个相互信任的陌生行为人之间的合作能够达成可置信承诺,而且能为所有人创造一种正外部性或社会网络效应。

2. 社会网络

绅士-企业家文化的社会网络效应是如何形成的呢?工业革命时期,真诚作为一种品质越来越受到重视,使得商业和信贷交易的合作均衡得以实现。具备这种品质的绅士之间易于产生信任,还可以将声誉信号从社会交往转移到市场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合作均衡。随着商品交易持续开展,共同的价值理念和信任纽带仍可以将这种合作维持下去,即使在法律规章临时缺位的情况下,争议也能得到解决。这也验证了诺思的观点,非正式约束的行为准则与正式的法律规则同样重要,非正式约束修正、补充正式规则。合作使得新晋商人们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激励他们的社会回报除了财富,还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声望,足以冲破旧日人们之间阶层与金钱的界限,也使人们在经济利益和行为方式之间建立联系,笃信财富很大程度上可以来自于良好的声誉。

特殊的成长经历使得绅士-企业家们面对社会报酬会产生不同的偏好,更注重文明行事、信守承诺,而不同于工业革命前夕的逐利行为。在这种交易氛围里,绅士-企业家们预设了对方也会采取守信行为的情境并通过实践加以验证,当足够多的人们遵守这种行为准则时,交易的对象、范围和时间等均已不再构成要素流动和信息沟通的障碍。绅士-企业家精神成为一种特定的非正式约束,它通过社会网络凝聚而成,促进了英国市场的整合以及不久之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尽管这个市场可能未直接催生工业革命,却是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补充。^③绅士企业家们规范的行为准则和信念模式使得他们的行为在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将正直、诚实、守信等个人品质泛化为一种非正式约束,形成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企业家赖以生存的社会网络。

在社会网络的作用下,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企业家更像是一套共同价值体系中的一分子,绅士准则内嵌的信任是有效市场的基本构成要素,营造了企业家精神所需的社会环境。良好的信誉和成为企业家的概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更值得信任。^④进一步的,信任机制和道德准则在市场经济中不仅形成社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替代法律,使得秩序成为一种维护社会规则的独立存在。

3. 社会回报

企业家精神激励的成功与否与企业家得到的回报直接相关。绅士-企业家的努力是否得到了

① [美] 乔尔·莫克尔:《企业家精神和英国工业革命》,载[美] 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尔、威廉·鲍莫尔编著:《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姜井勇译,第251-252页。

② [美] 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第164页。

③ [美] 乔尔·莫克尔:《企业家精神和英国工业革命》,载[美] 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尔、威廉·鲍莫尔编著:《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姜井勇译,第256页。

④ Guiso Luigi., Sapienza Paola., Zingales Luigi., "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20(2): 23 - 48.

相应的回报?答案取决于回报的含义。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随着社会阶层的流动与上升,功成名就与自我实现也被视为精神回报的重要内容,成为绅士—企业家的潜在激励。这种精神回报所带来的社会声望和内心满足无疑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以至于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曾提出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不过,虚荣总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自己是被关心和赞赏的对象的基础上。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他成为公众注视的中心人物,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①绅士—企业家们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迫切需要得到社会的接纳和尊重,如同刚刚挣脱传统教义束缚的新教徒想要获得经商权利的合法性,单纯利润回报显然无法实现这一功能。通过个人努力跻身主流社会赢得社会声望,这在以前的社会制度是无法想象的,工业革命时期的信念模式给予绅士—企业家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愿景,如同一架看不见的梯子,召唤他们全力攀登,无怪乎为之付出的种种奔波、疲惫、焦虑都是值得的。

熊彼特曾经分析过企业家精神中非享乐主义的心理动机。企业家普遍怀有这样的梦想和意志,借助事业的成功得以企及最接近于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领主的地位,对于没有其它机会获得社会声望的人而言,这样的诱惑难以抗拒。企业家存在征服的意志,证明自己的冲动,金钱的多少是次要的考虑,成功的炫耀性功能才是更重要的驱动力。^②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作为一种非正式约束,给予企业家相应的社会回报,形成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将成为企业家成群涌现的理想环境。

四、借鉴与启示

英国工业革命时代,无论是之前新教伦理中“天职”与财政改革所释放的商业精神,还是后来绅士—企业家的行为准则、社会网络与社会回报所确立的社会规范与习俗惯例,更不必说绅士—农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接近自由放任的社会环境,均作为非正式约束为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新一轮工业革命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改革正处于关键时点,企业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有目共睹。值此历史时机,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激发企业家精神,营建适合企业家精神生长的社会环境,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一) 传承诚实守信,恪守行为准则

工业革命时期,绅士—企业家诚实、正直的品质成为这个群体默认的行事方式,这种非正式约束有效降低了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费用,增进了信息和要素的流动性。绅士—企业家履行经商的职能,他们像鸟类爱惜羽毛一样注重声誉,既严格检视和控制自身言行,又通过共同努力将此泛化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公约,为新兴的企业家阶层赢得令人称许的社会声望。

① [英]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0—62页。

② [美]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第103—104页。

中国的企业家同样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传统的儒商文化赋予现代企业家“士魂商才”的品格特质,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约束对于促进企业发展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①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积淀和延续,历史上商业文化传统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现代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创业活动的发源地,形成典型的路径依赖现象。如同绅士-企业家精神的非正式约束在市场活动中起到的促进作用,传统商业文化传递了一种合作意识或观念,使陌生人之间的交易成为可能,有效扩大了商业交往的社会网络。^②这种传统商业文化与英国的绅士-企业家精神异曲同工,以特定的行为规范和惯例界定了人们的交易行为,形成有效激发企业家精神的非正式约束。

时至今日,企业家群体对诚信精神高度认同。调查显示,从2003到2022年,在“最喜欢/最不喜欢”的企业家特征中,“信守承诺”和“不守信用”分别高居榜首。^③诚信精神成为企业家在商业社会的通行证,诚实正直、恪守契约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表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无远弗届的商业环境里,诚信已从双方互信拓展为多方信任,形成社会网络效应。遵守承诺不仅是中国古代商人自我约束的训诫,更应该成为新一代企业家秉持的精神守望。唯有如此,作为时代的创新者,企业家才不只是制度逻辑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企业创新和社会创新活动来传承或重构这些制度逻辑,进而带动全社会道德素养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者。

(二)明确自我定位,履行社会责任

工业革命时代的绅士-企业家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中假设的经济人,相比财富,他们更在意社会认同,渴望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尊重,即使带有一点虚荣心和炫耀感,为此不惜放弃舒适和闲暇。对于企业家而言,追求社会认同意味着明确自我认知,理解企业家这一角色蕴含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如同一位18世纪的绅士会自觉遵守一套符合声誉的行为规范和行事标准,并以与之匹配的言谈举止发送出可置信的交易信号。真正的企业家在创业伊始已经完成了身份认同,在生产和经营中积极践行与社会角色密切相关的认知和行为准则,并且发自内心的接受并履行该身份角色的社会职责。因此,自我定位清晰的企业家能够因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满足了社会需求而体会到工作的意义,进而完成自我身份建构和自我价值实现。^④正如熊彼特所说,他们还受到创造的乐趣、完成工作的成就感和解决问题的胜利感驱使。

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阶层,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在日益提升,而数字经济时代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提出了新要求。衡量企业家成功与否的标准更多在于能够为社会带来多少福祉,而不仅仅是可以获得多少投资回报。德鲁克曾将“行善赚钱”(do well by doing good)视为21世纪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内涵,也就是通过创造对社会有益的商业活动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责任成为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标志性内涵。^⑤企业家需要在社会责任与自我价值之间实现平衡,通过自

① 李晓磊、张玉明:《儒商特质的企业家精神能“御风而行”吗?——亲清政商关系的调节作用》,《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② 邵传林:《中国商业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传承机理与实证检验》,《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③ 李兰、王锐、彭泗清:《企业家成长30年:企业家精神引领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中国企业家队伍成长与发展30年调查综合报告》,《管理世界》2023年第3期。

④ 张志学:《新时代企业家群像及企业家精神》,《人民论坛》2021年第26期。

⑤ 陈春花、尹俊:《新发展阶段的中国企业家精神》,《人民论坛》2021年第16期。

我身份建构完成社会身份认同,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赢得社会尊重。

(三)优化营商环境,倡导包容精神

如果将宗教改革和财政改革对新教徒精神的解放,使商业活动合法化视为社会规范的优化,工业革命期间接近自由放任的社会氛围更是企业家精神蓬勃生长的适宜土壤。在任何时代,开明包容的创业环境均是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必要条件。

近年来,我国的营商环境逐年得到优化,多元化、包容性的文化氛围对于培育企业家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宽松的约束条件使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激励企业家将资源集中在真正具有发展潜力的创新活动上。此时,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有助于弱化企业家的寻租动机,逐步形成合理的相对报酬结构,促进企业家更多地投身于生产性活动和研发活动中。^①由于创新过程面临的各种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一个社会的知识总量中通常只有一部分能够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其余的则如同被过滤掉而无法被企业家用来实现商业化。^②因此,应致力于营造宽容、开明的社会规范,打造适宜企业家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积极发挥非正式约束的作用,为企业家从事生产性活动创造条件。当企业家成群涌现,企业家精神充分释放,来自经济增长的繁荣将会实现。

责任编辑:侯德彤

Rol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Inspiring Entrepreneurship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Gao G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is a primary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ntrepreneur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productivity growth. In retrospect, it is easy to realize that the achieve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depended on a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informal institutions to a great extent. The commercial spirit coming from protestant ethics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bordering on laissez-faire and the reputation and social network of gentleman-entrepreneurs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needless to say, the social returns from the self-expectation of entrepreneurs, are all prerequisite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Today, China's economy is experiencing a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in order to better encourage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 useful lesson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 be tha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integrity, assum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centive rol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inspiring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informal instituti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gentleman-entrepreneur

① 齐结斌、安同良:《企业家精神、寻租活动与企业研发投入》,《华东经济管理》2014年第5期。

② 周大鹏:《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的熊彼特型增长转型》,《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论析

聂志平

浙江师范大学 语言研究所 /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索绪尔将“界定自身”即明确语言是什么看做语言学的第三个任务;将课程分为个别语言、语言和言语三个部分,并用图示说明言语行为、语言与言语的关系,提出了语言与言语的不同模式;将符号的构成明确为能指和所指,充分地论证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条性、具体实体与抽象实体、相对任意性与绝对任意性,以及为任意性所决定的社会性强制性、可变性与不变性,将博杜恩的静态与动态改造为共时与历时,认为这种区分是由语言符号的性质所决定的;将克鲁舍夫斯基的邻近性联想与类比性联想改造为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使之成为语言系统的结构关系的体现,认为符号是什么取决于系统中的关系,并奠定了音位学的基础。索绪尔以此建立了科学的语言符号学,并奠定了普通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索绪尔;现代语言学;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史

中图分类号: H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4-0121-20

现代语言学、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最主要奠基者索绪尔的世界影响,主要来源于根据学生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即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始于1910年10月28日,结束于1911年7月4日,按时间记录来看,每周有周二和周五两次课,整个课程持续8个多月。从刊出的孔斯坦丹的笔记来看,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与第二次教程在课程内容和安排顺序上,有很大不同,反映了索绪尔对自己语言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进一步思考。孔斯坦丹的笔记,是沙·巴利等编辑《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本/1916年)时所未见的材料。“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笔记版国内有张绍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和屠友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两个中文译本,本文以张绍杰译本为依据。

根据《普通语言学导论》^①记载,从起止时间来看,索绪尔的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课比第二次课程多7次课;除了“印欧语言学概要”部分(两次课程笔记刊行本均未收录)以外,目次上与第二次课程有很大的差别。最为明显的是索绪尔在课程开始阶段对语言学史进行了回顾并明确了语言学的三个任务,将课程主体部分分为“个别语言”“语言”和“个人的言语机能及其运用”(亦即“言语”——笔者注)三大部分,并将第二次课程中放到最后一部分的“印欧语言学概要”,前移到第一部分即《个别语言》之后,作为对个别语言的具体介绍;然后再从普遍性角度,论述与言语相对的、对个别语言本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研究”(16NDJC040Z)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聂志平,男,黑龙江富锦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理论和现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导论》,于秀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质和普遍属性进行概括而形成的一般语言;最后阐述对语言的运用。尽管由于学期结束,第三部分即言语语言学部分没有来得及讲授,但课程的整体设计表明,索绪尔对于普通语言学课程建设以及对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思考,更为成熟。

一、关于《序章》和课程主体的说明

《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的《序章》包括两部分内容:(一)语言学史一瞥,(二)语言学的题材及对象或任务。内容及排列顺序与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①基本一致,对应着后者《绪论》的《第一章 语言学史一瞥》《第二章 语言学的材料和任务;它和毗邻科学的关系》《第三章 语言学的对象》和《第四章 语言的言语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以下分别说明。

(一)语言学史一瞥

索绪尔把语言学史分做三个阶段:语法阶段、语文学阶段和历史比较语言学阶段。“第一个阶段即语法阶段,……偏重于逻辑。全部的传统语法都是规范性的,即注重订立规则,区分什么是正确的用法,什么是不正确的用法。”^②第二个阶段是从十九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现代的语文学,它以文献考订为主要方法,但由于语言不是其唯一的对象,因此“这还不是语言学的精神”;“第三个阶段,……这是一个发现不同语言可相互比较而引起轰动的阶段”,在葆朴(1816年)之后的30年里,学者们缺乏正确的语言观,尝试逐一比较不同的印欧语言,“差不多到1870年,他们还沉迷于这种游戏而没有关注影响语言生命的条件”^③。而真正形成关于语言的历史观念,是在狄兹所开创的依据于丰富文献的罗曼语言研究之后,“通过各种文献逐世纪地探究所研究的语言”,但“这种历史观最大的缺点之一,是对书面语的依附达到了卑躬屈膝的程度”^④。

与第二次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相比,第三次课程单列了标题并做了分段,明确表述为《语言学史一瞥》,而且讲得更细致一些;与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相比,后者阐述得更加细致,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评论更加详细,并且提到了1875年对语言观问题“发出第一次冲击”^⑤的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的《语言的生命》(即《语言的生命和成长》——笔者注),使笔记版中的“1870年”这个时间节点的语言学史意义更加明确。但也有一处明显不同:

早在亚历山大里亚就曾有一个“语文学”派,不过这一名称现在主要是指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在1777年起所倡导,目前还在继续着的学术上的运动。^⑥

而在笔记版第三次课程中表述却与之不同:

从19世纪初开始,如果我们涉及主要运动(不考虑先驱者),〈亚历山大里亚的语文学派〉),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2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3—4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24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7—18页。

(才出现〈2〉)古典语文学的伟大语文运动,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时代。1777年,当时还是学生的弗里德里奇·〈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August〉Wolf),就希望别人称他语文学家。^①

很明显,10年后即1787年才发表主要作品的沃尔夫^②,当时作为学生,是不可能学术成熟到“倡导”学术运动的,因此,笔记版第三次课程中的表述是正确的,而通行本中的说法是错误的。据称根据最后一版即法文第五版翻译的裴文译本^③仍没有纠正这个错误。看来,这个错误应该是来自沙·巴利等编辑者的失误。

(二)语言学的题材及对象或任务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科学研究将把每一种人类语言看作它的题材”,“研究每一时期的语言及其全部的表现形式”,“语言学家要始终把书面文献同书面文献的内涵区别开来;把前者仅仅看做它的真正对象即唯一的口头语言的外壳,或外部表现形式”^④。

索绪尔对语言学的对象或任务,提出以下3点:(1)“探究所有已知语言的历史”; (2)“必须从所有语言自身的历史中推衍出具有最大普遍性的法则。语言学必须确认在语言中起着普遍作用的法则,并以一种严格的理性方式从那些局限于一种或另一种语支的现象中分离出普遍的现象。此外,还有特别的任务,涉及语言学和各门学科的关系”; (3)“语言学的目的之一,是界定自身,确认什么是属于它的领域”^⑤。在第二次课程中,索绪尔没有明确提及语言学的对象或任务。因此,第三次课程中索绪尔对语言学任务的确定,是索绪尔语言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在通行本中对语言学的任务是这样确定的:

(a)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那就是,整理各语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

(b)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

(c)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⑥

除了“涉及语言学和各门学科的关系之外”,对于语言学的任务,通行本与第三次课程基本一致,而表达更为全面、清晰而明确。

在语言学史上,较早明确提出语言学的任务的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对语言科学和语言的若干原则性看法》中,博杜恩明确地说:

语言学如同归纳科学一样:①概括语言现象。②寻找在语言中起作用的力量及其语言发展、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2页。其中的[]〈〉和下划线等符号为原书中所标,下文中均是,不注。

② 参见[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7页。该页校注:“沃尔夫(1759-1824),德国文学家和语文学家,精于希腊罗马的文学和语文学,主张尽量用与文物有关的资料解释语文问题。他的重要著作有《罗马文学史》(1787),《荷马序论》(1795),《语文学百科全书》(1831)等等”。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4—5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5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26页。

生活的规律。^①

从索绪尔对于语言学任务的表述中,可以看出索绪尔对博杜恩思想的继承与发展:(b)是直接沿用博杜恩的观点^②,而(a)和(c)是索绪尔的发展,(a)相对于博杜恩的第一点,更加具体、全面,包括语言的描写与历史,亦即共时态与历时态两个方面,——把“描写”补充进语言学任务的第一项,应该看作沙·巴利等通行版《普通语言学教程》编辑者的补充,他们的努力使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更加完善;而(c)博杜恩没有提出,索绪尔明确地把弄清语言是什么也看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

(三)关于课程主体的说明

在对课程主体的说明中,索绪尔明确地把课程要阐述的内容分作(1)个别语言、(2)语言和(3)个人的言语机能及其运用三个部分,并作了说明。

索绪尔开宗明义:“倘若不直接区分语言和言语两个术语,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具体的、〈完整的、〉整体的语言现象?”“在每一个体中,存在着一种机能,可称为分节语言的机能。这种机能首先是由器官赋予我们的,其次是通过我们使用器官所进行的活动获得的”,但要利用它,没有外部赋予的语言是不可能的;“通过区分语言和言语机能,我们区分:(1)什么是社会的和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本质的和什么几乎是偶然的”,“概念和声音符号的结合就足以构成整个语言”^③。语言是一种社会产品,是一种储存在每个人大脑中的宝藏,但在任何个人的大脑中都不会是绝对完整的;“言语总是通过个别语言来表现自身的,没有言语,语言就不存在。反之,语言则完全独立于个人,它不可能是个人的创造,其本质是社会的,并以集体为前提”^④。索绪尔同意惠特尼把语言看做社会惯例的观点,认为惠特尼真正“关注影响语言生命的条件”^⑤,是对语言本质认识的一大进步,使语言学真正走上了语言本身的探索之路。但索绪尔认为一般的社会惯例同语言有着很大的区别:第一,没有任何其他一种社会惯例会像语言一样涉及所有的人;第二,大多数社会惯例受意志制约,可以被改正。索绪尔认为所有的惯例都以符号为基础,语言是所有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系统,符号系统属于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

“人类的语言总体上表现为无限种个别语言”,“我们被赋予的不仅是语言,也是各种不同的个别语言”^⑥;语言学家必须尽可能多地研究个别语言,从中抽象出本质的和普遍的东西,这就是语言,“个别语言在这个地球上给语言学家提供了具体的对象;而‘语言’是我们给语言学家从他超越时空所观察到的全部现象中抽象出来的那些〈普遍概念〉所提供的名称”^⑦。索绪尔所说的“个别语言”,即不同民族使用的具体语言,索绪尔用一个复数形式 les langgues;在第一部分“个别语言”的理论分析后,索绪尔还用跨度4个月的时间描述种种具体语言(“印欧语言学概论”)。这些具体语言中所包含的本质的普遍特征,就是跟“个别语言”相对的一般语言,亦即“语言”,索绪尔用一个单数形式来表

① [波兰]博杜恩·德·库尔内:《普通语言学论文选集》(上),杨衍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21页。

②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8页。

③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页。

④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2页。

⑤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1页。

⑥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3页。

示: la langgu。人们彼此通过说话来进行交际,所运用的就是各种具体的个别语言(les langgus),而从整个人类来说,人们彼此交际,亦即言语,必须运用语言(la langgu),亦即概念和音响形象构成的符号系统。

课程的第三部分,是“观察言语行为是怎样在个体中活动的”,“揭示出潜在于个人机制下面的是什麼,个人的机制最终不能不对普遍的产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产生反响”^①,研究“言语技能的运用”,或者简单地说——对言语的研究,这部分内容最终由于学期的结束而没有能够实现,索绪尔给语言学史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尽管索绪尔没有完成全部课程,但这部分关于课程构成的说明,也使我们得以明了索绪尔对语言学理论体系成熟和完整的思考,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认识递进的逻辑层级(见图1):



图1

二、关于个别语言

《第一部分 个别语言》包括四章:《第一章 个别语言和地理差异,这种差异的不同种类和程度》《第二章 论可能使地理差异复杂化的不同事实》《第三章 从产生的原因看语言的地理差异》《第四章 用文字表现语言》。这部分内容在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被分列三处:前三章主体被编入通行本《第四编 地理语言学》,一部分内容被编入《绪论》中的《第四章 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而《第四章 用文字表现语言》主体被编入《绪论》的《第六章 文字表现语言》,一小部分内容编入《绪论》的《第七章 音位学》(还有部分内容也见《附录 音位学原理》)。

《第一部分 个别语言》可以再分为两部分。前三章为一部分,第四章为一部分:前者是索绪尔从一般人眼中语言的显而易见的差别入手,从不同地方人们说话的不同入手,用语言在地理上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语言在时间中的连续性和变易性两个理论角度,从外部来解释具体语言的差异,认为的具体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是语言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在不同地域上的反映;后者论述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前三章所反映出来的语言学思想,从近年出版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来看,早在1891年以前就形成了,它体现在索绪尔到日内瓦大学后所做的三次讲座^②中。而第四章的主体即音位学部分,按通行本《附录 音位学原理》“编者说明”说:“这一部分,我们利用了索绪尔于1897年所作的关于《音节理论》的三次讲演的速记记录……此外,他的个人札记有一大部分是跟音位学有关的;在许多要点上阐明和补充了第一度讲课和第三度讲课的资料”^③。从中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2页。

② 这三次讲座收录在[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于秀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36—163页,被编者拟了三个题目“日内瓦大学第一次讲座(1891年11月)”“日内瓦大学第二次讲座(1891年11月)”“日内瓦大学第三次讲座(1891年11月)”。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67页。

可以看出,索绪尔的课程内容来自多年的学术沉淀。

(一)个别语言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地理差异是引起语言学家和一般人首先注意的东西,而时间上的语言变易容易被忽略,方言是具有特点的语言,自然语言只有方言;语言是构成民族的主要特征;人们注意到个别语言的差异进而开展比较,逐步形成了关于语言学的普遍概念,才产生语言学;语言的差异导致了对语言相似性的认识,产生亲缘关系的概念,形成了亲缘关系内的差异和亲缘关系外的差异两种范畴,进而形成语系等分类;而语言的统一则是一种主流语言向一定地区的延伸扩张,吞并了其他语言,使本来讲其他语言者讲主流语言,常见的情况是殖民主义者或外国征服者的语言强加于本地居民的语言之上;某一国家或地区语言的共存具有地方性,但界限不总是分明的。索绪尔认为,民族共同语“满足整个民族可以做工具的需要……可能是最发达省份的方言,或者最强大省份的方言,或某种权威、某一政府所在地的方言,或某一王子宫廷的方言”,“这种成为文学语言的方言,很少保持它的纯洁性,因与其他省发生联系而成为复合性的语言”^①。

在地理上分离的某一段时间之后,语言就会产生一些差别,“比如 500 年或 1000 年以后,在同一地域相反的两头,人们可能再也听不懂相互之间的交流,可另一方面,处在任何一点上,人们仍可以理解整个邻区间的交谈”^②。索绪尔认为,“这不是空间现象,而完全是时间现象。地理差别只有通过时间上的投射,才能完全从图表中表现出来。地理差别可以、也必须简约为时间上的差别,这种现象必须按时间轴来分类”^③。但索绪尔又说,“语言的形式在全地区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发生变化”,“革新只发生在一定限度的区域,这是最通常的情况,是产生方言差别问题的关键。每一革新都将有自身的区域”^④。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索绪尔前边认为语言地理上的差异“完全是时间现象”,说得太绝对了,应该是时间使语言产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因地理上原因而产生差异,这些差异的积累构成了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在地图上可以清楚地标出方言特征的分界线,具有相同特征的语言现象可以画成“等语线”,但“要画出某种方言的分界线是不可能的”,因为“有方言特征,但没有方言”^⑤。不同地域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方言或语言特征的交错性,方言或语言特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能选择认为是主要的特征来划分方言或语言。“任何方言都是其他两种方言间的一种过渡语”,“在所给出的图示中,我们所说的方言是封闭的,但最终在所有的地方只有开放的方言,这些方言是在连续的波浪中所形成的”^⑥。在对等语线和语言传播的认识上,索绪尔认为:“每个人类群体都有两种永恒的因素同时朝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1)乡土观念的力量,和(2)人类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⑦,前者是在有限的社区内发展形成的习惯,是促使语言分化的力量;后者是抵消前者、促使语言统一的力量。实际上,索绪尔所说的“乡土观念的力量”不过是“人类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的另一种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20—21 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28 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24 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26—27 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30 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35—36 页。

⑦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38 页。

或另一方面的具体表现而已,前者是内向的交际力量,后者是外向的交际力量,这样导致语言分化与统一的两种力量,实际上只是一种交际力量朝向两个方向的作用的结果。

索绪尔认为,语言在地理上的非连续性,都是通过迁徙而形成的,“如果没有人口流动,就没有两种相关语言的界限”^①;“不仅人口流动可能使中间地带的方言消失,文学和官方语言的影响也可能使中间地带的方言消失”^②。

(二)用文字表现语言

索绪尔首先说明文字只是语言的代表,但一般人认为文字比语言更具有权威性。索绪尔分析其原因,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符号系统,文字系统是为语言服务的,是语言的形象,“这种形象在我们的心智中与事物密切相连,使得它占据了主要位置,这就好像一个人的照片用做证据,竟被视为比那个人的容貌更可靠一样”^③,因为:第一,由文字固定下来的词的形象,给人的印象是永恒的、实在的;第二,一般人由于文字的视觉形象是固定的有形的,进而认为它优先于声音形象;第三,由于文字构成书面语,在人们的观念中,书写的词与正确的词密切联系;第四,当语言与书写不一致时,人们会选择书写的形式。正字法不能精确表音,可能是传统的字母表中缺少字母,但主要原因是语言的历时发展。索绪尔认为“指望书写来解决语言问题,永远是徒劳无益的”^④,因为:“(1)书写会掩盖语言中存在的问题,非但不能帮助语言研究,而且成为某种障碍”;“(2)书写形式跟它应表示的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越少,把它当做出发点的倾向性就会变得越大”,“说一个音‘这样来发’,是把文字即形象看做基础”,“这种词的书写形式占主导地位”,“忘记了词的历史,忘记了语言的历史”^⑤。索绪尔提醒道:“如果文字是我们进入语言的手段,它就必须要谨慎地加以对待。没有文字,我们就不会有过去的语言,但是为了通过这些书面文献掌握一种语言,就需要给以解释。〈在解释每一种语言之前〉,必须建立这种方言的音位系统。”^⑥

索绪尔把文字系统分作两类:“(1)表意系统,试图表现词而不在乎组成词的声音,〈但目的的确是表现词,而不是概念〉,因此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符号唯一与它所包含的概念发生联系。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汉字”;“(2)表音系统,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复写下来。”^⑦“书写词优先于口语词的倾向……在表意系统中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在中国各个省都使用同一种符号,尽管这种符号的发音不同”^⑧。在表音文字体系中,索绪尔推崇希腊字母,因为它用一个符号表示一个音。

在这一部分中,索绪尔对音位问题的论述,也同样充满了真知灼见。

索绪尔首先申明对音位认识的原则:系统性。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以不可分析的听觉印象(f和b之间的差别)为基础的系统”,“重要的是听觉印象,而不是产生听觉印象的手段”;“构成语言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34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37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46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55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53—54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56页。

⑦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47—48页。

⑧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48页。

的不同的形式,是通过听觉印象所表现的种种结合,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提供了语言的全部装置。……我们可以把语言比做一套下棋的装置,除非可能产生对比的价值,否则,这跟我们知道棋子是用什么材料(象牙、木头)做的没有多大关系”^①。

索绪尔指出,音位切分要从听觉印象入手,如果切分出来的成分“像其自身并与它们相邻的切分成分不同时,我们就获得了听觉链条上的最小切分成分”,“对这些完全建立在彼此差别基础上的单位,希腊人创造了标示的符号”;“音位既是由一组发音动作,同时也是由一定听觉效果所构成的,在我们看来,音位就是言语链条上诸多的切分成分”,“从抽象意义上说,它处于时间之外。我们可以把f作为f类来谈,把i作为i类来谈,集中在它的区别特征上,而无须考虑与时间的连续性有关的东西”^②。这说明,索绪尔认为音位是根据相互差别从言语听觉印象链条上切分出来的最小听觉印象成分,它是处于时间之外的彼此具有区别性的类别,是功能性的单位而非物理性的语音实体,而处于具体言语中、处于具体时间中的,是这个类的表现;因此,“精确地记录语音并不是非常可取的”,“使用一种符号表示每个切分成分,每个切分成分用一种符号来表现,这是必要的”^③;——这正是音位文字的制定原则,也是索绪尔推崇希腊字母的原因。索绪尔甚至认为:“通过习惯的力量,书写的词最终要变成表意符号,这种词具有整体的价值,〈独立于它所构成的字母〉。我们用两种方法读:拼读出熟悉的词和读出一见就认识的词。”^④也就是说,随着语言的发展以及与正字法的不一致,表音文字会失去某些表音的理据,“拼读出熟悉的词”是“拼读”,即按构成词的书写字母来读,“读出一见就认识的词”只是“读”,而字母形式的误导(表不同的音或不表音)被视而不见。索绪尔的看法很大胆,不过倒很符合他关于整个语言符号系统是在相对可论证性到不可论证性之间移动的说法^⑤。

对于音位的分类,索绪尔是从开口度角度来分类的,从开度零度到开度5共分6类,认为元音和辅音的差别不是本质的,它们之间没有外部界限,只是开口度的问题,因为口开得越大越要求声带振动协同;索绪尔把处于开口度变小或趋于闭合位置的音叫“内破”、处于开口度变大或趋于开大的音叫“外破”,认为音节是一个处于外破与内破之间的语音片段。

三、关于语言

《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的第二部分,是从普遍性角度来论述语言本体的,这部分内容构成了索绪尔语言理论的主体。这部分内容共分《语言》(未标章数——笔者)《第二章 语言符号的性质》《第三章 构成语言的具体实体是什么》《第〈四〉章 语言的抽象实体》《第〈五〉章 语言的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补充一些看法》《第四章(插入前一章后) 静态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语言学的二重性》《静态语言学》《第五章[原文如此]:要素的价值和词的意义,两者如何巧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60—61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62—63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1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1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84—185页。

合与区分》(标题采用原书中的说法)。这部分内容对应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中的《第三章 语言学的对象》《第四章 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第一编 一般原则》和《第二编 共时语言学》,共 85 页。

(一) 语言和言语、言语行为的区分

第一章《语言》,对应着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中的《第三章 语言学的对象》《第四章 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这一章用两次课来讲述,索绪尔区分了语言、言语和言语行为^①。在第一次课中,索绪尔认为在言语行为跨不同领域,区分语言和言语,因为语言是本质的、主要的部分,把语言剥离出来,就将“在与言语行为相关的事物中引入一种内部的秩序”^②,索绪尔描述了言语循环,区分了外部和内部、执行和接受、心理部分和物质部分、个人和社会,“这个社会的部分是纯精神的、纯心理的。这就是我们所想象的语言。……语言只存在于大脑之中”^③。

在第二次课一开始,索绪尔还补充下边的图示,用以说明语言与言语、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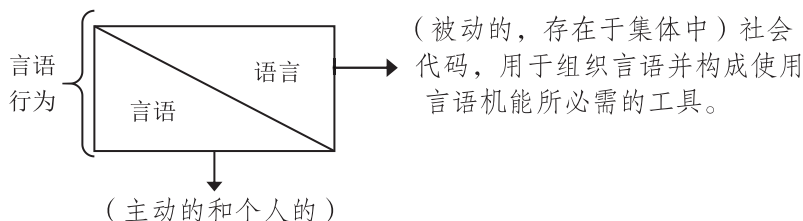


图 2

言语是“(1)一般以言语的产生(发音等)为目的的机能的使用;(2)也包括:为表达个人的思想、个人对语言代码的使用”^④。

而语言,索绪尔认为,(1)语言是从言语行为的综合中分离出来的可确定的对象,语言可能存在于言语循环中,即听觉形象和概念发生联系的领域,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语言可与其他部分相分离,一个人可能完全丧失言语却有书写能力,也是保存着语言,一种语言可能没有人使用,但它的机体仍然会保留字书面语中;(2)语言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3)语言是一种同质属性的对象,语言是符号系统,构成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4)语言尽管是心理的,但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存在于大脑之中,可以译成诸如视觉形象的固定形象,处于潜在状态的这些符号完全是现实的,一本词典和语法代表了语言中所包含的能被接受和恰当的形象;(5)语言是建立在听觉形象基础上的符号系统;(6)语言只能从言语中表现出来,为了达成语言的协议,必须具备数以千计的个人言语;(7)语言是言语行为中本质的、根本的部分,其他现象都处于从属地位,发音(言语)好像传递摩尔斯电码符号的电气部件,是非本质的,“〈语言可比作音乐作品〉,一个乐章只有在演奏的总和中才存在,演奏对乐章是无关紧要的”;考察语言的最好方法,是把语言作为出发点,作为“唯一的本质的事实”,而“考察言

① 通行本译作“言语活动”。参见[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30、31、115页。

②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3页。

③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6页。

④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7页。

语部分的最好方法,是把语言作为我们的出发点”^①。索绪尔还认为句子是语言与言语的混合物,“在句法中,关于什么是语言中所给定的,什么是赋予个人创新的,才存在某种程度的模糊性,其界限是难以划定的。〈这里必须承认〉在句法领域社会成分和个人成分〈行为的实施和固定的联想〉某种程度上混合在一起〈几乎是混合的〉”^②。在对语言的阐述中,与言语相对的语言,索绪尔使用的是单数的形式,以与作为复数用法的“个别语言”相对,“我们只有通过这一系列不同的个别语言才能了解语言,我们不通过任何具体的语言是无法了解它的”,“语言,这个词用单数理由何在?我们的目的是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概念”^③。在20多天后的5月19日第7次课上,索绪尔对这一章内容作了重要补充,补充了语言和言语对比的两个重要的模型“ $1+1+1+\dots=1$ ”和“ $1+1+1+\dots=1+1+1+\dots$ ”,认为语言存在于群体里每个人的大脑中,“〈就像把一部字典的复制本分发给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一样〉语言这种东西虽然存在于每个人的内部,但是同时又是集体的,存在于个人的意志之外”,并进一步明确了言语的定义“它是人们彼此言谈的总和,其中包括:(a)依赖于个人意志,反映个人思想的个人的组合,即句子。(b)同样依赖于个人意志,实现这些组合的发音行为”,并对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做了较完整的说明^④。

索绪尔在这次课中对语言、言语和言语行为三者关系的图示说明以及在后来间隔5次课后关于语言和言语两个对比模型的补充,对于完整理解语言和言语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只收录两个模型而没有收录图示,不能不说是一个疏漏。

(二)关于符号与语言符号

在《第二章 语言符号的性质》中,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建立在听觉形象和概念两种非常不同的事物之间通过心智所形成的联想的基础之上的,索绪尔用下列图示来说明(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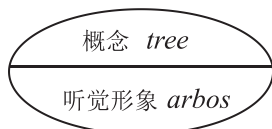


图3

概念和听觉形象都是在主体之内,都是心理的;说“听觉形象”是心理的,可以通过内部语言来证明,“在这样的内部语言中,我们无需活动双唇就能够在内部发出〈和听见〉一段言语,一首诗歌。〈因此,物质的部分是以听觉的形式位于主体之内的。〉”^⑤,概念和听觉形象构成的整体叫“符号”;“第一原则或基本真理: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小标题。——笔者注)”,“一定的听觉形象与一定的概念的联系,并赋予这种联系以符号的价值,是一种完全任意的联系”,“这一真理的层次位置处在登峰造极的地位”,“符号是任意的,也就是说,例如‘soeur’(姐妹)这一概念不是由任何内部的特征〈关系〉与构成其相对应的听觉象形的声音序列 $s+\ddot{o}+r$ 相联系……〈文字符号具有相同的任意性特征。〉”,“符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79—80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0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0—81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00—101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2页。

号学的研究领域将主要是任意的符号系统,其中语言是主要的范例”^①。至于象声词,“〈词的声音具有能够唤起所代表的实际概念的东西〉”,但数量非常有限;而感叹词“其内部包含着自然表示出来的东西,其声音和概念之间存在着联系”,“所以,象声词和感叹词这些例证是边缘的和有争议的”^②。“第二原则或第二基本真理。语言符号(作为符号使用的形象)具有一个长度,这个长度只能在一个维度上展开”,“语言符号具有听觉性质(它随时间展开,只有线性的维度,一个单一的维度)”^③。对于这条在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被表述为“线条性”的原则,索绪尔认为“这条原则体现了制约语言中存在的所有资源的条件之一”^④。

在这一章中,索绪尔把听觉象形和概念构成的整体称作符号,认为构成语言符号的两部分都是心理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性的联系,即具有任意性,任意性是处于最高地位的第一原则,语言符号因其具有听觉性质所以第二个原则是在时间中展开的线条性;索绪尔进而把符号看做具有任意性的,而把形式与内容有关联的如代表司法的天平排除在符号之外。把任意性放到符号最高原则的位置,认为其他后果都是由它而导致的,索绪尔建立了以任意性为基础、其构成的两方面都是心理的符号学体系,并以对符号的典型即语言符号的认识,奠定了符号学的基础。

(三)语言的具体实体与抽象实体

《第三章 构成语言的具体实体是什么》和《第四章 语言的抽象实体》两章,论述语言的实体问题。按照索绪尔在后来补充中的说明,在这两章之前应该插入“符号的可变性与不变性”,如此,这两章就应该后移,成为实际上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了。

索绪尔认为,“对待语言,要认识它的真正实体,我们显得特别无能为力,因为语言现象是内部的,本质是复杂的。语言以两种事物的联系为前提:概念和听觉形象”,“确认语言实体首先要满足的条件是,存在和维系两种成分之间的联系”,如果只关注其中一个,只能创造虚假的语言单位,“只有两者保持着联系,我们研究的才是语言学的对象”^⑤。索绪尔把语言比做某种化合物,比如水,如果通过去除氢或氧来分离语言的水,那么就不再处于语言学领域,也就不再有语言实体了,语言实体是听觉形象和概念结合所形成的整体,单一的某方面都不是语言的实体。索绪尔认为,确定语言实体“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言语为据,这里的言语仅仅表现为在语言的证据”,“确定语言单位存在的唯一手段”,是保证概念线与听觉线的切分相一致,“每一个单位将包含一个与某一概念不可分的声音的切分成分,没有概念,声音的切分将无法划定”^⑥;“为了确认某一单位,有必要始终注意意义和听觉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对听觉形象的划分”,这种活动,就是确定任何符号的同一性的过程;“整个语言机制依赖于同一性和差别”,“单位的问题或同一性问题完全是一回事儿”^⑦。这样切分出来的“这些与我们所称的词相对应的单位占有相当大的数量,但除了词还有别的单位(还有其他种类的单位)。复合词就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3—84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4—85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5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5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6—87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8—89页。

⑦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0—91页。

是一个例子……这样的复合词的后缀是从属于词的低一级单位”^①,亦即切分出来的具体实体有词和构词语素。

关于语言的抽象实体,索绪尔提出三种抽象实体。第一,如果单位的排列顺序被当做一种表意手段,那么这种序列就是一种抽象实体。第二,没有相似性的物质却使人意识到某种价值的同一性,那么这种同一性也是抽象实体。第三,“〈始终〉存在〈作为基础的具体符号,即便〉某种东西用零表达〈即便这种符号碰巧是零〉”,那么这种与有物质基础的具体符号相对的零符号,也是抽象实体;索绪尔总结道,“在语言中,存在于说话人意识中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当概念直接由一个声音单位支撑时,我们保留使用具体一词;当概念是通过说话人的内在活动而产生间接的支撑时,我们使用抽象一词”^②。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当概念与直接而明确的听觉形象相结合而构成的语言符号,是语言的具体实体;当概念与只能在人的意识活动中通过对比而以彼此区别的形式间接地结合而形成的语言符号,是语言的抽象实体。

只有确定语言实体,才能真正开始语言学研究。索绪尔正是凭借高超的抽象思辨能力,为没有对象实体呈现的语言学确定了对象单位,这是进入现代语言学很重要的一步。

(四)绝对任意性与相对任意性

在《第〈五〉章 语言的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中,索绪尔认为,在每一种语言中,有完全任意的和相对任意的,只有某些符号是完全任意的,而另外其他符号的任意性有程度的区分,“以[vingt]‘二十’,[dix-neuf]‘十九’为例。vingt一词是绝对不可论证的。Dix-neuf不是完全不可论证的,我们可以看出,在什么意义上vingt实际上无法使人联想起与这种语言中共存的要素有什么关系,而dix-neuf却与这种语言中共存的要素有着联系(dix‘十’neuf‘九’)。可以说,dix-neuf是可论证的”^③。也可以说,vingt、dix和neuf是完全任意的,具有绝对任意性或不可论证性,而dix-neuf相对于构成它的dix和neuf来说,是相对任意的,具有相对的可论证性;可论证性可以“看做是对与概念相联系的任意性的限制”^④。“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两种并存的成分——完全不可论证成分和相对可论证成分——两种成分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每一种语言所包含的这两种成分比例不同,两种成分变化的比例也大相径庭,这种比例上的差别构成一定语言的特点之一”,“某一语言演化的整个过程,可能表现为在完全不可论证性成分和相对可论证性成分之间整体平衡中上下波动”^⑤;“不可论证成分达到最大量的语言是比较重于词汇的,而不可论证成分达到最低量的语言是比较重于语法的”,“例如,极端词汇类型可在汉语中找到例证,极端语法类型则见于原始印欧语、梵语、希腊语”^⑥。

索绪尔认为,“相对任意性这一概念涉及到两种必须认真加以区别的关系”:一方面,它表现为图4的关系,另一方面它表现为图5的关系: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89—90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2—93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3—94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5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6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7—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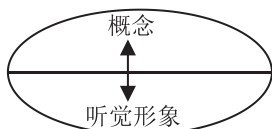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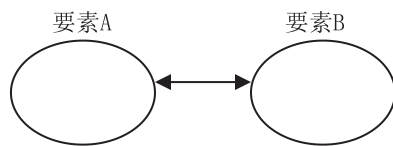


图5

如按前边的说明,那么相对任意性或可论证性应该如图5所表示的关系,“相对可论证的概念,必然暗含与另一要素的联系”^①;而图4所示关系为绝对任意性或不可论证性关系,是不是相对任意性也同时包含有图4所示的概念与听觉形象间的关系?还仅仅指拟声词、感叹词这两种情况?但“概念”和“听觉形象”本身都不是“要素”。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相对可论证或相对任意性的理解,侧重于复合符号相对于它的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所以认为汉语是这种特点语言的代表,实际上汉语中的同源词也符合相对可论证性或相对任意性这个解释。因此,有些古汉语研究者不同意索绪尔的任意性观点,如李葆嘉先生等。但这种“词源”还是属于图5所示的关系。

(五)关于补充一些看法

在1911年5月19日至5月30日的两次或三次课程中,索绪尔“〈重温第一章后关于语言的课程内容,对澄清下列问题再补充一些看法〉”^②。索绪尔在以下4个方面做了重要补充:

1. 对第一章《语言》,补充了关于语言和言语相对比的两个模式和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关系图示两部分内容,使对语言和言语两个语言学基本概念的论述更为全面、深刻,成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对《第二章 语言的符号性质》,补充了符号构成的两个方面的术语“能指”(signifiant)“所指”(signifié)。索绪尔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课上都论及符号,并把语言看做听觉形象和概念相结合的符号系统,但只有到最后一次课程剩四十多天要结束时,才在正规章节之外的课程内容补充中,使用具有相同词根的“能指”和“所指”来代替语言符号中的听觉形象和概念,不仅使其对立统一性更加合理,而且也使对符号的认识从语言这一具体的符号领域进入到普通符号学的领域,为符号学科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

3. “在第二章后……第三章应插入的标题是: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按照索绪尔补充的意见,接《第二章 语言的符号性质》后的第三章是《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原《第三章 构成语言的具体实体是什么》排序后移,变为第四章。

索绪尔认为,“符号对使用它的人类社会来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无需同社会大众商议的:好像符号不能被其他符号所代替。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包含着自由中的非自由的矛盾。〈这一事实〉可以通俗地称作霍布森选择现象。〈人们对语言说:〉‘自由地选择吧’,但同时又说:‘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必须选择这个或那个’”^③。从表达的内容来看,索绪尔这里的表述与通行本的表述一样,但通行本用的是“强制的牌”^④。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不变性是因为:第一,“语言,从任何时间来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98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00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03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07页。

考虑,无论时间追溯到多远,总是前一个时代的产物”^①,语言是历史事实;第二,学习一门语言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因此语言是难以改变的;第三,“语言是每个人每天每时都使用的东西”;第四,“构成一种语言符号”有极大的数量;第四,符号的基础是任意性,不存在可谈论的规范;第五,每一种语言都构成一个机构和一个系统,语言的系统性对改变具有制约性。

索绪尔用增加一章的篇幅补充了语言符号的可变性与不变性,不仅把1891年到日内瓦大学的三次讲座^②中的关于语言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变易性对立的阐述,用二律背反来解释符号的这一特点,用语言符号内在的任意性与外在的处于时间之中和处于说话的大众之中的社会性统一在一个理论体系之中,不仅构建了更完美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体系,而且大大提升了语言理论的哲学品格。

4. 补充了关于语言与时间和社会(说话的大众)的关系。在1911年5月30日课的笔记中,索绪尔用图示补充了语言与时间和说话的大众的关系的观点。在孔斯坦丹笔记中这个类似的图出现了3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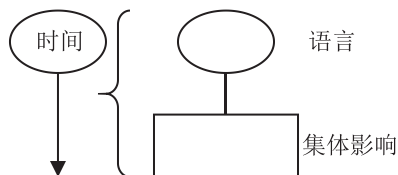


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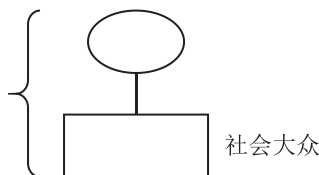


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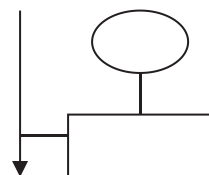


图8

图6出现在30日笔记的一开始。索绪尔说,“必须要考虑时间因素,社会力量需要时间才能发挥效力”,“事实上,语言在〈任何时候〉都和过去捆绑在一起,这就限制了它的自由,假如语言不是社会的,它就不会是这样了”;“时间的力量,不断限制我们可能称作任意性〈自由选择〉的力量。我们为什么说人、狗?因为我们以前人们就说人、狗,其理由就在时间因素,时间既不对任意性起限制作用,同时又起限制作用”,也就是说,因为时间具有连续性,所以时间对符号的任意变化的可能起到了限制作用;“符号的这种非自由性以语言中时间因素的连续性为基础,〈以世代符号的连续性为基础〉”;而“为什么符号要发生变化?因为符号要不断地延续”,“变化的原则以连续性原则为基础”,所以,如果不是连续性的,也就谈不上变化;因此(见图9):

在时间之外	联系时间
符号的任意性	1. 非自由(不可变性)
因此,自由	2. 变化(某种程度的可变性) ^③

图9

索绪尔从语言符号进一步推断到普遍的符号,“在各种符号系统中,甚至在聋哑语中,隐藏的力量将改变这种关系,〈这将是一般的符号事实:时间上的连续性和时间上的变化相依为伴〉”^④。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03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于秀英译,第136—163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06—107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10页。

索绪尔对这一章进行总结时,首先用图 7 进行说明,“当我们从言语行为中除去只属于言语的一切时,剩下的可以准确地称做语言,恰好只包括心理的要素,语言 = 概念和符号的心理联结。然而,这只是除了社会事实以外的语言,是非现实的(因为只包含它的现实的一部分)。为了使一种语言存在,就必须有使用语言的说话大众。在我看来,语言是恰好存在于集体心智里的东西。……〈采用这样的图式,语言是实用的〉”^①。索绪尔进一步论述,“如果我们有时间而没有说话的大众,也许就不会有外部的〈变化〉影响;有说话的大众而没有时间:我们刚刚看到,除非时间的涉入,语言的社会力量将不会起作用。〈采用下边的图式(指图 8——笔者注)即加入时间轴线,我们涉及到全部的现实〉”^②。从中可以看出,索绪尔最后得出关于语言与时间和说话的社会大众之间完整的关系,是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论证过程的,即(见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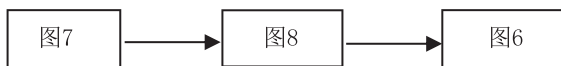


图 10

而在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116 页上的图示(即图 6),是忠实地体现了索绪尔的思想的完整图示。

认为语言处于时间之中、处于使用语言的大众之中,具有社会性,是语言符号具有连续性或稳定性的外部条件,同样也是语言符号具有可变性或变易性的外部条件,这个外部条件,与“符号的第一性原则”或符号的内在基础——即任意性相互作用,形成了可变性与不变性这一表面看起来相互对立的现象,索绪尔用二律背反展现了语言和语言理论辩证法的美感。

(六) 共时态、历时态与两种语言学

对《第四章(插入前一章后)静态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语言学的二重性》,索绪尔首先说明,“本章是前一章的〈直接〉继续,〈将表明我们在后面进行讨论所依据的一般基础〉。人们可能对何时介绍时间的概念,以及它所带来的结果犹豫不决(现在我们早些介绍),〈因此插入了这两章〉”^③。而前一章,即补充进来的“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这样这一章就成了“第四章”;而“插入这两章”的目的,是为了阐述时间对语言的影响。

索绪尔认为,“很少有语言学家相信,时间问题会滋生特殊问题;很少把时间问题看做是中心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我们必须决定是跟随时间还是跳出时间”^④,“我们不能同时研究价值系统本身和跨越时间的价值系统……:同时轴线(或涉及共存事物间的关系),等于排除了时间因素,和连续轴线(涉及连续的事物间的关系)因时间所增值的事物〈在纵向的轴线上,存在因时间而增值的事物〉”(见图 11)。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0—111 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1 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2 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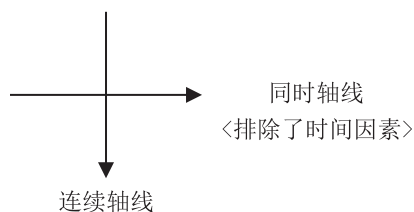


图 11

“当涉及研究价值的学科,这种区分便成了需要”,而“当涉及〈在第三层面〉价值系统(任意的价值)〈像符号学那样任意确定的价值〉时,区分这两条轴线的需要达到了最大的程度”,因为语言符号“每一价值都将依赖于邻近的价值或对立,同时,即使从先验的观点看,既然要发生变化,导致关系的转变,如果混淆了时代的话,我们怎样才能〈公正地〉判断要素呢[?]〈价值和同时性是同义词……〉”,“语言学必须一分为二,〈当涉及〉价值系统时,存在着一种由事物的本质所创造的不可调和的二重性”^①。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种符号的本质,决定了语言符号的价值只能依赖于要素具有同时性的系统。“存在着保持平衡(要素的固定平衡和处在某种关系的价值)的静态事实(〈个别语言〉),这些要素必然是同时性的〈共存的〉,并且构成了共时事实;我们研究的是共存的要素,不是连续的事实”^②,导致两者根本分离的还有一种最简单的观察,“如果从说话人的观点来看:跨越时间的事实顺序是不存在的东西,摆在说话人面前的是一种状态”^③,“人们从来就是依靠语言的状态进行言谈的”^④;“同样,为了理解这一状态,语言学家本身应破除那些探求什么是历时的,什么导致了时间中某一状态产生的观念,除非采用忽视起源的观点,否则他无法进入到说话人的意识之中”^⑤,“语言学家若要理解某一语言状态,就必须采用静态的图景,放弃阻碍和限制他的历时或历史的图景”^⑥。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必须把两者分开:“(1)语言是一个系统。在任何系统中,人们必须考虑到整体,〈即什么构成一个系统〉,〈确切地说〉变化从不涉及作为〈完整〉整体的系统,而只涉及具体的部分”;“(2)两个连续事实间的联系不像共存事实间的联系一样,属于相同的类别”;“(3)由于构成一种语言的符号是复杂的,要同时研究两条轴线是不可能的”;“(4)人们不能忘记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这条根本原则,构成语言的价值是任意的”^⑦。这样,“语言学遇到了第二个十字路口。我们应研究共时事实还是历时事实[?](事实上,有两个学科)我们不能混淆这两种方法。既然在第一个路口存在语言和言语的选择问题,所以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点:〈语言中〉一切历时的东西都产生于言语之中,语言中任何变化的基本原理都只有通过言语才能产生,每一种变化都要经过相当数目的个人(试探性)的试验,这些变化只有被集体所接受时才能成为语言的事实。只要它们保持在言语里,就不算语言事实(言语是个人的)”,“语言中每一种演化,每一演化的事实,都开始于言语事实。不容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3—114 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6—117 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7 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26 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7 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37 页。

⑦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 118 页。

置疑,演化事实处在语言研究的主流之外”^①。

区分了静态和演化,索绪尔进一步区分了两种语言学,“静态语言学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到的(而且任何个人的意识都可能表现出相同的集体意识——我们每个人都有内部语言)〈要素间〉共存的逻辑和心理关系,并且它们构成系统”,“而演化语言学研究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另一个,不从属于一个意识,彼此间不构成系统”^②。

索绪尔在博杜恩区别语言的静态与动态或演化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论证语言学就是共时的语言状态研究:第一,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语言符号的价值依赖于共存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只能是共时的和系统的,而变化是历时的和在系统之外的,因此不属于语言系统本身;第二,说话者意识中只有共时的语言状态,他们依据这种语言状态说话;第三,变化产生于言语,自然也不在语言之内,所以“演化事实处在语言研究的主流之外”。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索绪尔认为演化语言学或历时语言学不在语言学之内,而属于“言语学”。因为在下一章《静态语言学》笔记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许多包含在普通语言学里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属于静态语言学”^③。

(七)静态语言学:语法——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

笔记版《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第137页,只用黑体字单独一行单列“静态语言学”而没有标章数,时间标有“6月23日”“6月27日”和“6月30日”。在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版《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这部分内容被列为《第二编 共时语言学》的第五章《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而在第二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这部分内容对应着《第十三讲 意段组群与联想组群》和《第十四讲 意段理论与联想理论》两次课。

索绪尔认为,“静态语言学可以把许多包含在普通语言学里的内容纳入它的研究范围”,因为,“只有通过语言状态,普遍语法中发现的关系和差别才能确立起来”,“静态语言学的独特之处是研究关系和价值”^④。关系是语言要素之间的东西,而价值则是体现在要素身上的关系,它们都存在于语言状态之中。索绪尔把词当做语言系统的现成要素,“我们把语词作为一个系统的要素,而且把语词作为系统的要素是必要的。语言中的每一个词恰巧都与其他词发生关系”,“任何时候只有与其他相似的单位有关系,一个词的价值才能存在。词语间的关系〈和差别〉是遵循两种秩序,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域展现出来的:每个领域生成一定秩序的价值”^⑤;一种是组合配合和组合关系,一种是联想配合和联想系列,前者是先后出现并按顺序相接的两个或几个单位的结合,后者是“通过与语言中存在的其他要素构成的心理联系。……将无意识地在心智中特别能唤起具有某种共性的诸多词的概念”^⑥,联想系列“有时基于意义和形式的双重一致性,有时完全基于形式〈或意义〉,这些相关关系可以被看做同这些词一起存在于大脑之中。任何词〈通过联想〉都可唤起可能与其相似的一切”,联想系列“不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30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32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37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38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0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1页。

是以它们在链条中的位置为基础”^①；“以组合方式围绕一个词出现的，是其前后成分，即语境，而以联想方式围绕一个词的，不出现在语境中，它们源于心智〈(由心智联结，无空间的概念)〉”，“前者为在场的安排，后者为不在场的安排”^②；“由心智与在场的词发生联想所形成的词的关系的总和产生了虚拟系列，这是由记忆形成的系列(记忆系列)，与两个在场的单位形成的链条组合体相对立，后者是与虚拟系列相对立的真实系列，并产生其他关系”^③；“在言语外部，具有共性的词语之间在记忆中建立起来的联想形成不同的组别、系列、类族，它们之间确立起不同的关系〈但属于同一范畴〉：即联想关系”，“在言语内部，词语从属于一种独立于联想关系而基于它们自身的联结而确立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组合关系”^④。这样，词语既处于与其他词语的组合关系之中，又处于与能够在心理唤起另外一些词语的联想关系之中。

在这一章结束前，索绪尔把词这种具体单位上升到“要素”，并说明了逻辑的出发点，“有必要把词作为系统中的要素来考虑。我们一旦用要素〈替代了词〉，这就意味着考虑到要素与要素间的关系(唤起与其他词相互联结的概念)”；“为了建构系统，我们不能从词即要素出发，这样做会使人认为，要素具有预先给定的绝对价值，而且要达到建构系统的目的，就只能把词重叠地堆砌起来。相反，我们必须从〈系统〉即从相互联结的整体出发；这个整体可能要分解成具体的要素”^⑤。这样，索绪尔顺理成章地导入了下一章。

(八) 系统：要素的价值和词语的意义

在《第五章[原文如此]：要素的价值和词的意义，两者如何巧合与区分》中，索绪尔论述了价值和意义的问题。

索绪尔说，“哪里有要素，哪里就有价值，价值的概念有机地隐含在要素的概念之中，我们总是难以把这两个概念分开”，“价值当然是意义的成分，但重要的是避免把意义看成是价值以外的其他什么东西”，“要认识到意义依赖于价值又不同于价值，也许是语言学中最微妙的问题之一”，索绪尔图示如下(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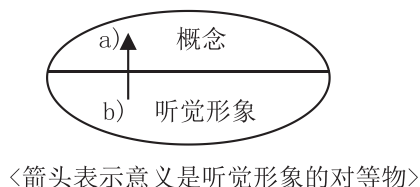


图 12

并解释说：“意义是听觉形象的对等物，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⑥而价值要有两个构成成分，“价值是由(1)可交换的非类似物所决定，这可以用箭头↑标明；并且(2)由可比较的类似物所决定←→”^⑦。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3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3—144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6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5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6页。

⑥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7—148页。

⑦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8页。

“作为听觉形象对等物的意义和作为共存对等物的意义合二为一”，“如果只考虑可交换的要素，我们决不能发现一个词的意义”，“〈要素从属的〉系统是价值的来源之一，词的意义等于可比要素与其对立的可交换的概念之和”，“一个词的价值无法得到确定，除非依靠限定它的共存要素的协助：……词的含义只有靠围绕它的成分的协助才能确定（词的含义是价值），依靠以组合方式围绕它的成分，或以联想方式围绕它的成分。我们必须从外部、从系统和共存要素出发来探究语词”；“一个要素的意义取决于某一邻近要素的在场或不在场”，“系统导致要素的产生，要素导致了价值的生成，〈那么，我们将认识到，意义是由围绕它的成分决定的〉”^①。

语言是由概念和听觉形象构成的符号系统，但在语言之前，并没有预先存在的“a）全部建立起来的并且彼此都清晰的概念，和b）表达概念的符号（即听觉形象——笔者）”^②，离开了语言，思想是一团无定形的星云，同时也没有预先限定了的清晰的声音单位，两种没有任何联系的事物由于心智的作用相互结合，依靠听觉形象的差别思想分割为不同的概念，依靠与概念的结合，声音变成了清晰的彼此相互区别的听觉形象，由于语言符号是这两种事物的任意性结合，任意性这一最高原则，决定“语言（即语言状态）中只有差别”，“只有符号间的差别在起作用”，“整个语言系统可以被看作是声音差别和概念差别的结合”，“只有通过符号间的差别，才有可能给符号以功能、价值”^③。任意性是消极的，差别也是消极的、负性的，但由任意性和彼此差别所构成的符号却具有积极的价值，这个价值具有相对性，因为它取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联系的任意性。这个价值也因此取决该要素与其他要素的相互区别、相互对立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取决于语言符号系统。而这种相互关系，这种系统，又体现为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都可以看作是对任意性的限制”^④。

对于语言符号而言，任意性是自由的起点，但同时也是自由的终点：语言符号、语言符号系统和语言学理论体系，在这里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回环。从这一角度来看，沙·巴利编辑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事实上，价值仍然完全是相对而言的，因此，观念和声音的联系根本是任意的”^⑤，这实际上颠倒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误解了索绪尔的意思。

至此，索绪尔完成了他所补充的语言学任务的第三项：界定语言自身。这是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最大贡献。

从上述对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评析中可以看出，索绪尔在授课中，不仅有知识、原理阐述的层次渐进，还有授课期间新的理论思考、补充，以及对理论体系构架的调整，过程性非常突出。从沙·巴利等编辑出版的通行本《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目录来看，除了把第一部分“个别语言”后移变为倒数第二编，即《第四编 地理语言学》，破坏了索绪尔理论阐述的逻辑顺序外，在第二部分“语言”部分基本上是按索绪尔补充调整的顺序安排的，除了（1）把最后一章《语素的价值和词的意义

①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48—150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51页。

③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55—156页。

④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第156页。

⑤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58—159页。

义》前移,调整到“具体实体”之后,(2)把“抽象实体”调到“第二编共时语言学”在最后。其中的课程笔记中《语素的价值和词的意义》的阐述,不同于沙·巴利等编辑出版的通行本中的《第四章 语言的价值》。笔记版始终是从语言符号的整体即词语或要素的角度来阐述价值的,而通行本则把概念、物质形式和符号做了区分后再分别做以说明的,这样看起来更加细致一些,但却忽略了一点,索绪尔讲的“价值”,是语言符号的价值,是隶属于语言系统的语言要素整体的价值,单独的听觉形象或能指,单独的概念或所指,是没有价值的。

责任编辑:冯济平

An Analysis of Saussure's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Nie Zhipi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Saussure recognized "defining itself", i.e., defining what langue is, as the third task of linguistics. He divided the course into three parts: individual langue, langue and parole, and illust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ech act, langue and parole, thus proposing different modes of langue and parole. He clearly defined the composition of symbols as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arbitrariness and linearity of linguistic symbols, concrete entities and abstract entities, relative arbitrariness and absolute arbitrariness, as well as sociality and compulsiveness, mutability and immutability determined by arbitrariness. Saussure transformed Baudouin's concepts of static and dynamic into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and argued that this distinction was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linguistic symbols. He transformed Kruszewski's proximity association and analogy association into sentence segment relationship and association relationship, and made them representations of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in language systems. Saussure believed that what symbols are depends on the relationships in the system,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of phonemics. Based on the above, he established scientific linguistic semiotics and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general semiotics.

Key words: Saussure; modern linguistics; linguistic theory; history of linguistics

话题的演变与觅材取材

姜言胜 洪仁善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作为修辞学,尤其是古典修辞学的核心范畴,话题自古典时期至今,历经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新修辞学”等不同时期,呈现出迥异的属性。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其属性共呈现出静态和动态两种形式。同时,话题的演变并不是任意而行的,其属性的更迭受制于作为其载体的、位居“修辞五艺”之首的觅材取材。话题的属性与觅材取材保持一致,且随觅材取材属性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关键词: 话题; 静态; 动态; 演变; 觅材取材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3)04-0141-08

罗伯特·迪克(Robert Dick)说:“在古典时期确立下来并得以广泛应用的修辞理论就包含对于论据的获取。”^①而论据的获取又与话题息息相关,缺少了话题的支撑,获取论据则如无源之水,无法进行。由此,话题在古典修辞学的劝说行为中的作用可见一斑。我国著名修辞学家刘亚猛对于话题的价值与地位进行了高度的认可,他在《西方修辞史》中提到,“话题自从希腊古典时期以来一直是修辞的核心范畴,是修辞学家在论述修辞理论时最为倚重的术语之一”^②。佐姆佩蒂(Zompetti)探讨了话题对于现代辩论理论的价值,并且明确指出,“话题的主要价值体现在论据的建构、论点的表达以及对于创造性思维的提升”^③。尽管自古至今对于话题的价值与作用均有广泛的认可,但正如大卫·李与凡奇尔(David Lee, Vancil)所言及的,“这一传承于古典修辞学的体系业已遭到严重破坏,话题亦随之而消弭”^④。与古典修辞学时期不可或缺的地位截然不同,就论辩而言,话题已经不再被视为有效探究论据的方式,即便如此,话题在论辩、修辞劝说和文本建构方面的重要性仍然不容小觑,话题理应获得更多的学术关注。故而,为了提升学界对于话题的关注度,加深相关领域学者对于这一修辞概念的认识,对话题自古典修辞学时期以来的演变过程加以梳理,探究其呈现不同形态的缘由显得尤为必要。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语汇在中国近现代的异质作用研究”(22BSS022)和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修辞受众视角下的修辞诉诸研究”(JJKH20190301SK)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姜言胜,男,吉林松原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修辞学研究;洪仁善,女,吉林蛟河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东亚思想史研究。

① Dick, C. Robert, "Topoi: An approach to inventing arguments", *Speech Teacher*, 1964, (4): 313-319.

② 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③ Zompetti, J.P., "The Value of Topoi", *Argumentation*, 2006, (20): 15-28.

④ Vancil and David Lee, *The Disappearance of Topoi in English Rhetoric, 1550-1830*,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77: 182.

一、话题的定义

斯洛姆科夫斯基 (Slomkowski) 指出:“何为话题这一问题几乎困扰着该研究领域内的所有学者。”^①原因一方面在于亚里士多德在对话题的阐述中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定义;另一原因在于定义话题需以明确以下与话题的定义密切相关的方面为前提,具体包括话题的本质、类别和功能等。尽管如此,相关领域学者仍通过研读亚里士多德的《话题》《修辞学》两本著作中对于话题的阐释对话题进行定义。这些定义视角不同,自然侧重点亦不相同。总体说来,以话题的根本属性为参照,这些定义可大致划分为静态及动态两大类别。换句话说,分歧主要聚焦在是否应该将话题视为一个动态抑或静态的概念。

古典修辞学将话题视为一个静态的概念。虽没有对话题进行明确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将话题诠释为一个类似于场合抑或区域的概念。他将话题视为在修辞三段论模式下有助于修辞者找寻论据的系统。作为相关于各类事务的论据的标题,对于修辞者而言,话题不仅是有用的,同时是必要的。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古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 (Cicero) 将话题视为贮存论据的场所^②。另一位古罗马修辞学家昆提利安 (Quintilian) 将话题描述为既是论据所处的神秘场所亦是提取论据的场所^③。从上述三位修辞学家对于话题的描述不难看出,在古典修辞学中,话题可以被喻为盛装论据的容器,亦可被理解为用以决定论据内容的一种导向抑或方法。显而易见,在这一认识下,话题被视为一个静态概念。

对话题静态属性的这一认识得到了部分现代修辞学者的认可。通过对古典修辞学中话题的历史回顾,奥克斯 (Ochs) 提出,“话题虽不会为修辞者提供论据的前提,但却对话题进行分类”^④。佩特 (De Pater) 认为:“话题具有两种功能,具体包括一种选择功能以及一种证明功能。其中,选择功能是指在一些列待选话题中选择适宜的论据。”^⑤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持有类似观点,均侧重于话题的静态属性。例如:爱默伦等 (Emeren et al) 则将话题定义为论辩技巧^⑥。以上定义虽然在视角以及侧重点方面存在差异,相同之处在于皆将话题这一源自古典修辞学的概念认定为静态的。

话题的静态属性并未得到修辞学者的普遍认可。萨拉·鲁宾利 (Sara Rubinelli) 将话题视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如此,话题的根本属性亦从静态变更为动态。话题被认定为建构论据的策略而非仅仅用以找寻并最终确定论据的方法。在这一理念下,话题成为具有普遍应用性特征的论据体系,通过聚焦于构成话题的命题的内在形式,建构话题。有关话题定义的分歧并非偶然,事实上,这些差异彰显着话题定义的时代特征。纵观话题这一概念自古至今的演变,必将有助于促进及加深该领域对于此概念的理解与认识。

① Slomkowski, P., *Aristotle's Topics*, Kolon: Brill, 1997: 1-3.

② Cicero. M. T., *De Partitone Oratoria*, trans.by Hubbell, H.M., Cambridge: Harvard UP, 1942: 268.

③ Quintilian, *Institutio Oratoria*, trans.by Butler, H.E., 4 vol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33: 68.

④ Ochs, D.J., "The Tradition of the Classical Doctrine of Rhetorical Topoi",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1966: 43.

⑤ De Pater, W.A., "La Fonction du lieu et de l'instrument dans les Topiques" in G.E.L. Owen (ed.), *Aristotle on Dialectic: The Top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64-188.

⑥ Emeren, F. H. van, R. Grootendost and F.S. Henkemans., *Fundamental of Argumentation Theory: A Handbook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1996: 38.

二、话题的演变

这里拟通过研究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和昆提利安以及新修辞背景下的帕雷尔曼的话题体系,探讨话题在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根本属性。

(一) 亚里士多德的话题体系

就对话题的系统研究而言,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是先行者,他们二人对于后世有关话题的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话题的综合阐释始于亚里士多德,传承于西塞罗。鲁宾利继而指出:“理解西塞罗的话题体系必须与亚里士多德的话题体系并行,从中不难可见二者间的传承性。”^①西塞罗又直接影响了波斯修,因为后者对于话题的阐述始于前者的话题体系。而中世纪有关话题的研究又根植于波斯修的话题理论。从中可见,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对于话题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话题》中,总共提及了 300 多个话题,并在《修辞学》中对部分话题进行了详述。根据威廉·格里马尔迪 (William Grimaldi) 所言:“对亚里士多德话题体系加以说明应以理解三个层面的修辞论据为前提。这是因为,整个话题体系的运行以此三个层面为中心。这三个层面具体包括可以产生信念的源材料、能够赋予与主题相关的内容以论辩形式的方法抑或技巧以及在受众脑海里产生的映像。”^②处在第一层面的源材料是指与修辞者修辞能力密切相关的逻辑诉诸、人格诉诸、情感诉诸等三大修辞诉诸及与修辞者修辞能力并不相干但却可以用于修辞劝说的类别,具体包括法规、证人、契约、拷问和誓言。第二层面是指赋予源材料以论辩形式的与三段论相对应的修辞三段论,以及与归纳相对应的修辞例证。第三层面关注于在议政演说、庭辩演说及宣德演说中赢得受众信奉的效果。

亚里士多德对于话题的具体探讨聚焦于修辞三段论,而修辞三段论的展开又依附于一个具体层面以及一个抽象层面。抽象层面以三段论为核心,而具体层面则指向与话题的内容及论辩形式相关的两类话题。正是这两类话题的协同合作支撑着修辞劝说行为,因为隶属于第一类的话题能够为修辞者找寻且确定相关话题所处位置,而第二类话题则指向基于三段论的具体的推理模式,这些思维模式在组织和运用与主题内容相关的话题方面,能够为修辞者提供莫大帮助。

指向论辩具体内容的话题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特殊性话题和普遍性话题。两类话题均指向话题所处位置,然而,就应用的范围而言,两者间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据亚里士多德所言,普遍性话题所涵盖的范围具体包括规范的行为、自然科学、政治学及其他彼此并不相干的事物等方面,特殊性话题的应用范围却被局限在隶属于特殊类别的事物之中^③。特殊性话题又包含可互相兼容的四个子类别。也就是说,在这些子类别的范畴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具体包括涉及专业性主题的话题,与议政演说、庭辩演说及宣德演说相关的话题,基于逻辑诉诸、人格诉诸、情感诉诸三大修辞诉诸的话题,以及涉及到演讲术具体组成部分的话题,如引言、叙事、论辩、结论等。不难发现,各类话题虽然视角不

① Rubinelli, Sara, *The Classical Technique of Constructing Arguments from Aristotle to Cicero*. Lugano: University of Lugano, 2009: 18.

② Grimaldi, William M. A., "A Note on the Pisteis in Aristotle's Rhetoric",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57: 188-192.

③ Scott, Robert, "On Viewing Rhetoric as Epistemic",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1967: 9-17.

同,彼此间界限并不绝对。

与特殊性话题相对,普遍性话题的应用,如其名所示,具有普遍性,可以应用到任何主题之中,并不受话题的视角、演说的类别等因素的制约。亚里士多德认为普遍性话题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具体包括与事件发生的或然性相关的问题、与过去的事实抑或将来会成为事实相关的问题,以及涉及到事物的大小抑或重要性的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话题体系中,围绕着主题内容的话题与聚焦于论辩形式的话题有着明确的分工,前者负责发现用以论辩的内容,后者为论辩内容确定论辩形式以及推断模式,二者的共同作用确保了整个话题体系的运转。换句话说,对于处在修辞论辩过程中的修辞者而言,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寻话题及建构话题用以形成论据。需要指出的是并非任何论断、观点、常识等均可以成为修辞劝说或者论辩的源材料,事实上,只有那些获得权威人士抑或群体首肯的内容才可以被确立为话题。一旦被认定为话题,这些与各类主题相关的内容就被具有了类似普遍性的特征。与此同时,话题就被赋予了静态属性。在这种情况下,话题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先于修辞者修辞行为的一种存在。处在特定修辞情境下的修辞者无需生成迎合自己修辞目的话题,只需在话题系统里找寻那些业已存在且已经得到过权威人士抑或群体认可的论据。如此,话题的静态属性便自然呈现出来。影响修辞行为的因素如修辞者的修辞目的、修辞情境、受众等虽然会影响甚至决定话题的内容,然而这并不能掩盖更不能改变话题的静态属性。这是因为,这些因素虽然可以改变修辞者对于话题的选择,但却不能改变话题作为先于劝说或者论辩行为的存在的事实。

如上所述,以论辩形式为焦点的话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话题体系中主要是用以组织话题、建构论据。然而这里的“建构”一词却与“生成”一词有着本质的差别,它只是将业已存在的话题以适合题旨情境、受众的需求及具体特点的方式加以整合从而构成用以修辞劝说抑或论辩的论据。故而,此类话题所呈现的亦是话题的静态属性。总言之,亚里士多德话题体系内的话题皆是静态的,其属性均不会随着影响修辞行为的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二)古罗马时期的话题体系

除了亚里士多德,古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与昆提利安在推动话题在古典修辞学时期的发展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对话题的陈说中,西塞罗一方面承袭了亚里士多德对于话题的阐述,另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尤其就话题培养修辞者的价值这一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

西塞罗将话题定义为“论点所在地”。它的提出基于两个初始命题:第一,“一切论辩性话语均关注两件事:论点的发明和对所发明论点是否确当做出的判断”;第二,“论点应该被理解为使所有存在疑问的事物变得可信的那些因素”。这两个命题中有关论点的所有问题皆可在话题中得到解答。以此定义为根基,在具体的阐释中,西塞罗将话题诠释为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载体。通过研读西塞罗的《论修辞发明》《话题》,鲁宾利认为,在西塞罗的话题体系中,“话题”一词可被理解为“题目”(topic)、“主题标识”(subject-matter indicator)、“论辩体系”(argument scheme)、“论据”(argument)和“业已存在的论据”^①。这里的“题目”一词并非专业术语,只是对事物的指称。“主题标识”这一概念蕴含

^① Rubinelli, Sara, *The Classical Technique of Constructing Arguments from Aristotle to Cicero*, Lugano: University of Lugano, 2009: 45.

着通过聚焦于主题事物的具体属性对其进行标识的意义。“论辩体系”是指相关于同一主题的话题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定的体系,为修辞者进行劝说抑或论辩而用。这里的“论据”一词是一个一般化的概念,并不指代有关任何主题的具体论据。“业已存在的论据”作为上述话题若干意义中的中心意义,与亚里士多德的话题意义相近,意为业已经过权威个人抑或群体认可的论据的所在地,所表现的必然是话题的静态属性。

与亚里士多德相同,西塞罗分别对以论辩形式为中心及以论辩内容为焦点的话题进行了阐述。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西塞罗将前者划分为内在话题和外在话题。内在话题受制于主题的本质,其可以由主题的整体、部分、意义、联系中获取。在对内在话题的阐释中,西塞罗在对具体包括诸如定义、部分、整体和语源等 18 类话题进行规约后,认为“如果言说者浏览过上述所有类别,那么他就会发现所有与主题相关的话题”^①。与内在话题相悖,西塞罗将外在话题定性为脱离主题的话题。这类话题通常来源于对于权威及证词的援引,其最大特点在于它们并非产生于修辞者对于修辞技巧的运用,而是作为一种外在存在游离于主题之外。与亚里士多德相类似,在确定了话题的类别后,西塞罗进而对类别内的话题进行了详述。例如,就“定义”这一话题而言,西塞罗认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定义事物。既可以通过可感知的对象亦可以通过抽象的心智来解释定义的对象。与此同时,“定义”的实现既可以依赖于所定义对象的各个构成部分抑或成分,亦可求助于定义对象的类属或者种别。

与亚里士多德相同,西塞罗亦对聚焦于主题内容的话题进行了阐述。大量的此类话题在西塞罗的《论修辞发明》一书中可见。如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的此类话题旨在帮助修辞者识别相关话题的蕴藏处。西塞罗的此类话题更加倾向于为修辞者提供选取话题时所用的清单。

在对待话题方面,西塞罗与亚里士多德最大的区别或体现在其对于话题的教育性的重视。在他的《演讲术》中,西塞罗建议言说者求教于修辞学家,原因在于他可以为言说者指明劝说或者论辩所需的所有论据,并通过例证阐明如何应用这些论据。因此,虽然话题被缩减为与亚里士多德初衷相悖的且相对缺乏弹性的相关规则的目录,但这却不能掩饰以西塞罗为首的古罗马修辞学家欲将话题融入至觅材取材中的意图。他们鼓励修辞者在觅材取材过程中发现那些能够帮助其赢得受众信奉的且可以作为论据的话题。

继西塞罗之后,在古罗马修辞学家中,为古典修辞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修辞学者当属昆提利安。昆提利安继承并且发展了西塞罗的部分话题理论。他对于话题的探讨多见于其著作《雄辩术原理》一书中。昆提利安将话题定义为“蕴藏论据的秘密处所,亦是修辞者获得论据的源泉”。在探究论据的蕴藏处方面,昆提利安尤为强调就相关主题提出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修辞者应从人与物两方面汲取相关论据。人的方面具体包括出身、民族、性别、年龄和国籍。与物相关的话题应该聚焦于如下问题,具体包括相关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和产生的方式。

与西塞罗相同,昆提利安亦对以论辩形式为焦点的话题进行了罗列。相较西塞罗而言,昆提利安的此类话题更为具体与全面。尽管如此,昆提利安清楚地认识到,他并不能罗列出所有可以用于觅材取材的话题。这是因为他所能罗列出的话题均是那些已经记录在册的话题,并不包括那些虽业

^① Cicero. M. T., *De Partitone Oratoria*, trans.by Hubbell, H.M, Cambridge: Harvard UP, 1942: 49.

已存在却尚未被发现的话题。故此,没有话题体系是包罗万象的。修辞者不应该满足于现有话题,而应去发掘尚未被确立的话题。与此同时,昆提利安鼓励修辞者提升应用话题的能力,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话题均适用于某一特定的修辞情境。故此,昆提利安认为,修辞者应尽可能地熟稔修辞情境,因为话题的找寻和最终确定受制于此。反之,修辞者在话题方面所做的所有努力将会徒劳无功。

从西塞罗对于话题的表述中不难发现,相较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更为强调话题的静态属性,这一点可以从其对于话题的划分和对于话题属性的认知中得知。昆提利安虽然强调了修辞情境等因素在话题选择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但这却不能改变他对话题静态属性的认知。在他看来,不管是那些业已记录在册的话题抑或是尚未被发现的话题,均是脱离于修辞者的修辞能力的存在。总言之,话题在古罗马时期仍被认定为静态的。

(三)帕雷尔曼的话题体系

就其根源来说,帕雷尔曼对于话题的探讨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话题体系。帕雷尔曼首先认识到倍受哲学家所推崇、甚至被奉为万灵丹的形式逻辑在解决司法公正、伦理道德、政治和宗教等领域的问题的严重不足。继而在寻求解决方案时,发现了始于古典修辞学的亚里士多德的话题体系在弥补形式逻辑的缺陷方面的巨大功效。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建立了自己的话题体系。该体系的建立是以修辞受众为导向。事实上,帕雷尔曼所有的修辞理论皆以受众为中心。对于受众的推崇彰显了帕雷尔曼对于形式逻辑的摒弃。

帕雷尔曼的话题包括准逻辑论据、基于现实结构的论据和建立现实结构的论据。第一类话题被称为“准逻辑论据”是因为此类话题在形式上与逻辑论据相一致,并且对于受众而言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相别于逻辑论据,准逻辑论据的前提根植于或然性而非逻辑论据的前提的先验属性。与此同时,准逻辑话题旨在寻求受众的信奉而非形式逻辑的有效性。故而,评定准逻辑话题的适宜度以及重要性的标准根植于它们是否有助于修辞者赢得受众的信奉而非是否遵从了形式逻辑的推理过程。

据帕雷尔曼所言,准逻辑话题包括分别依附于逻辑关系以及数理关系的两大类的话题。前者包含用以标识逻辑关系的不相容性、完全或者部分同一,以及传递性;而部分与整体的关联性、大与小的关联性,以及频率,则隶属于后者。帕雷尔曼也注意到了话题在论辩方面所存在的缺陷。他在《修辞学范畴》中提到:“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来说,准逻辑话题可能在逻辑思维过程方面相对缺乏缜密性,推理用的前提也不具备先验属性。但是,只有当一个言说者明确指出自己所用的话题隶属于逻辑性话题,受众才会关注其所使用的话题的所属类别。”^①也就是说,准逻辑话题不应由于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准则而备受指责与抨击,亦不能应用对与错的标准来评价准逻辑话题,而应以就受众而言修辞效果的强与弱来加以评定。

与准逻辑话题相类似,基于现实结构的话题源自于三段论的推理方式,具体包含用以将现象与其成因和结果相结合的承接关系和将人与其行为相统一的共存关系。此类话题旨在加强业已被接受的观点与意欲建立的观点间的关联性。已经获得接受的观点是指那些业已被受众所接受的观点。

^① Perelman Chaim and Olbrechts-Tyteca, *The Realm of Rhetoric*, trans.by William Kluback, South Be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82: 53.

该类话题虽然聚焦于现实的结构,但并未探讨存在论,它们直接指向受众的置信系统。需要指出的是,帕雷尔曼将观点等同于事实,真理和假设。作为现实的根基,这些事实、真理及假设等又根植于受众的置信系统。

用以建立现实结构的话题与上述两类话题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所采用的推理方式是归纳而非演绎。在前两类话题中用以进行演绎式推理的前提均先论辩而存在,且皆以受众为导向。建立现实结构的话题则主要包括实例、例证、范例和类比四个类别,关注点在于建构出以大众观点、事实、真理抑或假设为形式的前提,继而以此前提为依托,帮助修辞者进行劝说或者论辩。

虽然帕雷尔曼的话题体系源自于亚里士多德,但是其对于真理的根本属性的认知及对于受众的推崇使二者对于话题的根本属性的认识截然相反。帕雷尔曼首先质疑且否定了真理的先验属性,继而肯定了受众在真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可从他对准逻辑话题及基于现实结构的话题两类话题的描述中得知。两类话题均以受众为导向,且在地位上等同于基于形式逻辑的话题。基于现实结构的话题更明确地显示出话题蕴藏于修辞活动之中。话题不必再被局限地理解为那些先于修辞活动而存在的,且被权威个人、群体、机构等认可的命题;它亦可包括那些产生于论辩或者劝说过程中,且以受众的置信系统为导向的命题。由此,话题的属性完成了由静态至动态的根本性改变。

总之,对于话题根本属性的认识历经了由静态至动态的演变过程。将话题的根本属性认定为静态始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修辞学时期,这一认识沿袭至以西塞罗和昆提利安为代表的古罗马修辞学时期,直至以帕雷尔曼等修辞学家为代表的新修辞学时期,被彻底颠覆,话题的根本属性最终被确立为动态。

三、话题属性与觅材取材

我们认为,话题在不同修辞学时期所呈现出的根本属性并非是一种恣意的、自发的行为。相反,其根本属性由静态至动态的转变受制于与其密切相连的某一客观因素。这一客观因素就是话题所依附的且为话题的生存及价值提供支撑的觅材取材。作为“修辞五艺”的首艺,觅材取材在修辞理论和实践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理查德·杨等(Richard Young et al.)所言:“修辞的力量以及价值与觅材取材紧密相关。这是由于当修辞学与系统的探究方法以及实质内容相分离时,就会变得肤浅且微不足道。”^①这里所言的探究方法和实质内容均根植于觅材取材。与话题相类似,觅材取材在修辞学的历史长河中,在不同时期就其根本属性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特征。正如有学者所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修辞学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觅材取材所一贯保持的重要性并不能掩盖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以及在认识论方面所存在的差异。”^②

事实上,二者所呈现出的相同之处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而非偶然。与觅材取材相隔绝的话题若失去栖身之地,其在篇章建构及修辞劝说、论辩等方面的实际价值也将无从体现。换句话

^① Young, Richard, Alton Becker and Kenneth Pike, *Rhetoric, Discovery and Chan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123-143.

^② 姜言胜:《觅材取材的动态特征与修辞哲学基础》,《外语学刊》2016年第3期。

说,若没有觅材取材的支撑,话题将失去其存在价值及导向。与此同时,失去了话题支撑的觅材取材也将成为一个空洞的、徒有其名的修辞过程。原因在于,如此的觅材取材既不能为修辞者提供帮助实现修辞目的的且与相关主题紧密相连的源材料,亦不能为其提供能够用以组织、建构源材料的话题。换言之,在如此的觅材取材过程中,修辞者可谓无“材”可觅寻,亦无“材”可选取。故而,人们对于话题属性的认识源自于且受制于他们对于觅材取材的根本属性的认识。具体来说,当人们将觅材取材的属性认定为静态之时,话题的根本属性也随之被认定为静态。反之,当觅材取材呈现出动态特性的时候,话题的属性亦随之变换为动态。

亚里士多德话题体系下的觅材取材呈现静态特征,整个过程简单化。修辞者无需建构适宜于自己修辞目的的论据。这一表现也决定了话题的静态属性,具体表现为修辞者仅需从一般性话题及特殊性话题中选定相关的论据,继而由聚焦于论辩形式的话题中选取论辩的方式和策略。新修辞学视域下的觅材取材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与属性,正如斯科特(Scott)所言,“新修辞学以降,尤其是在修辞学的生成理论产生之后,觅材取材的动态属性开始焕发青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①。觅材取材不再仅仅用于传送知识,它本身就参与到知识的产生过程。在此情况下,觅材取材域内的话题自然而然就担负起产生知识的首要任务,话题的动态属性亦随之呈现出来。

责任编辑:牧南

[洪仁善、姜言胜发表于本刊2022年第4期的《近代日本的敬语政策嬗变及其同语言思想之关联》(第142—154页)需做如下更改:题目与第142页第6行的“近代日本政府”中的“近代”均改为“战后”。]

The Evolution of Topoi in Relation to Rhetorical Invention

Jiang Yansheng Hong Rensh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category of rhetoric, particularly classical rhetoric, topoi, in terms of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ave undergone the periods of ancient Greece, ancient Rome, and new rhetoric, displaying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long the evolution, the qualities of topoi manifest themselves in ways addressed as static and dynamic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evolution of topoi as well as the alteration of their nature is far from an arbitrary act; rather, they submit to the governance of their carrier, rhetorical invention, which tops the "five canons of classical rhetoric". The attributes of topoi are consistent with rhetorical invention, and change with the attribute change of rhetorical invention.

Key words: topoi; static; dynamic; evolution; rhetorical invention

^① Scott, Robert (chairma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Nature of Rhetorical Invention", *The Prospect of Rhetoric*, 1971: 228-236.

复合型治理：破解基层政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逻辑进路

王 义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数字政府的快速推进,催生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移动互联网程序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具有载体多样、内容翻新、发生频率高、同质化严重等特点,不仅增加基层负担,而且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在实践中出现了两种治理方式:运动式治理和常态化治理,两者具有不同逻辑机理和功效。破解“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难题,应采取复合型的治理策略,并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预期等方面做出调整和改变。

关键词:基层政府;形式主义;运动式;常态化

中图分类号: D69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4-0149-09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互联网+的推行,加速了政务“上云”的步伐。技术赋能为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却让“指尖的便捷”变形走样,引发基层干部的强烈不满。党中央为推进基层减负,适时启动了专项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仍然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并对基层政府治理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破解这一新的形式主义难题,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课题。

一、“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新的形式主义在基层之滥觞

关于基层政府的界定,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基层政府包括城市的市辖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农村的县、乡(镇)两级政府^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基层政府不包括市辖区政府及县级政府,其范围只限定在城市设区的街道办事处以及农村的乡镇人民政府。尽管观点不同,但基层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得到一致认可。大家普遍认为,基层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它处在行政链条的最末端,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键连接点,是政府与市场、社会和公众打交道的关键主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政府承担了“上传下达”的功能。一方面,党的路线方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和山东省委党校系统创新工程项目“建国后党的社会动员模式演变规律、特点及向现代化转型研究”(21CDCJ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义,男,吉林乾安人,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教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① 黄大戏、张绍舟:《基层政府的廉政生态:概念、困境、出路》,《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针政策以及上级政府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基层政府予以落实;另一方面,基层群众的意见和诉求也要通过基层政府向上反映。基层政府事多权少的体制局限性,不仅使其成为各种形式主义的“重灾区”,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一)形式主义是党和国家治理的难题

从发展历程看,形式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而是党和政府长期存在的一个顽症。形式主义,顾名思义,就是“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观点、方法和作风”。^①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庸俗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我们党历来反对形式主义,党的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做出过重要论述。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是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式主义害死人”,号召全党必须“揭破它”。^②1960年,毛泽东同志针对区乡工作存在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人们蹲在机关多、事务多、一般号召多”等问题作出指示,“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③邓小平同志提倡“开小会,开短会”,“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④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搞形式主义,要害是只图虚名,不务实效”,“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必须很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⑤胡锦涛同志要求“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讲实效、办实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⑥党的领导人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性质和根源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形式主义治理,将形式主义纳入“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整治范畴,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开展专项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⑦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份反映一些政务App变味走样、占用基层干部大量时间的材料上作出“要摈除形式主义”的重要批示。^⑧

(二)“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表征及危害

基层政府深受“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困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与传统形式主义(线下)有所不同,是移动互联网程序发展中出现的一种形式主义,被学界称为“信息形式主义和智能官僚主义”^⑨或者“数字形式主义”^⑩,这种新的形式主义呈现出与传统形式主义迥异的特点。学术界对此做了很多研究,比如,赵玉林等从动机、方式、机制、效果四个维度进行解读,认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广泛

① 童庆华:《形式主义面面观》,《紫光阁》2001年第1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9页。

③ 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情况专访:《整治形式主义老问题新表现 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光明日报》2021年6月25日,第8版。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7页。

⑤ 江泽民:《关于改进党的作风》,《求是》2001年第1期。

⑥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求是》2003年第1期。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00页。

⑧ 孙少龙、王琦、高蕾:《除“指尖”之苦 减基层之负——各地区各部门扎实开展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工作综述》,《人民日报》2021年6月21日,第1版。

⑨ 张祯:《信息形式主义和智能官僚主义的演变、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秘书之友》2022年第10期。

⑩ 黄新华:《数字形式主义的表征、根源与规制》,《国家治理》2023年第6期。

存在于全国各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①余哲西、郭妙兰则指出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五大病症,包括“机不离手眼昏昏、有图未必有真相、多了速度少了温度、溜须拍马易传染、暗藏‘微腐败’风险”等。^②方世南总结了其四种表现,分别是“文山会海悄变工作群、督查检查注重拍照留痕、理论学习只求打卡刷分、便民官网成为僵尸网站”。^③阳军指出,技术形式主义问题可以概况为“空、假、片、涩、滥、浅、违、堵、隐”,政府网络工作出现了“异化”现象,不利于政府工作质量的提升,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潜在的危害。^④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正确认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表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认清“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表现及其特点,应注重从特殊性角度进行分析。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呈现如下特点:一是载体多样。包括PC端信息平台、手机APP、工作群等。信息平台多、工作群多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最直接表现。“业务群、党员群、工作群,市里群、县里群、镇里群,请回复、请查收、请上报……一打开手机,各种工作通知铺天盖地而来,让人应接不暇”。^⑤某省级政府曾经做过统计,通过治理行动,全省各级共精简整合各类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4万余个。^⑥二是内容翻新。除了传统的“文山会海”外,还有定时打卡、拍照转发、积分排名、覆盖率等要求,这类要求往往重数量忽视质量,重留痕轻视结果。三是发生频率高。以工作群为例,基层干部不仅工作时间需要实时关注,即使下班休息也必须随时点击查看,否则就要被问责。四是同质化严重。以政务APP为例,由于缺乏整合,各单位、各部门自搞一套,导致很多工作重复,不仅浪费资源,而且降低工作效率。

从本质上看,“指尖的形式主义”是线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反映,属于形式主义在“互联网+”下的变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错把手段、技巧和程序当作目的,用“工作如何完成”掩盖了“工作是否完成”,“纷繁复杂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被高度压缩和简化为一个个简单的数字”,数字形式主义四处蔓延,“群来群往”成为新常态,“处处留痕”的政治“新秀场”频频亮相,积分考核排名催生“空对空”^⑦,“数字赋能”成为“数字负担”,“技术赋能”沦为“技术负能”。^⑧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一是加重基层干部负担,使基层干部超负荷运转,身心疲惫,滋生厌倦,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催生各种心理问题,危害基层干部的身心健康。二是败坏政府形象。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迫使基层干部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打卡、刷分、留痕上,做了很多虚功,不求实效,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仅败坏政府的形象,而且容易引发负面舆情。三是扰乱基层政治生态。“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具有顽固性,它披着技术创新的外衣,带有很强的迷惑性,容易将传统的慵、懒、散、漫等工作作风不自觉地由线下搬到线上,导致一些基层干部对待工作漫不经

① 赵玉林、任颖、周悦:《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压力体制下的基层治理——基于30个案例的经验分析》,《电子政务》2020年第3期。

② 余哲西、郭妙兰:《直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五大病症》,《中国纪检监察》2019年第15期。

③ 方世南:《信息形式主义的四种表现》,《国家治理》2020年第25期。

④ 阳军:《新技术条件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表现及其治理研究》,《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2期。

⑤ 郑少中:《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当治!》,《人民日报》2020年8月5日,第1版。

⑥ 黄晗:《给“指尖”减压 给基层减负 给发展助力——湖南扎实开展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工作综述》,《湖南日报》2021年7月1日,第3版。

⑦ 论剑:《如何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10月21日,第6版。

⑧ 胡世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表现及治理》,《学习时报》2023年1月18日,第3版。

心、缺少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为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责任感,遇事能拖就拖、能躲就躲,无形中破坏了基层的政治生态。

二、“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治理方式比较

作为形式主义的新变种,基层政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引发广大基层干部的强烈反感和社会热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出台了做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影响深远的专项治理行动,并尝试建立常态化的治理机制。

(一)运动式治理

2020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指出“不得以微信工作群、政务APP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来代替对实际工作评价”。2021年1月,《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通知》提出了治理“指尖的形式主义”的具体要求,如不得对上级没有明确要求的学习类移动互联网程序进行积分排名、考核,坚决杜绝“代刷分”“凑学时”现象。同一事项、同一单位原则上只建一个工作群,非工作时间不发布工作信息。

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各地纷纷向“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亮剑,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专项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运动。比如,安徽芜湖关停市级及以下自建的信息系统35个;上海把市政府各部门信息化实施职能划转至大数据中心,实现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统一维护;江苏开展“啄木鸟行动”,加强基层政务APP监督队伍建设,直接听取基层评价;江西将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纳入政府工作考核内容,等等。

“亮剑行动”作为专项治理的一种形式,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以指上清风带来工作新风”,凸显了专项治理的威力。何为专项治理?专项治理通常指“在特定时间段内,针对特定问题,由权威主体发动的自上而下集中各部门人员、资源、注意力以共同完成预定的目标的治理过程”。^①专项治理是运动式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跨越科层制、短促突击、效果凸显等特点,深受政府部门青睐。这种治理方式贯穿了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既包括中央政府发动的波及全国的运动,也涵盖了中央政府某个部门及地方政府发起的部门性、地方性运动。前者如“环保督查”“扫黄打非”,后者如“安全生产大检查”“创城”等。

目前,全国上下正在持续进行的治理方式带有鲜明的运动式特征。首先,从治理方式上看,采用的是专项整治模式。《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通知》由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正式印发,其模式符合以任务型为焦点的运动式治理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其次,从动员强度看,党中央“一竿子插到底”抓专项整治工作,各地出台具体举措,上呼下应,步调一致,在短时间内形成声势浩大的一场治理风暴。再次,从治理预期效果看,采取“一刀切”办法,力求速战速决。

经过广泛动员、上下配合,“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仅政务信息平台少了,而且网络工作群数量得到了精简。与此同时,运动式治理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基层场域内发生的“内

^① 张玉昆:《运动式治理:对既有研究的回顾》,《领导科学论坛》2021年第3期。

卷化困境”以及“密集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轮番上演”。^①如此,运动式治理便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各种政务平台被集中整治,数量大幅度压缩;另一方面,新的数字平台又不断出现,基层干部的考核内容没有实质上减少,一些政府部门为了凸显自己的政绩,要求下属部门特别是基层单位下载各类APP的热情依旧,出现了一边为基层减负一边为基层增负的矛盾现象,基层干部依然被牢牢地绑架在手机屏幕上。

上述事实,从一个侧面映射了理论界对运动式治理模式有效性的争议。赞同者认为,运动式治理“是一种根植于稳定的、制度化的组织基础上的机制,甚至已深刻嵌入到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之中”。^②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在我国有特殊的基础,“治理资源有限性与治理目标多元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运动式治理存在的基础。运动式治理尽管在手段上是“非常规的”,但这种方式有着高度的适应性与延展性。“它的确能在短时期内制造出明显的、可见的成果,在纠偏、消除违法存量与创造震慑、示范效应等方面的成效尤为显著。”^③针对运动式治理的必要性,学者潘泽泉等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了提炼:

从内在条件来看,传统权威体制赖以维系的制度要素,与社会有效治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组织矛盾,政府因而采用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应对传统科层制的组织失败,以实现纠偏和规范边界的作用。从外在条件来看,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治理资源相对贫弱的处境,政府不得不通过间歇性的“运动式”治理方式集中社会资源,来应对社会治理需求与国家治理规模之间的结构性矛盾。^④

但更多的学者对运动式治理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运动式治理是“一种相对落后的治理模式”,具有明显的“非制度化、非规范化、非专业化”^⑤特征,“存在着法治之困、治本之难以及持续乏力三大局限”。^⑥这种治理模式蕴含着较大的风险和副作用,比如损害制度权威、造成行政之恶等。其中,学者李辉就运动式治理对制度有效性造成的伤害做了详尽分析:

运动式治理的弹性逻辑可能对制度有效性造成伤害。运动式治理的本质是在常规状态和特殊状态间形成标准不一的弹性逻辑,即常规状态下可能呈现出治理低效或乏力,但在特殊状态下雷厉风行、立竿见影。这一弹性逻辑从根本上要依靠权威主义来实现,无形中是对权威主义的强化,也是对规则的僭越和伤害。^⑦

① 潘泽泉、任杰:《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② 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③ 郝诗楠:《理解运动式与常规化治理间的张力:对上海与香港道路交通执法案例的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4期。

④ 王连伟、刘太刚:《中国运动式治理缘何发生?何以持续?——基于相关文献的述评》,《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⑤ 王连伟、刘太刚:《中国运动式治理缘何发生?何以持续?——基于相关文献的述评》,《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⑥ 郝诗楠、李明炎:《运动式治理为何“用而不废”——论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运动式治理》,《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0期。

⑦ 李辉:《“运动式治理”缘何长期存在?——一个本源性分析》,《行政论坛》2017年第5期。

(二) 常态化治理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生成逻辑决定了单靠运动式治理无法将其根除。“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何以产生?其原因有多个方面。有的学者提出,形式主义表现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但产生形式主义的根源只有一种可能,即“上行下效”。为什么会“上行下效”?这与我国的压力型体制有关。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必须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指标任务,包括经济指标、社会政治指标等。上级利用奖惩手段对基层政府进行动态控制。同时,压力型体制与数字治理之间存在多维冲突。包括“唯上主义与公民导向,层层发包与公众满意,政府主导与多元协作,部门分割与职能整合”。^①有的学者从思想意识维度进行分析,认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根源是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②有的从制度上追根溯源,认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问责机制异化的相机策略”。^③在越来越严厉的考核压力下,为了避免被问责,基层政府无从逃避,只能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还有的学者认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产生与基层治理体系的新特点密切相关,“对上不对下”的基层治理体系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滋生的根源。^④

既然运动式治理存在短板,那么用何种方式予以取代?学术界提出了常态化治理的主张。所谓常态化治理(又称常规化治理),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制度化治理,即“政府通过构建明确的制度和程序,安排专门部门和人员,合理利用资源,加强技能培训,发挥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对各种冲突的常态化、经常化和规范化管理”。^⑤常态化治理与运动式治理至少有三点不同:一是注重制度规范建构,通过建章立制力图从根源上解决特定问题;二是强调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政治动员、社会动员等方式将社会力量纳入体制内,实现多元力量整合,避免政府闭门造车;三是强调结果的可持续性。常态化治理努力将治理效果放大,实现效益最大化。常态化治理避免了运动式治理的弊端,构建起“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治理的长效机制。

这一点在顶层设计中也有所强调。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通知》提出,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要将“当下改”升级为“长久立”,要完善机制,将集中批量化清理改为常态轻量化管理,减负松绑的成果要长期“在线”。各地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摸索出了一些经验。比如,辽宁省抚顺市督促相关单位建立严防“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反弹回潮的长效机制,加强源头管控,推进资源融合和数据互通,减少重复建设;福建省连城县纪委监委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落实情况纳入《2021年监督工作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考核原则,督促各部门细化绩效考核方案,取消涉及过度留痕的考核内容;江苏省金湖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组织部、考核办等部门,规范考核体系,调整评价方式,注重实绩结果、群众评价、现场查看,要求以实绩论英雄。^⑥

① 赵玉林、任莹、周悦:《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数字治理——基于30个案例的经验分析》,《电子政务》2020年第3期。

② 申国华:《狠刹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红旗文稿》2019年第13期。

③ 佟林杰、张明欣:《数字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制度困境及消解策略》,《理论导刊》2022年第4期。

④ 吕德文:《治理技术为何方便了形式主义》, http://www.legaldaily.com.cn/commentary/content/2020-08/10/content_8272273.htm.

⑤ 孟迎辉、崔萌萌:《社会管理范式的转移——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化治理》,《党政干部学刊》2014年第11期。

⑥ 初英杰:《持之以恒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从群里吼到实地走》,《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7月5日,第6版。

虽然我们渴望通过建章立制解决运动式治理的不足,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所谓的常态化治理也有失效的时候,因为常态化不等于长效化,常态化治理机制失效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屡上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度空转、制度成为“稻草人”等问题屡见不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治理中的日常预警、研判、处置系统能否发挥实际效果,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也受制于执行者的理解力和执行力。就制度设计而言,制度越精细化、标准化就越可能束缚基层干部手脚;就执行力而言,执行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对执行效果有很大的影响。在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干部数字素养的欠缺,成为“引致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重要因素”。^①

三、走向复合型治理

数字政府方兴未艾。2022年6月6日,《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14号)发布,明确提出要“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进政府治理流程优化、模式创新和履职能力提升,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政府运行新形态,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对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生态的引领作用”。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移动互联网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有利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滋生的空间会越来越大,啃下“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一“硬骨头”需要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

(一)破解“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需要新思路

形式主义之所以被称为顽症,就是因为这种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屡治屡犯,经常性地反复。以“文山会海”为例,2012年底出台的中央“八项规定”将“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列入重要规范内容,但多年过去了,“文山会海”现象依然存在,且出现新的形式——由线下搬到线上。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治理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与过去相比,数字技术主导下的形式主义更系统、更隐蔽、更顽固。从系统性上看,“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依附于体制内,上下贯通、左右勾连,不仅基层不喜欢,上级部门即使知道也很无奈。从隐蔽性上看,“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披着技术创新的外衣,具有迷惑性,传统的治理手段难以触及隐藏在各种规定背后的技术形式主义。从顽固性上看,治理技术一旦建成,自有一套运作方式,并产生反向适配效应——上级和下级都要依赖于技术,形成事实上的“路径依赖”。

就长时段而言,基层政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治理进程可能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阶段,运动式治理为主阶段——从上到下全员发动,开展集中清理整顿;第二个阶段,巩固前期成果,注重建章立制,治理方式由运动式治理向常态化治理转型。在这一阶段,运动式治理让位于常态化治理;第三个阶段,经过常态化治理,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有关的利益方的博弈进入均衡状态,问题不再凸显。这个时段维持的长短取决于治理制度的完善程度及执行者的执行力度。如果这两个要件中的一个有所欠缺,那么,“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会慢慢累积并日益严重,新一轮集中治理整顿可能再次“登台亮相”。这样,我们将陷入“问题出现—进行治理—问题再爆发—再治理”的恶性循环。基于形式主义顽固性及过去类似问题的治理经验,这样的结果虽然我们不愿意看到,但很可能不得不面对。

^① 胡世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表现及治理》,《学习时报》2023年1月18日,第3版。

所以,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既不能犯“急躁病”,力图通过一场运动就彻底解决,也不能因为强力整顿之后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而产生“悲观论”。^①我们要认清“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特点和运行规律,及时转换思路,寻求治理方式的新突破。

(二)复合型治理策略及推进路径

关于运动式治理与常态化治理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所持看法可以概括为矛盾论和协同论。矛盾论是指常规治理与运动治理相互冲突,常规官僚体制的组织失败是运动式治理得以产生并能够发挥作用的根源。^②运动式治理的治理对象往往是一些重大事件、突发事件或者棘手问题,在有限时间内常规治理模式无法解决。^③所以,在实践中我们就面临二选一的难题:要么选择运动式治理,要么选择常态化治理;协同论看法则与相反,其主张颇有新意。协同论则将常规治理和运动式治理理解为同一治理过程的两个阶段,其各自的特征与不同治理阶段的治理需求相适应,并且相互配合才能够完成有效的治理过程。常规治理和运动式治理是一个双层治理的有机体系,运动式治理以常规治理为基础,常规治理以运动式治理为补充,两者纵向协同才能完成治理过程。^④

这种观点否定了运动式治理和常态化治理之间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认为两者不是二选一的对立关系,完全可以实现有机结合,即将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一同嵌入基层政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治理过程,并根据治理需求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这种治理策略不同于以往单一的治理范式,强调双重治理逻辑,是一种更为全面系统的治理观。我们将之称为复合型治理。这种范式不是对单一治理模式的简单否定,而是立足基层治理客观需要的一种融合与超越。换言之,复合型治理不是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型治理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治理形态。具体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治理每一个阶段,运动式治理和常态化治理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而是以哪一个为主或者更突出而已,两种治理模式并存更符合基层治理的总体要求。比如,在常态化治理阶段,是否就完全取消运动式治理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这一阶段,可以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在局部开展运动式治理;同样,在运动式治理为主阶段,也不忽视常态化治理,国家可以将地方创造的某些制度予以升级、推广,这就形成了常态化中有运动式、运动式中有常态化的复合型治理模式,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完美相统一。

当然,上面描述的只是基层政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治理的一般过程与发展态势,实际的治理过程可能远比上述假设复杂。这不仅因为运动式治理与常态化治理的交替往复很难以线性逻辑呈现,而且二者相互嵌入的方式会随着治理进程而出现多样化的形态。有时,常态化治理被运动式治理的宏大声势所掩盖,隐而不显;有时,运动式治理又暗含在常态化治理的大格局中,不加注意就很容易忽略。

由此观之,走向复合型治理,需要我们做出如下改变。第一,在治理理念上,不能只满足于“破”,更要重视“立”,即从制度机制入手,为基层数字化治理提供制度指引和有效规制,以制度性整合代替运动式治理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克服短视行为和功利化倾向。第二,在治理方式上,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

① 蒋来用:《中国共产党反对形式主义的历史性考察与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② 许汉泽、邵瑞雪:《从运动式治理到常规化治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转换》,《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③ 董明伟:《制度整合式治理替代运动式治理的创新优势与路径构建》,《领导科学》2021年第22期。

④ 安永军:《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纵向协同机制》,《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不将运动式治理与常态式治理视为“相互替代关系”，“两者皆可视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双重过程和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也必须进行衔接”。^① 我们应努力找到两种治理方式的衔接点，实现两种治理方式优势互补。第三，在治理预期上，不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必须打持久战，要采取分布推进的策略，将阶段性目标与长远目标紧密结合，以便让数字赋能更好地服务基层治理现代化。

综上，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不能因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而否定数字赋能的合理性。面对呼啸而来的数字时代，我们必须勇敢地迎头而上。破解基层政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难题，应秉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在治理工具选择上，发挥运动式治理和常态化治理的组合优势，构建新的复合型治理模式。这不仅契合科层制组织运转的特点，也能够满足治理基层政府“指尖上形式主义”的现实需要。治理逻辑的变化将直接直接影响政策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转型，这就要求我们破立并重，逐步铲除“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生存的土壤，让基层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为民办实事上。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需要发挥运动式治理和常态化治理的优势，不意味着推进过程的一帆风顺。毕竟，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在实践中往往存在相互排斥的现象并暗含内在张力，这一点无法否认。另一方面，运动式治理和常态化治理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如果不能相互转化就无结合的必要与可能。在基层政府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治理过程中，二者相互转化的条件是什么？转化的逻辑机理和运行方式有哪些？等等，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大量的实践验证。本文仅仅提出了命题并做了初步论证，更加繁重的工作有待理论界同仁聚力而为。

责任编辑：侯德彤

Compound Governance: The Logical Approach of Breaking the "Formalism at the Fingertips"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Wang Yi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Qingdao Committee,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igital government have given birth to "formalism at the fingertips". This is a new formalism emerg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programs,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e carriers, content renovation, high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and serious homogenization, which not only increases the burden of the grassroots, but also damages the image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In practice, there are two kinds of governance: mobilized governance and regular governance, which have different logical mechanisms and effec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ormalism on the fingertips, we should adopt a compound governance strategy, and make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in the concepts, methods, expectations and other aspects of governance.

Key words: grass-roots government; formalism; mobilized governance; on a regular basis

^① 郝诗楠、李明炎：《运动式治理为何“用而不废”——论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运动式治理》，《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0期。



姜振昌,男,1952年生,山东昌邑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模范教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高校十大优秀教师,山东省教学名师等。历任山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东方论坛》主编等职。兼任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临沂大学教授,全国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鲁迅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重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近20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其中7篇被《新华文摘》主体转载,出版个人学术著作《中国现当代杂文史通论》《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经典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等5部,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17次获得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奖,其中一等奖3项、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2项。201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2018年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连续十多年入选青岛大学特聘教授高层次。



尹振涛,男,1980年生,山东青岛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秘书长。主要从事金融科技、金融风险与监管研究。在《管理世界》《政治学研究》《经济学(季刊)》《南开管理评论》《中国农村经济》《中国人口科学》及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金融时报》等发表理论及评论文章1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5部、译著4部、编著10余部,主持和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省部级项目30余项。相关学术成果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九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经济学优秀论文二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奖、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等。本人曾获“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荣誉称号、第七届全国优秀金融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多次参加国家及部委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或专家咨询会,撰写大量决策咨询报告并获得重要批示。



